



# A GLOBAL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 HISTORY



# 全球通史

## 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 梁赤民 董书慧 王昶 译 吴象婴 审校

第 7 版  
修订版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畅销35年经久不衰 最新版本图文并茂

## 专家学者联袂推荐 大师力作一生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潜心力作自1979年初版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

第7版在保留原文精华的基础上，融入了时新的研究成果，新增了数百幅生动珍贵的图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名著在内容和体系上更加完善。

作者文笔隽永，笔力深厚，才思横溢，整部著作风格前而后一贯，令您在颇具历史韵律的行文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重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阿诺德·汤因比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其中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最为著名。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全球通史》，是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首要参考教材之一，对我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

本书享誉世界几十年，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与《梦的解析》、《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间简史》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

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刘德斌

本书英文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敬请参阅。

ISBN 7-301-10948-2



9 787301 109489 >



www.pearsoned.com

ISBN 7-301-10948-2/K · 0453

定价：42.00元

# A GLOBAL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 HISTORY

# 全球通史

1

## 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 梁东民 董书志 王兴 译 吴象婴 审校

第 7 版  
修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2-628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 L. S.)  
著;吴象婴等译.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ISBN 7-301-10948-2

I. 全… II. ①斯… ②吴… III. 世界史:通史 IV. 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9872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from Proprietor's edition of the Work.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7th edition, by L. S. Stavrianos, Copyright © 1999

ISBN: 0139238972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earson Education 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 Inc.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and distribution 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sive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Pearson Education 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

书 名: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册)

著作责任者: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 梁亦民 董书慧 王 昶 译 吴象婴 审校

责任编辑: 徐文宇 苑海波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948-2/K·045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5887409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3.5印张 10页插图 464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2版

2006年10月第2次印刷(总第12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斯塔夫里阿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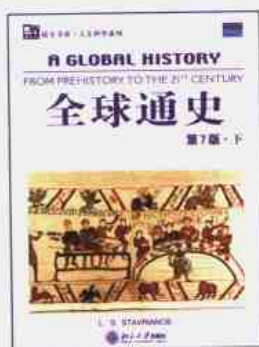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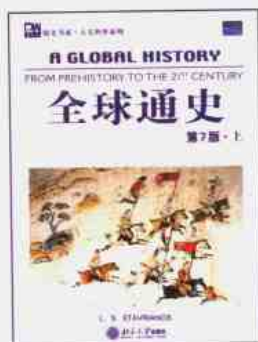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虽然他以《全球通史》闻名全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为学术界所称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其他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拉荷亚去世，本书不但是斯氏《全球通史》的最新版本，也成了其最后版本。

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英文影印版

ISBN 7-301-07656-8

全套定价: 78.00 元 ( 16 开 736 页)

责任编辑 / 徐文宁 苑海波 封面设计 / 海云书装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中睁大双眼,每天都有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教皇保罗六世,1969年5月18日

---

## 致读者

### 为什么需要一部 21 世纪的全球通史？

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例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欧洲帝国的消失便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从根本上起了变化,从而反映了已在20世纪中叶以前出现的这一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但世界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的出现、《世界历史杂志》的问世以及本书第1版的出版,皆证实了这种转变。

这又使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上: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几十年就又要出版面

向 21 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 1 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的无处不在，显见于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种种巨大的问题”中。例如，20 世纪末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木制东西如何抵挡得住呢？

地球母亲已产生人类生命；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Jaques Cousteau)已发出警告：“人类在 20 世纪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在先前全部人类历史中造成的还要多。”<sup>1</sup> 同样，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于 1989 年下结论说：“到 1999 年，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将要到来。随着世界进入 21 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sup>2</sup>

由于物种与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题有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类书名的一系列著作已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物种链上的小小一环，那么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 4 000 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 50 亿到 400 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 1% 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 99.9% 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纪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不过，这种统计却具有误导性，因为在人类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高级智能的人类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来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是能够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的独一无二的物种。

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的关系变化来予以戏剧性的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它最初出现在至少 2 000 多年前的远东，8 世纪时被传播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往其他大陆迁移，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诸岛的岛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欧洲大陆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 1796 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所以，天花与人类的关系给完全颠倒过来了。已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出现在 1977 年的索马里。1980 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



已被根除。

科学家们一度建议把实验室中余留的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样本也彻底毁掉,以防止它们传播开来。但是人们延迟了做出这一最后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可能会对将来的研究有用。现在,科学家们已制造出无害的天花 DNA 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可供研究,这样;天花病毒的样本存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董事会一致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定为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和消灭)它。由此可见,人类已俨然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首要地位乃我们当今全球性隐忧与恐惧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与我们的内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sup>3</sup>

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学(F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36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会健康状况中的这种“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

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

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sup>4</sup>

库斯托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者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中国，当毛泽东于 1949 年开始执政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后来，消费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变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 1990—2000 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 272 524 辆增长到 675 000 辆左右，印度从 354 393 辆增长到 1 100 000 辆，而中国则从 420 670 辆增长到 2 210 000 辆。<sup>5</sup>

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sup>6</sup>

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对基本原则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诸如“追逐名利、争夺权位”之类的“卑微目的”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吗？

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考虑。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这种躲闪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而，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昙花一现的生涯中的最大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利用其卓越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自己目前在地球上的首要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又随着这一地位迅速消失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社会与环境的退化中，人类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种种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 21 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们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

形态的纯洁”。<sup>7</sup>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供选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不同程度地将国家计划经济、被互相连接起来的联合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和政府对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工业的资助结合在一起的正在扩散的亚洲经济形态。

这种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确定无疑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比较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

## 注释

1.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ummer 1996), pp. 48, 49.
2.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s, State of the World 1987, 1989* (W. W. Norton, 1987—1989), pp. 194, 213.
3. Cited in A. Pacey,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1983), pp. 114—115, 178—179.
4. J. Cousteau, “Consumer Society Is the Enemy,”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ummer 1996), pp. 48, 49.
5.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6.
6.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pring 1989), pp. 4—8.
7.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87.

## 致 谢

本书中以下章节开篇的引语是引自下列作者和出版商的作品,在此谨表示真挚的谢意:

第一章引语引自 Clyde Kluckhohn, *Mirror for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49), p. 11。

第二章引语引自 R. J. Braidwood, “Near Eastern Prehistory”, *Science*, vol. 127 (June 20, 1958), 1419—1430。

第八章引语引自 Robert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 1962 by Max Leclerc et Cie, Prop. of Librairie Armand Colin and © 1966 trans. By J. M. Dent & Sons, Ltd., and published in 1967 by M. Evans and Co., Inc., New York, by arrangement with J. M. Dent & Sons, Ltd.。

第九章引语引自 Lynn White, Jr., “Tibet, India, and Malaya as Sources of Western Medieval Technolog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 (April 1960), 515, 526。

第十二章引语引自 W. C. Bark,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66。

第十四章引语引自 Lynn White, Jr.,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XL (1940), p. 156。

第十七章引语引自 A. J. Toynbee, *Civilization on Trial*, © 1948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第二十一章引语引自 Lynn White, Jr.,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XV (1940), p. 156。

第二十四章引语引自 B. H. Sumner,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3), p. 1。

第二十六章引语引自 Herbert Butterfield,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57), p. 179。

第二十八章引语引自 Peter Chaadayev, *Apology of a Madman*, cited in H. Kohn's *The Mind of Modern Russia*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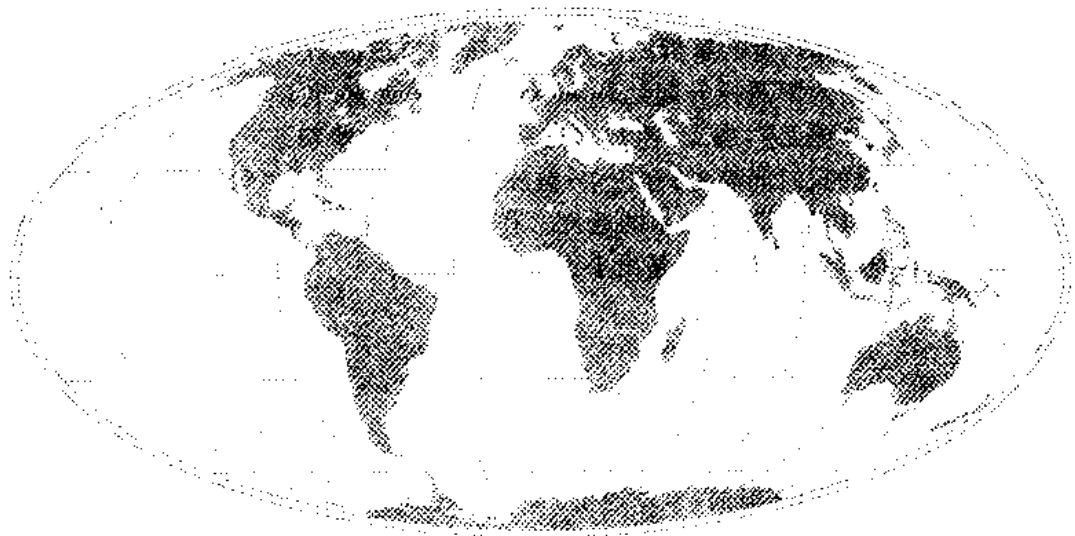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章引语引自 H. A. R. Gibb, “Social Change in the Near East”, in P. W. Ireland, ed., *The Near Ea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 43。

第三十章引语引自 Arnold J. Toynbee, *The World and the We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第三十一章引语引自 J. K. Fairbank,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Japan and China”, from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I, No. 4。

第三十六章引语引自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9)。

第三十九章引语引自 Arnold J.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



##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刘德斌(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翻开这本书,人类的过去就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的忧虑与警示。不同于那种把自己的观点和观念强加给读者的历史学作品,这本书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没有教育人的口吻,却把读者引入到一种求索的境界,让你不由自主地手不释卷。这本书就是享誉世界几十年、已经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全球通史》。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尽管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讲过长难记,但它已经随着《全球通史》一起进入了中国人的知识殿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熟知。

毋庸讳言,阅读历史,特别是通史类的教科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书却可以让读者比较轻松地读下来。这本书问世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不断再版,不仅为英语国家读者所喜欢,而且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

为在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有人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与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J. M.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等并列为 20 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可见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sup>1</sup> 作为历史教科书，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殊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恐怕也是出乎许多人意料的。

### —

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全球通史》何以有如此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观全书，读者首先会发现，《全球通史》虽是史书，但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它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创作的冲动。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询和解答的过程。例如，《全球通史》对伊斯兰教势力从中东不断地向周围扩张，直至非洲、中亚东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自然地体会到“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体会到当今世界围绕“大中东”的诸多矛盾冲突的缘起，体会到历史与现实是如何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作品的时代感或现实感问题。“古往今来”是通史类教科书的必然属性。但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埋头于“从过去到现在”的叙事，而对读者的求索目标和心态需求不能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历史作品的“受众”就只能局限于本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局限于以获取学分为目标的“专业读者”之内，而难以拥有历史专业以外的广大读者，历史作品就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许多大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感或现实感。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是继施宾格勒 1917 年《西方的没落》发表之后的另一篇历史巨著。但与《西方的没落》不同，《历史研究》并不认为西方的没落在劫难逃，而是对其存续持乐观态度。很明显，《历史研究》不仅是“历史研究”，而且也是对当时萦绕西方人心头的现实问题的正面回答。据汤因比先生本人说，他 1924 到 1956 年撰写《历史研究》期间，还为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他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是脚踩

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在这本《历史研究》的修订插图中,我同样是两者兼顾,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因为当你研究现在和过去的时候,对未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反而荒唐可笑了。”<sup>2</sup> 汤因比在阅读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后曾撰文指出,尽管此书结束于1500年,但却给他以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医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sup>3</sup>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进入《全球通史》的意境之后就会发现:你不仅在阅读历史,而且也在了解现实;你不仅在与过去沟通,也在与现实对话。可以肯定,当你阅读了《全球通史》之后,会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会对这个世界的走向有一个自己的判定。所以我认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感。

## 二

《全球通史》不同凡响,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西方,早在启蒙时代就有人试图以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但后来“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获得强有力的推动,而先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则消失了。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或二战后,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在西方学术界重新燃起,代表性作品包括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

人们一般都把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看成当代“全球史观”的理论上的先行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1967年的《当代史导论》、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同年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和1971年)和W. H. 麦克尼尔的《世界通史》(1967年),则被巴勒克拉夫视为体现了“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 H. 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sup>4</sup> 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也把1960年代“世界历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的成立、“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出版和1970与1971年他的《全球通史》第1版的出版,看成是西方学术界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转变的证据。<sup>5</sup>

巴勒克拉夫等人所倡导的“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一切民族的建树”。“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sup>6</sup> 在《当代史导论》中，他明确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阐释体系。<sup>7</sup>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构建全球史学已经成为史学界多数人共识的今天，我们重读半个世纪以来巴勒克拉夫等人的作品，不能不被他们的先见之明所折服。

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 1500 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 1500 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势。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融入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中去。众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也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它无视“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同时也把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1840 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无意这样为难我们。它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程的比较，而不是要把各地区的历史整齐划一。换言之，它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的历史进度。实际上，当代多数西方学者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历史在这个星球上不是按同一个速度进行的”，“三分法”存在着清晰的欧洲中心论偏见。<sup>8</sup> 正如美国学者威廉·迈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基督徒，并且只有亚欧大陆的最西端属于罗马帝国。一个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是一个影响全体的但无帝国疆界的宗教，在后来是它的分裂及由一个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经历对于西方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社会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sup>9</sup> 但是，对于“三分法”的否定并没有阻碍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分期上进行的不懈努力。实际上，多少年来，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上一直在做不同的



努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契合点。如沃尔夫从“家族秩序的生产方式—纳贡(封建)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的分期,<sup>10</sup>麦金德从“开放体系—封闭体系—开放体系—封闭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sup>11</sup>沃勒斯坦从“微型体系—世界帝国—世界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期,<sup>12</sup>霍奇森从“农业时代—技术时代”角度进行的分期,<sup>13</sup>麦克尼尔从“前文明—文明—相互联系的文明—全球文明”角度进行的分期,<sup>14</sup>格尔纳从“狩猎—农业—技术”角度进行的分期,<sup>15</sup>迈克高希从“文化技术”(原始或表意文字、字母文字、印刷术、电子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角度进行的分期<sup>16</sup>和布赞与利特尔从“前国际体系—相互联系的国际体系—全球国际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sup>17</sup>等等。仔细研读这些分期后我们会发现,尽管它们的切入点不同,时间上有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把1500年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换言之,1500年是多数世界历史分期在时间上的共同契合点。这可以证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以1500年为界的基本划分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同时也给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以诸多参考和启迪。

### 三

《全球通史》不想在阐释体系上束缚住读者的想象力,作者的阐释手法更是让读者得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sup>18</sup>例如,《全球通史》打破地区和民族的界限,按照历史运动本身的空间来阐释历史,不仅让读者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整体世界史”的思考境界,而且可以从中悟出许多对现实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尤其对我们深入考察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形式遮盖之下的真实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声言自己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但实际上他对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多种方法,如文明模式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文明交流理论、长时段和宏观历史理论等,都了如指掌,应用娴熟,从而为读者构建起一幕幕雄伟的历史画卷。不同领域的读者可以从《全球通史》的不同侧面,汲取不同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一本历史学的巨著应该做到的。当然,《全球通史》也阐释了许多人们共同关心的观点和话题。如作者在考察欧亚大陆文明兴衰时指出:如果其他地理条件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间的“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因为易接近性既为各民族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制造了淘汰的压力;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部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历史;农业文明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和黑人的优势;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里,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但到了古典时

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除了宗教领域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续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如希腊和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正是欧亚大陆的西方古典文明比其他文明遭受了更彻底的破坏,无法复原,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才使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西方衰落了,但西方开启的现代革命却蔓延到全世界,因而西方也是成功的,等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让读者对中国的历史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中国读者理解中国的历史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如他认为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他还认为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只有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这就是公元前 221 年秦王朝对中国的统一,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然,《全球通史》充满富有哲理的睿见,笔者常读常新,这里只是简单地举要而已。

## 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译本是这本享誉世界的历史教科书的第 7 版。该书第 1 版上卷问世于 1970 年,下卷问世于 1971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作者 1999 年推出的最新版本译出的。

同第 1 版相比,第 7 版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覆盖的时间跨度增加了。作者把他所阐释的内容延展到 1990 年代末。新版本加入了冷战终结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的内容,最后以苏丹的饥荒和印巴核试爆结尾,更加凸显了他一直强调和忧虑的这样一个历史主题,即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第二,原来上下两卷的副标题分别是“1500 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 年以后的世界”,第 7 版上下两卷只有一个副标题:“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突出全书是一个整体。第三,许多章节的内容都做了调整和简化,更加适应历史学专业以外读者的需求;同时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始文献资料,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新版本开辟一章专门介绍波利尼西亚即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从而更加显示了“全球通史”的完整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新增了数百幅生动珍贵的照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经典之作更加图文并茂。最后,作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最新参考书目,进一步丰富了《全球通史》的信息含量。

关于这个新版本,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在“致读者”中有这样的表述:“每个时代都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

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sup>19</sup>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斯塔夫里阿诺斯回答说:“答案与出第1版时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sup>20</sup>

## 五

最后,我们该来谈谈《全球通史》的作者本人了。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虽然他以《全球通史》闻名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为学术界所称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其他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等。《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英文版出版于1981年,1993年我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全球通史》的延续和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采用冷战期间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界定,而是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认为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也与地理位置没有绝对的关系;最早的第三世界发端于东欧,之后才将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纳入进来;第三世界不是与西方偶有联系的遥远异域,而是西方自己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这也是一本非常值得研读的历史著作。在1997年发表的《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三个类型,即家族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对世界历史提出了一种独特诠释。在每一个类型的内部,斯塔夫里阿诺斯又研究了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和战争四个生命线问题,并就与这四个生命线有关的21世纪可能的前景进行了展望。相信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本书也会给中国读者诸多启示。

当然,同其他学术作品一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在研读和欣赏这部20世纪的优秀作品时也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尽管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由于他特殊强调西方是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所以人们就对他是否真正地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产生了怀疑。另外,人们普遍认为西欧文化并没有在中世纪荡然无存,因此他关于西方何以从落后变为先进的立论就不够坚实,他对整个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历史命运的整体解读因而也就不能说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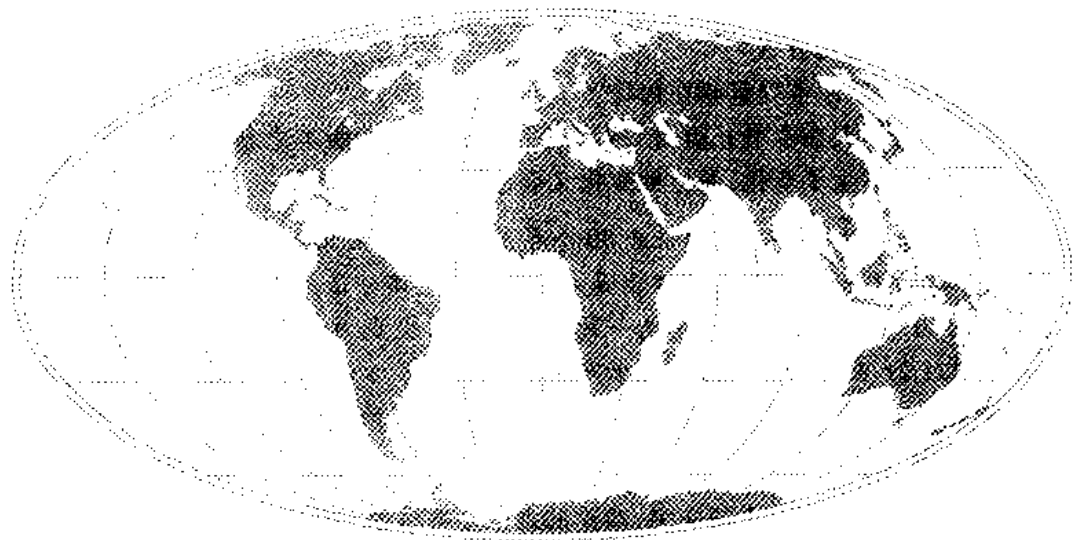
全站得住脚了。

不过,这些问题都可以见仁见智,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别人优秀作品的时候应该具有一种批判精神,这样才能够为我所用,充实自己。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化的链条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大国,是一个历史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我们迄今还没有奉献给世界一本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样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的人们所熟知和欣赏的史学力作,我们甚至依然在用别人的模式理解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这是与我们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身份不相符的。中国的强大有赖于中国文化力量的发展和强大,其中包括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解读能力和阐释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塔夫里阿诺斯及其《全球通史》是一面镜子,它映照无数的你和我。

## 注释

1. 邢宇皓:《百年回首——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光明日报》2000年1月6日。
2. 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2页。
3. 张广勇:《从文明中心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88年中译本,第49页。
4.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264—266页。
5.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第XIII页。
6.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158页。
7.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6年版,第13—16页。
8. 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第342页。
9. 威廉·迈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9页。
10. Wolf, Eric, R.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Mackinder Halford J. (190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13, pp. 421—437.
12.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3. Hodgson, Marshall G. S., (1993),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McNeill, William H., (1963),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Gellner, Ernest (1988), *Plough, Book and Swor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London, Paladin.
16. 威廉·迈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
17. 参阅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18.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54页。
19.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 XIII 页。
20.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 XIII—XIV 页。



##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

盛行于当今西方史学界的“全球史”之风,刮了已经有几十年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首次把世界唤作“地球村”起,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方史学家就感到了一种必要,那就是必须突破19世纪以来国别史和西方中心论传统,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以便提供某种参照,对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培育产生积极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内容(这常常与起分裂作用的民族国家紧密相关),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史学考察的重点,同时试图赋予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各区域文明之间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所谓的“全球史”,就这样渐渐发展了起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全球通史》,就是这个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它最初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而由于它的杰出,一经问世它就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所以如今它已经是一部风靡全球的全球史经典了。我国的读者对它当然也不陌生。9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首要参考教材之一,而它对我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是行内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较之以前的版本已有了

很大的不同,因为作者已根据 21 世纪世界的新需要,对本书从架构到内容都做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优化升级”。

那么,这个新版本究竟新在何处?

按照作者本人在本书开篇的“致读者”中的解释,新版本之新,主要就新在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全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为什么本书第 1 版问世才 30 个年头现在就又要出版面向 21 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 1 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结果,而 90 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

而“致读者”中接下来的文字,谈论的则全是核战争的可能性和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生命”和“地球母亲”带来的双重威胁,从中透露出的信息似乎是:如果说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的核心问题是由殖民地革命凸显的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的话,那么 21 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就已经转到了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方面了。

但那个“60 年代问题”是否就此消失了呢?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对于上述那两大问题(它们正是 20 世纪末以来全球史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作者在书中仍给予了同等的关注。也就是说,作者在敏感到现代科技负面影响问题凸显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对包括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在内的社会公正问题有丝毫的忽略,因而他也就没有忘却上面谈到的全球史初兴时的那份现实关怀,而那也正是全球史必须坚守的一份优良传统。

在本书的旧版本中,作者对“60 年代问题”的解决充满了乐观。这份乐观来自汤因比。汤因比曾盛赞当今时代,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敢于认为可以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的时代。斯塔夫里阿诺斯深以为然,并由此浮想联翩:

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 4.3%,即 400 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

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sup>①</sup>

然而,事过30来年后,作者是不是还能这样乐观呢?看来有点困难了。实际上,类似的言论在新版本中已经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种种消极影响的令人沮丧的描述。作者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指的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多项技术突破,包括核能、人工智能、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农业革命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使本书的新版本成为必要的那种“科技的神奇影响”之源。作者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性”的,导致了第三世界经济的恶化以及富国和穷国差距的惊人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欠发达国家的10倍,到1965年时这一比率转变为15:1;而到20世纪末,预计这一比率还有可能达到30:1。<sup>②</sup>同时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也在日趋严重——据联合国1994年的《人权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sup>③</sup>当然,作者也没忘记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乃至战争诸方面造成的各种有害的世界影响。至于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它归结为“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时间滞差,也就是说是因为受制于传统的人类总不能及时地变革社会以适应技术变化带来的新环境的缘故。

尽管如此,我们的作者仍然对未来满怀希望。他反对诸如人类将在“核冬天”中自我毁灭之类的悲观论点,理由是虽然今天的人类还在像其祖先那样不停地做着种种蠢事,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今天我们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那么这些优势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二是人权意识的全球觉醒,它们正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推动整个人类向自由王国飞奔——“这种新萌发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表明,现在的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sup>④</sup>这就是他的结论。

显而易见,作者在这里表达的,其实就是他对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应该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一开始就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礼赞,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5—897页。

② 参见本书第44章。

③ 参见本书末:“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④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up>st</sup> Century* [《全球通史·下》(英文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pp. 666—667.



尽管其曲调往往显得低回而不高亢。它试图展示人类社会从远古经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进步历程，这无疑还是启蒙主义的路数，还是所谓“宏大叙事”——只不过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它符合全球民众对自由平等、社会公正的渴望，而且契合“全球史”的精神。在本文开头处我们曾提到，“全球史”写的实际上就是“文明史”（这使它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史、民族国家史），其目的是要推动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建设。这种“共同文化”，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不是别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一点他虽没有明说，但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地从他在本书的老版本里写的这句话中体会出那个意思：

今天，欧洲三大革命（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引者）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面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sup>①</sup>

这句话虽短，却说得很有到。它道出了“三大革命”与后来广泛流播于全世界的现代文明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从而凸显了现代文明崇尚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本质内涵；同时它又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由现代文明的传播所创造的“世界文化”将是同质性与多样性的一种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世界各民族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即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同时，还将继续保留自己的某些可以与现代文明兼容的文化个性，从而继续维持各现代化社会之间的种种“细节上的不同”。显然，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关现代文明的理论信息。

只是很可惜，在新版本里，这段话随着内容结构的调整而消失了。但作者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似乎并没有变化，因为新版本的第七编中所阐述的，仍然是有关“欧洲三大革命”造就了某种统一的世界文化的一些基本事实。不过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了——实际上这个词在新版本中已完全看不到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情况是：“现代文明”或“工业文明”这种本来应该成为本书主要关键词的词汇（因为本书的章节结构就是按从古典文明到中世纪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这个逻辑理路排列的），作者好像也不大敢用。甚至作者一直都不曾给现代文明下一个像样的定义：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它是一种“新型的、与欧亚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别的、充满活力与扩张性的文明”。<sup>②</sup> 作者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这种畏缩躲闪，与他在谈论“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巨大潜力”时的那种眉飞色舞，显然不大合拍；而那所谓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其实与现代文明，或与由欧洲三大革命的传播造成的那种全球统一的“世界文化”，本质上却是毫无二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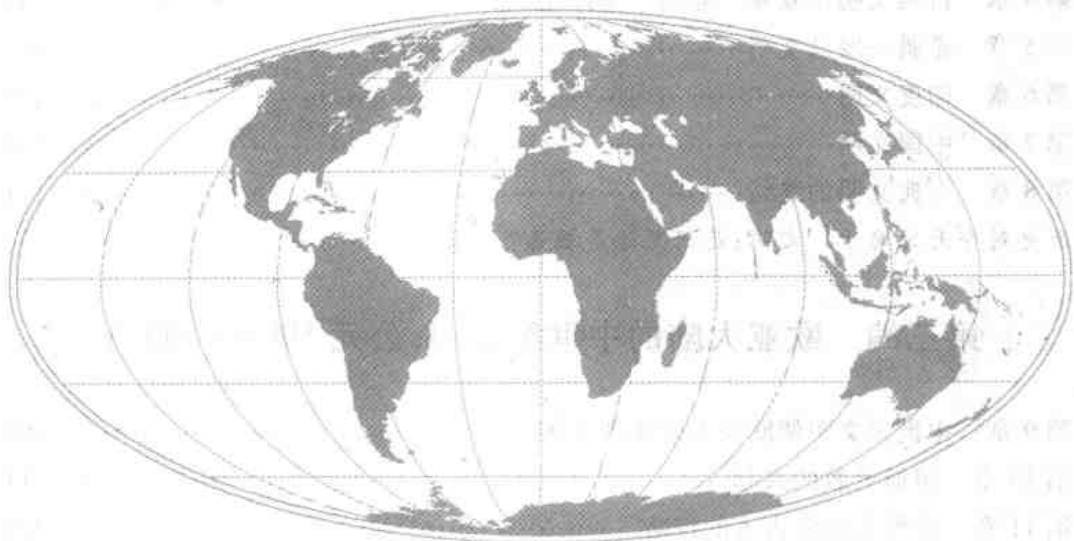
至于何以会出这种差池——恕我直言，很可能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余毒所致。

<sup>①</sup>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4页。

<sup>②</sup>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up>st</sup> Century* [《全球通史·下》(英文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p. 305.

毫无疑问,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赞成文化多元论而唾弃文化一元论的,绝无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高明那种粗俗观念。但是很遗憾,像很多西方学者那样,他也难免受到了萨义德所说的那种“东方学”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本书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他始终把三大革命仅仅看做西方文明的历史贡献,从而也就把现代文明看做了纯粹的西方文明,并进而把现代化看做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参见本书第七编)。这样做的问题,似乎是不恰当地忽略了广大东方民族对欧洲三大革命的诸多重大贡献,因而也就看不到现代文明中实际存在着的大量东方文明要素,结果也就无法深刻体认现代文明本身特有的那种世界性或普世性。如此说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闪烁其词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把一个在他看来纯属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说成一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的本质的时候,他分明感到了一种道义上的不妥,以及一种理论上的踌躇。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拉荷亚去世,享年91岁。谨以拙文聊寄哀思。



## 简明目录

|                               |         |    |
|-------------------------------|---------|----|
| 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 21 世纪的全球通史? ..... | 斯塔夫里阿诺斯 | 9  |
| 《全球通史》第 7 版推荐序 .....          | 刘德斌     | 15 |
|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           | 高毅      | 25 |

### (上册)

#### 第一编 史前人类

|                       |    |
|-----------------------|----|
| 第 1 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 | 3  |
| 第 2 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 | 23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  | 43 |

####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 500 年之前)

|  |    |
|--|----|
| 第 3 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1000 年) ..... | 49 |
|--|----|

|          |                                 |     |
|----------|---------------------------------|-----|
| 第4章      | 古典文明使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 83  |
| 第5章      | 希腊—罗马文明                         | 101 |
| 第6章      | 印度文明                            | 139 |
| 第7章      | 中国文明                            | 155 |
| 第8章      | 古典文明的终结                         | 171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 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                     | 193 |

###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1500年

|          |                  |     |
|----------|------------------|-----|
| 第9章      | 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  | 199 |
| 第10章     | 伊斯兰教的兴起          | 211 |
| 第11章     |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 225 |
| 第12章     |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 239 |
| 第13章     | 传统的儒家文明          | 253 |
| 第14章     | 革命的西方文明          | 275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 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 | 297 |

### 第四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          |           |     |
|----------|-----------|-----|
| 第15章     | 非洲        | 301 |
| 第16章     | 美洲和澳洲     | 317 |
| 第17章     |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 335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 历史上的种族    | 339 |

## (下 册)

### 第五编 公元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          |                    |     |
|----------|--------------------|-----|
| 第18章     | 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 345 |
| 第19章     |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 359 |
| 第20章     |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 371 |
| 第21章     |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  | 387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 401 |

## 第六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 年

|   |     |
|---|-----|
| 第 22 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 年 .....     | 407 |
| 第 23 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 年 ..... | 429 |
| 第 24 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                     | 443 |
| 第 25 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                     | 455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                  | 47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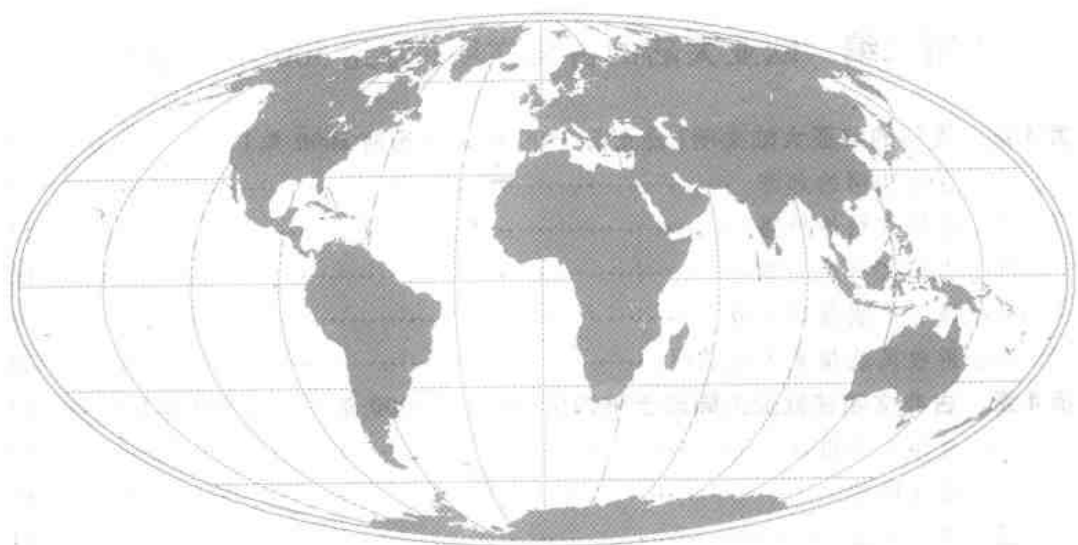
##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 年

|                               |     |
|-------------------------------|-----|
| 第 26 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     | 479 |
| 第 27 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          | 511 |
| 第 28 章 俄国 .....               | 545 |
| 第 29 章 中东 .....               | 561 |
| 第 30 章 印度 .....               | 571 |
| 第 31 章 中国和日本 .....            | 583 |
| 第 32 章 非洲 .....               | 595 |
| 第 33 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       | 609 |
| 第 34 章 波利尼西亚 .....            | 619 |
| 第 35 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         | 629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 | 639 |

## 第八编 1914 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                               |     |
|-------------------------------|-----|
| 第 36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    | 643 |
| 第 37 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     | 665 |
| 第 38 章 1929 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 | 675 |
| 第 39 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         | 689 |
| 第 40 章 走向战争,1929—1939 年 ..... | 703 |
| 第 41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    | 713 |
| 第 42 章 诸帝国的终止 .....           | 731 |

|                           |     |
|---------------------------|-----|
| 第 43 章 大同盟、冷战及后果.....     | 749 |
| 第 44 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 765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 789 |
| 词汇表.....                  | 807 |
| 索引.....                   | 817 |
| 编后记.....                  | 841 |



# 目 录

## (上册)

### 第一编 史前人类

|                            |    |
|----------------------------|----|
| <b>第1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b> ..... | 3  |
| 一、从类人猿到人类 .....            | 4  |
| 二、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           | 7  |
| 三、种族的出现 .....              | 17 |
| <b>第2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b> ..... | 23 |
| 一、农业的起源 .....              | 23 |
| 二、农业的传播 .....              | 26 |
| 三、农业的种类 .....              | 31 |
| 四、食物生产者的生活 .....           | 35 |
|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          | 38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       | 43 |

##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 500 年之前)

|  |     |
|--|-----|
| <b>第 3 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1000 年)</b> .....    | 49  |
| 一、古代文明的起源 .....  | 49  |
| 二、古代文明的传播 .....  | 54  |
| 三、古代文明的类型 .....  | 56  |
| 四、游牧民族获得权力 .....                                       | 73  |
| 五、游牧民族摧毁古代文明 .....                                     | 76  |
| <b>第 4 章 古典文明使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公元前 1000 年—公元 500 年)</b> ..... | 83  |
| 一、整体化的根源 .....   | 83  |
| 二、商业联结 .....   | 87  |
| 三、文化联结 .....   | 91  |
| <b>第 5 章 希腊—罗马文明</b> .....                             | 101 |
|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500 年 .....                       | 101 |
| 二、古典时代,公元前 500 年—公元前 336 年 .....                       | 104 |
| 三、古典时代的文明 .....  | 108 |
|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336 年—公元前 31 年 .....                       | 115 |
| 五、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 264 年 .....                               | 120 |
| 六、后期共和国,公元前 265 年—公元前 27 年 .....                       | 123 |
|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 27 年—公元 284 年 .....                         | 126 |
| 八、后期帝国,公元 284—476 年 .....                              | 130 |
| <b>第 6 章 印度文明</b> .....                                | 139 |
|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  | 140 |
| 二、改革与反改革 .....   | 143 |
| 三、孔雀帝国 .....   | 145 |
|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                                     | 148 |
| 五、笈多古典时代 .....   | 149 |
| <b>第 7 章 中国文明</b> .....                                | 155 |
| 一、过渡时期 .....   | 156 |
| 二、哲学家和经典 .....   | 157 |
| 三、秦帝国 .....  | 160 |
| 四、汉帝国 .....  | 163 |
| 五、帝国的衰落 .....  | 167 |
| <b>第 8 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b> .....                             | 171 |
| 一、古典文明的衰落 .....  | 171 |



|                            |     |
|----------------------------|-----|
| 二、蛮族的入侵 .....              | 175 |
| 三、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        | 179 |
| 四、蛮族对西方的不断入侵 .....         | 184 |
| 五、西方的巨大例外 .....            | 186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 ..... | 193 |

###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 500—1500 年

|                                    |     |
|------------------------------------|-----|
| <b>第 9 章 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b> ..... | 199 |
| 一、商业联结 .....                       | 200 |
| 二、技术联结 .....                       | 203 |
| 三、宗教联结 .....                       | 205 |
| 四、扩展中的视野 .....                     | 206 |
| <b>第 10 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b> .....        | 211 |
| 一、穆罕默德 .....                       | 211 |
| 二、征服时期 .....                       | 214 |
| 三、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              | 217 |
| 四、伊斯兰教文明 .....                     | 218 |
| 五、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                   | 222 |
| <b>第 11 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b> .....     | 225 |
| 一、突厥人的入侵 .....                     | 226 |
| 二、成吉思汗的征服 .....                    | 227 |
| 三、蒙古帝国 .....                       | 229 |
| 四、蒙古帝国的衰落 .....                    | 231 |
| 五、突厥人的复兴 .....                     | 232 |
| 六、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               | 233 |
| <b>第 12 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b> .....       | 239 |
| 一、拜占廷的出现 .....                     | 239 |
| 二、拜占廷的黄金时代 .....                   | 242 |
| 三、拜占廷的衰落 .....                     | 243 |
| 四、拜占廷的灭亡 .....                     | 246 |
| 五、拜占廷的遗产 .....                     | 248 |
| <b>第 13 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b> .....        | 253 |
| 一、隋朝和唐朝 .....                      | 253 |
| 二、宋朝的黄金时代 .....                    | 259 |
| 三、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                   | 261 |

|                                 |            |
|---------------------------------|------------|
| 四、明朝的民族优越感与回缩 .....             | 263        |
| 五、中国文明在日本 .....                 | 268        |
|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                 | 270        |
| 七、日本的回缩与孤立 .....                | 271        |
| <b>第14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b>       | <b>275</b> |
| 一、西方的多元化 .....                  | 275        |
| 二、地理背景 .....                    | 278        |
| 三、技术的进步 .....                   | 278        |
| 四、发展中的经济 .....                  | 279        |
| 五、新的君主国的崛起 .....                | 283        |
| 六、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 .....             | 284        |
|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                 | 288        |
| 八、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                | 291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 ..... | 297        |

## 第四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                             |            |
|-----------------------------|------------|
| <b>第15章 非洲 .....</b>        | <b>301</b> |
| 一、地理环境 .....                | 301        |
| 二、农业和铁器 .....               | 302        |
| 三、伊斯兰教 .....                | 304        |
| 四、贸易与苏丹诸帝国 .....            | 306        |
| 五、王国与诸侯国 .....              | 311        |
| <b>第16章 美洲和澳洲 .....</b>     | <b>317</b> |
| 一、陆地和人民 .....               | 317        |
| 二、文化 .....                  | 319        |
| 三、文明 .....                  | 321        |
| 四、历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 .....          | 326        |
| 五、澳大利亚 .....                | 331        |
| <b>第17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b> | <b>335</b> |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上的种族 .....       | 339        |



第一编  
史前人类

本书第一编论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长达400万年的历史,而其余各编则论述人类文明社会不足6000年的历史,因此,本书显然是以最短的篇幅来论述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漫长的史前阶段。笔者之所以偏重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历史,是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速度一直在不断加快。地质年代以10亿年为计算单位,人类史前时代以千年计,而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后,纪年单位开始不断缩小,逐渐变成以百年甚至十年计。时至今日,每天都有许多重大事件无休无止地蜂拥而来,无情地包围着我们。变化之迅速确实已经引起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人类是否能够迅速适应变化,以避免被淘汰、甚至被灭绝的命运呢?

由于诸重大事件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本书的研究也有所侧重。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因此而低估史前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在史前时代的几百万年中,有两大转变为此后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是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具有思维能力的真正的人类;其二是人类的先祖从坐享大自然恩赐的食物采集者转变为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这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就是第一编的两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sup>3</sup>  
使他们能够从中窥见自身无尽的变化。

——克莱德·克拉克洪

---

## 第1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对过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现代人所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了解甚少。希腊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德在开始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曾说过，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对历史的不了解，使他对雅典的无与伦比的光荣和贡献不能有所认识。相比之下，我们这一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注重历史。对埃及人、希腊人和中国人的早期历史，我们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多。而且，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诸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每年都在丰富着有关我们早期祖先的知识。这一学科名单上还应该添上能被用来从卫星、航天飞机和飞机上探测地面和地下情形的空间技术。卫星、航天飞机和飞机都配备了能够测量地面温度微弱差别的传感器。由于沙地、耕地、植被和不同类型的岩石均有不同的温度，并以不同的速度释放出自身的热量，所以传感器能够分辨出地面的松土是史前时代的耕地，还是古代的商路，抑或是古建筑的遗迹。因此，雷达成像技术除了已被用来绘制危地马拉丛林中的玛雅人的道路和哥斯达黎加阿热内湖畔的小径外，还被用来绘制横穿中亚的古代洲际丝绸之路。

空间技术能使我们找回人类历史失佚篇章的一个最近的精彩例证，就是发现了中国长城的断失部分。长城的某些部分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被湮没在数层移动的沙丘之下。<sup>4</sup> 1994年4月奋进号航天飞机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发现了这部分长城——这些图像显示，在距中国首都北京以西430英里的边远地区，有一段长达47英里的长城。几个世纪以来北京近郊的长城一直都受到了很好的维护，从而获得了许多上镜的机会，比如说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就都在长城上漫步过；但是偏远地区的长城却是年久失修，无人照料。再加上这些地方的长城也并不是用石头砌成的，泥土和树枝是常见的替代品，所以时间一长，很长的长城也就逐渐损毁，终至湮灭，直到近来魔术般的现代技术重新发现它们。<sup>1</sup>

类似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考证已将我们的认识拓展到了人类文明开始之前,即便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录。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只是在大约 5 000 年前才刚刚学会书写,而人类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 400 多万年前。我们应当考察史前时期这漫长的几百万年,因为人类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形成的。在此期间,人类的远祖居住在能够发现食物的地方,和其他动物一样靠采集食物为生,而不是像他们擅长农耕的后代那样通过种养来获得食物。

## 一、从类人猿到人类

我们所在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太阳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中上百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只是整个宇宙几百万个星系中的一个。当本书在以后的章节中回溯人类的经历和人类的切身之事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如此悬殊的对比。比较好记的一个类比就是,地球在宇宙当中小得就像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

地球形成于约 50 亿年以前,而大约 40 亿年前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单细胞生物。尽管人们历来都认为这种原始的生命与非生物有着质的区别,但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与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观点,而把生物看做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照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无机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有机物的。说得具体些,电子、质子和中子相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物,其中某一类构成了生物。

生物又从低等级不断地向高等级进化: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最终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及植物一起,约于 3 亿年前开始成功地适应陆上生活。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随后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接着是鸟类,最后则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生物界占据统治地位已达 6 000 万年。

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这种说法:人类属于动物王国——更明确地说,属于灵长类这一目;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类的,还有树鼩、狐猴、眼镜猴、猴子及类人猿。好几个研究领域都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大量证据。解剖学家发现,从总体来看,人类与其他高级动物在骨骼、肌肉和器官构造方面有不少基本相似处。胚胎学家注意到,人类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显示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征,如:胚胎一个月时有半圆形的鳃,胚胎两个月时出现发育不全的尾巴。人类学家指出,对人类化石的研究证明,人类是由普通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许多可表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联系类似迹象,如:猿类血液的化学成分和人类的极其相似,猿类和人类身上有共同的寄生物,猿类和人类学习的方式也很相似。

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 6—7 次大冰期和 5—6 次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当时

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必须能不断地适应和再适应新的环境。能否适应的关键不是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能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当然,这也就是人类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居于无可争辩的首位的秘密。首先,人类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人类与长臂猿或北极熊不同:长臂猿双臂柔软细长,只适应森林生活;北极熊白色的毛皮很厚,只适应北极环境;而人类,决不是只适应一种环境。更准确地说,人类靠自己的大脑,而不是自己的身体,能适应任何环境。

人类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从一系列人类的祖先即近似人形的原人进化而来的。原人中有一部分已能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和武器。最早出现的原人是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一般认为,它们最早出现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距今约400多万年。这种灵长类动物的骨盆和腿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但其脑容量只有人类的三分之一,几乎还不及现存的类人猿的脑容量大。因此,这种与人相像的两足动物(原人不再用四肢行走)的运动系统是与猿脑般的大脑结合在一起的。

对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灵长类来说,非洲大草原是很理想的环境。那里气候温和,即使缺衣少穿,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且,辽阔的大草原与茂密的森林和荒凉的沙漠不同,那里有水源,也有可供食用的动物。因此,尽管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工具很简单,但它们依然能享用到丰盛的食物,其中包括蛋、蟹、龟、鸟、啮齿动物,还有小羚羊。小羚羊很容易捕猎到,因为它们一遇危险便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

更新世灵长类动物在非洲平原上漫游了200多万年,在此期间,这种类人动物中先后有好几个物种都经历了出现、兴旺、最后又消亡的过程。由于每年都有许多新发现,而相关的理论又必须随着这些新发现而作修正,所以,人类学家们尚不能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比如说,最近在爪哇出土的人类化石就对传统的“非洲起源”理论提出了挑战。“非洲起源”理论认为,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从那里迁徙到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爪哇出土的化石古老得惊人,足以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论者的观点。人类多地起源论者认为,早期的人类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独自起源和进化的。<sup>2</sup>无疑,在未来的岁月中,人们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所以,围绕人类起源问题,还会提出更多的新理论来解释新的化石发现。

尽管不知道确切的年代和准确的地点,但却可以肯定,早在40000年以前,人类,或者说智人(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终于出现了。而最近的考古发掘则显示,人类的出现比这一时间还要早得多。从最宏观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出现是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二大转折点。第一大转折点是生命从无机物中脱胎而出。在第一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之后,所有的生物种类都通过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也就是说,生物的基因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点在气候变化剧烈的更新世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一进化过程发生了逆转。人类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今天,随着人类关于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知识不断增加,人类很快就能既改变其所处

的环境,又改变自己的基因,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也即将来临。

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其原因在于,对于同此时此地的现实相分离的事物和概念,只有人类能予以想象或表示。只有人类会笑;只有人类知道自己会死去。也只有人类极想认识宇宙及其起源,极想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将来的处境。

由于人类具备独特的、彻底变革环境的能力,所以人类不用经过生理上的突变更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生活在北极离不开毛皮,生活在沙漠必须有水源,生活在水中要靠鳍;所有这些,通过人类创造的文化,也就是经过新的非生物学的途径,都能得到解决。具体地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使人类能适应自然环境和人类相互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在接下来章节中所讲述的人类故事就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今时代所创造的一系列的文化的故事。

当人类运用其超凡的大脑去改变其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基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任由环境改变生物的基因的时候,他就已经远远超出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了。这也解释了为何人类当年在非洲大草原刚刚起源时毫不起眼,而今天竟成了地球上居统治地位的物种。但是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人类现在显得不能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为什么人类日渐觉得自己创造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

答案似乎在于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根本差别。基因进化通过基因突变起作用。如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突变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它就会在生命史中短短几千年



图1 威灵道夫的维纳斯

威灵道夫的维纳斯,是雕刻于公元前 15000 年至公元前 10000 年的一尊石像。从该雕像中人物形体的比例可以看出人类早期的生殖崇拜倾向。



里成为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物种。其实这种进化模式也就是人类由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一直进化到智人所经由的道路。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只要看看蒸汽机是如何在19世纪时改变了整个世界,看看内燃机在20世纪中是如何发挥其功用,再看看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又是如何使我们的环境大为变样,你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何要警告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的要么是新的“思维方式”,要么是“空前的灾难”。

关键问题似乎在于,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虽然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学会如何平衡知识和智慧正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以致正如爱因斯坦所警告的那样,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平衡的结果。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平衡问题已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并在今天由于我们的智慧无法赶上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而出现得更为频繁、更为急迫。

## 二、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7

人类凭借自己优越的智力发明了一种所谓的“石刀技术”,他们用压制法从石核上取下长而锋利的薄片即“石刀”,制作各种新型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用的工具”。有些新型工具是由不同的材料组成的,如:以兽骨、兽角或燧石为尖端的长矛和装有骨制或木制把柄、石制刃口的刮削器。这时还有了抛射物结构的新发明,如:用于捕牛的一端系有重球的绳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这些新发明物刚开始使用时效率比较低,但随着不断改进,终于成为近代火器发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发明,如用骨头和象牙制的锥子、带眼的骨针、作腰带用的扣件,甚至还有纽扣——所有这些表明,马格德林时期的猿人已穿上了用兽皮缝制的裤子和袖子合适的上衣。

虽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比起早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技术,要先进得多,但由于生产率低,这种技术仍是很原始的。食物采集者也没有成立任何正式的配备专职领导人的政治机构。更准确地说,他们通常只是各自成群地结合成自治的团体,团体的人数一般是20至50人。不过,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如马格德林

时期盛产取之不尽的鲑鱼的美洲西北部、大驯鹿成群的法国南部的多尔多涅山谷，也曾出现过人数更多的狩猎团体。根据当时的狩猎团体判断，旧石器时代，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而自然地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一样都还只是粗具雏形，如果说这两者真可以区别开来的话。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成年和未完婚的子女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被允许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家庭极少。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平等，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当时的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所以，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今日所谓的“男尊女卑”的观念，现实中的女性也不处于依从和卑下的地位。

通过对现在仍然存在的 90 个食物采集部落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人类学家们发现在这些部落中，男人负责狩猎动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所能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等。虽然男人弄来的肉类极受欢迎，但事实却是，女人采集来的食品仍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女人采集到的食品经常是男人带回的猎物的两倍。因此，尽管两性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却同等重要。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女性不但生育和抚养了小孩，而且还提供了大部分食品。

确实，男人负责部落的防卫，并掌控着武器，但是他们并不用武器来恐吓或镇压女人。事实上，当欧洲人最初在海外遇到食物采集部落时，他们普遍都对部落中的女性享有比欧洲女性多得多的平等感到好奇和震惊。耶稣会传教士保罗·列·居内(Paul le Jeune)在 1633 至 1634 年的整个冬天，都和居住在加拿大东部拉布拉多半岛的蒙大格拉斯—纳斯卡比印第安人(Montagnais-Naskapi Indian)的一个部落待在一起。“女性在这里享有极大的权力，”列·居内报告说，并力劝该部落的男人们坚持自己的权利。“我告诉他们，男人是一家之主。在法国，女人是不能支配丈夫的。”另一个耶稣会传教士报告说：“从决定计划、决断事情、确定旅程，到储备冬季物资，几乎每件事情都由家庭主妇决定。”颇有意义的是，人类学家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于 1950 至 1951 年研究蒙大格拉斯—纳斯卡比印第安人时发现，这些印第安人中间的两性关系依然如故：“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男女有别的教化，我们仍能看到他们具有集体责任感……具有安乐自治感，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sup>3</sup>

在食物采集部落中不但男女平等，而且部落成员之间也都有着很亲密的血族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从而享有权利和特权。他们在寻找食物、

躲避风雨和防御敌人的过程中互相帮助。虽然部落与部落之间也会因个人世仇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而发生一些争斗,但是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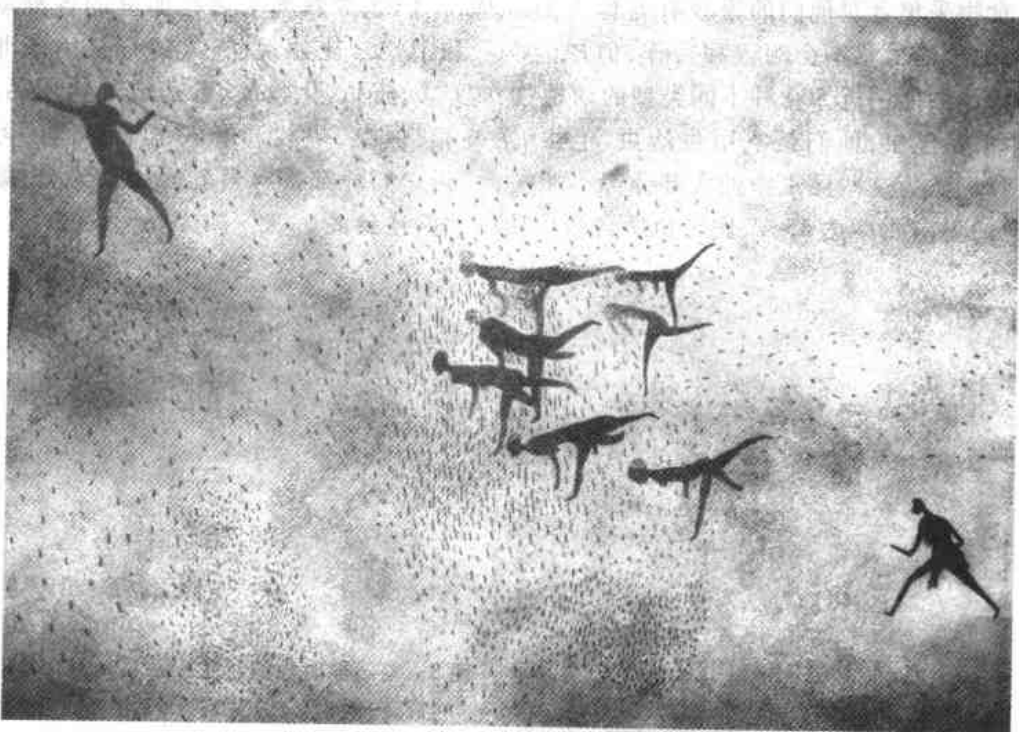


图2 塔西里·那杰岩画

塔西里·那杰岩画(the Fresco of Tassili n'Ajjer),一幅刻在撒哈拉沙漠岩石上的石器时代的绘画,出土于阿尔及利亚。一位学者认为,这幅美轮美奂的画作描绘了妇女采集谷物(画面上的黑点可能代表谷物)的场景。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谷物应该是野生的,除非这里很早就出现谷物种植(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不论此画表现的是采集谷物,还是优雅地翩翩起舞,这些形体都告诉我们在这个曾经是绿树成荫的撒哈拉地区当时已有人类的存在。

在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食物采集者的日常生活之后,人类学家 R. B. 李(R. B. Lee)得出如下结论:“一种真正的公社生活时常被当做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不予考虑,时常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然而在实践中却实现不了。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证据却告诉了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sup>4</sup>

人类学家们近来除了关注我们史前祖先的社会制度外,还关注他们的日常食物,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吃的东西似乎对我们今天有借鉴意义。几千年前的人类吃

什么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判断:其一是通过研究粪化石,即古人排泄物的化石。粪化石里含有许多东西,如花粉、植物结晶体、羽毛、骨头、毛发以及蛋壳,因此,一个粪化石就提供了几百万年前食物的一个密封记录。另一个办法是观察今天的食物采集者吃什么,无论他们是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还是居住在南非卡拉哈日(Kalahari)沙漠中的兀人(!Kung)。这类观察已揭示,现代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供应惊人地充足,且有保障,尽管他们生活在别人都不愿意居留的恶劣环境中。食物丰富的一个原因是,食物采集者对他们的家乡有着惊人的了解,他们非常熟悉生活在那里的各种动植物。他们虽然不会阅读和写作,但却能学习和记忆。比如说,兀人的记忆力就非常好,他们能用近 500 种不同类型的动植物作食物、药品、化妆品、毒药或其他用品。其中单是昆虫,他们就吃甲虫幼虫、毛虫、蜜蜂蛹、白蚁、蚂蚁和蝉。由于我们的习俗,我们认为这些昆虫中的大部分都不能吃,然而它们却都富含营养。比如说,白蚁所含的蛋白质高达 45%,比干鱼所含蛋白质的比例还要高。



图 3 新石器时代的村庄

收藏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圖片的局部,它描绘了约公元前 2700 年左右位于丹麦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注意图中显示的操各种职业者:狩猎者、木材采集者、火堆照看者、磨谷者、陶工和织工。

食物采集者乐意吃的食物数量很大,这就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所需。食物采集者依靠大量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作为其食物来源,这就使他们比农民过得更为充裕,因为农民只种植少数几种庄稼,所以一旦这些庄稼因为干旱、洪水、霜冻或虫灾而歉收,他们就要面临挨饿的危险。相比之下,食物采集者就不会碰到这种危险;他们一旦发现某种食物供应减少,就会用他们能够发现的数百种食物来弥补缺口。比如说,1964 年夏天研究兀人的人类学家们发现,当时的一场大旱饿坏了附近的班图族农民:他们的庄稼遭灾了,他们的家人都在挨饿。于是班图族的妇女也跟从兀人妇女去找寻植物块根、青菜、浆果、坚果、鸟类、蛋类,等等。而这数百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则是永远都不会同时匮乏的,所以除了兀人家庭外,班图人

家庭也顺利地度过了这场大旱。

亢人和其他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供应不但是充裕的,而且于健康有益。这些食品都只含有少量的盐分、饱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而富含多价非饱和脂肪、粗纤维成分、维生素和矿物质。由于食物采集者长年享用这些健康食品,再加上他们作为游牧部落民过着充满运动的生活,所以他们很少患上诸如高血压、肥胖症、静脉曲张、溃疡、大肠炎之类的工业社会常见病。另一方面,许多亢人又因缺医少药、得不到治疗而死于意外伤害。因此,科学家们发现,活过60岁的亢人约占其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与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工业国家的长寿人口比例大致相等。

以上关于史前人类的日常食物的结论已得到了德州农工大学人类学家小沃恩·M.勃朗特(Vaughn M. Bryant, Jr.)的试验证明。勃朗特在得克萨斯西南的一处考古现场进行野外挖掘时,按照生活在该区域的史前人类的食谱进食。他是通过研究粪化石了解清楚这一食谱的。由于对这个新食谱感到很满意,他回到营地之后继续依照该食谱进食,并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锻炼——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爬楼梯而不坐电梯,步行而不坐车横穿校园——以便使自己的活力接近史前人类的活力。在改换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方面,我都感觉好多了。我觉得比以前更有精力了。……此后四年中我再也没有患过大病,也从未缺过一天班。……在既没有计算卡路里也没有故意绝食的情况下,我在大约3个月里瘦了30磅……因为这些水果和蔬菜本来就只含有很少的卡路里。……想吃零食对我也有帮助。当你整天都在吃零食时,你实际上比每日坐下来大嚼三顿饭要吃得少。……仔细想想,这个食谱也不奇怪。我想自然已经设计好了要我们与灵长类动物吃相近的食品。这些猩猩一般吃水果和其他植物、一些肉、一些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食品以及不多的脂肪。直到几千年以前,每个人可能都像我那样吃东西。<sup>5</sup>

现在,我们将对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探讨转向一般的信仰。我们发现,原始人对自己和社会基本上不是抱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会与现在相同,就像现在和过去一样。因而,在他们的头脑里没有变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评或干预现有制度和习俗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文化和住处,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将一成不变地延续到将来。各狩猎民族的创世神话,包括神话中半神式的英雄,都惊人地相似——这些英雄创造自然环境、安排供狩猎的动物、繁殖人类,并教给人类各种技艺和风俗习惯。

下面安达曼群岛岛民们的创世神话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11 第一个人是贾特波。他就像蛋壳里的鸟，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节头里。大竹子破裂，他出来了。他还是一个小孩。天下雨时，他替自己盖了一间小茅屋，住在里面。他制造了几把小弓和一些箭。有一天他找到一块石英，用它在自己皮肤上划了几道花纹。贾特波一个人生活，很孤独。他从白蚁的窝里取出一些黏土，捏了一个妇女模样的模型。那模型活过来了，做了贾特波的妻子，取名科特。他们一起住在蒂尤特-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黏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教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黏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sup>6</sup>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就无法生存。他们的知识代代以口相传，所以其中的大部分知识只是现在才得到承认和利用。对印度楝树即一种速生长青植物的全方位利用就是一个例子。几百万年以来印度楝树在古代文献和村落文化中始终占有显著地位。它的树皮、树叶、花朵、种子和果实，被用来治疗从糖尿病、各种溃疡到便秘的种种疾病；它的树枝被制成有杀菌作用的牙膏；它的油汁现在被用来制作牙膏和肥皂；它的萃取物则是一种很好的杀虫剂，对于杀死包括蝗虫、幼蚊以及棉铃虫在内的两百多种昆虫具有特效。

尽管早期人类对于自然有着大量的第一手知识，但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是在捕捉不到很多的动物和鱼时，他们往往不能从自然界本身给予说明。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求助于魔力，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愚蠢地祈求大自然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起来。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跳起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确保。

最初似乎所有的团体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原始人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天地里，食物最重要；食物的来源能否充裕，他们能否无病无灾，交上好运，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医或巫师则与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巫医、巫师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福。今天，在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布希曼人中，在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友洞里的“巫师”岩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这幅画现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可怕的杰作”。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像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还拖着一条马尾巴。这幅画的附近还有一些别的画；这些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

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像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也就是说,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有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的神学。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很模糊。宗教还没有被当做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人们乞求超自然力量,或者与超自然力量谈条件;这一点,从一位爱斯基摩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

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会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sup>7</sup>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和对人类能够控制它们的祈盼,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以大猎物如野牛、熊、马、毛茸茸的犀牛、猛犸和野猪等为题材。画面丰富多彩,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显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显然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由此可以获得控制猎物的某种魔力。

12

13

总之,近来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的发现已足以使我们承认并赞赏我们史前祖先所创造出来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整个人类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成分。我们总以为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做得特别成功,但即便在这一领域,食物采集者也获得了大量知识,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至今仍是基本知识。他们对住地环境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能够利用动植物中的有益品种,而避开那些无用或有害的品种。他们发明了许多种工具,包括刀具、斧头、刨子、锤子、锥子以及针。同样,他们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武器,如矛、投枪、棍棒、盾牌、盔甲、吹箭筒以及弓箭。他们的许多发明创造,诸如不下沉的独木舟、雪做的房子、带梁和桁的独木舟以及下毒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术。食物采集者们使用种类繁多的毒药来毒杀猎物和敌人,比如说,南美的印第安人就懂得从树薯粉中分离出氢氰酸,将树薯粉留作主食,氢氰酸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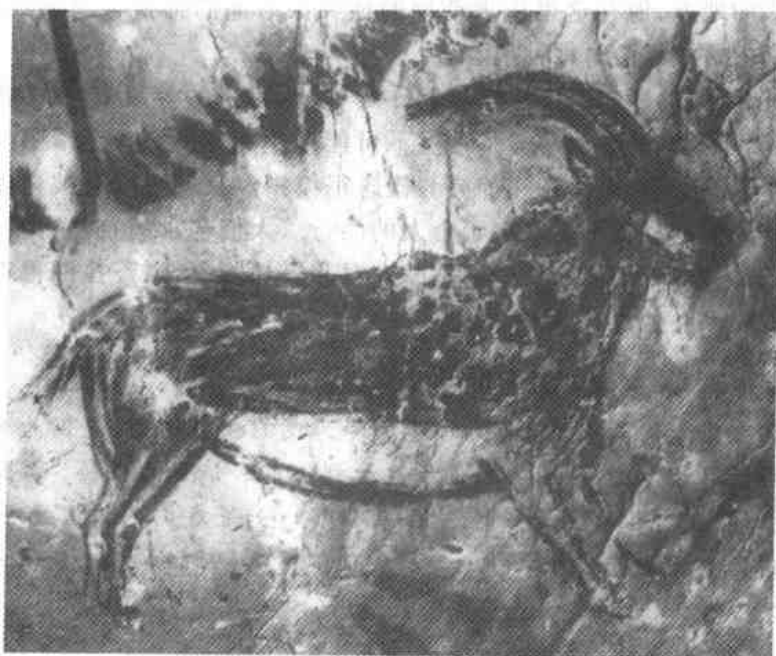


图 4 洞穴壁画

法国史前时代的两幅洞穴壁画。

则被用来制作毒药。其他常见的毒药还有箭毒、蛇毒、毒芹和砒毒等。在储存食物和做菜方面,我们的早期祖先实际上也已用上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全部技术。他们拥有泥质灶,使用石板烧烤技术,在北极圈内冷冻食物,通过风干来保存食物,并用牛



油或兽脂来密封食物。除了诸如塑料容器、煤气和电力之类的现代发明物外,旧石器时代的厨师对现代的厨房和烹饪技术一定会感到非常适应。

在对付疾病方面,史前诸民族决不是完全依赖于巫术。他们懂得利用夹板来进行断肢再续,懂得使用止血带,懂得敷用药膏和绑系绷带,懂得将放血作为一种疗法,还懂得灌肠疗法——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使用橡胶注射器来进行灌肠。这些尚未使用文字的民族也懂得天体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分辨出不同的星座并给它们命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史前时期波利尼西亚人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他们那时就已经在夏威夷到塔西提之间长达 2 350 英里的航线上作定期航行。在纵览了生命在所有进化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之后,人类学家列斯利·A. 怀特(Leslie A. White)下结论说:“由尚未使用文字的诸原始民族发展起来的累积的知识、技能、工具、机械和技术,为文明和所有高等文化奠定了基础。……看到诸原始民族在技术水平上在许多方面和当今是如此接近,真令人感到惊奇。”<sup>8</sup>

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且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通过这种方式,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藉,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做是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作这一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确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有时违背传统还会导致死亡——比如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生活的人。正是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了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14

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婴儿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迟早都会被耗尽。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自己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地削减其团体的成员,如婴儿、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

15 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被杀掉；同样，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个。只有少数食物采集者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养活自己。因而，当农业革命席卷而来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被食物生产者即农民们推到了一边，因为农业革命使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养活更多的农民成为可能，从而使农民们不可阻挡地拓展到人烟稀少的狩猎区。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农业革命一旦开始进行、食物采集团体便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只有为数极少的食物采集团体能残存在因某种原因而无法开展农业活动的偏远地区。

(14)

## 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我们可以假设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公元 15、16 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的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基本相似。当时的探险家以及追随他们之后的移民和传教士们所留下的记述，对我们粗略地了解人类过去的的生活是颇有价值的。以下报告为耶稣会传教士雅可布·比格特 (Jacob Baegert) 所作。他于 1750 年至 1767 年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中间。他对“加利福尼亚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旧石器时代祖先的一幅生活图景，也构成了对有关“人类本性”的普遍假设的挑战。

尽管食物粗劣、生活艰辛，加利福尼亚人却很少生病。他们通常很强壮，能吃苦耐劳，而且比起数以千计的衣食富足、每日享用巴黎厨师烹饪出来的美味佳肴的人要远为健康。……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利福尼亚人也从欧洲人那里感染了天花，而且这种疾病在他们中间呈现的传染性最强。1763 年一个出天花刚愈的西班牙人送给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一段布料，随之也把天花传给了这个加利福尼亚人群体。短短 3 个月内，便有 100 人患此病死去。……

也许有人会根据我对这些加利福尼亚人所作的介绍，推断他们是亚当的最不幸、最可怜的孩子。但是这种推断完全错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比起欧洲的文明居民，无疑他们过着更为快乐的生活。……一年四季，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什么东西使他觉得生活艰难或活着没意思。……嫉妒、猜疑和诽谤不会扰乱他的生活，他也用不着担心会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不必想着如何增加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按圣格列高利 (St. Gregory) 的说法，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无法解释的罪恶。

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自己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家乡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他们的一

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难怪他们总是脾气极好,老是沉浸在欢乐和笑声中,显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正是幸福的真正源头。

\* 见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for 1863* (Washington, D. C., 1864), 第352页到369页。

我们将看到,农业革命还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损害了原始社会令人神往的平等,但这一来它也打破了部落传统主义的限制性束缚,从而,不论好坏,使人性在由狩猎区发展为大都会、由利用人类体力发展为利用原子能的重大过程中得到解放。不过,在研究农业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至今仍在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旧石器时代诸民族的全球性拓展及其后果。

### 三、种族的出现

人们通常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按人类当时的标准,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12.5万人,而到了距今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从旧石器时代,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这就是,在技术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且与人类学家 M. D. 萨林斯(M. D. Sahlins)和 E. R. 塞维斯(E. R. Service)所提出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该定律认为:

……能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sup>9</sup>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那些在其活动范围中占据优势、并不断扩展其活动范围的种类。因之,只有原始的卵石工具且又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无法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

智人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因而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不仅能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而且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

人类拥有的高超技术也部分地表现在建造不同类型的渡水设备方面。这些设备的建造取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类型:皮划艇、树皮船、浮筏和独木舟。有了这些不同的船只,早期人类就能够横渡河流、湖泊,甚至还能够穿越从非洲到欧洲、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从西伯利亚到北美的广阔水域。这一迁移活动在冰河期进展得更为顺利,因为在冰河期,大量海水结成了冰盖,海平面降低,诸大陆之间形成了陆地桥。在这些境况下,人类的足迹已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和与人类形影不离的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见地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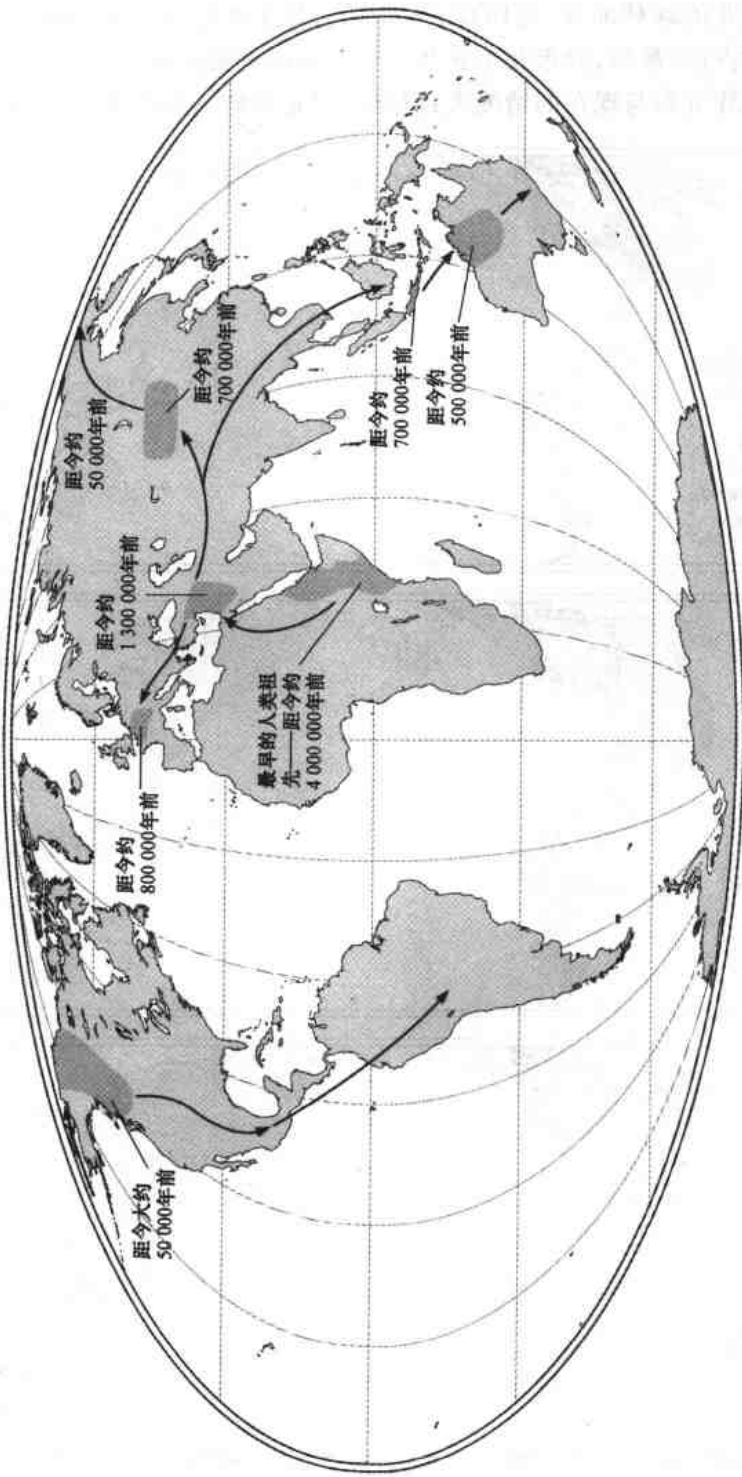
17 在人类向各地分散的同时,逐步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有显著特点的所谓的种族。一般认为,这些种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各个地域集团适应了各自不同的环境,而且彼此较为隔绝。关于人种差别,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人种差别发生得很晚——在智人出现之后。因此,现代的各个种族都源自作为人类已获得充分发展的同一祖先。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与他们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各个种族通婚;也说明了为什么人类现存的各个种族在与生俱来的智力方面彼此没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实际上已为所有的人类学者所赞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或当代的澳大利亚土人与其他任何种族的成员一样,如有机会受教育,也大有希望毕业于大学。

各地区种族形成时的确切情形还不清楚,也许永远无法了解。考古学家们在人类起源方面早已接受“非洲起源”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然后从那里迁徙到其他大陆。由于世界各地新的考古发掘差不多每年都提供一些新发现,该理论和其他理论一道,如今正受到质疑。比如,最近在澳大利亚北部发现的石制工具表明,人类早在 176 000 年前就在该地区活动,这就推翻了将人类迁移到这里的日期确定为 50 000 至 60 000 年前的一些传统理论。同样,传统理论所认定的人类最早迁移到中亚的时间,也因为最近在该地区出土的年代更为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制工具而站不住脚。

由于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所揭示出来的差异是如此巨大、如此众多,所以考古学家们正在重新评价过去受到珍视的一些理论假设。有些人已开始质疑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到底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还有一些被称为人类多起源论者的人则认为,人们永远不可能找到人类最初的起源地,因为全人类单一的发源地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更准确地说,他们发现那种认为人类在不同地方独立进化的人类多起源理论要更可信一些。

尽管现在人们在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到距今约 10 000 年即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末期,各种族在全球的分布已和现在大致一样。高加索种人分布在欧洲、北非、东非和中东,并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亚;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那时的水源比现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带,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则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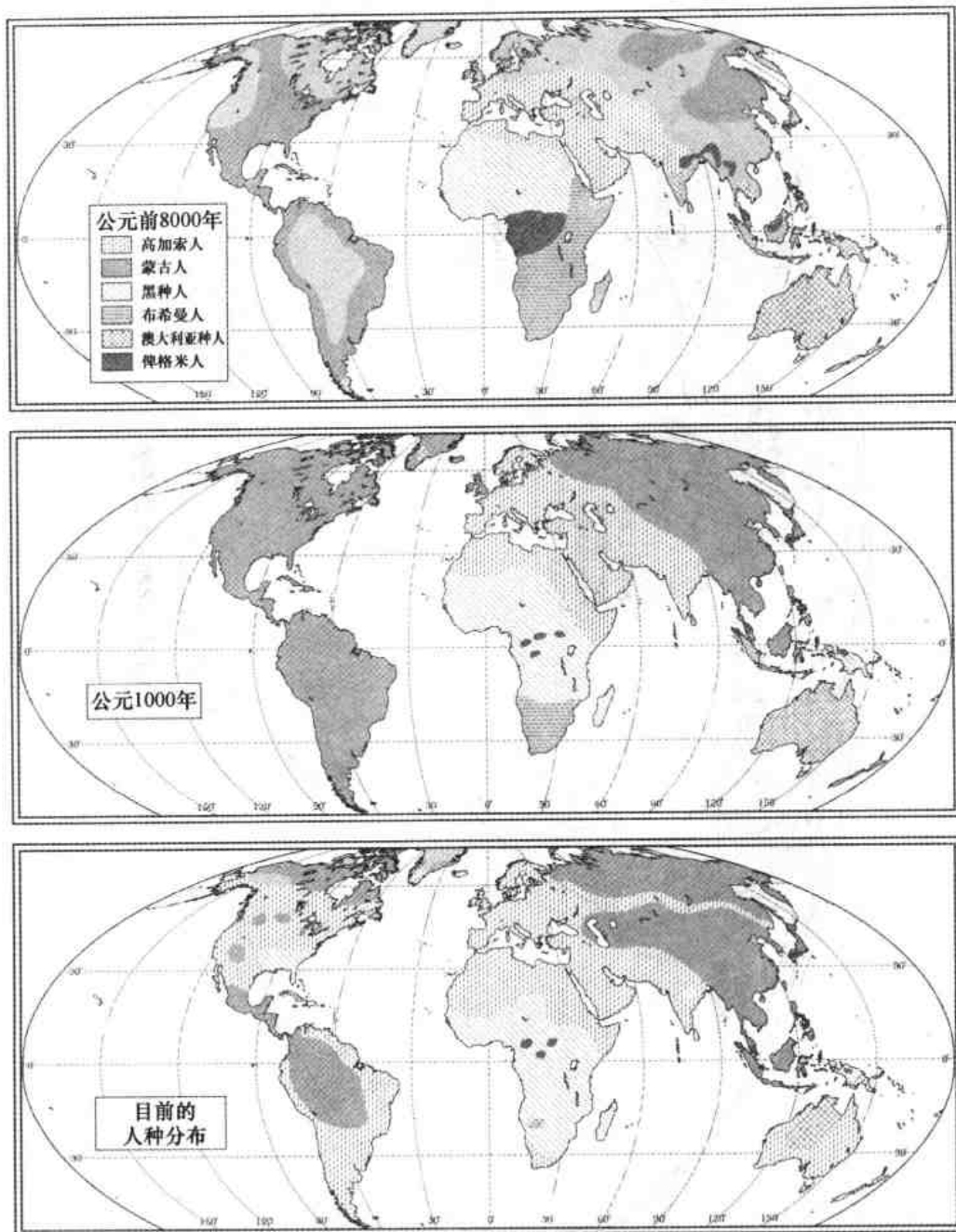


地图1 早期人类的迁移

与他们后来的情况不同，分布在非洲的其余地方；还有一部分俾格米人即小黑人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森林地带，而印度、东南亚的其余的辽阔地区和澳大利亚则为澳大利亚种人所占据；最后，分布在东亚和南北美洲的是蒙古种人。

虽然这一种族分布与现在的情况大致相似，但是全球人种分布图(地图 2)却表

18



地图 2 全球人种分布

明,到公元1000年时,全球各种族的分布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是后来的技术革命所直接导致的。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会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之所以会越来越,其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革命。换言之,10000年前,白种人与布希曼人的人口数差不多,而今天,布希曼人仅占白种人的十万分之一,其实际原因也在于此。

布希曼人的历史较之高加索种人和其他种族的历史有着霄壤之别,但这与各种族天赋才能上的差异毫无关系。我们将在第四编的结尾“历史上的种族”一节中再度谈到这一重要课题。在那一节中我们将探讨造成不同种族历史的种种原因。

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类分成了不同的种族,但是各种族成员的身材却都在日益增高。人类早期祖先的平均身高是4英尺6英寸,而现在人类的平均身高则是5英尺10英寸。人们认为这一增高应归功于两点:一是人类获得了丰富而稳定的食物供应,尤其是充足的动物蛋白的供应;二是现在的小孩都接受免疫,这就抑制了妨碍生长的疾病的侵袭。目前人类的身材还在继续增高,像中世纪骑士的盔甲,现在的成年男子大多穿不下。

## 推荐读物

19

对研究世界历史有着基础性辅导作用的书籍有 G. Barraclough 所著的 *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Times Books 出版社,1991 年版)和 W. L. Langer 所著的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1972 年版)。还有配有绝佳插图的 *National Geographic Atlas of World History* (Washington 出版社,1997 年版)。

最近出版的关于早期人类历史的重要书籍有 J. E. Pfeiffer 所著的 *The Emergence of Man* (Harper & Row 出版社,1985 年版)以及 R. Lewin 所著的 *In the Age of Mankind* (Smithsonian Book 出版社,1988 年版),后一本书讲述了现在流行的关于人类史前和未来情况的理论。另有 M. Wolpoff 和 R. Caspari 合著的 *Race and Human 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1997 年版),该书叙述了关于人类起源的非洲起源论与多起源论的争论。最近发表的内容丰富的考察人类起源的著述是 R. Gore 写的 *The Dawn of Humans*,见 *National Geographic* (1977 年 5 月号),文中还附有精美的插图。

有关旧石器时代妇女的地位,请参阅 M. Ehrenberg 所著的 *Women in Prehistory* (British Museum 出版社,1989 年版); R. R. Reiter 主编的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Monthly Review 出版社,1975 年版); M. K. Martin 和 B. Voorhies 合著的 *Female of the Species*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1975 年版);以及 R. Briendenthal 和 C. Koonz 共同主编的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1977 年版)。

## 注释

1.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2. C. C. Swisher et al., "Latest *Homo erectus* of Java," *Science* (December 13, 1996): 1870—1874;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96.
3. Cited by E. Leacock, "Women in Egalitarian Societies," in R. Bridenthal and C.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1977), pp. 21, 22.
4. B. Spencer, *Native Trib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 (London, 1914), p. 36; and R. B. Lee, *The !Kung Sa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9), p. 246.
5. V. M. Bryant, Jr., "I Put Myself on a Caveman Diet Permanently," *Prevention*, Vol. 3 (September 1979), pp. 128—137. More details on this subject can be found in Bryant's articles i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32 (January 1975); and in *American Antiquity*, Vol. 39, No. 3 (1974).
6. A. R. Rad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 (Free Press, 1948), p. 192.
7. K. Rasmussen, *People of the Polar North* (Lippincott, 1980), p. 124.
8. L. A. White,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 (McGraw-Hill, 1959), pp. 271, 272.
9. M. D. Sahlins and E. R. Service,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0), pp. 75, 79.



现在,倘若我们要使最早出现的有效的食物生产所带来的种种结果完全概念化(或者对这些结果加以夸大),也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从生物学方面(包括食物、人口统计、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等),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都已焕然一新。

——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

---

## 第2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们仍像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像完全倚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由于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为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提供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1—2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地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1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20—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本章将着重研究这一转变的原因及其后果。

### 一、农业的起源

当人类成为食物生产者时,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使人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了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获得的。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新石器较旧石器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但是，把打制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技艺，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相比，只能算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德突然顿悟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一声“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确实，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像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就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现代的原始人对农业毫无所知，但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幼苗；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中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中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现代原始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生存就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可怀疑，但有大量证据可相信，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忍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作为游牧群体，他们经常处在迁徙过程中，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由于没有畜养的动物来提供牛奶，母亲只能用自己的母乳来哺育每一个孩子。由于母亲无法同时为两个孩子哺乳，也不能同时带着他们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所以当一个小女孩出生后不久很快又生了一个小孩时，母亲一般会让后出生的那个小孩死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母亲们还是能够避免出现这种杀婴惨剧的，因为哺乳会抑制排卵，所以她们在喂养一个小孩的几年中一般不会怀孕。如果这一计划生育的天然形式失效了，我们的祖先们就会采取杀死新生婴儿、堕胎和停止哺乳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猎社会能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生长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

在正常情况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极为丰富的食物品种。生活在南非的布希曼人提供了这方面一个现代的例子。虽然这些捕猎者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但他们的食物依然包括 85 种可食用植物和 223 种动物。因此，他们的日常食物比起农民的日常食物，其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要多得多，因为农民依靠的只是自己种植的少数几种谷物和块茎。从历史情况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的食物来源最可靠，因为他们能够从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中获取食物。相形之下，农民经常面临挨饿的危险，如果天公不作美导致庄稼歉收的话。

比起种养食物的农民,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有着更好更可靠的食物来源,而且为获取食物所需劳作的时间也更短。再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的布希曼人为例,他们当中的成年人平均每周仅花15个小时去狩猎和采集食物,也就是说,他们每天只工作两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我们对他们超常的健康状况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事实上,有10%的布希曼人能活过60岁。当然游牧生活也有助于他们的健康,由于他们不断地搬迁,他们能够避免因环境不卫生而染上的疾病;而农民们则相反,在集满了人粪和垃圾的村落中度过一生。

22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懂得如何种养食物,但直到10000年前才转向农业。人类之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特性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因为适于栽培的植物必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收不到什么成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大约200000种开花植物中,只有约3000种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食物。而在这些被用作食物的植物中,也只有不超过30种的植物是主要作物,它们包括4种禾本科植物(小麦、水稻、玉米和甘蔗)、淀粉为主要成分的植物(土豆、番薯、树薯粉和香蕉)以及被称为“穷人的肉类”的豆科植物(扁豆、豌豆、大巢菜、豆角、花生和黄豆)。

同样,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失去一见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够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所以,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峰驼、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

由上所述,可见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

在距今10000年前到距今2000年前这段人类发展史上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都转向农业。显然这是一次强制性的转变,因为没有一个人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会自愿抛弃他那舒适而又可靠的生活方式,去做终日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或牧场上、无休无止地劳作的农民。迫使人们发生转变的是人口压力。上万年,人类的数量增长缓慢,但还是造成了非洲、亚洲、大洋洲乃至美洲的人口迁移。最后,除南极洲外的各大洲都住满了人。随着此后人口缓慢但不断增长,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以自己种植的食物来补充采集食物的不足。毫无疑问,他们并不喜欢呆在一个地方种庄稼或者养牲畜,但事实是,就每平方英里所能养活的人口而言,农业远远超过了食物采集。

农业首先在少数几个存在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的地区成为主业。在这一驯化过程中,野生动植物长得越来越大,从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因此,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也就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做食物生产者,而不是食物采集者——最后他们就变成了居住在村庄中的农民。而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从农业革命最初的几个中心

地区逐渐传播到了全球大部分地区。

## 二、农业的传播

从狩猎到农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是独立发生的。农业除了独立地起源于墨西哥、中国北部地区和秘鲁外，还独立地起源于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和苏丹的尼罗河流域，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属的地中海以东海岸地区。每年发掘出的新证据表明，在东南亚、西非以及其他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我们知道得最清楚的是中东和中美洲（大致指巴拿马以北的美洲热带地区），这两个地区都拥有种类繁多的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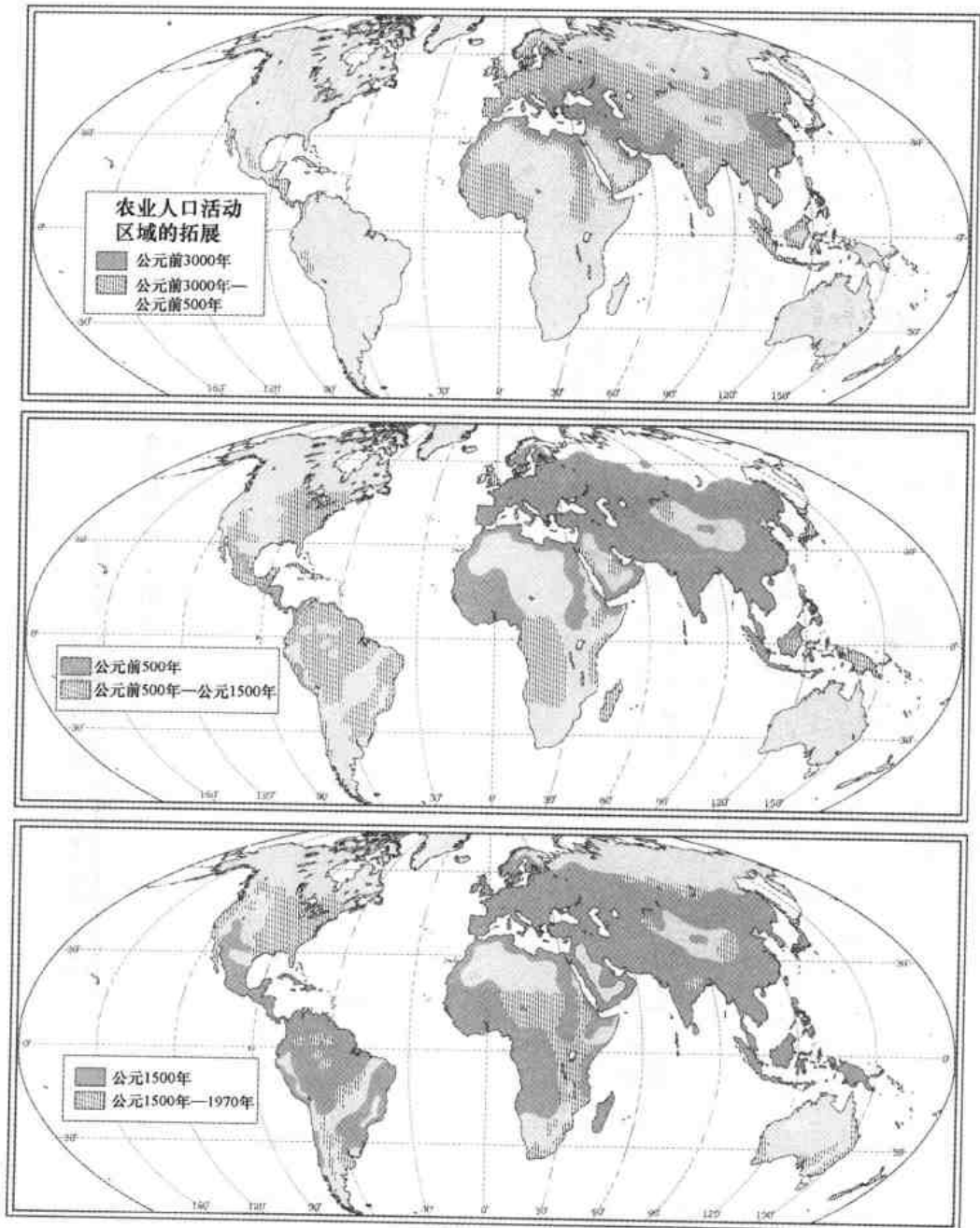
29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和大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和猪均起源于中东。而中美洲的两个小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其面积虽然仅为美国的 1%，可盛产的植物品种却不亚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中美洲品种极其多样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其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却殊为不同，极其多样，从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环境。因此在中美洲，能够成功地栽培的植物品种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蚕豆和南瓜之类。

经过许多世纪之后，人类已能让各种植物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并远播它方，从而在某个地区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使人类生存有保障的巨大优点。在这种地区，若一种作物因气候原因而不能生存，其他对生长环境要求不同的作物则仍可以生长。于是农业也就使密集的人口有了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类的文明也有了延续发展的基础。

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它被称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 9500 年起，至公元前 7500 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则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 7000 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0 年后，当地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来源的 10%；到公元前 3000 年时，也只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一。直到公元前 1500 年前后，由于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才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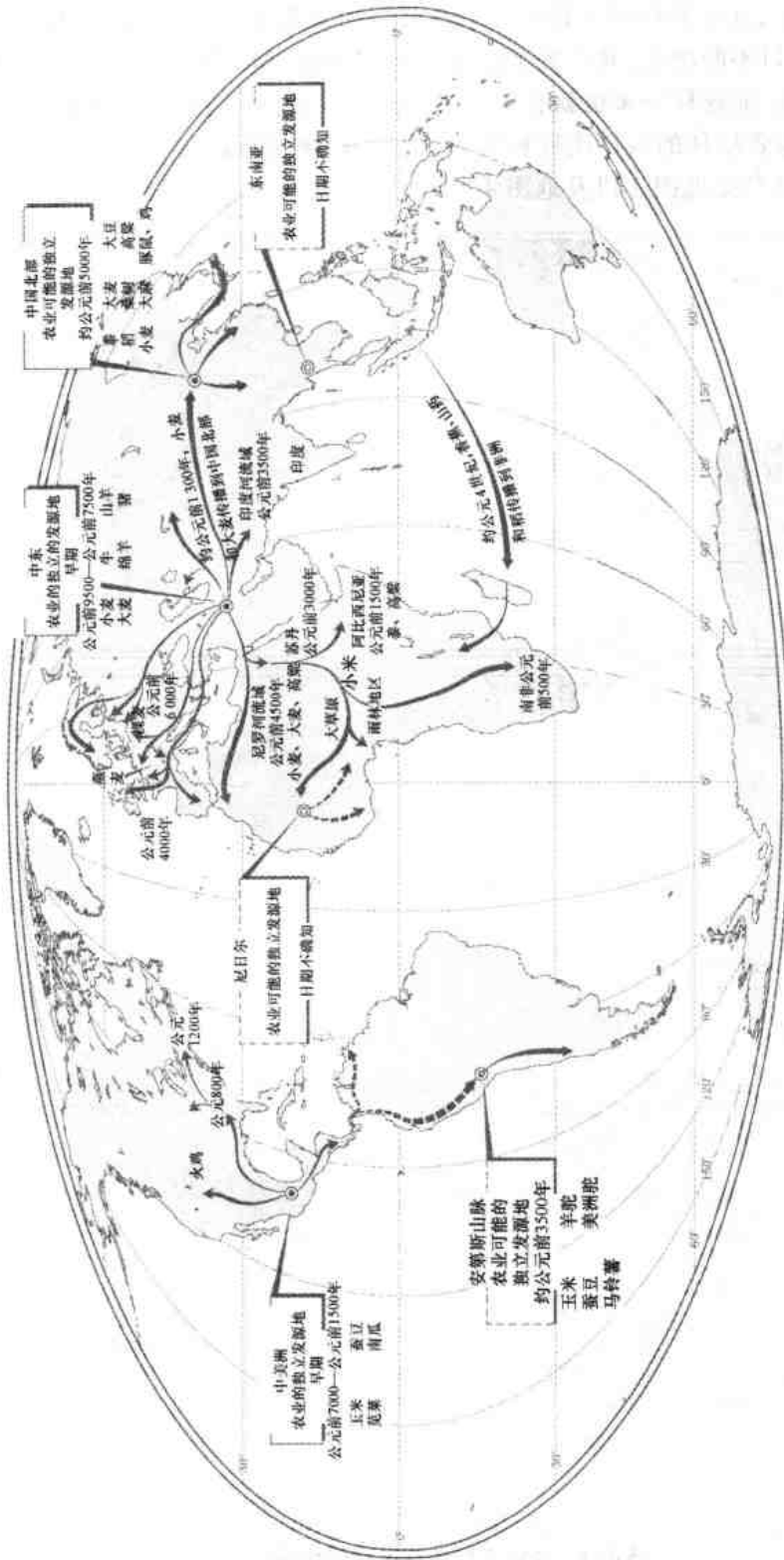
从中东和拉美这两个已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从中国北部地区，从现在还不能确定的其他农业发源地出发，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这一传播过程由于早期农业的低效率——植物栽培时断时续，经常要转换地方——而得到了促进。一块土地经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 8 年、10 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得被放弃

(即休耕)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的比例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5:1至10:1之间。这一点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必须经常进入新的区域,以扩大耕地面积。而这样一来也就有了一个连续的发展,即“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其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参见地图3以及地图4)。



地图3 农业人口活动区域的拓展

(26)



地图 4 农业的传播

注：①日期表明该地区的某些人已实行“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 ②箭头指示某些重要谷类植物培育的传播方向。

这里并不意味着农业已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这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所决定。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南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由于那时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农业的出现也推迟到了很久之后。当铁斧取代石斧时,清理森林的工作变得更有成效,从而使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扩展了,不仅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

农业在各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在还了解得很不够。农业大致是以中东为中心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向北传播到中亚和东欧,向西传播到中欧和西欧。在中国,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就已驯化了当地生长的植物,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中国人栽培出的植物包括中国南部地区的水稻和茶叶,以及中国北部地区的粟、高粱和大豆。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要算是桑树,它的叶子可用来养蚕;还有漆树,它可用来生产著名的清漆或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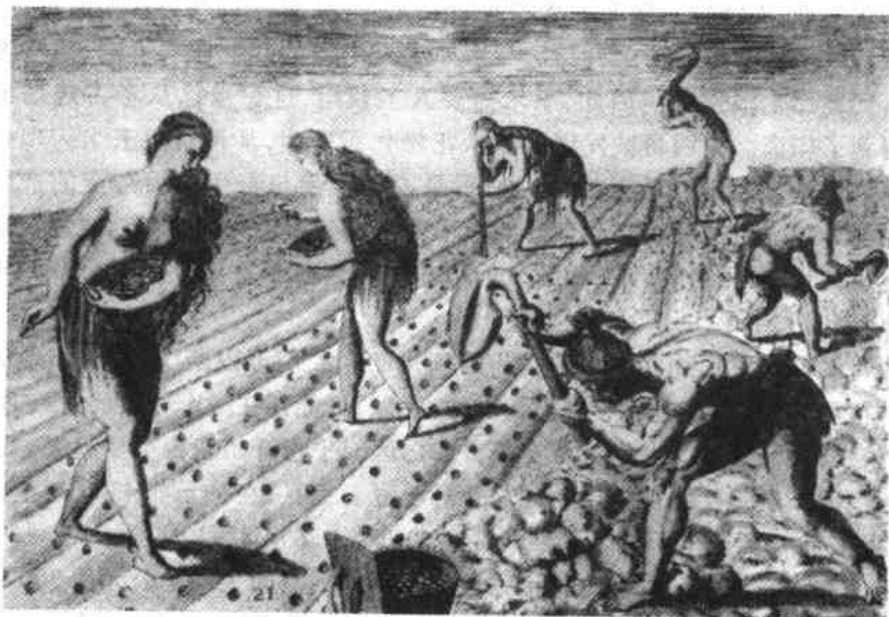


图5 印第安人的农耕图

在大多数土著美洲印第安部落里,妇女都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她们种植花生、豆类和其他作物;这些作物构成部落的大部分食物来源。这幅16世纪的法国版画,表现的是印第安男人正在耕地,而印第安妇女正在整理过的土茬中播种。

25 非洲的农业是在公元前 5000 年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和公元前 4000 前后在尼罗河流域独立发展起来的。不管其源头在哪里，非洲农业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局限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上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地生长。但是，公元初，这一障碍因两个重大发展而得到克服，这就是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前者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则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地生长，所以，它们和铁器的传入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

在近代，非洲被各西方帝国所瓜分，非洲的农业也因此而遭受了挫折。欧洲的传教士、官员和科学家从欧洲带来了他们熟悉的作物，如小麦和谷类，并把他们所不熟悉的非洲作物视为低等作物。通过现代的包装和广告，欧洲作物被普遍接受为真正的高等作物。不过，现在人们已意识到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1996 年美国科学院开始发表一系列名为《非洲丢失的作物》的报告；报告称，比起其他任何大陆，非洲拥有种类更多的原生物种，包括一系列非洲稻谷，富含蛋白质和铁元素的埃塞俄比亚薯以及高粱。高粱在美国主要用来喂牲畜，但它也可用来制成一种高质量的面粉。报告总结说：“非洲被称为饥饿的大陆，但它又是许多未被利用的食用植物的聚生地。”<sup>1</sup>

27 在南北美洲，农业独立地起源于墨西哥和秘鲁；我们将重点考察墨西哥的玉米。玉米的颗粒聚生在玉米棒子上，而且，与诸如小麦之类的其他作物不同，这些颗粒不会自动落到地面生根发芽。因此，玉米需要人工栽培，这一点已从考古现场出土的玉米中得到了印证。墨西哥城发现的玉米花粉化石表明，某种野生玉米为现代栽培的玉米提供了基础。现代的玉米品种似乎是古代玉米与野生蜀黍杂交的产物。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这种杂交品种开始在墨西哥得到人工栽培。墨西哥地区最早开始人工栽培的作物还包括南瓜（约公元前 7000 年前后）和蚕豆（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间）。

墨西哥的许多农作物并不是同时开始驯化的。人们可以断定，由于该地区的人们一边种植已有作物，一边继续寻找新作物，所以，可能存在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 5600 年时，农业在秘鲁的山区似乎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一地区的人工栽培作物包括番茄、花生、利马豆和土豆。而且，在公元前 43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间，秘鲁还出现了不同于墨西哥品种的玉米。农业就是从这一中美洲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开去。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 3000 年，不过在公元 750 年以前，玉米的传入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到公元 750 年时，由于对最早的玉米品种进行了改良，玉米栽培才变得比简单的食物采集更富有成效。同样，直到约公元 800 年时，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由于培植成功了玉米、蚕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 三、农业的种类

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促使人们去培植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小麦和大麦是中东最普通的作物,但是,当农民们向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在农民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燕麦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同样,农业朝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传播,导致对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带的传播,则导致对橄榄树的栽培,橄榄树成为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实质上是一种中东类型的农业。不过,有一条自南而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它标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一过渡地带相应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这里正好属于季风地区,季雨量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里不能茂盛地生长,所以为薯蓣、芋头、香蕉和稻所取代,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遍布南北美洲的主要产品是玉米;不过,在北美洲还有蚕豆和南瓜,在南美洲则有甜味的木薯和马铃薯,木薯和马铃薯均是“爱尔兰”品种。

一般来说,以上所述的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近,小麦已在取代水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原因在于农业科学家们已培育出具有更强的耐酷暑、耐严寒、耐干旱、抗虫害能力的小麦新品种。所以,现在可以栽种小麦的地区要比过去多得多,1995年全球小麦总产量已达到5.42亿吨。

早期的农民不但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种植不同类型的作物,而且还为种植那些作物发明了不同类型的农耕技术。最早的农耕技术被称为“刀耕火种”技术,这种技术是用来对付森林的,农民们利用这种方法清空树丛和灌木以便播种。但是,在人类历史早期,对于只有石制工具的农民们来说,清空树丛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于是,农民们就利用火烧光树丛,以便开辟出空地来从事农业。不过,由于活树本身存有大量的树汁,不易烧着,所以早期的农民就先围着树干削一圈,中断树汁的输送,让树木死去。干枯的树木很容易点燃,而且燃烧后的灰烬也是很好的肥料。然后,农民们就在已经清空、肥力又增加了的土地上播种,为迅速成长的作物浇水、除草,并建起篱笆防止野兔或鹿之类的野生动物闯进田地,最后,在作物成熟时收割它们。

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使农业得以大规模地拓展到原本为森林所覆盖的地区。这一技术至今仍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得到沿用。

另一个至今仍在各大陆被运用得相当普遍的技术是梯田农业。梯田在山区是一种深受农民青睐的技术，因为在山区，一旦下起大雨洪水就会沿着山坡汹涌而下；这时农民就面临着庄稼被冲走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破坏，农民在山坡上筑起石墙，并收集来泥土垒在墙后。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在石墙后不断聚积。当泥土多到足够积满梯田时，农民就可以放心地在这些小块的平整田地上耕种作物，而不必担心洪水会把它们冲走。这一技术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土豆，中国北部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玉米，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地区的农民则用它来种葡萄。

第三种农业类型是块状根植物的种植，这一技术在热带地区应用得比较广泛。在这些地区有许多有块状根的植物，如芋头、薯蓣、树薯等。它们的活的根茎有一部分埋在潮湿的地下，并形成体积很大的隆起的块茎。这些块茎被采出来后，可以通过烤、煮、焙等烹调手法，制成菜汤、面条或蛋糕。这些纤维类的粮食作物搭配起来种植，可以一年到头不间断地提供食品。（将这些淀粉类食物与鱼肉搭配在一起，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们的通常做法。）

最后，我们要注意到大约 3000 年前秘鲁山区农民发明的培高田地农业技术（*raised field agriculture*）。这一技术后来逐渐失传，并在几百年前就为人们所遗忘。如今，科学家们之所以对这一古老的农业技术非常感兴趣，是因为当人们发现它的奥妙、用它来种植秘鲁当地的作物时，发现这样种出的作物比用更为昂贵的、采用化肥和机械的现代农业技术栽培出来的作物要大得多。

培高的田地宽为 13—33 英尺、长达 33—330 英尺、高约 3 英尺，它们由渠道间隔成大小基本均等的几块泥质平台，作物就种在这些泥质平台上。这些泥质平台的泥土实际上取自开挖渠道时所挖取的泥土。农民们之所以要在这些培高的田地而不是在周围的平地上种作物，是因为如图 6 所示，采用这一培高技术有以下几个优点：

- 渠水的温度可以保护作物免遭安第斯山区寒夜里经常出现的霜冻的侵袭。
- 渠道可以及时地将多余的水排出，从而保护作物免遭洪水袭击。
- 由于毛细作用，渠水可以被吸入田地，而农民也可以通过手工很轻易地从渠道中取水灌溉，使作物免遭干旱侵袭。
- 作物可以从培高田地的泥土里所含的有机肥中吸取营养。这些富含有机肥的泥土取自旁边的渠道，含有绿藻、家畜排泄物和腐化的植物枝叶，其营养程度要优于化肥。它除了耗费劳动力以外不耗费其他任何东西，而当地的村庄并不缺乏劳动力。
- 渠道中养的鱼提供的蛋白质，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民的膳食。

由于以上这些优点,1984年秘鲁实验性的培高田地每公顷产土豆30吨,而周围采用进口农机和化肥、以普通方式进行种植的对比田则每公顷仅产土豆8吨。由于培高田地农业技术是一种不但生产效率高、而且自我支持的体系,它除了在几个拉美国家外,还在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得到推广。或许这一最先发源于安第斯山区、其后被人们遗忘了数百年、最近又被科学家们发现和恢复的农业技术,最终还要在全世界重新得到运用。这一古老技术的成功运用表明,尽管现代的“高科技”创造了无数奇迹,但即便在技术领域,我们也仍然可以从史前祖先那里接受一些教训。

除这些驯化的植物品种和农业技术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雨量较少、不适于从事农业活动的那些区域,当地居民开始转而喂养家畜。他们驯化当地的动物而

29



图6 培高田地农业技术

不是当地的植物。他们最先驯化的野生动物是狗。最初,他们杀狗取肉吃,就像对待其他动物一样。后来他们发现,狗的叫声能吓跑野兽,可利用狗来看守营地,而且还可以利用狗来帮助猎人找到猎物。到公元前10000年时,各大陆的狩猎部落都有了自己的猎犬队。

不久以后,人类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驯化了对他们有用的其他动物。这样,他

们也就成为牧民,过起了游牧生活。今天,有许多人继续以这种方式生活,游牧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辽阔大草原和沙漠地带,亦游牧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草原地区。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一直等到马和骆驼被驯化、空旷原野中的交通运输问题得以解决时才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一旦畜牧业在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间开始兴起,多种多样的畜牧方式也就发展起来。有些地区的牧人仅靠畜养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畜养骆驼,非洲东部和南部主要是畜养牛;不过也有一些地区的牧人靠畜养多种动物为生,如中亚地区畜养的动物就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等。

30 不过,不管畜养了多少种动物,牧人们的生活较之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民的生活,是颇为穷困的。在这些流域中发展起来的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具有很高的生产率,能及时地支撑起伟大而富庶的文明。这些大河流域的文明对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中东以及北非沙漠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伟大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历史,而每一伟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其内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进而由随时准备入侵的游牧民族促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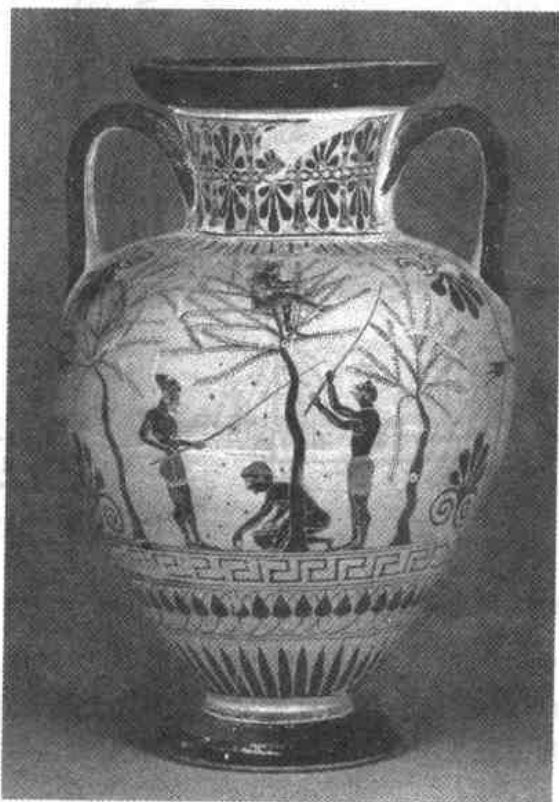


图 7 收获橄榄图

公元前 6 世纪末雅典制作的瓶子上所绘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人们是如何收获雅典最重要的一种作物——橄榄。

## 四、食物生产者的生活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人类也不能不定居下来。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最近的考古发掘揭示,我们的早期祖先并不局限于要么选择游牧和采集生活,要么选择定居农耕生活。如果当地的动植物食物来源异常丰富,当地居民也可能长年定居于村庄,即便他们完全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这一情形曾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布·哈热耶(Abu Hureyre)地区出现过。那里野生的谷物和豆类长得非常稠密,产量极高,就像把它们种在田里时一样。因此,这就使一个人数多达300—400人的狩猎采集者村庄有可能在该地区兴盛数百年。同样优越的条件也使食物采集者在其他一些地区如太平洋西北部沿海地区(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英属哥伦比亚)永久地定居下来,那些地区长年盛产鱼类。同样,在太平洋南部地区,沿秘鲁海岸一线,合适的洋流养育了涵盖整个生态系统的海洋生物:从浮游植物到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因此,在这些地方,食物采集者也定居于永久性的村庄,以采食海岸边各种海洋生物为生。不过,这类村庄只能算是一种例外情况:一般说来,游牧生活是食物采集的自然结果,就像定居生活是食物生产的自然结果一样。

人们常常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显而易见,这样做将会误入歧途。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诸方面知识的掌握是极其缓慢而又费力的,所以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天公不作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滴雨不下,有时瘟疫横行,故饥荒是常客。定居生活使粪便和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跑到离住处较远处解手,但是,这些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致的各种疾病。而且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的饮食很不全面,营养不良乃最为常见的事。处于这些境况下,可以估计,那时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出生率高往往使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31

不过,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阴影、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疑的,不如说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

过流浪生活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舒适的家具、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黏土制作陶器。最初，他们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渐渐地，他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出和过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近东的居民们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时温度较高，因而能用于给陶器上釉。上过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农人们就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体的各种器皿。

纺纱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已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能用黏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像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去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纤维，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制宜。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够容纳十多户人家的大房子里，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黏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都是用茅草盖的。这些住房内部设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还覆盖一层用布做成的床罩。住房内还有现代式样的、里面至少有两层隔板的橱柜和各式各样的壁橱。房间的中央通常都会生起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用来排烟。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各游猎民族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部落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把它们区别开来。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部落，发展很不充分，完全没有定形，几乎还处于游猎群体的水平。还有些部落则已有强有力的首领、原始贵族及平民，不过他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那时还根本没有后来的文明所特有的阶级结构。

通常，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社会基本单位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较适宜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如果有个别生产者暂时或永远丧失了他的劳动能力，大家庭也能承受这一损失。当遇上“大忙”，需要众多的人手来开伐森林、收割农作物或放牧家畜时，大家庭也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另外大家庭还能通过留一部分成员在家料理家务和照管附近的田地，派其他成员长期在外管理远处的菜圃果园或放牧牲畜，来有效地利用大面积的土地。

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 and 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

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这一点有着充分的保证,因为所有的农田、牧场和其他自然资源皆为村社所有,而村社则是由各家庭自动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会,既没有土地拥有者,也没有无地的耕种者。美国有位人类学者说:“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不可能村子的一头是饥饿与贫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却生活富裕。”<sup>2</sup>

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阻碍性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能满足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像现代社会这种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它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一个人帮助他的兄弟干农活,不是为了对方也许会给他一篮甘薯,而是出于亲属关系。这种部落社会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是一个生产率低的社会,这一点从第38页所载的贝恩巴(Bemba)部落的工作日程表中就可以看出来。

部落中社会关系的平等也扩展到部落中的两性关系上。这一平等的根据明确地体现在部落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方面。一位人类学家在考察了生活在婆罗洲中部、种植水稻的相人(Siang)后报告说,相人的寡妇在失去丈夫后可以继续种植自己的田地。“总之,妇女能像男人一样熟练地使用斧子。”如果某个寡妇受到孩子的拖累,“她通常会得到村中其他人的帮助。他们会赠予她稻谷和野猪,或者帮助她清理田地,至少在她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帮得上她忙以前是如此。”<sup>3</sup>

妇女们不但在农业方面,而且在村庄诸新行业中也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人们对凯特尔·哈玉克(Catal Huyuk)即公元前7000年小亚细亚的一个居留地的发掘揭示,妇女们种植了当地的植物,用公共烤箱烤面包,织毛纺织品和棉织品,用麦秸编垫子和篮子,还烧制煮饭和储物用的陶器。在这个特别的定居点中,妇女们似乎不仅享有平等的地位,而且还享有比男性更高的地位。这里的绘画雕塑、房屋装修以及墓葬遗址都显示出当时家庭等级的最顶层是母亲,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而父亲则位于最下层。

最后谈谈宗教。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导致新的信仰和新的神。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这时已不合时宜。农夫们开始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照管他们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灵。他们通常已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最重要的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土地女神即丰产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他们以为,农作物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取决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日益盛行。现今发现的许多故意夸大女性特点——乳房悬垂、大腿粗壮——

的黏土雕像便可证实这一点。这一类雕像不仅整个欧洲地区有，就是往东远到印度这样的地区，也时有发现；这充分反映了农业从中东向其他地区的传播。

##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我们已看到，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同样是 1 平方英里的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要比采集食物所能养活的人口多得多。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总人口在距今 10 000 年至 2 000 年的 8 000 年中，从 532 万直线上升到 13 300 万，即足足增加 25 倍时，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 部落社会的低生产率

一位西方观察家记录了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贝恩巴部落成员在 1933 年 9 月间的工作情形。无可否认，这里记录的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人们可以比平常多喝一些啤酒。不过，记录中的以下精选片断表明，贝恩巴部落成员无须应付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日常苦差事”。

1933 年 9 月 1 日，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其中一葫芦给老头们喝，另一葫芦给小伙子们喝。有人生了一个小孩。其他村庄的妇女赶过来祝贺，并在村子里呆了两三天。这期间妇女们种菜的活推后了。

9 月 2 日，老头们出去清理灌木。小伙子们待在家里喝剩下的、有点发酸的啤酒。邻村有更多的妇女赶来看新生的小孩。很少有妇女出门去侍弄菜地。

9 月 3 日，小伙子们和妇女们去邻村参加由来访的传教团医生主持的宗教活动。没人去种菜。

9 月 6 日，老头们和小伙子们清晨 6:30 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下午 2 点。晚上老头们和小伙子们各喝一葫芦啤酒。妇女们像往常一样在菜园里干活。

9 月 7 日，观察家所在的狩猎组杀死了一头雄鹿。小伙子们负责将鹿肉取回来。妇女们磨多余的面粉，就着鹿肉一起吃。还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人们从下午两点开始喝酒。到 4 点钟的时候，小伙子们开始醉醺醺地在村子里摇来晃去，四处滋事，最终争吵起来。晚上跳舞。老婆婆们也兴高采烈，而她们的女儿则指责她们在村子广场上跳粗俗的舞蹈。没有足够的啤酒给较年轻的女人们喝，她们仍保持清醒，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表示不满。除了老头们以外，没人干菜园里的活。



9月8日,上午8:00,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去菜园干活。中午12:00,人们回到家里。小伙子们坐在隐蔽处,喝了两小时的剩啤酒,用苏格兰传教士教的全音阶唱法唱赞美诗。小姑娘们出去进行小规模地给鱼下毒的活动,但什么也没抓到。

9月15日,3个男人在河边开垦旱季菜地。小男孩们在学诱捕鸟类。年轻的女人们都去了首都,还没回来。没人得到开胃小菜。没人做像样的饭。

9月17日,天很热。小伙子们整天坐在隐蔽处,互相为对方梳头、刮脸,互相捉虱子。得不到开胃小菜。女人们太累了,不愿意做饭。

9月19日,9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个女人在锄地。3个女人在堆柴火。年轻的女人们出去给鱼下毒,抓到了一条鱼(约2磅重)。

9月22日,3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个男人锄地。4个小伙子和他们妻子中的3个人去钓鱼。3个人在堆柴火。

9月24日,全村分享4葫芦啤酒。除了男人们外,女人们也可以喝个够。喝啤酒的活动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天。

9月25日,两个老头只能去砍树。小伙子们不敢爬树,因为“啤酒在眼前晃荡”,他们坐在隐蔽处编篮子。只有一个女人在侍弄菜地。小男孩们在诱捕鸟。剩余的啤酒被喝个精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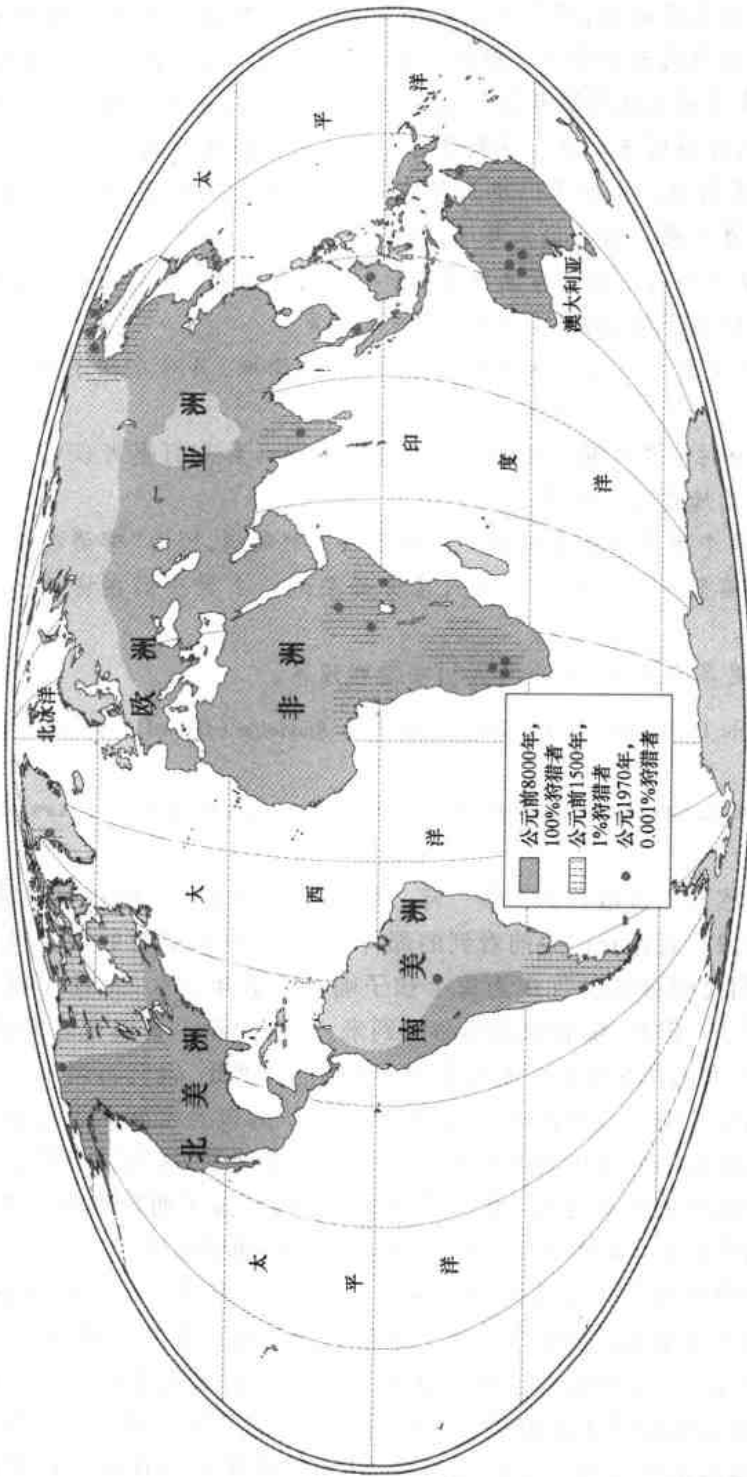
9月30日,更多的啤酒。4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

\* A. I. Richards *Land, Labour and Diet in Northern Rhodesia* (Oxford University, 1939), pp. 162—164.

并非所有民族的人口增长都一模一样。最先转向农业生产的那些民族,其人口往往也增长得最快。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妇女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因为她们要用自己的乳房为每个孩子哺乳达数年之久,而且在哺乳期间她们一般不会再怀孕。但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母亲们除了利用自己的乳汁外,还能利用母牛、绵羊和山羊来给孩子们提供充足的奶水,因此,她们再也不必自己为每个孩子哺乳好几年。而一旦停止哺乳,她们重新怀孕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生活在拥有驯化了的牲畜的村子中的妇女平均每人生6个孩子,这与漫长的数世纪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食物采集者平均每人生4个小孩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照。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在距今2000到10000年间全球人口剧增的原因。

34

当农业人口快速增长并迁徙到世界各地时,食物采集者的人数远远落后了,而且被排挤出大部分土壤肥沃的地区。由于早期农业的生产率并不很高,所以村庄中很快就出现人口压力,过剩的人口只好移居到附近食物采集者所在的地区。有时候,数量上占劣势的食物采集者被迫逃到不适于农耕的其他地区。在非洲就出现过这种情形:布希曼人最终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俾格米人现在则住在茂密的丛林中(见地图2和地图5)。



地图 5 狩猎人口活动区域缩减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生出一种新的混血人种。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徙,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 8000 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前 1500 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 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 000 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种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的分布地域大致是平衡的(见地图 2)。但到公元 1000 年时,这一平衡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一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 18 世纪时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便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

### 推荐阅读物

36

关于农业革命起源和本质的理论正随着新的发现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见解出现在 C. Wesley Cowan 和 Patty Jo Watson 合著的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出版社,1992 年版)和 R. D. Hurt 所著的 *Indian Agriculture in America: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of Kansas 出版社,1987 年版)两书中。了解相关内容也可参阅下列著作: M. N. Cohen 所著的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77 年版)、S. Struever 主编的 *Prehistoric Agriculture* (Natural History 出版社,1971 年版)、L. R. Binford 和 S. R. Binford 共同主编的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eology* (Aldine 出版社,1968 年版),以及 B. M. Fagan 主编的 *Avenues to Antiquity* (W. H. Freeman 出版社,1976 年版)。有关中国农业独立起源的描述参见 Ping-ti Ho 所著的 *The Cradle of the Ea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75 年版)和 D. N. Keightly 主编的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83 年版)。C. Renfrew 所著的 *Archeolog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8 年版)一书分析了农业在欧洲的传播所带来的文化结果。J. Bertin 所著的 *Atlas of Food Crops* (Paris 出版社,1971 年版)一书则阐述了农业革命对今日世界的影响。D. Pricc 与 J. A. Brown 合著的 *Prehistoric Food-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 (Academic 出版社,1985 年版)分析了食物采集者安土重迁思想的源起。

### 注释

1. Cited in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2. L. H. Morgan, *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 (New York, 1881), p. 45.
3. J. H. Province, "Cooperative Ricefield Cultivation Among the Siang Dyaks of Central Borne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9, No. 1 (1937), pp. 80—91.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37

## 人性的本质

1971年全世界都因发现了塔萨代人而感到惊奇和兴奋。塔萨代人是一个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一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的食物采集者部落,共有27人。在至少6个世纪的时间里,塔萨代人的先祖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这个小群体的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他们根本就没有“武器”、“敌对”、“愤怒”或者“战争”这样的词语。自从与外人有了接触后,他们急不可耐地采用了波罗刀,即菲律宾人用的一种长刀,因为这种刀优于他们采集食物、砍斫树木和劈开树丛用的石制工具。但是,他们拒绝使用矛和弓箭,因为他们不能运用这些武器来采集食物。他们仔细而平等地在群体所有成员中分配自己采集来的所有食物(番薯、水果、浆果、鲜花、鱼类、螃蟹和青蛙)。

对塔萨代人的这种生活状况的真实性,有人表示怀疑,有人提供辩护。不过,由于世界各地已发现具有类似社会特征的其他一些小群体,人类学家们承认塔萨代人作为史前人类的一种共同类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塔萨代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是食物采集者,就和农业革命前——即占人类历史80%的时间中——的所有人类一样。如果在这数万年中,所有地方的人都像塔萨代人那样爱好和平,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那种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侵略性的共同看法。

不幸的是,就在世人知道塔萨代人的同时,人们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另一个有30人的小群体,即芬图人(Fentou)。这个部落的人都是凶暴的武士,他们不断地用弓箭进行战斗。历史上,类似的矛盾现象也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出现过:科曼奇人(Comanches)和阿帕切人(Apaches)将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战士,但霍皮人(Hopis)和祖尼人(Zunis)却培养他们的孩子过和平的生活,而且至今仍这样培养。

那么上述这些情况对我们认识人性的本质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历史记载表明,人类生来既不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就专门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人性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侵略性不是人类与

38

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sup>1</sup>

人性问题对我们大家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变得更加致命，同时也更加频繁。在包括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战争并不多见，因为小型的食物采集者群体只能占用那么大的地盘，占领相邻部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并无多大用处。事实上，他们很可能在战争中失去一切，因为那时全球的人类少得可怜，血腥的战争极可能毁灭整个人类。小猴子只需完全依赖父母一年就可以独立生活，猩猩需要依赖 3—4 年，而人类需要依赖的时间则长达 6—8 年。族群内的合作体系能给小孩提供必要的食物和保护，从而更好地保证他们在漫长的依赖期中的生存。简言之，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乐意合作的血亲社会之所以能占上风，就因为它们十分适合于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不断增加，村庄拓展成城镇，城镇又扩张成拥有巨大的宫殿和庙宇以及聚敛来的财富的帝国。由于此时可以争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也愈来愈具有毁灭性。虽然手持短剑的古罗马士兵或披挂盔甲的中世纪士兵杀死的人并不多，但到近代时，大屠杀却已变得很普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 840 万军事人员和 130 万平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军事人员和平民分别增加到 1690 万人和 3430 万人。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伤亡人员肯定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增加。由来自 30 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于 1985 年 9 月报告称，核武器攻击造成的冲击波和辐射效应会直接夺走几亿人的生命，但是全世界 50 亿人中，有 10 亿到 40 亿人将死于饥荒。这种饥荒起因于“核冬天”；在“核冬天”，核爆炸产生的黑色蘑菇云形成的巨大云层会遮盖地球，使全球的作物得不到热量和阳光。

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缘故。而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而也可以由人重新构建。以下是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 (Ashley Montagu) 就人性问题得出的结论要点：“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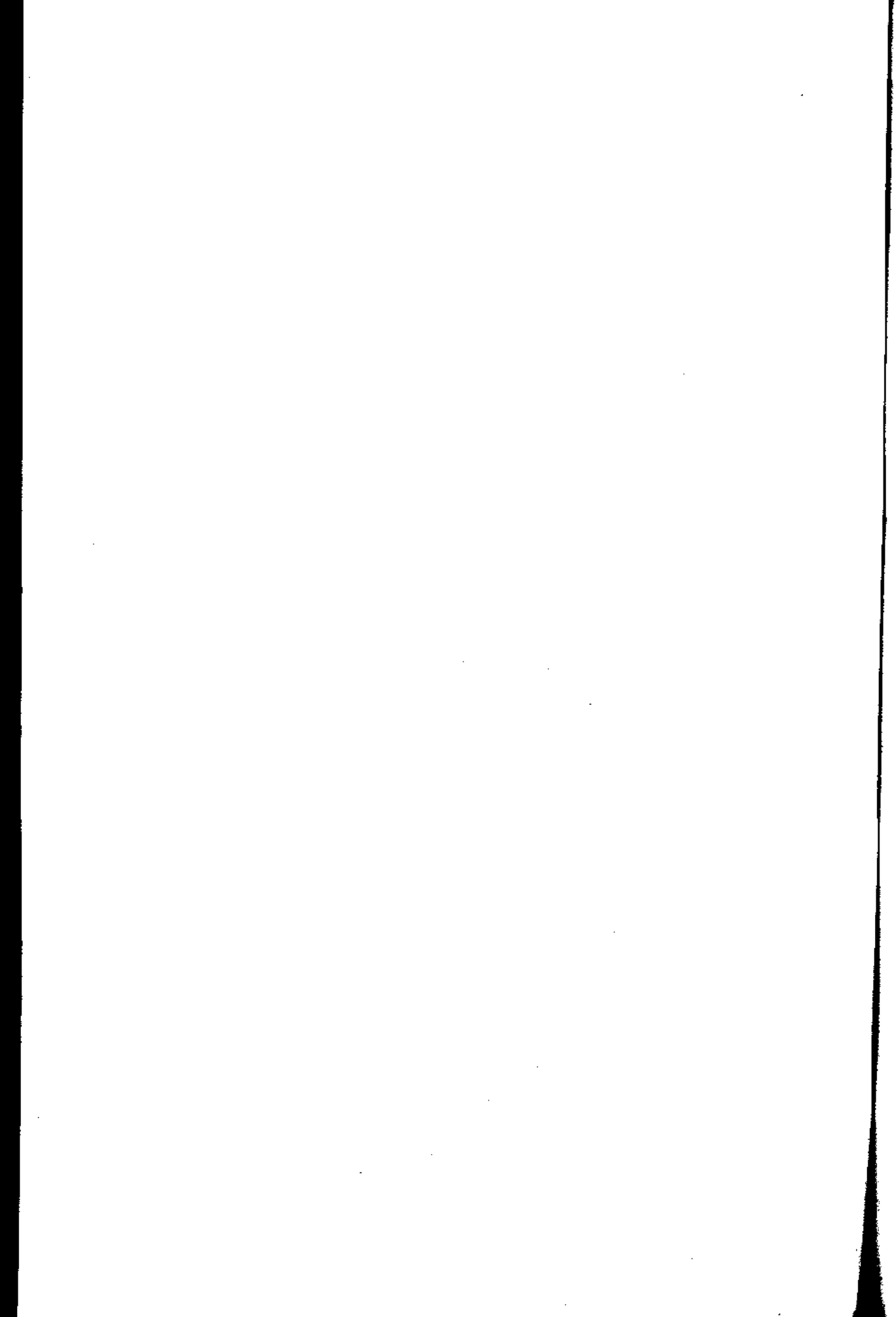
## 推荐阅读物

以下两位作者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富有侵略性的动物：R. Audrey 著有 *African Genesis* (Atheneum 出版社，1961 年版)，他还著有 *Territorial Imperative* (Atheneum 出版社，1966 年版)；D. Norris 著有 *The Naked Ape* (McGraw-Hill 出版社，1967 年版)。而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而不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这一观点出现在下列广受欢迎的著作中：M. F. A. Montagu 所著的 *The Nature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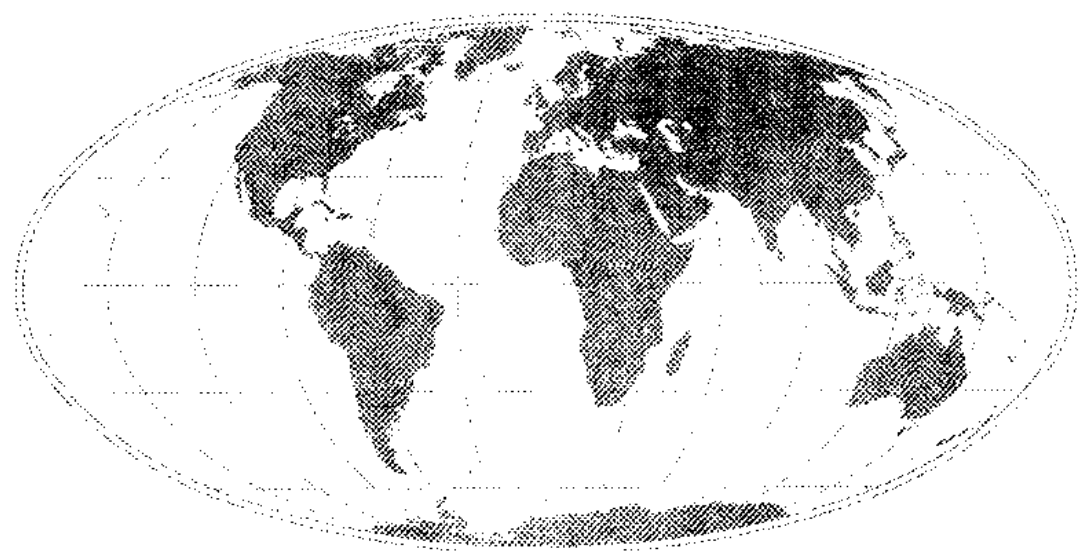
*Human Aggression*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6 年版)、A. Bandura 所著的 *Aggression* (Prentice Hall 出版社, 1973 年版), 以及 R. C. Lewontin、S. Rose 和 L. J. Kamin 合著的 *Not in Our Genes* (Pantheon 出版社, 1984 年版)。关于这一论题的最新著作是 L. H. Keeley 所著的引起争论的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96 年版)。

### 注释

1. A. Bandura, *Aggression* (Prentice Hall, 1973), pp. 113, 322.
2.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1983 (Letters to the Editor).







##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  
(公元 500 年之前)

我们从第一编中已知道,农业革命是人科动物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后所取得的第一项重大成就。这一革命使古代大河流域文明有可能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发展起来。诸古代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最后被来自中亚大草原和中东沙漠的游牧入侵者所灭绝。古代文明就这样让位给了在好几个方面不同于自己的新的古典文明。

虽然诸古代文明局限在大河流域,但诸古典文明却向外伸展,直到彼此接壤为止。于是,古典时代的文明整个地覆盖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不但就范围而言,而且就内容来说,也都是独特的。与古代文明一样,每个古典文明都发展起自己的独特风格——自己的独特的社会、宗教和哲学体系——这些体系一直延续到近代。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创造性并不像在古代文明时那样,被限制在中东。在古典时代的数世纪中,欧亚大陆的所有地区都作为同等的地区互相影响。所有的地区都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这些贡献至今仍对全世界的人产生影响。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  
的生活。 49

——亚里士多德

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  
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  
处于交战状态。

——柏拉图

---

## 第3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 (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

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蒸晒下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的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1年、10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 一、古代文明的起源

44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 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

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就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以用作一般的指南。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会。那么，简单的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是如何转变为复杂的新文明的呢？我们可以通过探究最先出现文明的中东地区的转变过程，来解答这一问题。早先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区，人们已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此时，人们又在那里开始了第二次伟大的冒险，即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并逐步发展起一种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从高地迁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木材，不过这些木材的质地不太好；那里的芦苇荡里，有各种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这一新环境蕴藏了很大的潜力，但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说在山区种植农作物，降雨量还勉强够，那么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就显得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土，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夺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据公元前 2500 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 86 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样，而且，由于实行了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开挖更多灌渠、开辟更多农田、生产更多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做是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而冷却后，铜又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器。到公元前 3000 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入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掺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地胜过石器。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器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犁的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得尖尖的。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是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犁已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得到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时,犁还传入了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45

公元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波斯湾和尼罗河上已先后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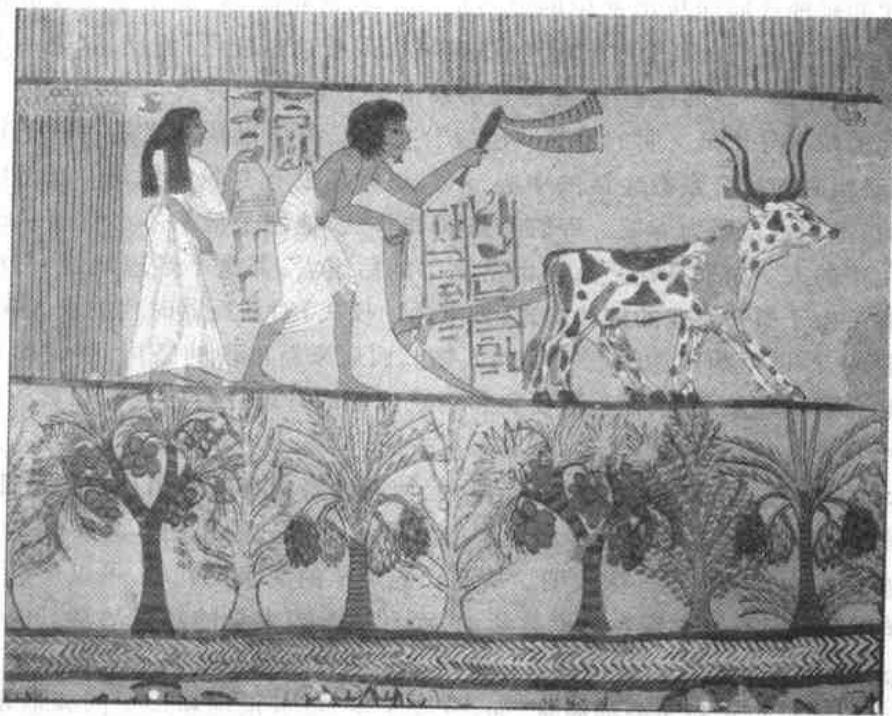


图8 犁的发明和使用

车轮是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另一项基本发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以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也被用来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

46

又当作战台使用，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投掷标枪杀敌。轮子也被用于和平目的，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黏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成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尽管有不少人一直都在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若干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先有了人的大脑的发展，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还是语言和工具制造促成了大脑的发展？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的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如果祭司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后来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这时，社会的成分已日益多样——宗教的显贵们对此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开始破坏宗教显贵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

财富,屡遭劫掠,客观起了一定的促成社会混乱的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47

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大批生产的陶器和金属器具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的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但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

48

大规模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木材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3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十分紧缺的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送到苏美尔。”<sup>1</sup>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邦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人力物力的开支,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它也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

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陪葬品越来越大的差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

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成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更是差别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

从中国到安第斯山脉的许多文明中都出土了伴有奢侈陪葬品的王室陵墓，这表明这些文明与它们所取代的简单的部落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我们对中东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变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它们使最早的欧亚大陆诸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印度河和黄河岸边诞生（参见地图 6）。

## 二、古代文明的传播

一旦文明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几个地区生根，它便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正像农业革命以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为文明所取代。部落社会被取代的原因与早先狩猎团体被取代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曾提到过，随着其人数的增多，狩猎者们不得不转向农业，因为农耕技术的生产率比狩猎活动要高得多。同一块地所能养活的农民比所能养活的狩猎者要多得多。现在类似的情形又在部落耕种者那里出现：他们也由于低下的生产率而被取代。我们从第 38 页关于贝恩巴部落的工作日程的记叙中可以看出，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部落生活是多么闲适和随意。但是，由于不存在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生产量的压力，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极其低下。部落成员只需生产出能满足自己家庭和患难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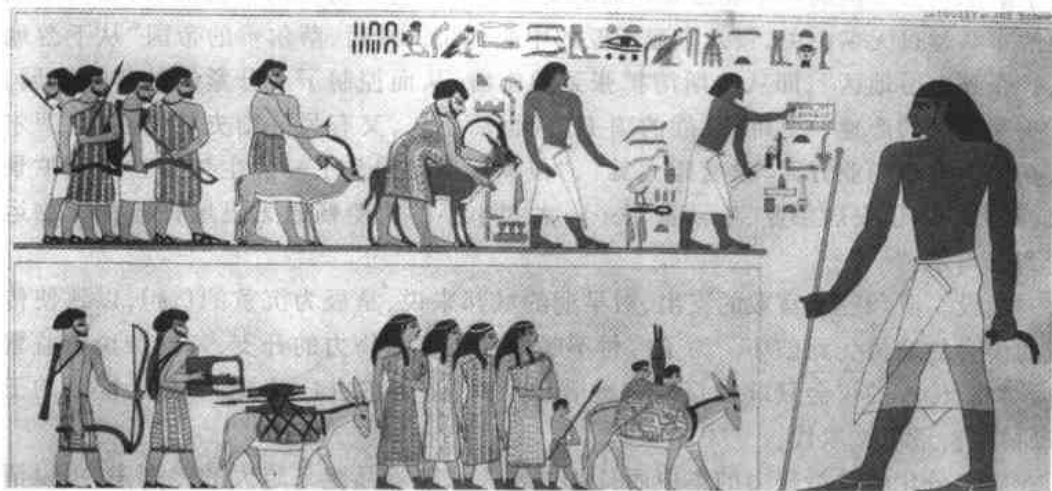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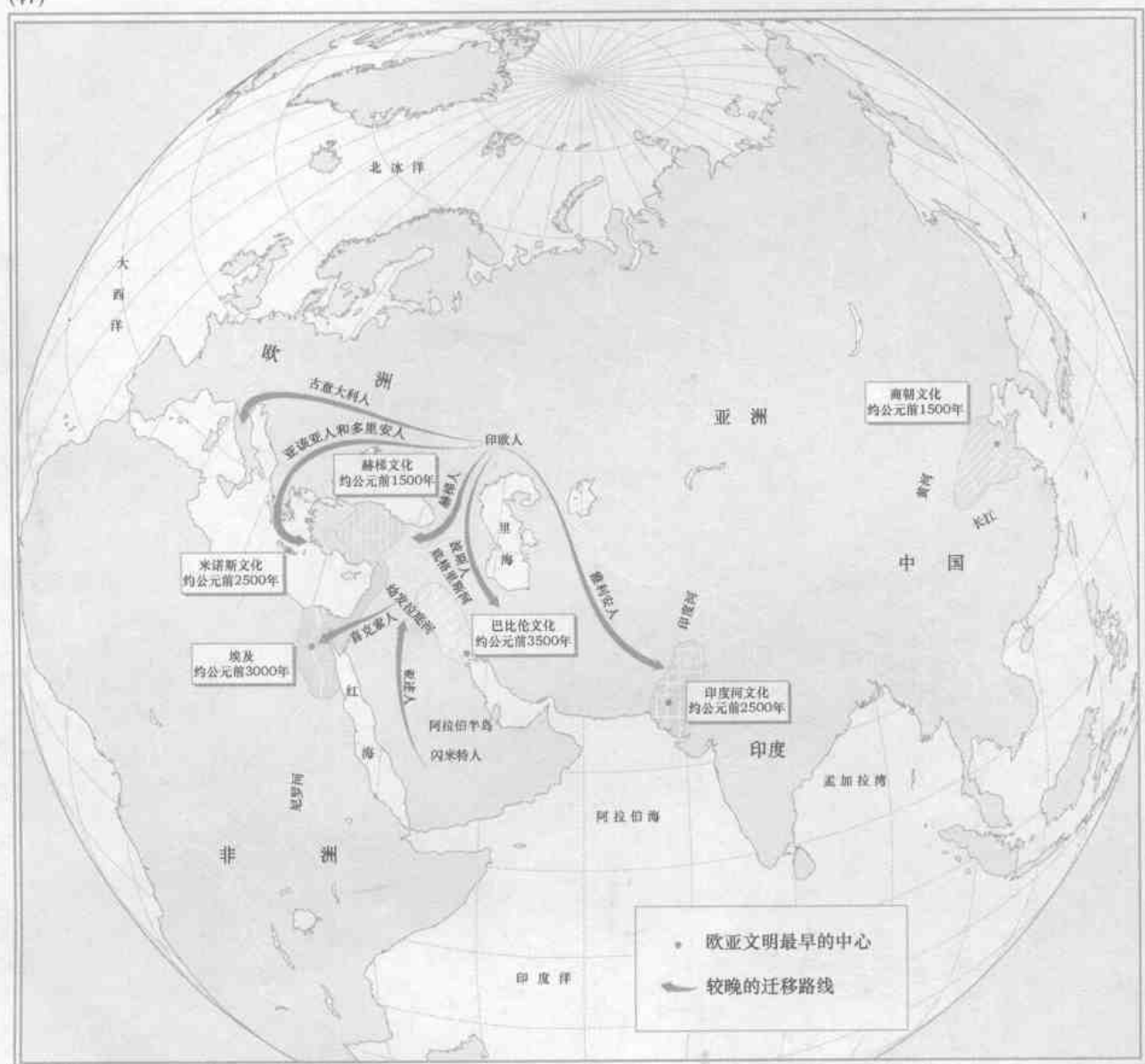


图 9 移民埃及图

这是一幅作于约公元前 3000 年的埃及早期绘画，它描绘了部落农民向埃及迁移的情景。





地图 6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公元前1500年)

属的生活必需品就行。

当部落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大时,部落社会便无法与生产率高得多的文明社会相对抗。诸文明社会之所以会生产率更高,是因为它们是建有国家机构的阶级社会,国家机构能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吏、军事首领、传教士和书吏。为了支付税收和租金,文明社会的农民不得不比部落社会的耕种者更努力地工作。请细想一下贝恩巴部落的日常生活与下面一段话中描述的埃及农民和工人的恶劣境况之间的对比。这段话是公元前3000年一个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社会底层许多人的苦难与社会顶层少数人的幸运作了一番对比。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吏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菜摇橹的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口边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像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干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只好整夜蜷缩着身子睡,等到太阳一出来,就又得去接着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椎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下来歇一会儿的工夫也没有。他匆匆地走家串户,兜揽活儿。就像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像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儿子。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的。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sup>2</sup>

显然,和那位埃及父亲所提到的可怜的农夫、石匠、理发师及铁匠相比,贝恩巴部落成员享有的生活更闲适随便、无忧无虑。但是,正因为部落成员的生活安逸,他们也注定要被淘汰。与那些为了应付地主和税收官的强征勒索而不得不辛苦工作的埃及同事相比,贝恩巴人的生产率极为低下。因此,就像早先狩猎者团体被部落耕种者挤出历史舞台一样,部落社会也被无情地逐出了历史舞台。

在部落文化到达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时,中东核心区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取代过程不可抗拒地继续着;到公元时,文明实际上已毫无间断地从英吉利海峡扩展到中国海(比较地图6与地图7)。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约公元前 3500 年前后,那么,其他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 3000 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 2500 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 1500 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 500 年。这些日期都是大致的估计,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不断得到修正。实际上,人们最近已发现,以前大多数史前年代所赖以确定的碳同位素测定法也会有正负几百年的误差。因此,一些学者现在对文明从地中海东部传播到西欧这一传统假设提出了质疑。

### 三、古代文明的类型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提到,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随农业与畜牧业的比例、种植的植物和饲养的动物的种类的不同而迥然相异。同样的道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古代文明中的每一个都有其与众不同之处,都是一种独特的类型。这些类型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无论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都能立刻从该城市的建筑风格、社会风俗、食物和所用的语言判断出这个城市是中国的、印度的、中东的还是西欧的。

在考虑各种古代文明的独特性之前,我们应该承认它们还具有某些共性,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共性或许是,社会关系的新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新的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源于这一事实: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的基础上。日常生活不是取决于亲属之间的互助关系,而是取决于税收、地租和劳役形式的纳贡关系。因此,那位埃及父亲所描述的剥削是一种普遍情况,而非例外情况。虽然似乎尼罗河畔的那些农民、石匠和金属加工工人所受的待遇异常苛刻,令人难以置信,但现存的许多资料也同样描绘了在其他所有文明中存在的野蛮剥削。公元 1 世纪中国汉朝的一位观察家描述道,一个农民的“双腿像烧过的炭棒,后背结满盐痂,皮肤像锥子都刺不穿的皮革,拖着扭曲的脚掌和疼痛的腿脚蹒跚前行。”<sup>3</sup>

这种不平等一直持续到近代;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富裕的贵族们通常给他们的每个乡间别墅都配上 300—800 个仆人。对这些贵族来说,买卖、质押或交换他们的农奴即“魂灵”已成了一种惯例。他们发布广告,将他们的魂灵和家庭用品以及其他商品一起出卖:“本人有意出售:宴会用桌布,还有两个受过训练的女孩和一个农夫。”“本人有意出售:一个举止得体的 16 岁女孩和一辆没怎么用过的二手马车。”<sup>4</sup>

古代文明的这种不平等甚至还扩展到死者身上。考古学家们发现,平民的坟墓中仅有少量的陶制容器,或者什么也没有,富人的墓葬中可以发现昂贵的家具和珠

宝,而王室的陵墓中则不仅有奢华的个人装饰品,还有不少贴身侍从,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太监、乐师和普通仆人——他们都是殉葬品;让他们殉葬的目的除了是要反映出王室大人物生前的富裕和高贵外,还为了让他们侍候这位死后的王室大人物。在最近发现的一处秦始皇陵中,这位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用 7 500 个陶俑组成的军阵将自己护卫起来。每个俑都有真人大小,其面貌特征各不相同,代表着 2 000 年前皇帝统治下的各个族群。

51

甚至坟墓中的骸骨也反映了古代文明中严酷的生命不平等。对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危地马拉梯克沃(Tikal)坟墓中的骨骼的研究表明,虽然普通玛雅男人的身高只有五英尺一英寸,但少数获得精美墓葬的玛雅男人却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他们的骨骼实质上也更为粗壮,他们的寿命显然也 longer。考古学家们断定,“营养优势”使玛雅的精精英们能在身高和预期寿命方面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sup>5</sup> 这种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骨骼差异至今依然存在。英国卫生部在 1984 年 12 月发表的报告中称:“在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以一个体力劳动者为户主的家庭的成员,其平均身高要明显低于非体力劳动者家庭的成员。”<sup>6</sup>

除社会不平等之外,诸古代文明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两性间的不平等。我们已知道,在旧石器时代,妇女享有平等地位,因为她们作为食物采集者对食物供应所作的贡献甚至大于男性狩猎者。同样,由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技术相当简单,妇女可以耕种居住地周围的土地,并可以继续采集她们所能发现的各种食物,因而,她们依然与男人一起是平等的食物提供者,依然与男人一起保有平等地位。



图 10 乌尔城透视图

约公元前 2000 年时乌尔城(the City of Ur,在今伊拉克境内)风貌的透视图。

随着犁、灌溉技术和诸如冶金术之类的新工艺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先进的新型农业为文明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同时又破坏了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因而也破坏了她们在社会上的独立地位。妇女们发现要参与新的农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新的农业要求人们照料拖重物的牲畜、砍伐树木、维护灌溉渠道、保养犁

和其他农具，而这类工作并不适合女人做，因为它们要么太繁重，要么会让她们无法长时间地照看小孩。于是，妇女们渐渐地不再是与男人平等的食物提供者。她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小孩和丈夫。

男人们逐渐控制了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而妇女们则变得孤立起来，处于从属地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妇女做“家内”活和男人做“家外”活的区分。当然，  
52 “家内”活对家庭和社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们却普遍认为这种活没有男人干的活重要。既然人们认为妇女们干的话不太重要，自然也就认为她们是不太重要的性别——“第二性”。

此外，既然妇女们被束缚于“家内”活，男人们就不但获得了对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的垄断，而且还获得了对国家中一些新的职位的垄断。他们成为议会、法院和军队中的领导人。就这样，男人们最后垄断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妇女们则开始居于从属地位，变得十分顺从，变成后来所称的“弱势性别”。当欧洲人于 15 世纪进行海外扩张时，发现食物采集部落（如拉布拉多的蒙大格拉斯—纳斯卡比印第安人社会）中的妇女们与男人们一起享有令欧洲人难以企及的平等，这并非偶然的。但是，在诸如中国、印度和中东之类的海外文明中，欧洲人则发现妇女们像在欧洲一样是受约束的、顺从的——其程度甚至还超过了欧洲。

各种文明中的妇女们都地位低下的另一原因是，对可继承的私人财产有了新的强调。这使男人们竭尽全力地去确保自己实际上是其继承人的亲生父亲，因为他们的继承人将会得到他们的所有财产。因此，富裕的上层人士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周密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活动。这些措施包括穿戴贞洁带、用簿记制度记录女性每次性生活的具体日期、阉割伺候统治者的嫔妃的男人和广泛实施割礼。割礼就是割除少女的阴蒂；由于这一措施能减少或消除妇女性交时的快感，所以被认为是阻止妇女“偷人”的有效办法。

众所周知，在这一男尊女卑的整体格局中，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其中颇为突出的是：野心勃勃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迷倒了朱利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两人，试图利用他们来恢复埃及王位的实际权力；阿斯帕西娅，也就是伯里克利的情妇，以学识渊博、聪慧过人、美貌无双而闻名于希腊；足智多谋的皇后艾琳废黜了她儿子的王位，成为拜占廷帝国的第一个女性统治者（797—802 年在位），不过因考虑到传统，她在官方文件中仍被称为“忠实的皇帝艾琳”；还有女皇武则天，她废黜了她儿子的王位，不但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统治者，而且还成为中国最能干、最开明的一个统治者。这些著名人物以其超凡的才智和惊人的成就在史册上占有显赫位置。不过，尽管她们名气很大，但却不能说她们的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她们那些不知名的姐妹们的日常生活，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庇隆夫人、英吉拉·甘地和科拉松·阿基诺的生涯并没有明显地改善阿根廷、印度和菲律宾妇女的日常生活一样。

在考察了所有文明中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方面由平等到不等的历史性转变之后,我们现在开始细察每个文明的特殊类型。

## 美索不达米亚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是城市类型。第一个中心在苏美尔;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邦。各城邦相互征战不休,结果轻易地就被来自北方的印欧入侵者和来自南方的闪米特入侵者所征服。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印欧入侵者与闪米特入侵者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进行数千年斗争的历史。

第一位伟大的帝国莫立者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闪米特人,即萨尔贡一世(约公元前2276—公元前2221年);他以大河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征服了南抵波斯湾、西达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另一位帝国创立者也是闪米特人,即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4—公元前1662年);我们后面将谈到他因制定《汉谟拉比法典》而闻名于世。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继汉谟拉比之后的人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

尽管这些帝国颇可夸耀,但城市依然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基本单位。大多数平民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53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银块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则提供劳动,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通过多种形式缴纳给寺院、宫廷或地主,作为报答。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的纺织纤维。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葱、洋葱、小萝卜、莴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账,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管理事项和账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当笔,刻写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称为楔形文字,它显然是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智力游戏或文学活动才发明的。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

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sup>7</sup>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画下来,也就是说,用这一方式记录所要记录的事物。不久,图形符号固定下来,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应付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尤为重要,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地、全面地应用语音原则。到公元前 2900 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 2000 个左右减少到大约 600 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书吏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因此,他们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54)

| 最初的象形文字 | 后来的楔形文字 | 早期的巴比伦文字 | 亚述文字 | 初始的或引申的意思 |
|---------|---------|----------|------|-----------|
|         |         |          |      | 鸟         |
|         |         |          |      | 鱼         |
|         |         |          |      | 驴         |
|         |         |          |      | 牛         |
|         |         |          |      | 太阳<br>白天  |
|         |         |          |      | 谷物        |
|         |         |          |      | 果园        |
|         |         |          |      | 耕作        |
|         |         |          |      | 回力镖<br>投掷 |
|         |         |          |      | 站立/走      |

图 11 楔形文字

一些楔形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还有其他一些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了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

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其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体的主要手段。

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牲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天体的运动,弄清了天体的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做出相应的行动。因而,在许多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们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的天文学。

苏美尔人及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常引起特大洪水,洪水不是充满灌溉沟渠,而是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常可见到这样的词句:

54

猖獗的洪水啊,没人能和它对抗,  
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  
庄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来将它淹没。

对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之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地感到,仿佛自己正无依无靠地面对着许多无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苏美尔人的诗写道:“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他们以为,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神的意志和行为是无法预言的。因而,他们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另一种方法是剖肝占卜术,就是通过检查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还有一种方法是占星术,如前所述,是以观察星辰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星辰运行对人的命运是有影响的。最后,每个人都尊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把它当做自己的良师。他们以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它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诸位大神。

55

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消除各种潜在的冲突。《汉谟拉比法典》是最杰出的一部;这部法典试图明确地、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而,它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照亮





图 12 苏美尔人所制群像

特尔·阿斯玛(Tell Asmar)出土的苏美尔人制成于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500 年间的雕像。这组群像埋在现代巴格达附近的一个寺庙的圣坛旁边。在这组包含诸神、传教士和信教者的群像中,最高的那座雕像是阿布(Abu)神像,它是“植物之王”。

了当时的社会。以下是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 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 196 条,第 197 条)

2. 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法典第 203 条,第 205 条)

3. 施行严格的、保护商业界财产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应处死刑。”(法典第 6 条)

4. 颁布许多类似“福利国家”政策的规定,包括:确定基本商品每年的价格,限制利息率不超过 20%,周密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城市负责对未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做出赔偿。“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法典第 23 条)

5. 具有现代社会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即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静止不变的。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而颁布的。法典生动而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怨声载道的统治,寿命不会长,将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他的幽魂[在地狱里]喝不到水。”(法典,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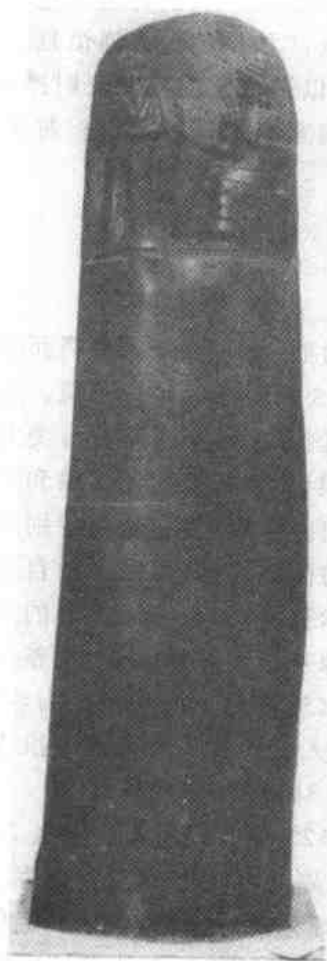


图 13 汉谟拉比法典石柱

该石柱上刻着用以规范社会的《汉谟拉比法典》,共包含约 300 条法规。

最后,《汉谟拉比法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所有法典都以明确的法律术语规定了男人相对于女人的优越地位。婚姻关系首先是个实用的问题——是当时还不存在的医疗保险、残疾保险或养老保险的一种代用品。因此,对婚姻关系做出选择的不是新郎和新娘,因为他(她)们也许会被爱情弄昏了头,而是父亲,或者父亲去世后的母亲或兄长。结婚后,丈夫是法律承认的无可争辩的一家之主,他的

妻子和孩子们必须对他表示充分的尊敬。作为一家之主，丈夫其实就是他妻子和儿女们的所有人。为了还债，他可以典当或出卖他（她）们，仿佛他（她）们仅仅是普通物品一样。

妻子如果通奸将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通常是对她和她的奸夫处以死刑。然而，对丈夫而言，则没有不忠一说，因为依照法律他不但能够拥有一个正妻，还可以纳一个妾和许多女奴，以满足他的“欲望”，同时确保他有后裔。事实上，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有义务给她的丈夫找一个妾，使他有儿女。丈夫想要离婚十分容易，他只需指称妻子不能生育或是个挥金如土的人或宣称她小看他。不过，倘若妻子想要离婚，那就是一场致命的赌博。法典规定，她必须接受调查：“如果她为人谨慎且从无异，而她的丈夫已离家出走，且十分轻视她，那么她可以带着她的那部分财产（嫁妆）回娘家去。……但是，如果她被发现为人不检点、离家出走、毁坏家庭、蔑视丈夫，她将被淹死。”

## 埃 及

埃明文明的类型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形成对照，是一种帝国文明而非城市文明。这一文明之所以颇为稳固且延续很长时间，主要得益于其地理环境。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大河流域国家。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尼罗河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不受外界的干涉。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没有因不时的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换。而且，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水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这样，埃及人就拥有了宝贵的手段进行可靠的交通运输线，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 3100 年时的统一。

57 在埃及从公元前 3100 年得到统一到它于公元前 525 年被波斯人征服这 2500 年间，只有三个帝国统治过埃及，而且这三个帝国相间隔的时间也都相当短暂。因此，埃及文明是稳定而保守的。此外，它还是一个自信而乐观的文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每年会爆发毁灭性的、不可预测的洪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不同，尼罗河是一条温和的、可预测的大河。虽然美索不达米亚人将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为冷酷无情的恶神，但埃及人却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做是“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喜神。

关心死亡，为来世——尤其是国王的来世——作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埃及人并不认为国王的死是最终的结局，所以他们在国王死后用香油等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

陵墓即金字塔内。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为规模最大。塔底占地13 英亩,塔高481 英尺,全塔约用巨石2 300 000 块砌成,平均每块重约2.5 吨。这一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即坡道、滚筒和杠杆建造的;那时甚至连滑轮和铁器都没有!

据说埃及的农民们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位能决定他们共同的幸福的的神建造宅邸。不管这一说法的理由是什么——也许还可以设想,无论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说法的确有力地表明了想象中的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神王,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的法老的区分;这一观念确令人费解。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没有任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相应的法律。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被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通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宰相被称为“全国的管家”和“国王的耳目”,其下设有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负责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分署和仓库,负责征收赋税;可能年景不好时,还要负责分配种子和牲畜)、管辖各州的州长及下属的管理城市和周围村庄的市长。



图14 内菲太尔皇后

在专司生育和繁殖的伊西斯女神引导下的内菲太尔皇后。

58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是埃及文明最后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尽管当时已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都还不像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用来支付国家的开支,也作荒年时用的储备物。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都由国王负责”。除缴纳赋税外,每个村社还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强制性劳役。金字塔就是这些劳工最著名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工还被派去采石、开矿和整修灌溉沟渠。



图 15 斯芬克斯像

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像。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举世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首饰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越。他们的搪瓷制品、象牙和珍珠镶嵌物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玻璃着色技术,而且最早开始鞣制皮革,鞣革的方法至今仍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匀净,不逊于今人所织的。埃及人可能极早就发明了美容品,发展了制造美容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灰白头发的方法。用于化妆的物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的头发,等等。

## 克里特

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类型可以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来总结。克

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它的贸易,其范围包括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国家。陆地环绕的地中海上的风暴不像辽阔的大西洋中的风暴那样凶猛,所以,克里特岛的商人们可以在几乎始终能看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而且,克里特岛上的山区长满了森林,提供了建造单桅商船的木材。米诺斯人驾着这些商船,满载着来自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来自叙利亚的马和木材,来自爱琴群岛的银子、陶器和大理石,来自塞浦路斯的铜,以及自己岛上产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

这种贸易影响了米诺斯文明的各个方面。由于米诺斯的海上力量非常强大,足以保护克里特岛不受侵犯,所以岛上所有的城市都不设防。克里特村社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都比大陆上的村社更奉行平等主义。克里特岛不像大陆那样在几座宏大的神庙和王宫周围是一片贫民区,而是由村庄组成,村庄很大,进行宗教礼拜的地点在室外,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户通常住在用木头和灰泥造的单独的房子。可能已有家庭奴隶,不过数目不会多,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门供奴隶住的房屋。所以,克里特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当划手。

59



图 16 米诺斯王宫

建于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

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学家们并不试图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引人注目，也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周围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有模特儿——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妇女。克里特岛人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个人的舒适。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千门万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座、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建造的复杂的给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

克里特岛远离战争，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和国家机构，所以，原先的新石器时代的血亲体系在这里保存得比在中东大陆要好得多。因此，男人们在克里特岛上不能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取得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垄断。壁画、印章和图章戒指皆显示出，克里特岛的妇女们除了积极地做“家内活”，还不断地做“家外活”。从这些图案中可以看到，妇女们在田间劳动，在园林中跳舞，涌进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斗牛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战争，这明显不同于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妇女。在克里特岛，妇女们可以拥有财产，也可以像男人那样轻而易举地离婚。克里特文明以这种方式成为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中的一个伟大的例外。

## 印度河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是保守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我们可以从此地的城市建设中看出这一特点，这些城市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 6—7 平方英里。城市布局呈格子型，宽阔的主干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各街区约长 400 码、宽 200 码，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制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11×5.5×2.5 英寸和 9.2×4.5×2.2 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这一文明于公元前 2500 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 1000 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而又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



图 17 印度石印

印度的石制印章。上面所绘的是印度常见的隆背牛。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织布的。与外部世界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关系；出口品种包括孔雀、猿猴、珍珠、棉织品、铜、象牙和诸如梳子之类的象牙制品。当时的梳子与今天印度仍在使用的梳子属同一造型，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人们总是要用梳子将虱子从头发中梳出来。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同美索不达米亚进行的，货物由帆船沿着海岸运到波斯湾。如果行驶途中看不到海岸，水手们就放出乌鸦，因为乌鸦总是飞向相距最近的海岸。按照《圣经》，这一方法正是诺亚驾着方舟、希望找到陆地时所使用的。

61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详情尚不清楚。迄今为止，普遍认为主要是由于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由中亚入侵，所以才衰落。不过，最近有人提出，这一文明也许实际上是为泥浆所淹没的。按照这种说法，地下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淤泥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印度河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把首都摩亨约·达罗全给淹了。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毁损，河水流过堤坝，大河又恢复原来的水道，不过，摩亨约·达罗这座城市已遭毁灭。从摩亨约·达罗一层又一层的淤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 5 次以上。最终的结果就是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害，使北部的边沿地区十分衰弱，不能抵挡本土文化的同化。

这一切大多是推测，无法加以证实，因为人们迄今未能释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就像牛犁地一样”。



## 商 朝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是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为与众不同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大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

虽然中国在地理上比较封闭，但也没有完全与外界相隔绝。早期商朝文明之所以会出现在黄河流域北部，就因为那个地区是各种文化的汇集地，同时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来自东边的农耕民族以及来自南方的森林居民的影响。甚至遥远的中东也在中国北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约公元前 1500 年前后建立商朝的入侵者学习和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铸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术。运用这些技术，这些入侵者征服了散布在中国北部的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

发生在以后许多入侵者身上的事，也发生在商朝入侵者身上。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商朝人被同化，所以，普通老百姓依然保持中国特色。尽管来自中东的大麦、小麦、绵羊、牛、马、青铜和轮子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但这些新奇事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虽然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

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中国是第一个养蚕并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丝织品的国家，也是唯一不用动物乳汁和乳制品供人们普遍食用的重要文明。实际上，中国人对饮用动物乳汁的反应和西方人对吃虫子和蚂蚁的反应是一样的。另外，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撑，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已开始的，就像中国人从远古时代起就已使用筷子而不使用刀叉一样。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都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用火烧得通红的小棒子按在这些切口上，使其产生裂缝。卜人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

状、排列和方向来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情况。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许多能幸存下来,不仅揭示了商朝的文字,并使我们能了解到商朝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拿的只是一些轻武器,像两匹马曳引的战车和冲锋陷阵时穿戴的青铜盔甲,只有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其尖锐。只要将结构复杂的宫殿和商王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置放在陵墓里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制的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可用来说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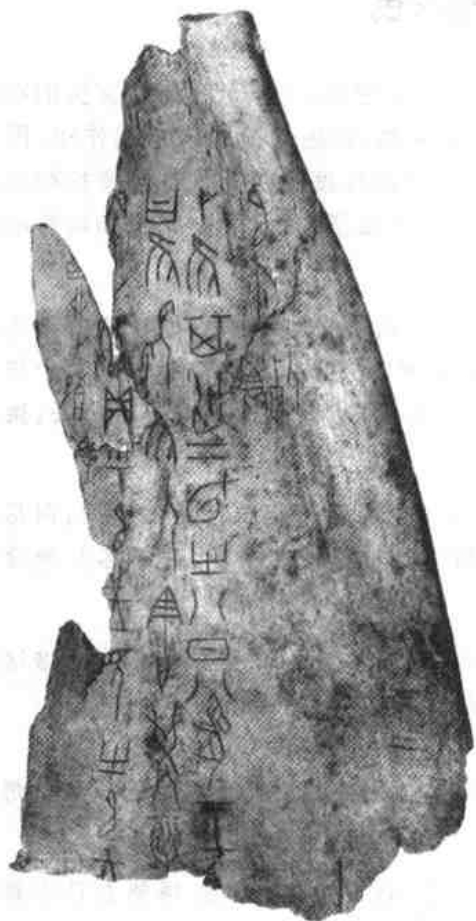


图 18 商朝甲骨文

商朝甲骨,即上面刻有文字、加热后产生裂缝的龟甲兽骨。卜人察看与这些文字有关的裂缝以断吉凶。这一做法是汉语的基础。龟甲兽骨上所刻的是古典汉语的象形文字。

就两性关系而论,中国文明如同其他所有文明,也存在着不平等。性别歧视从婴儿一出生就开始,因为女婴比男婴更有可能遭到杀害。童年时,女孩被迫缠足;缠

足使她们走路蹒跚,无法冒险远离家门。年届婚配时,婚姻由父母一手包办,心惊胆战的新娘由受父亲的管教转为受婆婆的管教。在富裕家庭,她还可能不得不接受丈夫娶第二个妻子或纳妾的现实,尤其是如果她没有生养嗣子的话。

中国的两性不平等也反映在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中;中国人认为,世界是阴和阳这两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元素的产物。阴代表女性、黑暗、弱小、被动;阳代表男性、光明、强大和主动。尽管男性和女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但女性天生就是被动的、顺从的。几千年来,男性道德家们从这一哲学命题出发,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妇女应如何行事才算完全做到顺从和被动。

---

## 部落居民和农民

文明的代价之一就是将人分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点,荷兰官员们在新几内亚发现了。那里的巴布亚人从不知文明为何物,拒绝向荷兰人打躬作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人。但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印度尼西亚人却愿意把荷兰人当做自己的主人来接受。一名美国记者所作的以下报道,揭示了文明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设在霍兰迪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

一天晚上,约九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招待所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寻思,借这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的习俗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错。

丛林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有一人发表意见说:

“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已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做主人看待。

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

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政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揖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

“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 见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1957. © 1957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 四、游牧民族获得权力

64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无论是在中东、印度还是遥远的中国,所有的古代文明纷纷崩溃。那么,整个欧亚大陆政治败坏、社会离析,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的人侵呢?要对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给出肯定而确切的回答,是极为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在决定事态发展的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内部的虚弱。由于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必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铜和青铜的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像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那样经久耐用。

诸古代文明因这种内部的腐朽而虚弱不堪,所以很容易成为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目标(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见第二章第三节)。促使帝国崩溃的游牧集团主要有三个: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较贫穷的东部地区和较富裕的西部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差异，引起了一场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是作为难民，或者是作为征服者，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他们于 13 世纪崛起并侵占欧亚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为止。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

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西部诸民族的种族组成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变为由蒙古种人占优势。这一转变自公元前 1 千纪末叶开始，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操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用西方的技术装备自己，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发展趋势转到相反方向。

最后，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地区。他们最早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接连不断的迁徙浪潮贯穿了他们的整个历史。早先，闪米特人用驴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 1100 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像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的文化一样。随着文明的兴起，<sup>65</sup> 闪米特人的许多部落居住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又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游牧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用说，所有文明的定居民族都将游牧民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一位埃及官员写到闪米特游牧民时说：“他们的名字散发出比鸟粪更难闻的恶臭。”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的一位朝廷大臣同样辱骂蒙古人说：“他们胸藏虎狼之心……自古以来，就没人把他们当人看过。”

直到公元前 2 千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诸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马的驯养和较迟出现的冶铁技术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5000 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有牛和野驴，牛速度太

慢,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俄国南部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合4英寸),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像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2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人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接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2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人可以直接骑驭。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这一技术最终导致成吉思汗在13世纪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对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来说,骆驼的作用不亚于马。骆驼有两种:阿拉伯的单峰骆驼和大夏的双峰骆驼;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这两种骆驼都能在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生活,都能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最早驯养骆驼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1000年时,穿越中亚和中东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就已全靠这种“沙漠之舟”。

66

冶铁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公元前2千纪中叶,这一技术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但是,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冶铁技术之所以出现得晚,主要是由于冶炼铁矿的工艺与冶炼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根本不同。

冶铜时,金属溶液沉于炉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铁时,至少在古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内,铁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种灰色的多孔体,技术上称之为铁块。反复锤打炽热的铁块,能使其成为熟铁,这一发现来得较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金属比起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来,绝不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锋刃较易失去。后来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投入冷水(淬火),并与木炭燃料接触,可以使其坚硬。当时所须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金属,而

且还包括一种崭新的冶金术——对此，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毫无准备。

虽然改进冶铸方法后铁比过去坚硬了，但仍然很易生锈。不过，这一缺陷由于铁矿较之铜和锡分布远为广泛、制铁成本相应低廉，而得到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已超过缺陷本身。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出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 五、游牧民族摧毁古代文明

游牧民凭借马和铁制武器，掀起了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 1700 至公元前 1500 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 1200 至公元前 1100 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做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最终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其他地方的帝国都迅速地、接二连三地崛起和崩溃。虽然中东由于其地理环境使外界易于进入，故遭到入侵的次数也最多，但那里的文明，连同其城市、宫殿、寺庙、书吏、商人和政府官员，还是幸存了下来。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个原因是，到公元前 1700 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 中 东

如果首先考察中东，那么蛮族入侵是始于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即印欧语系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时。他们与当地诸民族联合，建立起一个包括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大部分、但不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随赫梯人之后的是印欧语系的另外两

批入侵者,即喀西特人和胡里安人。在这一时期内,即便是地理环境易守难攻的埃及,也遭到了种族成分复杂、然以闪米特人为主的一批入侵者即喜克索人的蹂躏。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平息下来,中东为三大强国所控制: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由于先前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彼此长年征战不休,结果俱皆衰竭。三个入侵的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占领了地中海沿海一带;阿拉米人占据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希伯来人占有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约公元前1100年前后,强大的第二亚述帝国凭借其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开始进行扩张。到公元前7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由诸敌对者结成的联盟摧毁了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亚述人之后是波斯人,他们建立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公元前529年在位)的率领下,波斯人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征服了从西面的尼罗河到东面的印度河的所有地区。整个中东第一次处于一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而诸蛮族入侵者则被强有力地排斥在国门之外。

## 希 腊

与中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的文明都没能在经历蛮族入侵后幸存下来。这些边缘地区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所以都被消灭。因而,也正是在那些地区,随着新的宗教体系、社会体系和哲学体系的建立,出现了新的古典文明。

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他们是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是,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了大量的传人大陆的米诺斯文化,并在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由于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锡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居留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山顶上,供国王和他的官僚居住;平民们的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险,平民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图 19 迈锡尼的狮子门

建于希腊迈锡尼的狮子门。

68 迈锡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代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们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 15 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 1150 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与此同时,新入侵的多里安人又使迈锡尼人遭到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里安人出现于公元前 1200 年前后,他们用精良的铁制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锡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到以农业和畜牧为基础的经济中。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 800 年诸城邦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锡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波斯岛,再由此航海到小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从未能扩张到内地。虽然这些殖民地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但很繁荣,注定

要在希腊人的历史上起较大的作用。

现在人们对希腊这一黑暗时代的了解,比对印度遭受蛮族入侵后那一时期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希腊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四大史诗,即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希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而赫希奥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些世纪中原始的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用羊毛织成衣料。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更为值钱的货物。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有时也为偶尔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每个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前者在战争中居支配和领导地位;后者包括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是动员人民支持已由国王与贵族们共同做出的决定。这些简单的制度是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印欧语系的部落的特征,表明了希腊城邦的政府机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情景。

## 印 度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部落的蹂躏;这些部落凭借其拥有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这一军事上的优势,轻而易举地打垮了还在使用铜制武器和牛拉大车的当地人。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大家庭。其中位于西方的几个分支先前已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雅利安人通过小群小群的渗透,很轻易地就颠覆了衰败中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到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资料非常缺乏。与留下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留下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的印度河文明不同,雅利安人几乎没留下任何遗物,因为他们的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也没有大城市,不过,他们倒是留下了大量以吠陀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因而,可用来重现描述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用来重现描述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

69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印度教徒来说,正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徒、《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也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别的著作也加到这四部吠陀中,获得与后者相似的神圣地位。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锡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同样,《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它共有

十卷，收集赞歌 1028 首，其篇幅之庞大，大抵与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在一起相当。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身披金色盔甲，快活地冲锋陷阵，一餐能吃 300 头水牛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以牧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在某些部落，还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牛被崇拜但却能吃；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然无种姓；祭司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巅。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的社会极为相似，而与较后数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

## 中 国

约公元前 1500 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商文明这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他们为商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为商文明所同化。在中国，真实的情况始终是，这些入侵并没有引起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彻底决裂，而在希腊和印度，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独特的中国文明不间断地从商代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有时也有所变更，但从未遭毁灭或得到彻底的改造。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 1027 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分享到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当周人侵占中国北部时，入侵者虽然推翻了商朝，但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的发展。文字系统同祖先崇拜、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着；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统治下，变得更为明显。周统治者将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们定期到周朝廷觐见述职，不过，这一制度以后渐被废止。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日渐衰微，居住在围有城墙的城市里的诸侯们，开始统治周围的农村。

公元前 771 年，周朝都城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洛阳继续它的统治。因而，周朝公元前 771 年迁都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人称为“西周”；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东周”。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

统治者。虽然他们仍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的诸侯们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领导。周王朝还起了高级祭司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做民族统一的象征。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在这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约同时发展起来。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质是第二编剩余章节中所要论述的主题。

### 推荐读物

有关诸文明起源的描述,参见 J. Gowlett 所著的 *Ascent to Civilization* (Knopf 出版社,1984 年版)、P. R. S. Moorey 主编的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Clarendon 出版社,1979 年版)、C. B. Heiser, Jr. 所著的 *Seed to Civilization* (W. H. Freeman 出版社,1973 年版)、J. E. Pfeiffer 所著的 *The Emergence of Society* (McGraw-Hill 出版社,1977 年版),以及 A. C. Renfrew 所著的 *Before Civilization* (Cape 出版社,1973 年版),他的著述挑战了文明扩散理论。

对各个文明分别进行考察的著述有:K. C. Chang 所著的 *Shang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0 年版)、O. R. Gurney 所著的 *The Hittites* (Penguin 出版社,1980 年版)、C. Y. Hsu 所著的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8 年版)、T. Jacobson 所著的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Mesopotamian Religion*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76 年版)、N. Postgate 所著的 *The First Empires* (Elsevier 出版社,1977 年版)、J. Hawkes 和 L. Woolley 合著的“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收录于 *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Vol. 1 (Harper & Row 出版社,1963 年版)、M. Hammond 所著的 *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2 年版)、J. G. Macqueen 所著的 *The Hittites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Asia Minor* (Thames & Hudson 出版社,1975 年版)、B. M. Fagan 主编的 *Avenues to Antiquity* (W. H. Freeman 出版社,1976 年版)、R. F. Willetts 所著的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re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77 年版),以及附有精美插图、由 Life 编辑部主编的 *The Epic of Man* 和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McGraw-Hill 出版社,1961 年版)。

关于游牧入侵者的著述有: E. D. Phillips 所著的 *The Royal Hordes: Nomad Peoples of the Steppes* (Thames & Hudson 出版社,1965 年版)、O. Lattimore 所著的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Mouton 出版社,1962 年版)和 *Inner Frontiers of China*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出版社,1940 年版),以及 A. Cuha 主编的 *Central Asia: Movement of Peoples and Ideas from Times Prehistoric to Modern* (Harper & Row 出版社,1972 年

版)。对今天的游牧民族进行考察的著述有附有精美插图的 *Nomads of the World*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出版社, 1971 年版)。

### 注释

1. Cited by N. Bailkey, "Early Mesopotamia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ly 1967), pp. 1225.
2. Adapted from J. Hawkes and L. Woolley, *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Vol. 1, *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Harper & Row, 1963), p. 467; and V. Gordon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Mentor Books, 1951), p. 149.
3. Cited by A. J. Wright,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anford University, 1959), pp. 19—20.
4. Cited by G. Soloveytchik, *Potemkin* (Butterworth, 1938), p. 25.
5. W. A. Haviland, "Stature of Tikal," *American Antiquity* (July 1967), pp. 316—325.
6.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84.
7. E. A. Speiser,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Mesopotamia,"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December 1939), p. 27.

从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自那以后,一切重大事件都开始连缀成为一个整体。

——波里比阿

---

## 第4章 古典文明使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 (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拿欧亚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整体化的程度(见地图6和地图7)。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看起来就像尚处于汪洋大海般未开化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人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不过,即便到古典时代末期,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的、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大陆的整体化仍处于初始阶段。整体化过程中这一初始阶段的由来、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 一、整体化的根源

74

技术进步是新的欧亚大陆整体化的基础。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从人类历史真正开始之日起,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它的技术水平。在人类处于

食物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它的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举例说吧，扩大到可包括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邻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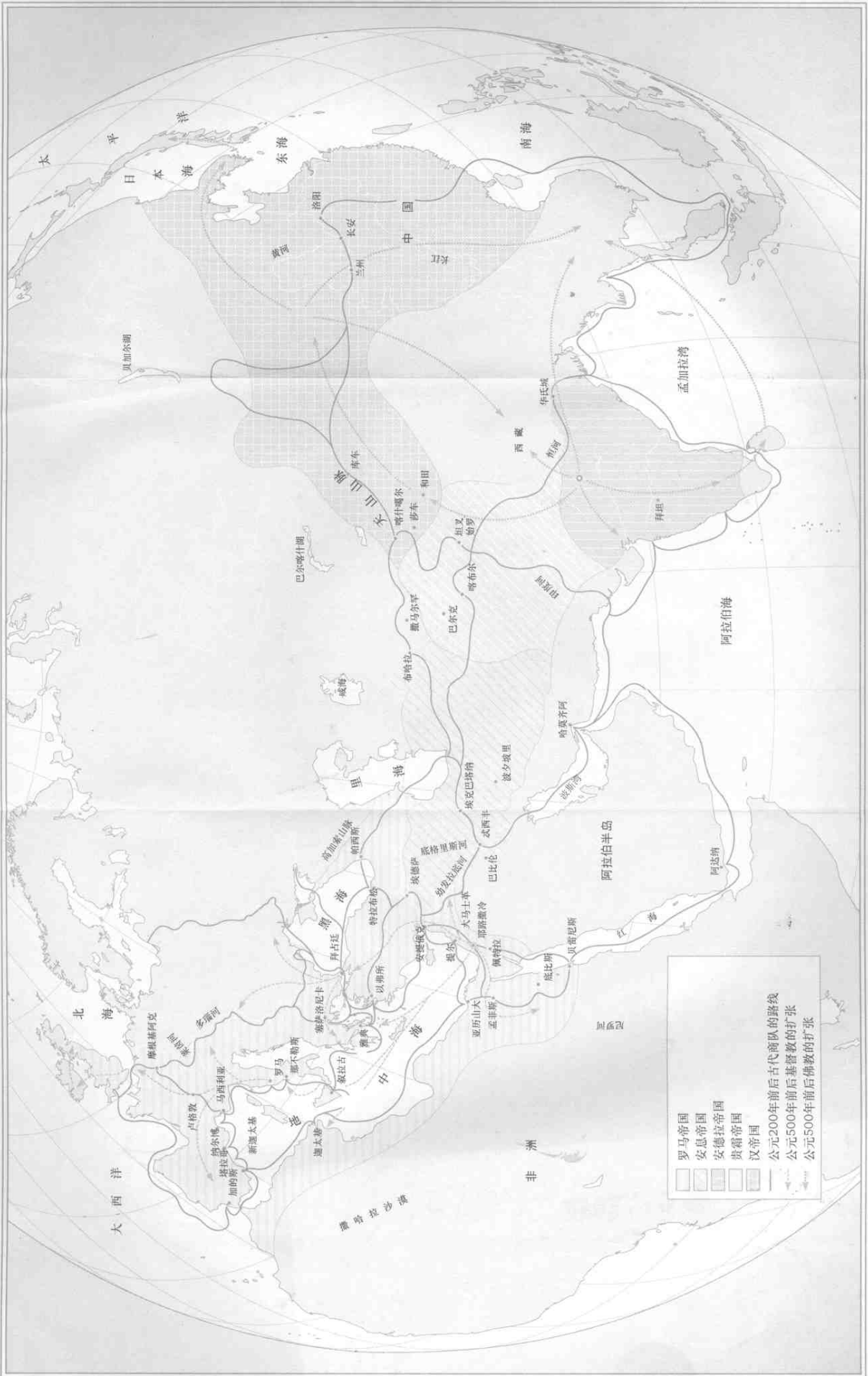
冶铁技术是公元前 2 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 1200 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我们已经明白，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 2 千纪末的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不过，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其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不过，这一阶段来得较迟——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 800 年；在中欧，是公元前 750 年；在中国，是公元前 600 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拓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前 500 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不仅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新开发地区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以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在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愈来愈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业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重金属条块，为支付手段。不过，每成交一笔买卖，都须检查贵重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贬值。

约公元前 700 年，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在贵重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其最后结果，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



地图7 早期欧亚大陆整体化(约公元200年)



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如在中国是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

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扩张受到海盗行为的阻碍;那时的海盗行为同陆上的土匪行为一样,被看做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半海盗、半经商的探险活动,说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它渐渐地在经常的大规模航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海路运输比起陆路运输,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在18世纪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以海路运输为主。

在公元前2千纪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盛行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到了古典时代末期,情况大为不同,商队的路线已遍绕整个欧亚大陆。除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独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东南亚。



图20 阿庇乌大道

有“驿道中的皇后”之称的阿庇乌大道,连接着罗马和意大利南部,至今仍在使用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层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

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了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例如,波斯帝国修筑的所谓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 1677 英里。沿途设有 111 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掉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花 90 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从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后,罗马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这张驿道网设计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使用中。

76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朝西北方向修筑的驿道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长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提到。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修筑并养护驿道,属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是他们玩忽职守,将会受到弹劾。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约公元前 6 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巧合。因为上述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各自做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各自的发展方向也明显不同。实际上,这些文明的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并在以后数世纪中成为它们各自的特征而一直持续到现代。

这些观念和制度将在后面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予以分析。本章余下部分将考察这些文明的相互关系。当时的欧亚人非常清楚这些相互关系。他们肯定意识到,历史的舞台正在扩大——生活愈来愈复杂,他们正受到内外多种新力量的冲击。因而,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论述从公元前 220 年至公元前 145 年诸重大事件的历史时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以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

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地区间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即以下两节的论题。

## 二、商业联结

地区间主要的物质性联结是商业联络,虽然商业联结不是唯一的联结。这是一个不仅货物流通各地,而且也是身怀技艺、携带植物的人们四处漂移的时期。当时,交换的范围有多广阔,可由以下事实来表明。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技术方面也发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车这一重大发明的传播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本都国王米思里代蒂统治期内诞生的,约于公元前65年前后安装在黑海南岸;中国的第一部水车是其后不久、约公元前30年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车无论是从西亚直接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西亚,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们之间某一未为人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欧亚各地区的这种相互影响,是古典时代这些世纪里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全面繁盛的结果。

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两条总的路线决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此外,各条陆路和海路均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就会使贸易转向其他路线。

77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米诺斯人相比,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米诺斯人是古代伟大的海上贸易者,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这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的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这个操闪语、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来的民族,很快发展起繁盛的中介贸易。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宗买进没药、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

种工艺品,从海外国家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运销外地。其中纺织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们自己畜养的羊身上的羊毛织成的,并用从沿岸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的负有盛名的紫红染料加以染色。



图 21 古希腊银币

这是一枚雅典人用的面值 4 个德拉克马 (drachm, 古希腊货币单位) 的银币,铸于公元前 5 世纪(约公元前 440 年—公元前 430 年)。正面(左边图像)是雅典娜女神的头像,背面(右边图像)是女神的智慧的象征——猫头鹰。铸造这些货币所用的银子主要产自阿提卡南部苏流恩(Sunium)的国有银矿。

78 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腓尼基人逐渐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越来越向西推进的远航。公元前 11 世纪,他们开始向爱琴海外扩展,到公元前 9 世纪末,他们已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他们甚至还大胆地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一心追求的锡。

从约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8 世纪后期,腓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大部分。从那以后,希腊人在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首先设立商业据点;这些商业据点后来在土地资源许可的地方,都发展成为农业殖民地。尽管殖民地居民们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这些殖民地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因而,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希腊的一个主要殖民区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许多殖民地,以致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在大陆上,希腊人向北推进,远到那不勒斯;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伊特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马赛是他们在当地的主要殖民

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自由地;刚进入黑海地区时,他们曾为寒冷、多雾的气候所阻挡,但最终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经济上可获得很好的机会: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可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为繁荣的希腊商业据点和殖民地所环绕。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曾派一个叫做斯西拉克思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510年从印度河起航,驶往位于红海入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一条运河,似乎还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大大地繁荣起来,无论就贸易额还是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过了已知的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们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承者将波斯人的贸易拓展活动又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派出了更多的、地理知识更为丰富的探险队,并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装上船,再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诸港口起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西绕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后者用自己的货物交换前者的东方货物,再将东方货物经由红海沿岸诸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序幕。这一大发展于公元前不久开始,约持续了两个世纪。贸易大发展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中亚的影响不断增长。中国人不仅打通了好几条陆上商路,而且还使获取地区间贸易最重要的商品即丝织品变得更为容易。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后面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地括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治下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绝迹,关税壁垒也几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

因此,罗马人与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都很兴旺。这对欧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1世纪某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他发现,季风可用来加快轮船来回横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重新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知道这一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人的季节一词派生来

的。)每年 10 月至来年 4 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6 月至 9 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现在,水手们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了,再也无须花费很多时间紧靠宽阔、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 16 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定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 2 世纪和 3 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某种权力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衰萎。这一模式,只要观察一下这些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以及文明和帝国扩大的缘故,显然,总的趋势是贸易量上升。不过,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例如,在欧亚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东部的中国诸朝代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贸易获得迅速发展。

比如说,西徐亚人就与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一些城邦有着充满活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蜡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同样,中国人沿着从中国西北部经中亚直达黑海和黎凡特诸港口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贩运各种商品。中国主要出口丝织品,也出口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石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以及来自罗马诸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公元 2 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陆上贸易渐渐衰弱。7 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给了陆上贸易以巨大打击。在阿拉伯人于 751 年的怛逻斯战役击败了唐朝军队之后,整个中亚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巨大的穆斯林帝国此时成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最后,随着陆上道路的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 13 世纪蒙古人征服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有了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综上所述,尽管贸易方向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基本事实始终未变;这就是古典时代与早先的古代时期大为不同,其贸易范围大为扩大,贸易额巨幅增长。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限于单个

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

### 三、文化联结

80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既不是互不关联的,也不是彼此独立的。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同样,印度佛教传布到中国的过程也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不过,各种文化运动也都有它们自己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2千纪末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以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美索不达米亚的结构复杂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文字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米特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但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希腊字母又经过一些改进后,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廷人向东传播。



图 22 阿特米修神像

在阿特米修出土的走姿神像是一尊青铜塑像,约公元前460年制成。阿特米修位于希腊巨大的优布依岛(Euboea)北端的海滨。此雕像现存于雅典考古博物馆。此像到底代表哪位神还有待考证。有人认为他是手持三叉戟的波司登,也有人认为他是正在释放雷电的宙斯。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它都是古典时代初期希腊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字母文字的出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

自然是取回避的态度，几乎直到公元以前，他们一直使用自己传统的文字。中国因与世隔绝，也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的，经过几次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欧亚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哪里，在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的到来而不断扩大的裂缝虽然没有被完全弥合，但多少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是支持的，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煽起了某种骚动。这种骚动不仅使政治受到影响，也使文化受到了影响。印度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尼赫鲁在其著作《世界史概览》中给他十多岁的女儿英吉拉·甘地写一系列的信时，承认了这种骚动的重大意义：

肯定存在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思潮，一股对现状不满且憧憬更好的生活的思潮。不要忘了，伟大的宗教创立者总是追求更好的东西，总是试图改变他们的人民，完善他们，并减轻他们的痛苦。……<sup>1</sup>

81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带有全盘性的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分解，融入拥有各自独特的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的地区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姓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就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的这一改组时期，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不过，文化联结也的确在发展，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将近古典时代末期，还兴起了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佛教；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团体，而是要求全人类皈依它们。

先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人的“Hellas”意即“希腊”一词派生的。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以后，又为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 4 世纪和公元前 3 世纪，希腊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成群地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这些城市往往是以这位伟大的将军的名字命名的）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虽然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



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古希腊共同语成为整个中东的共同语。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并于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还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其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未能在它的一些移植地永久地幸存下来。当中世纪穆斯林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希腊文化的这些小岛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若不是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长远影响,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人就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直到3世纪起,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主厨。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听到成熟老练的希腊臣民们的非凡的雄辩和高水平的演说时,眼界

82

大开,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在他们面前展现。希腊人给罗马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1世纪,送年青的罗马人到雅典或罗德岛的哲学学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在文学领域,罗马人最初只是翻译或模仿希腊原作,不过渐渐地,他们开始改以自己的生活为主题。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外观也有很明显的影响。希腊的陶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这三种建筑形式都被采用了,不过罗马人的建筑物往往规模更大、装饰更华丽。因而,意大利的城镇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影响之下的相同外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基督教争取到了整个欧洲,佛教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

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虔诚徒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里,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的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教和大乘佛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宗教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贱、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则均没有这些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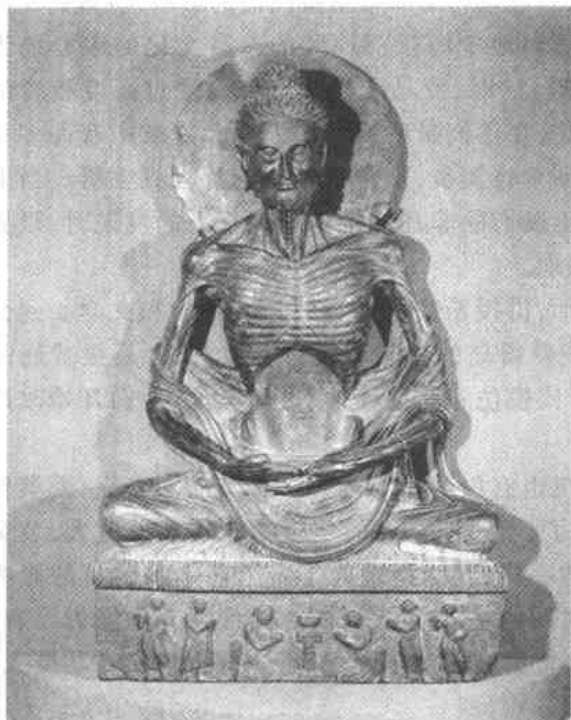


图 23 斋戒的佛陀像

此为斋戒的佛陀像。在释迦牟尼修炼到“中途”之前,他已进行了为期六年之苦修。根据一个古典文献的记载,佛陀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外貌和体态:“我的四肢像枯萎的藤蔓,关节外突;我的臀部就像水牛的硬蹄……我的肋骨就如破败的房屋屋椽;我的眼珠深深地陷入眼窝深处,就像深井底部泛出的水光……”这尊甘达拉(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的佛陀雕像成于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它反映出了希腊文化对于早期佛教雕塑的影响。

89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 12 世纪崇奉耶和華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十诫》中的第一条。这一条的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说,他是雅

各的后代的唯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的、超俗的,不如说是社会的、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追求正义、援救被压迫者、识别生父不明的人、为寡妇辩护”。

但是,从公元前6世纪起,犹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统治者的宗教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这些犹太人长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解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徒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观念——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将堕入地狱,遭到永久的惩罚。



图 24 耶稣受难图

此为罗马帝国后期所制的描绘耶稣受难场景的象牙雕版,图中耶稣正扛着十字架走向刑场。

一开始,基督教对世界各地持不同信仰的人群并没有直接的吸引力;在耶稣生前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不久这段时间里,基督教仍只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教徒。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信奉的宗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能吸引少数犹太人,而且能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因此,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迫害,仍稳步发展起来。公元313年,基督教

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得到宽恕,399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由传教士在600至800年间,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中;在800至1100年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中。以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

84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6章中将要提到的,它是在印度人明显地反对不公平的种姓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过程中产生的。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原属释迦族,贵族出身,因对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深感苦恼而舍弃优裕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漂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彻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核心是四大真理:(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意为“无为”、“寂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佛陀死后,他的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对佛教起决定性影响的寺院团体。这些团体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很满意,但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做到。因而,与“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即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除了吸纳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外,还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它稍微改变了原先偏好默祷的做法,开始采用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戒条。于是,只要有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由于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救赎,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其传入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中国皈依者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国内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末叶,中国西北部90%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像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700年时,佛教臻于

极盛,但此后,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敌视,它很快衰歇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国民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从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至855年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庙40000余个给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它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个宗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不过在锡兰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佛教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大陆,从而,使欧亚大陆的文化整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融合的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而且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东西也是由传教士在传布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外,还有罗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欧亚诸民族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首创精神的中心。正是中东,在那一段时期里对人类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冶金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而且还有琐罗亚斯德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过去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有过很大影响。

---

## 佛教在印度和中国

欧亚大陆的整体化始于古典时代,而起联结作用的,部分是商业,部分是文化。佛教是一个在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这一点,从一个名叫玄奘的中国僧人的以下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于公元629年至645年间访问了印度的许多寺庙。当他在纳兰达寺(Nalanda Monastery)宣布自己决定返回中国时,僧人们的反应是发人深省的。

纳兰达寺的僧人听到玄奘的决定后,纷纷请求他留下来。他们说:“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地,虽然他已离开尘世,但他的许多遗迹依然存在。世间还有什么比依次寻

访佛陀遗迹，崇拜佛陀、歌颂佛陀更令人愉快的呢？况且，中国是微不足道的野蛮人呆的地方，这些野蛮人都鄙视宗教，鄙视[佛教]信仰。这就是佛陀不诞生在那里的缘故。中国人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圣人和贤人都不去那里。那里气候寒冷、国家破败，你必须三思而后行啊。”

法师(玄奘)回答说：“佛陀创立教义，是为了将教义传布到所有地方。谁愿意独享佛法？谁愿意忘记那些不曾受到教育的人？再说，在我的祖国，官员穿戴威严，法律人人遵守。皇上公正，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伦正义深受尊崇，老人贤人备受爱戴。还有，中国人的知识深不可测，他们的智慧不逊鬼神。他们效法上天，知道如何计算七个天体的运行；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确定了一年的四季。……如此这般，你们怎能说佛陀没去我国是因为我国无足轻重？”

\* 见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Volume I, pp. 209—210.

86 不过，事实依然是，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已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时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留到现在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各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论述这些地区的文明——希腊和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考察这些文明之前，我们应注意到，欧亚大陆诸伟大宗教的影响，至今依然可感受到。比如说，它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教导，对处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各民族来说，依然很有意义。孔子曾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圣经·旧约》中，先知弥迦也发表了同样的伟大见解，这一见解如今已成为联合国的座右铭：“他们应当铸剑为犁，熔矛为镰；国与国之间不应挥剑相向，他们也不应当再学习有关战争的知识。”诸伟大宗教所具有的这一共同意义，在 1986 年 10 月 27 日给明显地显示出来，因为这一天，它们的代表一齐参加了教皇保罗二世主持的“世界和平祈祷日”。以下不但是其他信条中的一些选段，而且也是他们祷辞中的一些选段：<sup>2</sup>

### 佛 教

唯愿世间万物，凡受身心之折磨者，皆可获无尽之幸福与欢乐。

### 基督教

我对你们说，听着，要爱你们的敌人，要善待那些怨恨你的人，要赞美那些诅咒你的人，要祝福那些痛骂你的人。如果有人打了你的一边脸颊，就给另一边让他打；如果有人取走了你的斗篷，就不必再留住你的上衣。对每个乞求你的人，给他们所要的东西；对拿走了你的东西的人，不要再找他们归还。如果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他。

### 犹太教

我们的上帝在天堂。和平之主将会同情和怜悯我们,将会同情和怜悯地球上所有祈求他的同情和怜悯的民族。让我们祈求和平,追求和平。

### 非洲万物有灵教

万能的上帝啊,您是我们打结时不可或缺的伟大的拇指,您是能劈开大树的咆哮的雷电,您是站在高处能看清地面石块上留下的羚羊脚印的洞察一切的主。您毫不犹豫地对我们的要求作为反应。您是和平的基石。

### 美洲印第安人

在抽烟的时候,我会邀请我的家人和你我一起分享;现在,我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情来为今天、为世界和平祈祷。我祈祷,不管是在家庭内、在部落里还是在自己的国家中,我们都能为和平祈祷、为和平努力。我为在孕育万物的大地上行走的所有兄弟姐妹祈祷。

## 推荐读物

欧亚大陆诸地区间的联系在 G. F. Hudson 所著 *Europe &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Edward Arnold 出版社,1931 年版) 这部写得很好的论著中得到了清晰的分析。另外,还可参阅 J. Needham 所著的多卷本著述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54 年版),该书的第一卷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交流,包括关于文化传播的理论分析。有关欧亚大陆商业联结的各个方面在下列著述中得到了较好的阐述:A. Tousseint 所著的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66 年版)、S. Chandra 主编的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 (Sage 出版社,1987 年版)、D. Harden 所著的 *The Phoenicians* (Praeger 出版社,1962 年版)、E. H. Warmington 所著的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28 年版)、Ying-shih Yu 所著的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67 年版)、J. I. Miller 所著的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B. C. — A. D. 641*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9 年版)、C. G. F. Simkin 所著的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9 年版) 以及 P. D. Curtin 所著的 *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4 年版)。

关于欧亚大陆的文化联结,可以参阅 H. G. Rawlinson 所著的 *Intercourse Between India and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16 年版)、E. Zürcher 所著的 *Buddhism: Its Origin and Spread* (St. Martin's 出版社,1962 年版)、R. MacMullen 所著的 *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A. D. 100—400*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4

年版)、以及 J. Pelikan 所著的 *Jesus through the Centuries*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5 年版)。

### 注释

1. Jawaharlal Nehru,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1982), p. 35.
2.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986.



雅典的学生已成为其他人的老师;雅典 87  
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  
表示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

## 第5章 希腊—罗马文明

在论述三大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篇幅最长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截然不同但互有联系的文明合在一起叙述。古典时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的单一文明的历史发展根本不同。所有这三大文明都是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展到囊括整块整块的周边地区——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三章中所提到的,铁制工具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扩大到新的沿海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文明的扩展成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从属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区,而西方则不同,罗马由于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因而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土,而且还征服了古代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征服过程中,罗马使西方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腊和罗马这对姊妹文明的历史和性质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500 年

随着公元前 12 世纪多里安人的频频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见第 3 章第 5 节)。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仅限于爱琴海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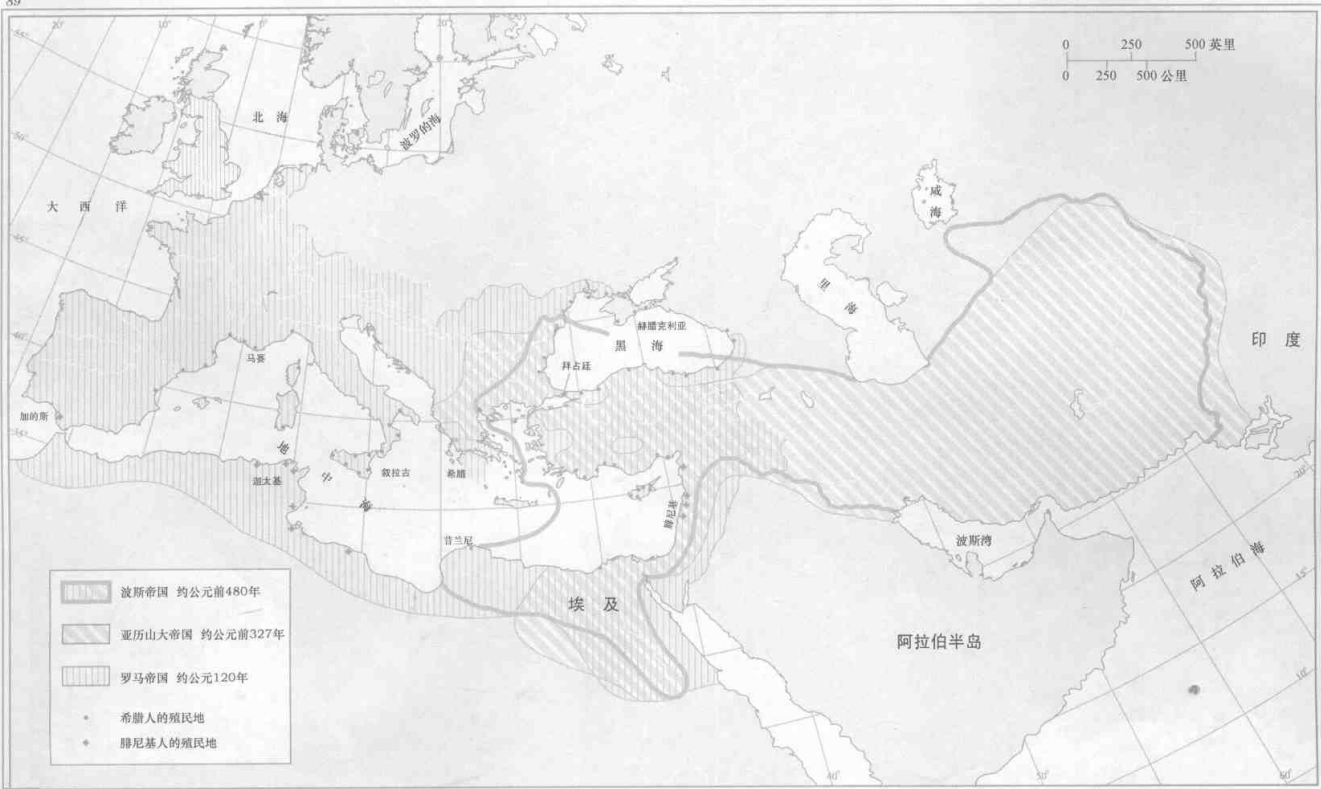
区域。到公元前 6 世纪末，这一切都起了变化。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层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使希腊世界在其形成时期内大为变样，并为古典时代扫清了道路（参见地图 8）。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把农村地区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相反，在入侵者入侵之后，他们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则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从而吸引来更多的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气勃勃地独立不移。

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靠自给型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到公元前 8 世纪初，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人口压力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事之。到公元前 5 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见第 4 章第 2 节）。

殖民地的建立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船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和陶器之类的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希腊的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所以，既然小麦可以进口，多岩石的山坡也就可以用来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故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了。因此，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以前经营自给型农业时增长 2—3 倍，同样，制成品也增加了，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起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

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回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



地图 8 古典时代中东和欧洲地区的诸帝国

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民众吵着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让拥有土地的贵族独掌政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公元前7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步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形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90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公元前7世纪时,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力而进行统治的人,但是,这一名称不带有道德谴责的含义。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尽管并非总是如此。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不过,他们为自身安全而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避免的。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组织得像一个军营。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接受训练。所有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受军纪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消。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切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它也使得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地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住宿在怀有敌意的居民中的一伙入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愈益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别

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是简单而又严厉的。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很有限。另外，还规定富裕商人可以担任执政官；还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削弱贵族最高法院的权力。总之，梭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梭伦改革之后的 30 年里，由于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时已是非法的，但贫民们发现谋生仍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到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在这种情况下，约公元前 560 年，庇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 30 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sup>91</sup> 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帮助。庇西特拉图死后，他的儿子们继位为僭主，但是，由于他们个个昏庸无能，所以斗争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 506 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所有年满 30 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 500 年时，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而斯巴达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化社会。

## 二、古典时代，公元前 500 年—公元前 336 年

伯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为悼念公元前 431 年在与斯巴达人的战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辞中宣称：“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这番自我夸耀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公元前 5 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居于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了劳里昂银矿。他们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并建造了 200 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战争的根源在于，公元前 6 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 499 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它们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时波斯帝国正扩展到欧洲东南部，从北面威胁希腊。小亚细亚诸城邦尽管得到来自爱琴海对岸的海军的援助，但到公元前 494 年，还是给波斯帝国制服了。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

对希腊本土顽固抵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波斯服装、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勇敢地面对,这些人当属最早;在那时以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图25 纪念希波战争胜利的青铜头盔

米尔梯尔兹(Miltiades)献给宙斯的青铜头盔,用来纪念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对波斯人的胜利。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集结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强大得多,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陆路。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混合部队为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至最后一人。虽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人;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赢得又一次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陆续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成为统治中东的庞大帝国的战胜者。

92

希腊人的胜利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使希腊人免遭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点,为人类文明做出其独特的贡献。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时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

甲步兵还要重大。这自然加强了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 461—公元前 429 年）达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虽然出身贵族，但却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 40 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做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完全有理由在他的演说中自豪地宣称：“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雅典霸权，而斯巴达由于其固定不变的经济和经常受到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原先设在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动的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 450 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斯的话来说，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这一海上强国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斯巴达这一陆上强国发生冲突。战争绵延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一直未能突破用来连接雅典和大海、保护雅典物资供给的长城。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 429 年遭受到祸害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他们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公元前 415 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以惨败告终。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灭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来。”于是，雅典盟邦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而雅典于公元前 404 年因受到围困、饥饿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的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达强加其上的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失去。

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结果，使整个希腊世界陷人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一个也没得到解决。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公元前 371 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遭受 200 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但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没在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这一混乱阶段的存在使外来强国得以征服希腊和用暴力统一希腊。公元前 338 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实行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 336 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他

那举世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古典时代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在论述希腊化时代之前,我们先停下来考察一下古典时代的文明;一般认为,古典时代的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伟大胜利。

## 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

雅典领导者伯里克利留下了对伟大的黄金时代中的雅典城邦文化的经典描述。他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将士的葬礼演说中,作了如下著名的叙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做排斥他人的事,所以在私人交往中,我们不会互相猜疑,也不会因邻人做了他喜欢做的事而生气。……我们喜爱美丽的事物,但我们的趣味很单纯,所以我们修养心性而不丧失男子气概。我们不用财富相互吹嘘、炫耀,而是用财富来做真正有用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公开承认自己贫穷并不丢脸,丢脸的是不去设法摆脱贫穷。雅典公民不会因为要照顾小家而忽视国家,甚至连我们当中从事商业的人也有很好的政治观点。如果一个人对公众的事不感兴趣,那么我们不会将其视为无恶意的人,而会将其视为无用的人;所以,如果说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是政策制定者,那么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明智的政策判断者。照我们的看法,行动的巨大障碍不是讨论,而是在先于行动的讨论中获得的知识还不够。因为我们有一种先于行动的独特思考能力,而且,还有一种独特的行动能力。……

总之,我要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我已遵照法律,用我认为合适的词语,致了规定的悼词。对烈士们的英勇事迹,也在某种程度上作了称赞。烈士们已被隆重地埋葬,现在唯一要做的是,让烈士的遗孤们在长大成人以前一直受到公家的救济;这是真正的奖品;在经历这样的斗争之后,希腊像授花环一样,将这一奖品授予她活着或死去的儿子们。

\* 见 B. Jowett, trans.,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Tandy-Thomas, 1909), book 2, pp. 35—46.



### 三、古典时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在提到公元前 5 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表示称赞的说法。

94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文明也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过分的赞扬大半也都是应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希腊“天才”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比较的结果，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战争的结果使希腊人能同时做上述这两件不相容的事并双收其利。

城邦的出现和持久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当然，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区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给并入开始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君主国，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们的城邦达数世纪之久。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缘政治基础（见本章第 1 节）。另一个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来促进，而且能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确实，希腊人为各自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也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希腊在公元前 5 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希腊古典文明并非纯粹的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时常以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的身份到国外去旅行；在旅行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图在《申辩》一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

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辩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雅典人啊,不要以为我现在是在为我自己而申辩,我是在为你们而辩……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打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像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害将会超过对我的残害。<sup>1</sup>

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强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义。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习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希腊人把神看做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无忧无虑、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它们表示好意。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的《神谱》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出一部宗教经典。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非常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的,因而,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构成人类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是多么的不同。他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马,牛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sup>2</sup>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邦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

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许多庙宇专门从事于发展某种特殊的技艺，多少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最先成为有技术的医生的那些奇迹创造者，就是在科斯岛上，在崇拜传说中的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在论及“圣”病羊痫风时，他写道：

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sup>3</sup>

同样，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的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做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资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勇敢地面对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画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比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sup>4</sup>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像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

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理。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太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图 26 雅典卫城

雅典卫城既是雅典的宗教中心,又是雅典的城市中心。它由伯里克利及其后继者于公元前5世纪末叶最终建成。位于这幅图片中心位置的就是帕台农神庙,它的左边是厄瑞克修姆神庙。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的独特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的城市与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所,如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墙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农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作一比较,或者将希腊雕像与那时以前中东各族较为粗糙的、不自然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97 当我们将希腊人的哲学思辨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思辨作一比较时,也会发现类似的差别。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 6 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次第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幼稚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助于以诸神的干预为基础的解释,而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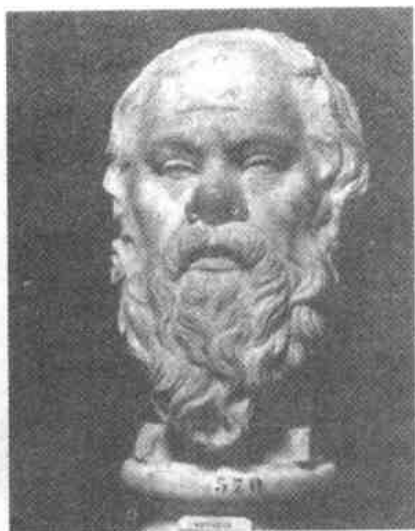


图 27 苏格拉底像

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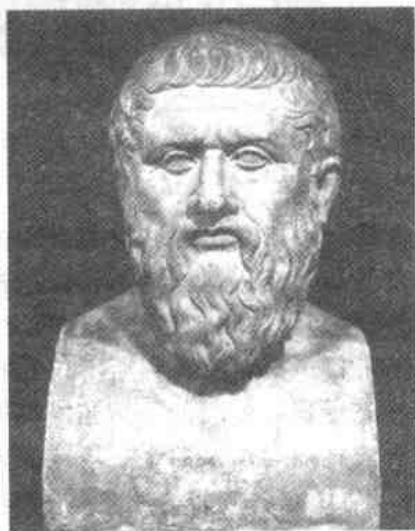


图 28 柏拉图像

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头像。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智者派的杰出代言人普罗塔哥拉便表现出了这种新的兴趣。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上绝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谴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腐败的政治和不存在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大不相同,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引雅典为自豪,可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给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

98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他开始时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识分类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这一分级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别人,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

战争当然是正义的。<sup>5</sup>

论述古典希腊就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受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颂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个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

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畏惧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sup>6</sup>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可是，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归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sup>7</sup>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也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

点。一个缺点是存在奴隶；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住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是，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另外，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很低，就像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其他国家中那样。在雅典，妇女的境况比其他城邦的妇女更糟：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包括投票权或担任陪审员的权利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利。丈夫们掌控着子女们的一切，甚至连杀害哪个婴儿，也全由男方决定。诸如律师、医生和戏剧演员之类的职业，不准妇女们从事，奥林匹克竞赛会也不准妇女们参加。一些最杰出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写到女性时都说她们天生低贱，并警告说，如果女人获得太多的权力，便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女性要保住面子，就必须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伯里克利劝告寡妇们说：“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做到让男人们极少议论自己。”狄摩西尼在提到雅典有三种女人时绝妙地总结了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他说：“我们有情妇让我们取乐；有小妾和妓女供我们满足情欲；还有妻子替我们生育后代。”<sup>8</sup>

99

在希腊文明中，就像在古代的其他所有文明中一样，隔离女子的严格规定仅适用于上层社会的女子。家境不富裕的女子无法做到终日闲坐在家、躲避世人。她们不得不出去干活，帮着养家糊口。在街上和市场里很少能见到有钱人家的女子，但是，劳动妇女却随处可见。她们或在作坊做工，或在市场售货，或在富人家中做佣人、保姆或丫环，以挣钱补贴家用。亚里士多德曾在书中写道，由于穷人家没有奴隶，所以他们不得不允许自家的女人走出家门，抛头露面；这样写时，他指出了是阶级决定妇女生活的性质。

虽然这些缺点是基本的，但是，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336 年—公元前 31 年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 4 章第 3 节）。公元前 336 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 334 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 330 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



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 323 年他在那里患恶性疟疾病逝，终年 33 岁。



图 29 亚历山大像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

100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庞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 3 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给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

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图 30 大流士接受贡品的浮雕

这是波斯波利斯的国库中的一幅浮雕,描绘的是正在接受贡品的大流士一世。注意国王前面的香炉和进贡者表示敬意的姿势。大流士手持的权杖和荷花是他王权的象征。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91年—公元前486年在位)站在他的身后。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与土著民族间的差别而分裂。而且,它们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做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做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于是,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为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4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

101

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但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此时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做出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结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获得相应增长。不过,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当。虽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但奴隶数目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也日渐加剧的时期。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也受到了冲击。随着许许多

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而且希腊化城市也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统治者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之类的称号，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的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转向神秘主义。这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描述理想社会时，描绘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没有妒忌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之类的哲学中。这些哲学虽然有许多方面殊为不同，但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则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迦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的灵魂得救；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遭蹂躏的群众的感情上的需要。因而，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此时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102 考虑到哲学和宗教的这些反理性主义的趋向，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 17 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地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提供了经济良机。大大扩展的市场激发人们改进技术，从而提高产量，增加收益。后起诸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续不断的战争产生了对较复杂的武器的需要。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的作用。最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实际上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 50 万至 70 万册的图书馆。当时，还曾发生过早期“人才流失”的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惬意且激励人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酬的吸引，纷纷来到埃及。

在数学方面，欧几里得是以《几何原本》而闻名的最杰出的人物。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一直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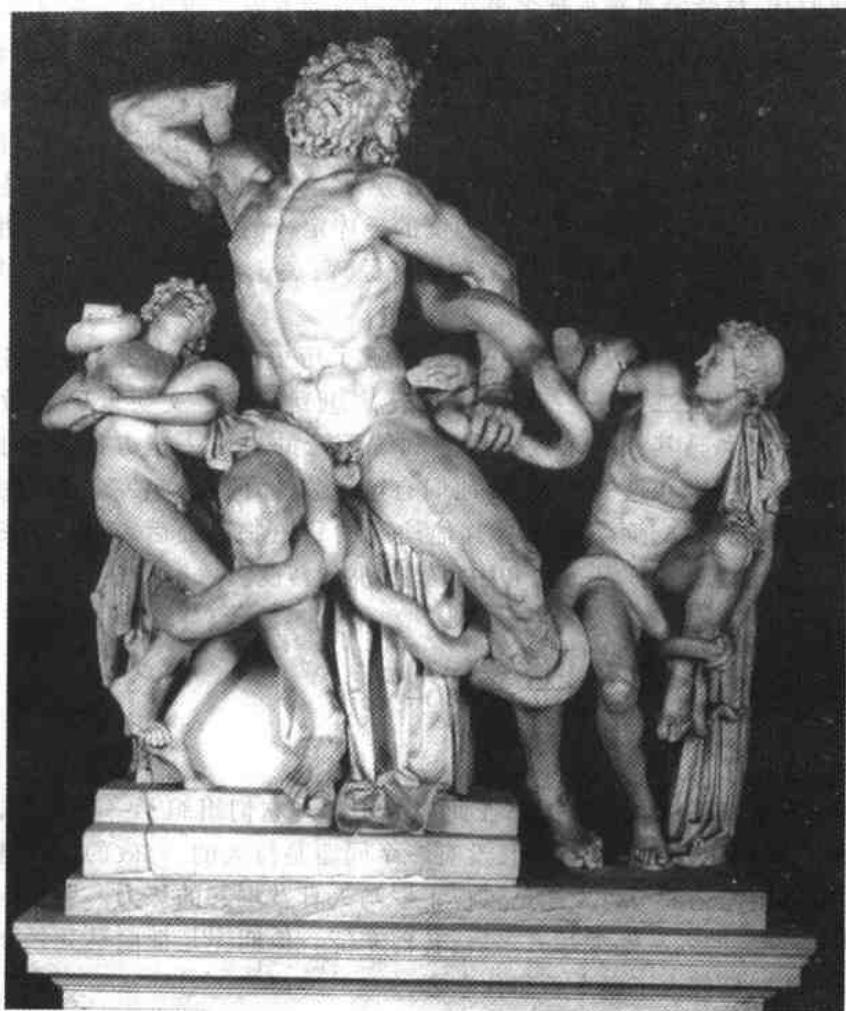


图 31 拉奥孔雕塑

这是一尊罗马人复制的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杰作——拉奥孔雕像。据传说，拉奥孔是一名祭师，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将希腊人的木马运进城。这尊雕像描绘了他所受到的惩罚：护佑雅典人的女神雅典娜派来几条巨蟒，它们当着吓呆了的特洛伊人的面，吞食了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

有名的著作和权威的教科书。最有独到见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规模，认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他的观点，支持的人寥寥无几，被看做与日常经验相违，是邪恶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促进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出地球圆周长为 24 700 英里；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 250 英里，直到 18 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诸海相连，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一个巨大的岛屿。

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此时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大脑的脑回。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通过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医学家盖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至于直到近代以前,医生们都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精巧的战争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有一句豪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型,将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做一个单位。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

## 五、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 264 年

其时,希腊诸城邦仍像过去那样彼此征战不休。它们组织了一些同盟,如亚该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但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同盟是持久的、有效的。尽管得到过许多警告,但互不团结的希腊人还是忽视了罗马人日益崛起的势力。罗马人在击败他们在地中海西部的劲敌迦太基人之后,转而东征。他们先是征服马其顿和业已分裂的希腊城邦,然后侵占了整个希腊化东方。

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成为整个地中海乃至整个欧洲的主人?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早期历史有许多相似处。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南岸。罗马是那时形成的拉丁社团中的一个,位于台伯河旁可以方便地涉水过河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处。其战略位置颇同泰晤士河旁的伦敦,使罗马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宜于经营商业和接受外来影响。

主要的外来影响来自先前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伊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伊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于公元前 800 年前后移居台伯河北面,然后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之前,他们将自己所信奉的男、女诸神,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以及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的典型的东方习俗传给了罗马人。希腊人出现于伊特鲁斯坎人到来之后不久,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包括塔伦坦、叙拉古和那不勒斯。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有字



图 32 伊特鲁斯坎人的石棺

我们对伊特鲁斯坎人的了解,多半来自于他们的丧葬艺术。这尊描绘一对伊特鲁斯坎夫妇的雕像是石棺的一部分。

母表、若干艺术与神话、某些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还包括其本体取自希腊神话的罗马诸神。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弥斯成为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约公元前 500 年,罗马驱逐了它的最后一个伊特鲁斯坎国王,开始了独立城邦的生涯。在短短几年里,它征服了周围诸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邦的制度相似。最初,国王拥有帝权,即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约束力。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帝权这时转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甚至在接纳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仍然不变。

当罗马完成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整个半岛时,罗马与希腊城邦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罗马能够制服意大利半岛,而诸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两者地形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山峦重叠,实际上,“巴尔干”这一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地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而且,由于没有像巴尔干那样的山脉,罗马公路网,例如,有名的阿庇乌大道就是顺着靴子状的意大利半岛从罗马一

直通到靴子跟部的布朗迪西恩。将整个意大利联结成一体。实际上，阿庇乌大道现仍存在，1943 年英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时还使用过。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开明。早先，雅典向希腊同伴征收贡物，且从不给予他们公民权。而罗马，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仅在于不能控制对外关系，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最后，罗马人获胜还由于他们拥有优势的兵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在与邻邦作战时，他们认识到，传统的由 8 000 人组成的方阵过于庞大，难以指挥，尤其在多山地区作战时。所以，他们将军队组织成 120 人一支的“支队”；30 支支队，即 3 600 人，组成军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其侧翼。除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之外，罗马人还用有效的进攻型武器即铁尖标枪来装备军团。作战时，军团士兵先从远处将标枪掷向敌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敌人队形的缺口进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 295 年，罗马人已夺得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兵临地处半岛“足背”、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塔伦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被汉尼拔誉为其将才仅次于亚历山大。皮洛士获得了两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担不起为此付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人虽然损失更为惨重，却有 75 万意大利战斗人员作其后备。所以，皮洛士于公元前 272 年撤退，临走时，他颇有见识地说：“我为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一个多好的战场！”仅过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 264 年，罗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岛交战。

在论述布匿战争——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词叫布匿克斯，故名——之前，须先提一下罗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趋向。由于平民们曾为得胜的军团提供人力，所以他们处于要求政治上得到让步的有利地位。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有权选择被称为保民官的官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还关心与群众有关的其他事务。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步包括：写下法律条文，公之于众；限制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数量。

因而，到公元前 265 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设想，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是存在的，也会由于此时把罗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海外战争，而被有力地消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国内的制度，民主化趋向的夭折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 六、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年—公元前27年

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共和国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马其顿和罗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来解释它们的急剧扩张。它们都发展起优良的军用器械和高超的军事技术,而且,与波斯帝国和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同:后者社会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却都享有社会生气勃勃、团结成一体这一极其重要的优势。

罗马的劲敌迦太基,最初是建于公元前850年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由于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中转贸易,它逐渐变得富强起来。它倚仗活动范围广阔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最初,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冲突,原因很简单:一个是陆上强国,另一个是海上强国。但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时,冲突发生了:西西里岛距罗马人新获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而迦太基对西西里岛的影响又日渐增长,这使罗马人深感忧虑。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公元前241年)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他们建立起一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近身格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这时,两大强国间的殊死斗争已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从而增加了农民士兵的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西西里岛的丧失,就加强对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入侵意大利,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尤其是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败罗马人。可是,罗马同盟军对罗马的忠诚使他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奉召从意大利返国驰援,在本国终遭失败。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对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和约,结果,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城墙和十艘舰只——仅够驱逐海盗。迦太基人尽管遭到这一灾难性的失败,可在经济上却获得非凡的复苏。但是,这只能使罗马惊恐,无情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6年)。结果,迦太基被攻占,城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106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坠入一个连锁反应: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是罗马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后,它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此外,征服能带来明显的好处,从每个新行省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最后,存在与辽阔的帝国疆域相联系的不可避免的支持和挑战。例如,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援助汉尼拔,所以,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转而攻击马其顿。接着而来的马其顿战争只是罗马人在中东几大强国——马其顿、塞琉西王朝的



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所引起的一系列战争中的头一场。

这样，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并吞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 31 年并吞埃及。罗马人还以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沦陷于帕提亚，因而帕提亚成为罗马在东方的主要对手。当时，尤里乌斯·恺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 58 年—公元前 49 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最后，公元 1 世纪时，罗马开始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修筑一道防御工事，巩固占领地。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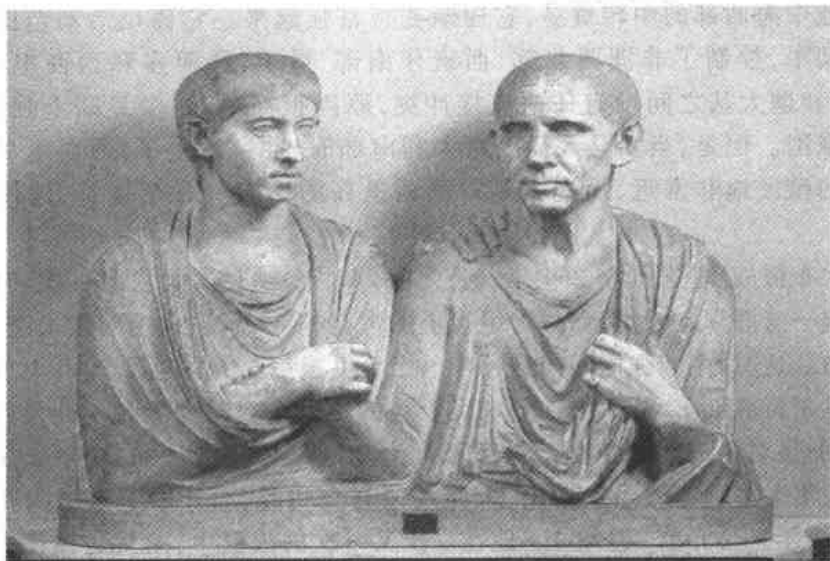


图 33 罗马夫妇半身雕像

共和国时期的一对罗马夫妇的半身雕像。虽然有些人认为雕像表现的是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和他的女儿波西亚(Porcía)，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这种说法。

罗马对待新获得的行省并不像早先对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诸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引起了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西塞罗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总督盖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岛（公元前 73 年—公元前 71 年）的恶政，这种恶政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并不罕见。他说：

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从农民钱袋中榨取无数的金钱；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像对待民族死敌一样；折磨和处死罗马公民，好像他们是奴

隶一般；罪大恶极的罪犯可以用钱买得无罪释放，而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却……未予审问即被判罪、受到放逐；听任设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盗和冒险家的攻击。让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给活活饿死；尤使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耻辱的是，装备精良的舰队被击毁，化为乌有。著名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富有的国王们的礼物……全被这位总督劫夺、掠去。他不仅如此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掠夺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个神，其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决不会留给西西里人民。<sup>9</sup>

107

这些政策对罗马本国也有不利的影响，几乎就像罗马对诸属地的影响一样。意大利许多小农由于汉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期间长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产。廉价谷物和成群奴隶又源源不断地从征服地流入罗马，故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极其富有的阶级。那些富人急欲积聚大地产，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营农业仍是有身份的人的唯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在意大利，公元前2世纪时，为在外地主所有、由奴隶们劳作的大庄园不断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隶们竞争工作机会。官方关心的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城市生活尽管也不安稳，但至少是令人兴奋、有吸引力的。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称之为“公共厕所”的罗马。

罗马帝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方面一样，也是苦涩的。早期的民主化趋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成为民主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帮他们解除困境的煽动者。此外，军队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帝国的职责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征召有产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所以，凡是志愿当兵的皆可入伍，破产农民开始长期服兵役。结果，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此时，士兵们首先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指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将军们愈来愈开始把交给他们指挥的军团看成自己的附庸军，利用附庸军来大发个人之财。

帝国的扩张也给文化带来破坏性影响。原先，罗马人传统的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被遗忘了。疯狂地争夺金钱，暴发户故意炫耀的挥霍浪费，以及对人类一切社会准则的冷漠无视，成为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

于耕地人。”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白，从公元前 146 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 27 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愈演愈烈的军人干政——的时期。开始时，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由竞选获得的保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 133 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 300 人一起被杀。12 年后，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统治。

108 格拉古兄弟的命运表明，温和有序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此时，帝国因上层将领的争权夺利和下层奴隶的起义而四分五裂。最重大的起义是公元前 73 年爆发的斯巴达克起义。整个帝国制度一时摇摇欲坠，但最终，斯巴达克还是给打败了，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满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起义追随者。

最后的胜利者是高卢的征服者尤里乌斯·恺撒，他建立了一支强大、忠实的军队。公元前 49 年，他渡过将高卢和意大利分隔开来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此时，恺撒成了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至于恺撒会运用到手的权力做些什么，我们无法知晓，因为公元前 44 年，他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谋杀了。

恺撒死后，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 13 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公元前 31 年）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 33 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 44 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 200 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 27 年—公元 284 年

公元前 27 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号，象征罗马已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虽然屋大维声称他更喜欢共和国“第一公民”（元首）的称号，但实际上他像皇帝一样行事，在损害元老院和公民会议的情况下集大权于一身。他创立了由他亲自监督的中央集权制度，直接控制诸行省总督，严厉惩罚总督中犯有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罪行的人。他规定收税标准，使收税成为国家的职责，而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包税人私人的事。他严密控制军队，让士兵们得到很好的待遇，使他们直接对他宣誓效忠。他还创建了一支常备海军，镇压海盗，保护帝国各地间商品和军队的运送。

开始以奥古斯都闻名的屋大维通过这些措施，建立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确

保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能维持200年之久。确实,奥古斯都之后的四个皇帝——提比留(公元14—37年在位)、卡里古拉(公元37—41年在位)、克劳狄(公元41—54年在位)和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都是不称职的。但是,帝国经受住了他们的暴政,并在此后“五贤帝”——涅尔瓦(公元96—98年在位)、图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在位)、安东尼·庇护(公元138—161年在位)和马可·奥勒留(公元161—180年在位)——的统治下繁盛起来。在“五贤帝”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范围,其文化处于极盛时期。

当时,从福斯湾到克莱德湾的防御工事是帝国最北面的边界线。莱茵河和多瑙河则是东北面的天然边界线,这条边界线进一步向东绕过多瑙河的北面囊括整个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是罗马的属地,不过这两地间的边界线紧靠地中海沿岸,把一大块内地留给帕提亚人,公元224年后,这块内地归萨萨尼亚人所有。同样,在北非,罗马人以撒哈拉沙漠为南部边界线,控制了埃及和大西洋间的沿海地区。

109

这一巨大的、有着牢固的天然边界线的地区构成了一个繁荣的、实际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在这数百年间,促使帝国经济繁荣的有各种因素,包括诚实而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国内外广泛的贸易等。国内的自由贸易保证来自埃及的小麦、纸莎草纸和玻璃制品,来自叙利亚的亚麻布、毛织品和各种水果,来自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和小地毯,来自意大利的酒、油和各种制成品,来自高卢的谷物、肉类和羊毛,以及来自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各种矿物,能畅通无阻地销往各地。罗马人还从帝国外面进口某些商品: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毛皮和奴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和奴隶,以及占有重要地位的亚洲的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香料、宝石、调味品和最受欢迎的丝绸(见第4章第2节)。由于国内外贸易殷盛,主要商品和奢侈品从近至高卢、远至中国的地方源源涌入首都,其数量之多,使主要商品足以保证100万人的衣食穿用,使奢侈品足够满足西方世界统治者的挥霍浪费。

在文化方面,罗马人的主要成就是把城市文化连同它所带来的一切扩展到中欧和西欧。这方面,罗马人在西方所起的作用和希腊人在中东所起的作用相似。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建立了许多城市,将希腊文化传播到远至印度和中亚。现在,罗马人也建立了许多城市,如不列颠的伦敦和科尔切斯特,高卢的奥顿和瓦依松,以及德意志的特里尔和科隆。这些城市,占地面积从20英亩至500英亩,大小不等,比起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较为肮脏的山顶要塞和村庄,有了明显的改进。甚至这些城市中奴隶的住处也比当时土著村民的茅舍要卫生。此外,这些城市还拥有使人身体舒适的公共澡堂、令人心情愉快的公共剧场,以及住宅区、公共市场和商店。这些城市不但构成了帝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细胞,而且还构成了帝国文化的基本细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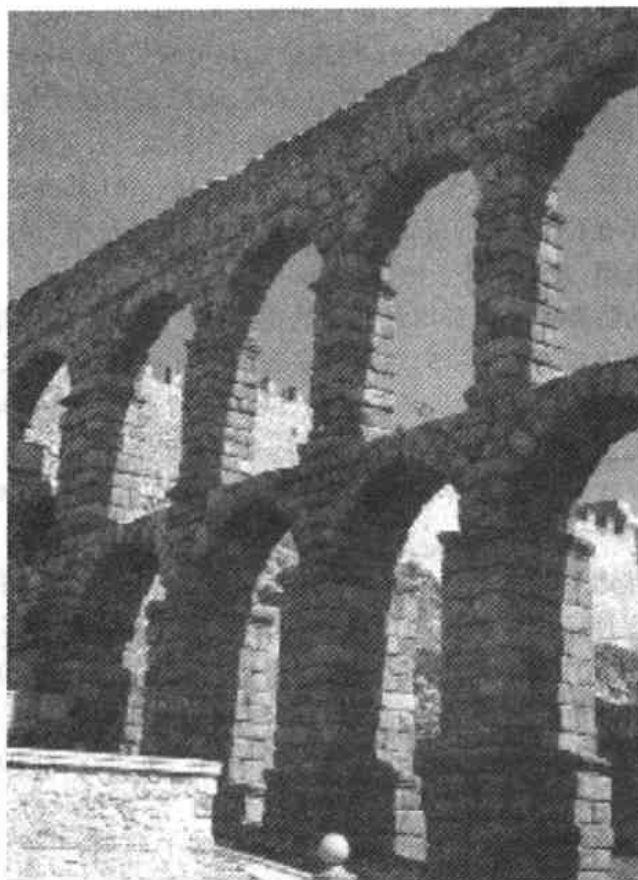


图 34 罗马石渠

这一花岗岩沟渠乃罗马帝国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的一个实例，建于图拉真统治时期，至今仍在使用中。

当然，帝国最伟大的城市是罗马。它占地 5 000 英亩，其人口据估计，公元 2 世纪时有 100 多万。游览者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罗马法中多处提到这一习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富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白天街道上人来人往，嘈杂极了。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着硬币，修补匠敲打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的罗马也不安宁。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赶马车人组成的队伍。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富裕得可以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之所以还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众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

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 32 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 27 英亩。这种公共浴室比起结构简单的浴池,其服务项目当然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设有运动场所、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绝妙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理想的实现。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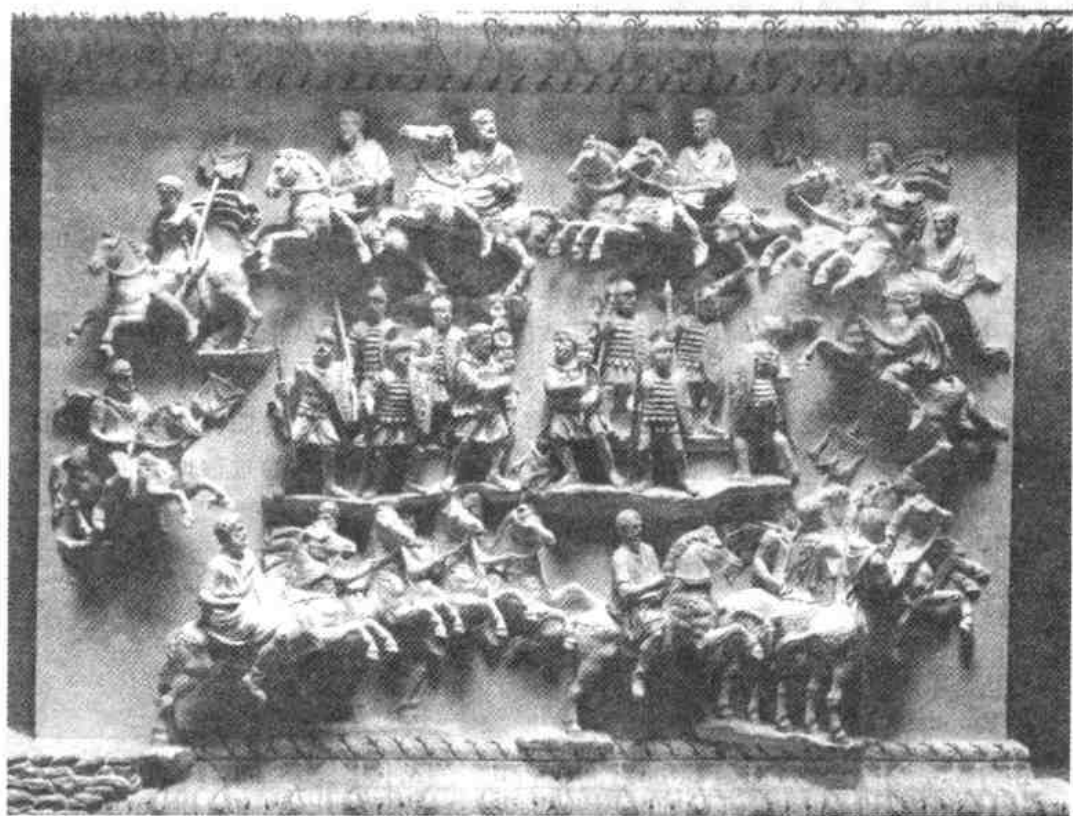


图 35 罗马浮雕

安东尼·庇护圆柱上的浮雕,描绘的是被骑兵包围的罗马步兵。

最后,罗马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自希腊,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爱好实践,故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修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内。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造得好,故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罗马的新型建筑材料——混凝土、砖和灰泥——使罗马人为大型建筑物修建宏伟的拱

顶结构成为可能。

也许罗马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 450 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这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日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若遇上这种情况，该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罗马妇女的从属地位，她们必须服从家庭中最年长的男性继承人即家长的权威。这一法律制度包括了夫权原则；按照该原则，丈夫是一家之主。因此，丈夫享有绝对权力，其中包括决定家庭全体成员生死的权力和将家庭成员出卖为奴隶的权力。但是，罗马妇女与希腊妇女不同，的确享有继承和获得不动产的权力，而且不经监护人同意就能处理不动产。此外，罗马妇女也不像她们的雅典姐妹那样被牢牢地关在住宅区内。由于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过渡时期存在种种变化，所以作判断是要冒风险的。不过，可以有把握地下结论说，罗马妇女比起希腊妇女，其境况要好些，虽然她们依然明显地从属于男人。

## 八、后期帝国，公元 284—476 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 180 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却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 193 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掌权。从公元 235 年至 284 年这一段时间里，有过近 24 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自然死亡。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图 36 君士坦丁像

君士坦丁皇帝(公元 306—377 年)的半身雕像。

公元 3 世纪时,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 284—305 年在位)和君士坦丁(公元 306—337 年在位)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在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就是其中的一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 301 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 6%—12% 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和马之类的“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必须永久地、世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所有被认为是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行业。

112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划分成两部分,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引以自豪的首都。

较后的数世纪里,对后世有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君士坦丁做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



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期阶段,苦难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 4 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观、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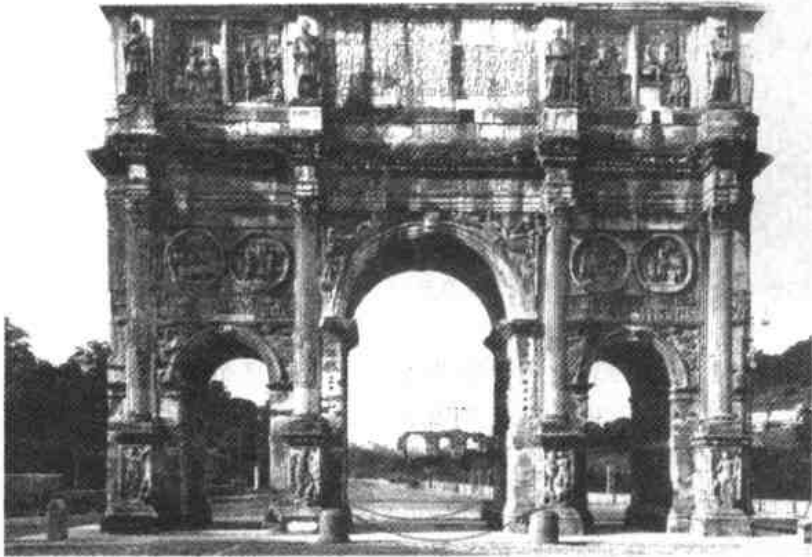


图 37 君士坦丁拱门

君士坦丁拱门,是为了将君士坦丁尊崇为罗马的唯一皇帝而于公元 312 至 315 年间建成的。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一神教的东方膜拜仪式。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是,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星光灿烂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到公元 64 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竟使尼禄相信,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开始对基督徒的首次迫害(这样的迫害后来发生多次),是明智的。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在 4 世纪初对基

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公元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在位)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叛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在位)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

正像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一副神圣的架势。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镶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的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只是延缓而不是避免了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的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5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114

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做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充当应对“陷落”负责的工具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sup>10</sup>这一判断可找到一些理由来证明其正确性,不过,即便如此,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扫荡一切。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西哥特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图 38 汪达尔武士的象牙浮雕

古罗马象牙浮雕,制成于公元 395 年稍后一点的时间,表现的是一个名叫斯迪里欧的汪达尔武士。他在罗马军队中跻身于显赫地位。从公元 3 世纪起,罗马军队已愈来愈由外国雇佣兵组成。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器质性病是经济。”<sup>11</sup>实际上,这一“器质性病”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像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

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像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是“自然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且有害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今罗马圣皮特罗广场树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竭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同样是有害的。因而,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伟大的阿基米德

……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做是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叙拉古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一门学科即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按理论根据在当时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结果,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sup>12</sup>

奴隶制度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不断地阻止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在经济方面也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因为奴隶们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115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掩盖。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至开始缩小,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却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在也到了收缩时期,它是不可

能维持下去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6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000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则涨为200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势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还拥有各种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由于帝国的疾病是“器质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没有用的。不过,严格管制并非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sup>13</sup>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崩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像中东肥沃的大河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意大利的谷物产量平均不过是播种量的4倍。所以,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因此,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器质性病”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却最不坚固,首先屈服,而东部则又生存了1000年。

尽管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它确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有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沟渠、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要大大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治下和平”曾带来长达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此以后的数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激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 116 推荐读物

最近出版的同时考察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著作有由J. Boardman、J. Griffin和O. Murray共同主编的*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7年版)。单独研究希腊历史的著作有:M. Grant所著的*The Rise of the Greeks* (Scribner's出版社,1988年版)、R. Sealey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States* (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77 年版)以及 R. Meiggs 所著的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2 年版)。关于希腊历史和文明的某些特定方面的著述有:A. R. Burn 所著的 *Persia and the Greeks: The Defense of the West* (Edward Arnold 出版社,1963 年版)、J. Boardman 所著的 *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Thames & Hudson 出版社,1982 年版)、C. Kerényi 所著的 *The Gods of the Greeks* (Thames & Hudson 出版社,1979 年版)以及 R. Flacelière 所著的 *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 (Macmillan 出版社,1965 年版)。

关于希腊化世界,标准的史学著作有 W. W. Tarn 和 G. T. Griffith 合著的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Edward Arnold 出版社,1952 年版);简短的概览性著作有 M. Grant 所著的 *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 (Scribner's 出版社,1982 年版);学术性的人物传记有 N. G. L. Hammond 所著的 *Alexander the Great: King, Commander and Statesman* (Chatto & Windus 出版社,1980 年版);相关的详细分析可参见 M. Rostovzeff 所著的三卷本的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Clarendon 出版社,1941 年版)。

还有几本很好的单卷本的研究罗马的著作,包括:A. E. R. Boak 和 W. G. Sinnigen 合著的 *A History of Rome to 565 A. D.*, 第五版(Macmillan 出版社,1965 年版),以及 M. Grant 所著的 *History of Rome* (Scribner's 出版社,1978 年版)。有关罗马前 3 个世纪的历史,可参见 M. P. Charlesworth 所著的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51 年版);此后的历史则可参阅 A. H. M. Jones 所著的 *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 (Longmans 出版社,1966 年版)。特殊的专题在下列著述中涉及:J. Carcopino 所著的 *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40 年版)、R. MacMullen 所著的 *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A. D. 100—400*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4 年版)、以及 M. I. Finley 主编的 *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Heffer 出版社,1960 年版)。

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地位在下列著作中论述得最好:S. B. Pomeroy 所著的 *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Schocken 出版社,1975 年版)、V. Zinserling 所著的 *Women in Greece and Rome* (Schram 出版社,1973 年版)。M. R. Lefkowitz 和 M. B. Fant 共同主编的 *Women's Life in Greece and Rom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出版社,1982 年版)是一本有用的相关原始材料的汇编。另外,M. W. Bingham 和 S. H. Gross 合著的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 丛书的第一卷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Glenhurst 出版社,1983 年版)中,也有相关精彩论述。

最后,关于为什么罗马会“陷落”的问题在以下两本论文集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S. N. Eisenstadt 主编的 *The Decline of Empires*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67 年版)以及 D. Kagan 主编的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D. C. Heath 出版社,1962 年版)。这两本书既方便了我们阅读相关论文,也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详尽书目。

## 注释

1. Plato, *Apology*, trans. B. Jowatt in *Dialogues of Plato*.
2. Cited by F. M. Cornford, *Greek Religious Thought . . .* (Dent, 1923), p. 85.
3. Cited by C. J. Singer, *A History of Biology* (Schuman, 1950), p. 4.
4. From *The Greek Mind* by W. R. Agard. © 1957 by Litt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 Van Nostrand Company.
5. Aristotle, *Politics*, I, 5, 2.
6.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 G. Rawlinson, Book VII, Chap. 104.
7.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B. Jowatt, Book I, Chap. 22.
8. Cited by S. Pomeroy,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Schocken, 1976), p. 8.
9. Cicero, *First Part of the Speech Against Gaius Verres at the First Hearing* (New York, 1928), Chap. 5.
10. A. Piganiol, *L'Empire Chrétie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7), p. 422.
11. R. S.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M. Evans, 1967), p. 23.
12. *Life of Marcellus*, from *Plutarch's Lives*, Vol. 3, trans. J. and W. Langhorne (London, 1821), pp. 119ff.
13. J. Lévy,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ed. J. G. Bira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7), p. 99.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117

——考底利耶

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为全世界牟利。

——阿育王

---

## 第6章 印度文明

当我们的研究从希腊和罗马转向印度时,我们便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差别并不只是对比它们的自然环境后呈现的差别,即在职业、饮食、居住和服装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要根本而广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之类的基本观念和制度有些微相似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的抽象观念。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持续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将其与欧亚的其他一切文明区分开来的明显特点。

正如下一章将要说到的,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不过,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处于空前未有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而印度,其早期阶段似乎与西面雅利安人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区——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早期阶段基本相似。如前(第3章第5节)所述,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人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拥有与诸如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同样的生理特征、同样的畜牧经济、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诸神和同样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脉并非不可逾越,所以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有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来回翻山而过。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超过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118

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现可得到的证据很少,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



回答。但是,最简单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不太开化地区的亚该亚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人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见地图 9)。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被征服,且受到鄙视,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不能被灭绝、赶走或同化,因而也不能使其原先的文化留存无几。相反地,当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这样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达数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是文化融合。这一文化融合的情况、性质和结果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地区的多雨地带,因为那里有大片的草地可供放牧牲畜。渐渐地他们开始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约公元前 800 年时,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改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对栽稻来说是很理想的;在恒河流域栽稻比在旁遮普种小麦和大麦时的产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最初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业,如木工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等。随着以河流充当运输剩余粮食的天然交通干线,农业也促进了贸易。贸易刚开始时,通常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母牛为大笔交易中的价值单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铸币出现时,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实行的度量衡。城市由原为贸易重地或专营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而来。

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政治上的统一。原先,印度雅利安人像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者议会和部落大会帮助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的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

公元前 4 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他们开筑沟渠,组织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陀王们现被说成是印度最早帝国的创建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

他于公元前321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相平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宴请同伴时的禁忌,等等。但是,到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关于种姓等级制度的起源,虽然现已提出许多种理论,但普遍同意,肤色是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119



地图9 古典时代印度境内诸帝国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与黑皮肤的土著居民在肤色上的差别,他们将土著居

120 民称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因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是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所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语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司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根据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大划分内,现已成长起令人困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舍种姓。另一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举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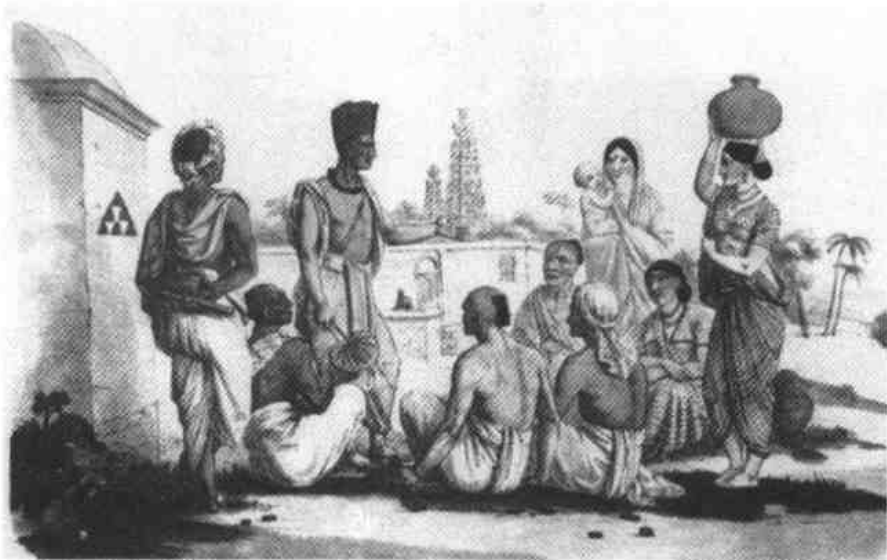


图 39 婆罗门

印度祭司等级的婆罗门之一员正在向虔诚徒众布道。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

分之一。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玷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要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渔民、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清道夫和拾荒者。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玷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仍必须敲打一对拍板,以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承受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低下地位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121

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这种结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当然,种姓制度还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使一个人只要遵守其规定便可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虽然它现已受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作用。

##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最基本的部分。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罗为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为神圣的醉人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新的神。因而,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印度河流域一些遗址中的发现物惊人地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时,雅利安人自然会占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司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这一变革可能也源于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学会了后者的巫术和习俗。不管在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被大声朗诵。它们通过世代口口相传而留存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

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份，坚持并实施自己的主张。

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而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除了在来世外，还会在今生获得相应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已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无法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个人做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 6 世纪和 5 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司居支配地位很不满。因此，现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属于蒙古种族。这些因素相结合，促成了那些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人们开始要求自由——自由是一种比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122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明了训练或者“修炼”（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一些修行方法。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这一新宗教不能容纳种姓制度和婆罗门。它要求圣典能为所有信徒而不仅仅是处于上层的少数人所理解。佛教还废止了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佛教不但在印度，而且还在亚洲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不过，公元 600 年以后，佛教在印度失去地盘，最终，仅存在于其诞生国的少数几个地区。佛教在本土衰落的一个原因是，它未能为应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做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相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了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做法确保他们尽管遭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来。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通往解脱——通往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们教导说,弥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朵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经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抛弃世界。虽然佛教作为一种虔诚的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的反改革运动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



图 40 青铜湿婆雕像

印度南部出土的一尊动人的青铜湿婆雕像。湿婆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神之一。这尊线条流畅、结构匀称的雕像描绘的是所谓的“跳舞的湿婆”正忙着跳毁灭世界同时又创造世界的舞蹈,是对世界万物永恒的流动的一种神话般的艺术表达(雕塑成像是13世纪,尺寸为33.5×24.8厘米)。

### 三、孔雀帝国

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如本章前面所述,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西北地区正独自行动,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个行省。两个世纪后,也就是公

公元前 327 年,亚历山大大帝也从西北部侵入印度。但是,他在印度仅待了两年,在他离开后不久,希腊人在旁遮普的统治就结束了。尽管亚历山大在印度待的时间不长,但他对印度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

123 其中一个影响是,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向贸易迅速发展。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做出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国家促进这一贸易达 200 年之久。



图 41 狮形柱头

在萨尔纳特出土的阿育王圆柱上的狮形柱头。这是阿育王(公元前 273 年—公元前 232 年)朝代的作品,是这位孔雀帝国的统治者为了纪念佛陀而下令竖立的许多石柱中的一个,现陈列于新德里博物馆。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当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击退了希腊军队。

旃陀罗笈多的儿子征服了南部的德干地区,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公元前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十分富裕,且得到很好的治理,就像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许多驿道上,成群的商人、士兵和王室信使往来不绝。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所以专门成立一个海事部来维护航道和港口。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因它的公园、公共建筑物和9英里多长的河边绿地而闻名于世。它的一些学校里挤满了来自帝国各地和国外的学生。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常被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124

阿育王的统治根本不同于这种传统型的帝国统治。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自己描述道,看到十多万名俘虏被杀死,他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从此以后,阿育王设法实行佛陀的温和的教义。他以佛教信条为根据颁布敕令;这些佛教信条是: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他下令兴办了许多对他的人民而不是对他的政府有好处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医疗,驿道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任何教派的杰出人士都予以帮助。这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一般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种态度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毁灭。



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高于任何政治制度这一事实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公元前 2 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 500 年的混乱和黑暗。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涌来为数众多的入侵者。从亚历山大及其手下的希腊人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帕提亚人，其后是西徐亚人，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这里仅仅提及那些最重要的人侵者。所有这些民族建立的帝国都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将印度与外国连接起来，促进了大陆贸易和海外贸易。罗马商人去印度南部和西部，而印度商人则大批地定居于东南亚。就像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经商和殖民一样，印度人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经商和殖民。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托钵僧可以安全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各民族之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回报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各种文化获得大发展。文化的交流绝不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影响。公元 1 世纪时，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入印度。据传说，圣多马于公元 52 年前后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教堂。然后从那里经陆路旅行到东海岸，不过到东海岸后，他的布道遭到强烈反对，他自己也于 68 年在马德拉斯附近被人杀害。但是，他在马拉巴尔地区的工作结下了丰硕成果，那里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至今。

## 五、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4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一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比。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之际,再一次将势力扩张到由贵霜帝国溃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sup>125</sup>



图 42 婆罗门浮雕

约公元600—700年的婆罗门浮雕。

笈多时代开始于约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登基之时,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盛。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扩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纳巴达河为止。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一隔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已接受印度教、佛教以及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

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笈多帝国享有引人注目的繁荣，尤其是在旃陀罗笈多二世采用标准的金币和银币之后。当时，无论半岛内的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其贸易量均达到新的高度。笈多统治之际，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的降低这一点上反映出来：孔雀时期，贷款的利息率为 240%；笈多时期，降为 20%。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业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纹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这些东西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被大量生产。其他重要的行业有冶金业、制陶业、雕刻业和宝石切割磨光业。

126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东晋僧人法显曾在 401 至 410 年间逗留印度，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笈多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一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像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法显还注意到：

---

## 一个中国僧人眼中的印度

中国去印度朝圣的佛教徒们留下了关于古典时代印度的宝贵叙述。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他在公元 629 年至 645 年间访问了印度各地，并留下了以下生动的描述。\*

城镇和村庄都有几扇内门，城墙又宽又高，街道和小巷曲曲折折，道路蜿蜒逶迤。大街很脏，货摊设在街道两旁，上面挂有合适的标志。屠夫、渔夫、舞女、刽子手和清道夫之类的人不能住在城里。这些人在街上行走时只能走路的左边。他们的屋子都建在郊区，被矮墙围起来。由于地面柔软而泥泞，城墙大多是用砖和瓦建造的。城墙上的塔楼是木头和竹子搭建的；住宅都有阳台和瞭望台，这些建筑也是用木头建造的，上面抹了一层石灰和胶泥，屋顶盖着瓦片。这些不同的建筑物都和中国建筑物式样相同：盖屋顶的材料是茅草、瓦片、树枝和木板。屋子的墙上抹有石灰和泥浆，还掺杂以起清洁作用的牛粪。逢到不同的季节，他们便在四周撒下不同的花朵，这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习俗的一部分。……

他们对个人卫生很在意，在这方面不允许半点马虎。他们在饭前要洗手，他们从不吃上一顿剩下的东西，他们不互相夹菜。木制和石制的器皿在用完时必须销毁；金、银、铜、铁制的器皿在每顿用完后都要清洗和擦亮。饭后他们用细柳枝清洁

牙齿,并要漱口和洗手。

不洗浴完毕的话,他们不会互相接触。每次如厕之后,他们都要洗干净身体并喷上用檀香或姜黄制的香水。

最常见的食物是牛奶、黄油、奶油、绵糖、冰糖、蓖麻子榨的油,主食是用玉米做的各种糕点。他们一般吃新鲜的鱼肉、羊肉、羚羊肉和鹿肉,但有时也腌着吃。他们严禁吃牛肉、驴肉、象肉、马肉、猪肉、狗肉、狐狸肉、狼肉、狮子肉、猴肉和所有带毛的动物的肉。……

家庭用品并不缺乏。虽然他们有煎锅和炒锅,但他们不知道煮饭用的蒸锅。他们有许多用于泥制成的器皿,他们很少用红铜器皿:他们吃饭时只用一个器皿,各种辛辣调味品都混在一起,他们用手抓着吃。他们没有汤匙或茶杯,也没有筷子。

\* 见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 S. Beal (Kegan Paul, 1884), I. pp. 70—89. Reprinted by Paragon Reprint Corp., New York (1968).

人民众多,都很幸福;他们无需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益。如果他们想去,则去;如果他们想留,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再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其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sup>1</sup>

127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梵语,现又卷土重来,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娑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或抒情诗。18世纪末叶,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被译成英语,从此以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喝彩,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的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赋予的样式出现的编定本。这些编定本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书中大量的故事为世代作家所采用,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是很杰出的。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了有益的交流。公元 476 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 365.3586805 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

无疑,笈多时代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一基点可以是任何数;印度人选取 10 大概是因为他们靠十个手指计数。有了十进制,需要的单数仅为 0,1,2,……9。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 中的每一个 8 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 就是 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要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尽管这些数字具有明显的优点,却长期受到藐视,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而且太易伪造了,因为短短的一划就可以把 0 变成 6 或者 9。直到 15 世纪末叶,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文化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这些发明相媲美。

## 推荐阅读物

关于印度文明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汇编是 W. T. de Bary 等所编的 *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1958 年版),以及 A. T. Embree 主编的 *The Hindu Tradition: Readings in Oriental Thought* (Vintage 出版社,1972 年版)。另一本价值不可估量的参考著作是 J. E. Schwartzberg 主编的 *A History Atlas of South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78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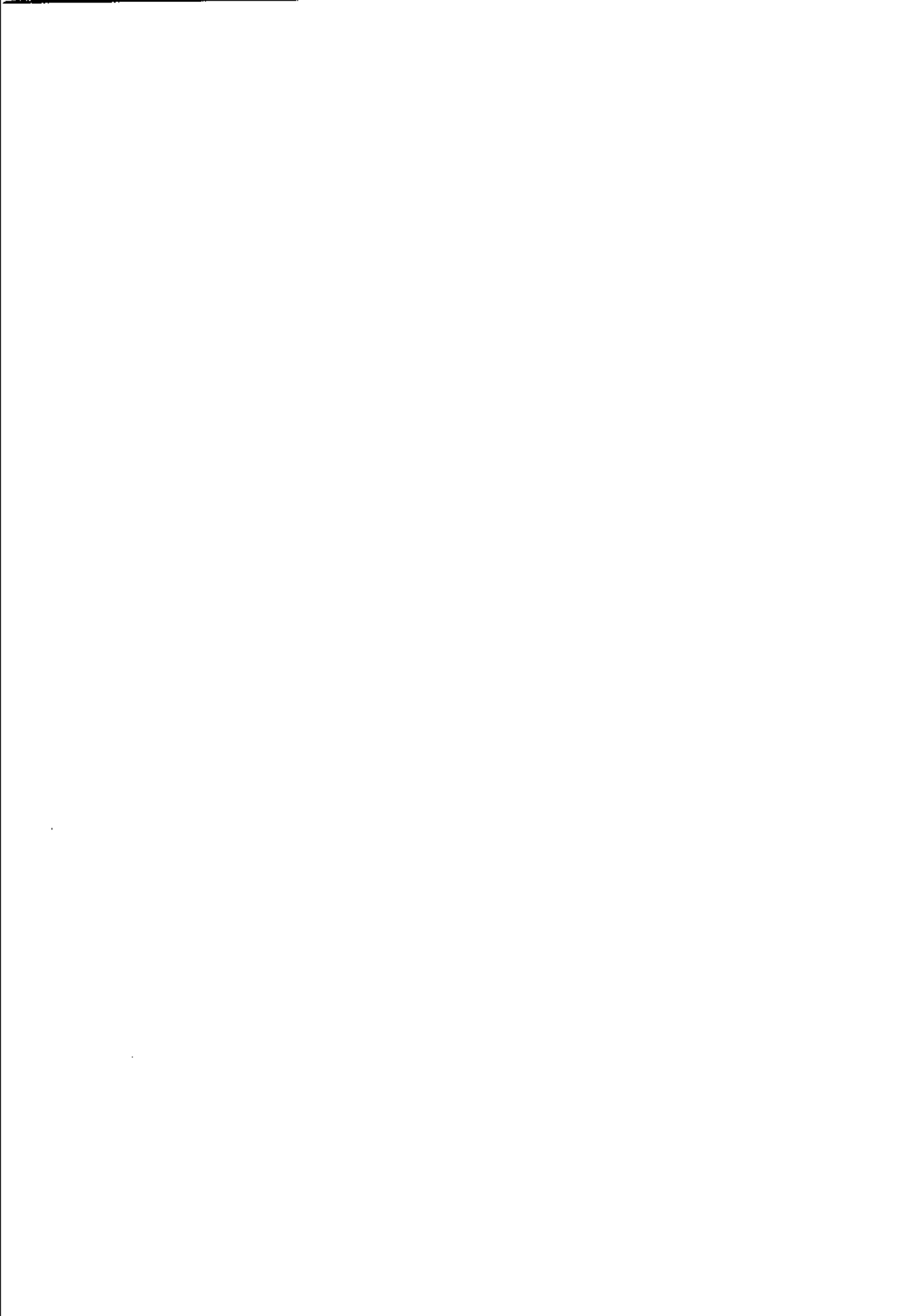
一部写得很好的关于印度的通史是 S. Wolpert 所著的 *A New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7 年版)。也可参考下列四本著作:P. Spear 所著的 *India: A Modern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出版社,1961 年版),R. Thapar 所著的 *A History of India* (Penguin 出版社,1961 年版),D. D. Kosambi 所著的 *Ancient India: A History of Its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Pantheon 出版社,1965 年版),以及 H. Kulke 和 D. Rothermund 合著的 *A History of India* (Croom Helm 出版社,1986 年版)。

对印度作了社会学解释的著作是 D. G. Mandelbaum 所著的 *Society in India: Continuity and Change*,两卷本,(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70 年版)和 B. S. Cohen 所著的 *India,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a Civilization*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71 年版)。在下列书中还可以找到许多有趣的材料:J. Auboyer 所著的 *Daily Life in Ancient India from Approximately 200 B. C. to A. D. 700* (Weidenfeld & Nicolson 出版社,1961 年版),以及 M. Edwardes 所著的 *Everyday Life in Early India* (Batsford 出版社,1969 年版),此书对生活在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 700 年间的印度人的生活进行了分析,并有

精美的插图。另可参阅 K. W. Morgan 所著的 *Asian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nduism, Buddhism, Isla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Washington 出版社, 1964 年版)。

### 注释

1. Fa-hien, *A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trans. J. Legge (Clarendon, 1886), pp. 42—43.



---

## 第7章 中国文明

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与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所同化的游牧入侵者和较为原始的部落一样，一开始都是蒙古种人。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流。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



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 2000 年才出现。

以上所述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可用来帮助说明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 一、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 771 年—公元前 256 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休,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见第 3 章第 5 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明确地、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 600 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 5 世纪和公元前 4 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铁器发生影响的方式人人都很熟悉。比以往工具生产效率更高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起初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在大河流域地区兴修大批的排水工程、为远距离运输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在西北干旱地区进行的打井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转而又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终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应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像过去那样向村社头领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由于当时新开垦的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人诸侯们的府库。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侯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我们将在本章第 3 节论述秦朝。

## 二、哲学家和经典

130

我们前面论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家,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佛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种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这里,我们将探讨存在过许多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家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五经》,它们由诗歌、民间传统思想和历史文献组成。在研究并利用这些经典的哲学导师中,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000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一个词即“儒教”来概括。孔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下等贵族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都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种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现存史料把他描写成是一个引人注目、魅力四射的人——明智,仁慈,感伤于时局的荒唐、深信自己能够恢复社会的宁静,同时具备一种含蓄的幽默感。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合理的道德原则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

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们

坚信梦的预兆意义，坚信种种占卜术，也坚信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信条。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认为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因帝国政府的建立而变得不可或缺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

---

## 孔子的学说

儒家首先是一个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实用性道德体系。它主要强调礼仪和社会责任，这一点可从以下几节中看出来：

### 个人

通过礼仪规则，可以塑造性格。

礼仪规则是塑造人的性格的工具。它们可以消除人的一切任性的行为，增加人的天性中的美好的东西。用礼仪规则来要求自己，可以不犯错误；用礼仪规则去要求别人，可以使人不入歧途。

### 家庭

一个超越常人的人必须做到：父母健在时，尽心奉养父母；父母过世后，全心供奉父母。他主要想的是如何在一生中不使父母受辱。

孝道有三个等级：最高级是给父母带来荣誉；次一级是不使父母受辱；最低一级是仅仅能养活父母。

父母健在时，要对他们表示尊敬和爱戴；父母过世后，则要对他们表示伤痛和悲哀——这就履行了活着的人的全部义务。

### 政府

好的政府能做到使近的人感到快乐，远的人受到吸引。

民为贵……君为轻。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当君主乐于遵守礼仪规则时，他的臣民就乐于听从他的召唤来为他服务。

如果君主要求他的臣民拥有某些品质，那他自己就必须首先拥有那些品质；如果君主想要他的臣民弃绝某些品质，那他自己就要先弃绝那些品质。

### 教育和艺术

要维持一个教育体系,一个难点就是要确保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只有确保了这一点,教师所教的知识才会得到尊重;而知识得到尊重,人们才知道如何尊重学习。

学者应当不断追求有德性的东西,并在艺术中找到娱乐。

音乐产生人性所不能没有的快乐。

\* 见 M. M. Dawson, *The Ethics of Confucius* (Putnam's, 1915), pp. 2—5, 167—168, 255—257.

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或官方信仰,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民国总统蒋介石极力主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运用其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台湾地区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来庆祝。

132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骼、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应该“使其人民无知识,无欲求……填饱他们的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诸侯们所无法依靠的无用的人,该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应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做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美德,而应是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

法家的这些原则被秦统治者成功地用来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成为永久的正统信条。从此以后,儒家学说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其他学派也就被渐渐淡忘了;道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和官员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 221 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 1911 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 1949 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一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国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攻易守。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铁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 318 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其他列国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最后，秦统治者都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参见地图 10）。

133 凭借上述这些有利条件，秦统治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了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当时的人们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做“蚕食”。到公元前 221 年，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这位新皇帝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郡县，每一郡县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原秦国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并把秦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此外，这位新皇帝还通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行经济集中化。

从后来的历史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诸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性质，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的黏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个词的语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成，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数字表示法。尽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 five、funf、cinque 或 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有意义而无声音。它们和数字一样，可以表示概念，但每个读者念的时候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发音。因之，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它经过数次修改后一直存在到现在）是所有受过教育



图 43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朝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 246—公元前 210 年在位)陵墓中出土的真人大小的兵马俑。

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基于同一原因,这种文字也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朝鲜人或越南人都能阅读汉文,但不会说一个汉字。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134

秦王朝的这些改革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是他们最憎恶的。因此,始皇帝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于是,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给保存了下来。但是,“焚书”计划实际上失败了,因为那些文人学士不惜冒一切风险把书藏起来,或者在交出之前将它们整本地背下来。后来,秦王朝覆灭之后,传统文献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于先前藏下的书和老人们的回忆而恢复原状。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知识方面的损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而得到补偿。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发展。修筑的驿道网以首都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边远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驿道,秦始皇统一了

中国两轮车的车轴长度——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车轮在松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车辙，使每一辆车子要么循着现有的车辙走，要么以新的车轴来适应之。秦始皇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力量将疆界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在西北面，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还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长城西起内蒙古，东至大海，延袤 1 400 英里。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 2 000 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要谈起这一事实：有 100 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正如文人学士诅咒皇帝“焚书”那样，老百姓都为筑长城的事诅咒皇帝。

正是这种普遍的憎恶，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干的继承人，成了民众奋起造反和公元前 207 年、也就是秦始皇去世才四年时秦王朝覆灭的原因。不过，秦的统治虽然如此短命，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记。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如果说中国的英文名字 (China) 由秦 (Ch'in) 而来，那是恰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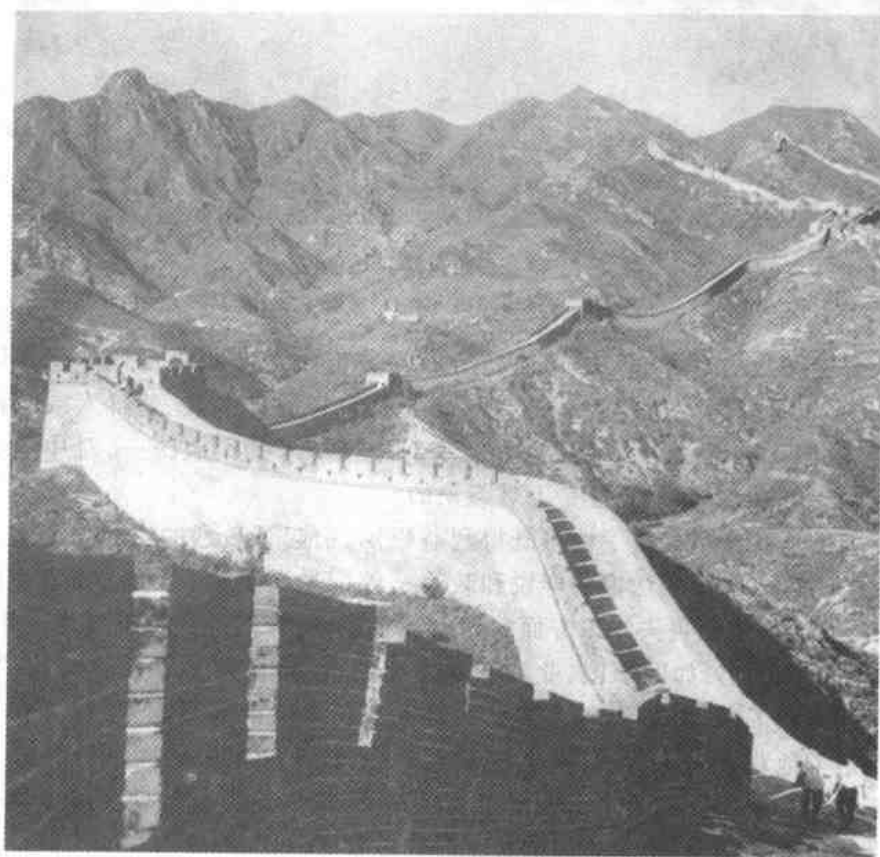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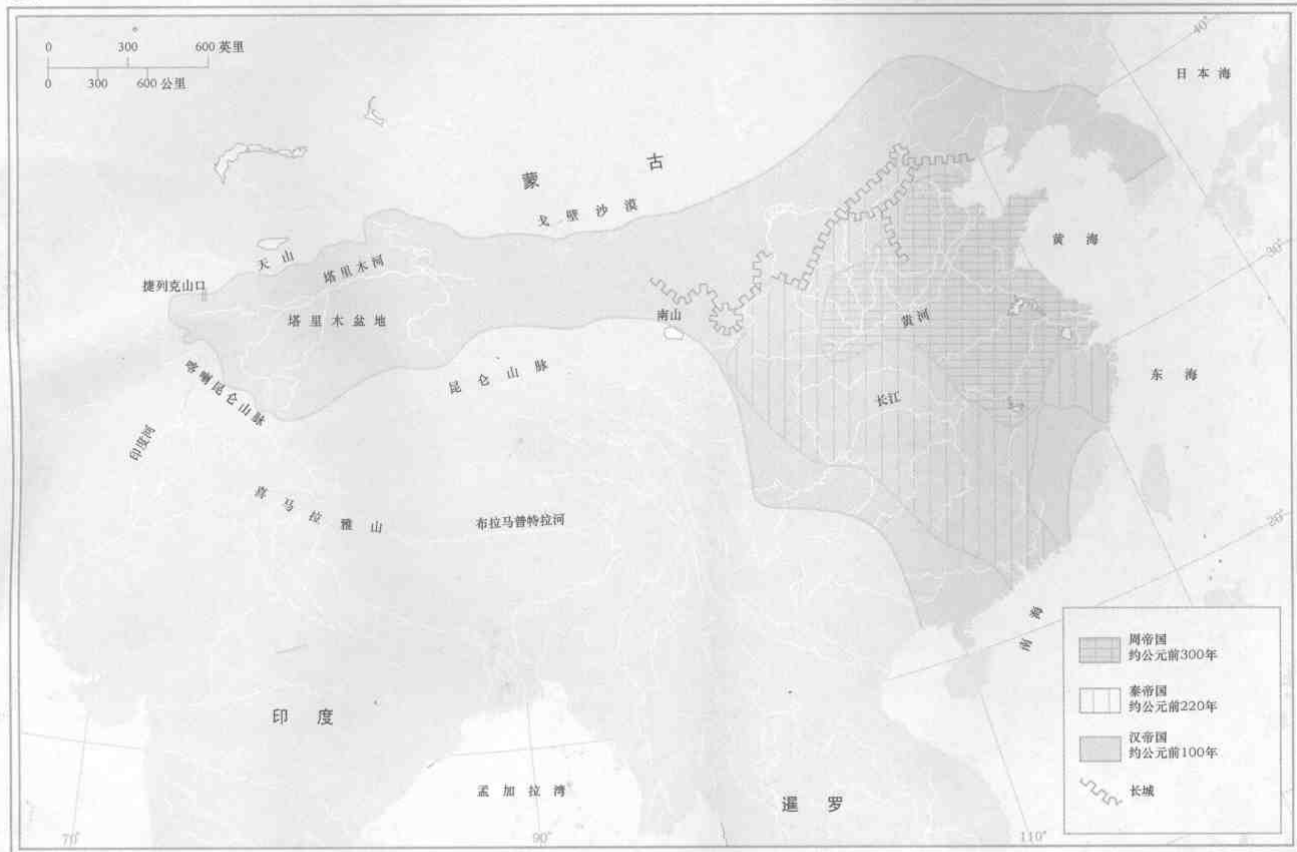


图 44 长城

中国万里长城的一段。长城最先修建于公元前 3 世纪秦朝的时候，其后于明朝重修。



地图 10 古典时代中国境内的帝国



## 四、汉帝国

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不过,继秦而起的汉皇帝更重实际且更为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国家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州县之间。后来,公元前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因之,汉帝国繁荣了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汉帝国的领土也和罗马帝国一样辽阔。在最初的60年间,汉统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时期,帝国的疆界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不过在帝国的这一部分地区开始由操汉语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经过了长达好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移居该地区与当地诸民族被同化的过程。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在西面,中国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见第4章第2节)。

136

游牧匈奴在骑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取之不尽的马匹。事实上,中国人为了他们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也只好与游牧部落进行贸易交往。但是,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战国时代后期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括,一扳扳机,就射出矢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开始初步呈现出现在所具的规模。

汉帝国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

居汉帝国之首的是皇帝,他不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权力,而且还要对其臣民的物质福利和富足负责。对皇帝本人尊严的强调体现在他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主持的朝廷或神殿的长时间的仪式中,体现在为每一种场合所规定穿的龙袍上,体现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监和嫔妃侍候在他身边,有漂亮的马车供他去旅行,还有宏大的陵墓供人们日后用庄重的仪式去安放他的遗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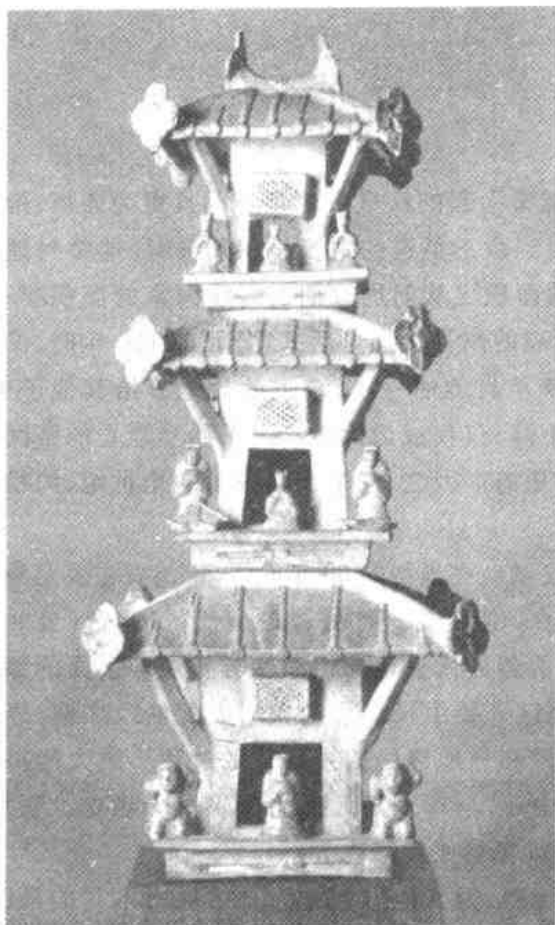


图 45 绿釉陶制塔楼

东汉时期的一个绿釉陶制塔楼模型(规格为 87.6 × 35.6 × 38.1 厘米)。注意它与后来中国佛塔的相似处。

居皇帝之下的是两名丞相,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和首相。他们经常与皇帝接触,负责政府的实际运作。在他们之下的是九卿,分掌如下职责:宗教礼仪,宫殿警卫,照管御用车马,惩处罪犯,接受外国领导人的敬意和贡物,记录皇族、宗室的名籍,征收国家税收,管理帝国财政。

除中央政府之外,还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县、乡的地方官僚机构。基层官吏承担如下任务:征收捐税(包括谷物、纺织品或现金),捉拿罪犯,维护公路、运河和粮仓,提供驿马和一连串的驿站来维持帝国的邮政。

据说,公元前 1 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 13 万名,平均每 400 或 500 个居民仅摊到 1 名。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是很小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这也很典型,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颇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过犹不及”。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3000人;在汉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已达30000人。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考试分三种级别(乡试、会试、殿试)举行;通过一种级别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一种相应的学位。这三种学位大致相当于西方大学中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参加考试,可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常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由于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儒家原则来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个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科举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当西方商人和炮船出现时中国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

虽然中国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汉时期,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历史著作是一个指望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中国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里已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但是公元前1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其内容比那时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

138



图 46 西汉侍从俑

西汉时期(公元前 2 世纪)制作的陪葬用的直立侍从俑。

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这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

这种方法有其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

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诸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的各种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天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天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此,中国史学家虽然也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 五、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就会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仍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139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割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也就形成一个恶性

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而与此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从而又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是西汉时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汉武帝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帝国的资源耗损过度。为了应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甚至在朝廷里,各种预兆也被解释成是上天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实际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 9—25 年)。王莽原是很有权势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约 30 年。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位篡位者。在这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驱使破产的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洗劫首都,并于公元 23 年在首都杀死王莽。继承王莽王位的是西汉皇帝的一位远亲。

东汉(公元 25—222 年)的历史基本上与西汉相同。在两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大规模起义爆发了,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像。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造为家堡,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地衰落,城市相应地缩小。公元 222 年,汉朝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正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相似。

## 推荐读物

最好的关于中国的通史是 E. O. Reischauer 和 J. K. Fairbank 合著的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1978 年版); C. O. Hucker 所著的 *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5 年版);以及 W. Rodzinski 所著的 *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Free 出版社,1985 年版)。如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细节,可参阅

正在出版的十卷本的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8 年版)。

关于中国的思想和宗教发展的一手资料的汇编可以参阅 W. T. de Bary 等所编的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0 年版)。描述最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的书有 H. G. Creel 所著的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John Day 出版社, 1949 年版); 以及 A. Waley 所著的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llen & Unwin 出版社, 1938 年版)。关于现代社会以前的中国的日常生活, 可以参阅 M. Loewe 所著的 *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utnam 出版社, 1968 年版) 和 J. Gernet 所著的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0 年版)。最后, 还可看 J. Spence 所著的消遣性作品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Knopf 出版社, 1974 年版), 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 1661 年以来中国皇帝的作品的译文。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罗伯特·洛佩斯

---

## 第8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居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古典文明在3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因地而异。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幸免于难;拜占廷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京人的侵略,因此,其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世界上居首位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旨在分析为什么古典文明会衰落,以及为什么西方会是一个例外——它开创了一条不同的走向世界统治地位的新路。

### 一、古典文明的衰落

142

如上所述,诸古典文明衰落的基本原因在于其生产技术相对停滞不前,而生产技术停滞不前又使生产率低下。约翰·梅纳特·凯恩斯描述了这种技术发展的停滞

状态：

史前至近代初期，技术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几乎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但是，在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sup>1</sup>

凯恩斯的看法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更早期的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容易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在此之前，马匹仅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寺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景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 1 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长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 4 世纪，罗马才建造水磨，而且即便那时，水磨也较为罕见。

意味深长的是，唯有战争能将古典文明从其生产技术的昏睡状态中唤醒。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以及所谓的“希腊火”（公元 8 世纪），即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器械的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解决诸古老文明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来增加财富。但是，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这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上所述，当时开始了恶性循环。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的衰落是两个很好的

实例；关于这两个实例，我们掌握的资料更多。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的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由此，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的周期性。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它的技术落后。他说：

143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在技术上比中世纪欧洲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休耕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只得用牛耕地拉车；水磨虽已出现，但似乎数量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支撑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没有一个中世纪王国像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sup>2</sup>



图 47 《罗马法汇编》早期手稿

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编纂的《罗马法汇编》早期手稿中的一页。这一页画的是一位蛮族国王、一位主教、一位伯爵和一位公爵。像这样一部法规汇编有助于保存罗马法中的各项原则。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是,技术却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从建造金字塔、金字形神塔、大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上可以看出,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了需要有效的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的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原因。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的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进行宗教仪式。公元 1 世纪,亚历山大时期的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制造出一种能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同样在这一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起石柱的机械,并说:“让我为普通百姓提供点食物吧!”尽管这种情感也许是值得称赞的,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却使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产业中心。

144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中国,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就是例证。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毫无高贵可言,对性格的完美是不利的。”公元 65 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垂目,毕恭毕敬”,他写道: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充足的阳光透过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下层结构及其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使池内上下水温相等。……还有速记,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绝不是一个仅仅为生产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匠。<sup>3</sup>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因此,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使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而下层工匠又缺乏动力。



图 48 一名中国贵族的长指甲

一名中国贵族的长指甲,他把指甲蓄得这样长只是为了证明他不是  
一个体力劳动者。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说明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兴亡的模式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迥然不同。W. W. 罗斯托在以下这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以工业革命开始划时代的、开拓性的“起飞”以前诸农业文明所具有的这一共同特征:

……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规定了农业文明无法突破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确缺乏系统的认识;这种认识能使发明成为多少有点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75%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纪念碑和其他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或葬礼上。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与人们易得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sup>4</sup>

## 二、蛮族的人侵

145

3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人侵的时期,这时的人侵不亚于公元前2千纪使用青铜和铁制武器的人侵。正如公元前2千纪的人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至6世纪的人侵结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见地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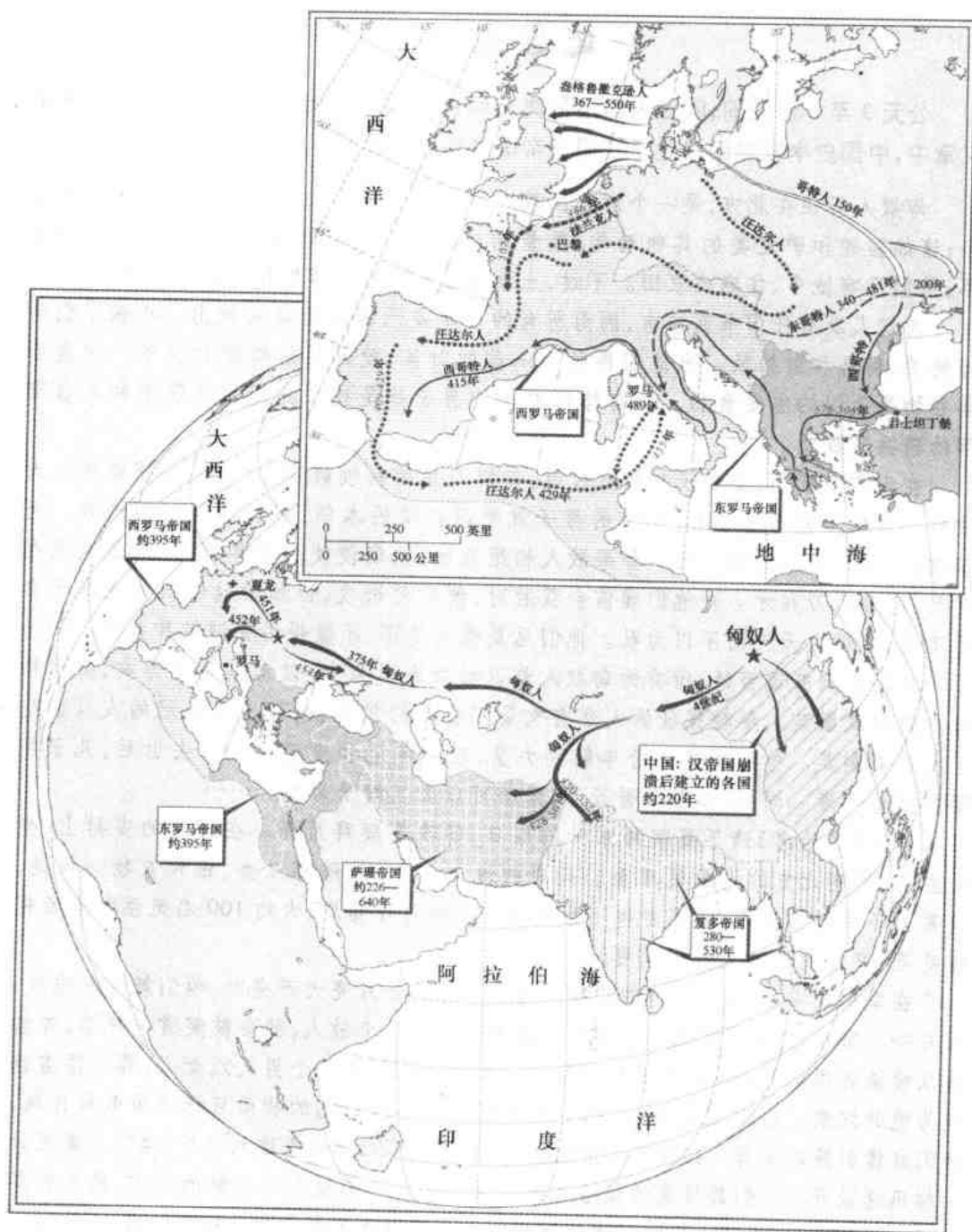
游牧民的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见第 4 章第 4 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诸文明中心和周围游牧民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增长，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因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做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诸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这种新的军事力量就会被采用。入侵还常常是一系列爆炸性反应的最终结果。攻不破中国长城，或者遇上障碍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往往使游牧民转而西进。接二连三的内侵犹如不断向西的一连串冲击波，最终使游牧民涌过奥克斯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攻击；突厥—蒙古人通常又被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除了时常遭受周围蛮族的进攻外，还遭受沿线各民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一斯拉夫人、维京人以及突厥—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和入侵者成分一样多种多样。在中国，汉帝国最终于公元 222 年屈服于突厥—蒙古入侵者。接着，出现了三个独立的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 265 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即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 年，一批新的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至南京，从那里统治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从此，中国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 589 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为止。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

我们以后将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在政治、文化和种族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能够吸收并同化游牧民而不用经历根本变革。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了躲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因而，北方的部分野蛮化因中国文化的向南扩张而被抵消，从而，为中国从北到南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纵深。这样，589 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时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地图 11 欧亚大陆的蛮族入侵(公元4—5世纪)

## 匈奴蛮人

公元 3 至 6 世纪间,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被蛮族入侵者所践踏。在以下节选的文章中,中国史学家班固描述了征服汉帝国的匈奴游牧民。\*

匈奴人居住在北方,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饲养各种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居多;诸如骆驼和驴之类的其他动物,数量相对少些。他们经常迁徙,去寻找水和牧草;他们没有城市、住宅或农田。不过,土地却在不同的部落群体之间进行划分。

匈奴人没有任何书面语言,因而所有的协定或承诺均由口头做出。小孩子们学习骑羊、射鸟和射松鼠。当他们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射狐狸和兔子。肉类而非谷物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所有体格健全的男子都是技术高超的弓箭手和各自部落的骑兵队成员。

在正常情况下,当日子相对好过时,匈奴人靠照料牧群谋生,并通过捕猎来扩大牧群。当生活较为艰难时,所有的男子就学习打仗的本领,积极准备发动进攻。可以说,这就是匈奴人的天性。如果敌人相距较远,他们便使用弓和箭,如果敌人近在咫尺,则改用刀和矛。当他们确信会获胜时,便发动进攻,但如果他们认为战况于自己不利,便逃之夭夭而不以为耻。他们总是唯利是图,不懂得讲究诚信和礼仪。……

从国王到普通百姓,所有的匈奴人都以动物肉类为食,以动物毛皮为衣,将动物毛皮改制成服装。年轻强壮的人享有吃最好食物的优先权,而上了年纪的人只能吃一些残羹剩菜。他们高度评价年轻和力量,轻视年老和虚弱。父亲去世后,儿子将娶其继母为妻。同样,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娶其嫂子为妻。……

可汗(统治者)清早要朝拜东升的旭日,傍晚要膜拜月亮。在座位的安排上,坐在左边、面朝北方的人最受尊重。死者被埋入棺中,并陪葬以金、银和衣物。但是,坟墓上不用树作标志,送葬者也不穿丧服。一旦可汗驾崩,大约 100 名宠臣和爱妾将被处死,好让他们的灵魂伴随可汗。

在军事战斗中,匈奴人仔细观察月亮的大小。当月亮大而亮时,他们就发起进攻,当月亮小而暗时,他们就撤退。如果匈奴士兵杀死一个敌人,就会被奖赏一杯酒,外加他从被杀者那里获得的任何有形的财产。如果他俘获了一个男人或女人,那么俘虏就成为他的奴隶。因此,在战场上,所有的匈奴士兵都为自己的物质目标而勇敢地作战,他们就像饥饿的兀鹫一样向自己的物质目标汇聚。不过,如果遭到挫折,他们又像流云一样迅速散开。他们最得意的战略是先把敌人诱入一个预先安排好的地方,然后将其包围。战斗之后,将死亡战友尸体带回家的战士将继承死者所有的物质财富。

\* From Dun J. Li,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 Van Nostrand, 1967), pp. 211—213.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不过,5世纪时,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世纪的情况,现在了解得很少,只知道阶段性的入侵仍在继续。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群体。其中最突出的是拉其普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其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其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其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印度尽管经受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她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三、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不过,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轻微的变动。这一地区的人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沟通。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像反对他们共同的仇敌一样,相互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事实上,偷牛是引起他们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雏形。

在日耳曼部落,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来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149 塔西佗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

日耳曼部落中的妇女们比起罗马帝国中的妇女们,其处境要好得多。塔西佗提到,日耳曼妇女继承并控制财产,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都享有和丈夫不相上下的地位。“据传说,妇女们使已经动摇和屈服的[日耳曼]军队重整旗鼓。”



图 49 赤陶塑像

匈奴时期中亚的赤陶塑像:骑马人。这尊塑像系巴黎的私人藏品,表现的可能就是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本人。

塔西佗还提到,日耳曼妇女积极参与部落事务。“人们甚至还相信女性具有某种预知未来的神力,从不会轻视她们的意见,也不会认为她们的答复不很重要。”<sup>5</sup>因此,日耳曼部落中妇女的境况比同时代罗马妇女和后来中世纪妇女的境况要好,因为罗马妇女被限制在家庭中,而中世纪妇女则须按照基督教教义,做到虔诚和顺从。

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调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同时出于无奈,还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是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的。他们可怕的外貌以及精心设计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sup>6</sup>

很明显,是其他游牧民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内,寻求避难。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并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在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但不久之后,洗劫罗马城的事件又再度发生。

最后,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内部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方幸免于难。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是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不过,匈奴人的大肆破坏,粉碎了罗马帝国对西部诸省的控制,实际上,这时日耳曼部落可以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内。汪达尔人渡过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

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455年,一支汪达尔人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纳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占据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王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斯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中国汉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6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图 50 拜占廷的希腊火

拜占廷人之所以能在公元 717—718 年间击退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其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拥有一件秘密武器——希腊火。希腊火是由石油、硫黄和沥青混合而成的一种极易燃烧的物质,即使落在水面上也能燃烧。在这幅 14 世纪的图上,画着拜占廷的海军正在用铜管向敌舰喷洒希腊火。

151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5 世纪时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 年在位),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统一到一起,形成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在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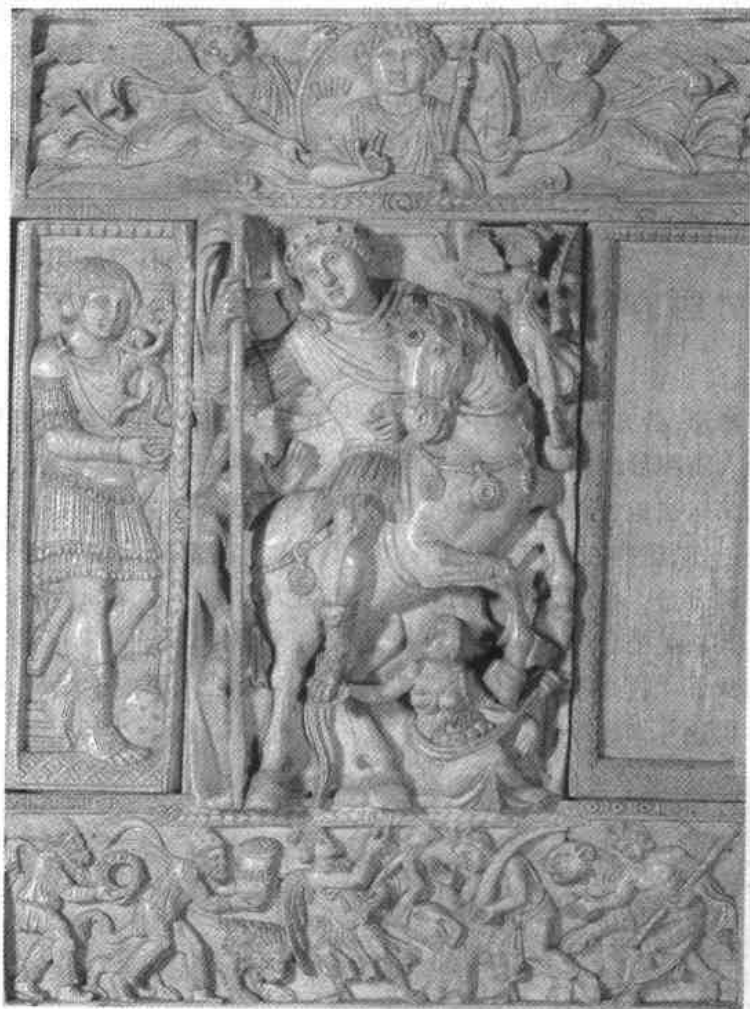


图 51 查士丁尼一世的雕像

一块公元6世纪的象牙雕版,其画面将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描绘成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从公元500年至1100年,拜占廷帝国一直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中心。

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险要位置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虽然蛮族的侵略摧毁了罗马城,但君士坦丁堡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1000年。在那些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了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称为拜占廷帝国,如此命名是因为,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52

在西部诸省成为一些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限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在位)所不能接受的。查士丁尼血统上虽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

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的一个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授予我们。”

#### 四、蛮族对西方的不断入侵

但是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蒙古内部的动乱又一次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着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就像他们的匈奴祖先一样,这些在西方开始被称为阿瓦尔人的蛮族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他们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赶到了意大利(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占据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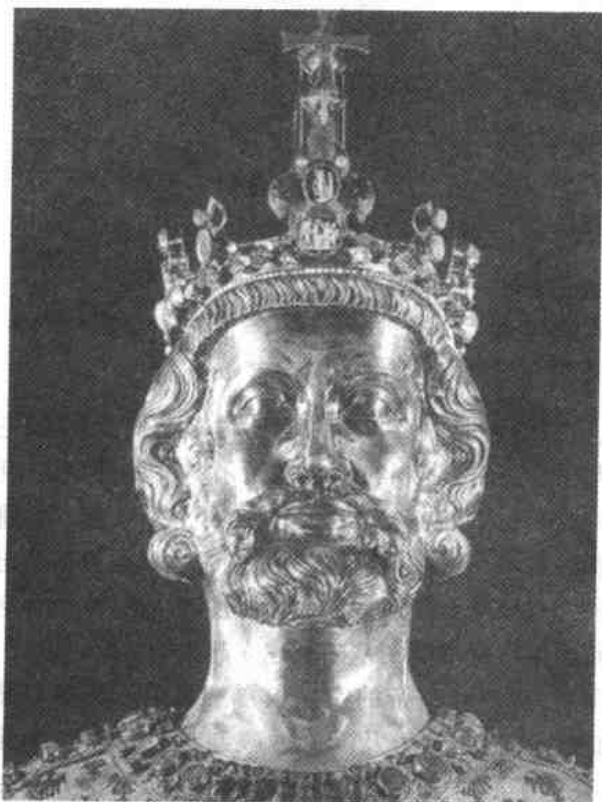


图 52 查理曼大帝

查理曼:法兰克国王(768—814年),查理帝国皇帝(800—814年)。

8世纪时,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不过,占据了“拥有实权的下级”职位、意志坚强的宫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外号“铁锤”的查理·马特最为杰出,他从714年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732年)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且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

马特的儿子即矮子丕平不甘心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768年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东欧的斯拉夫地区,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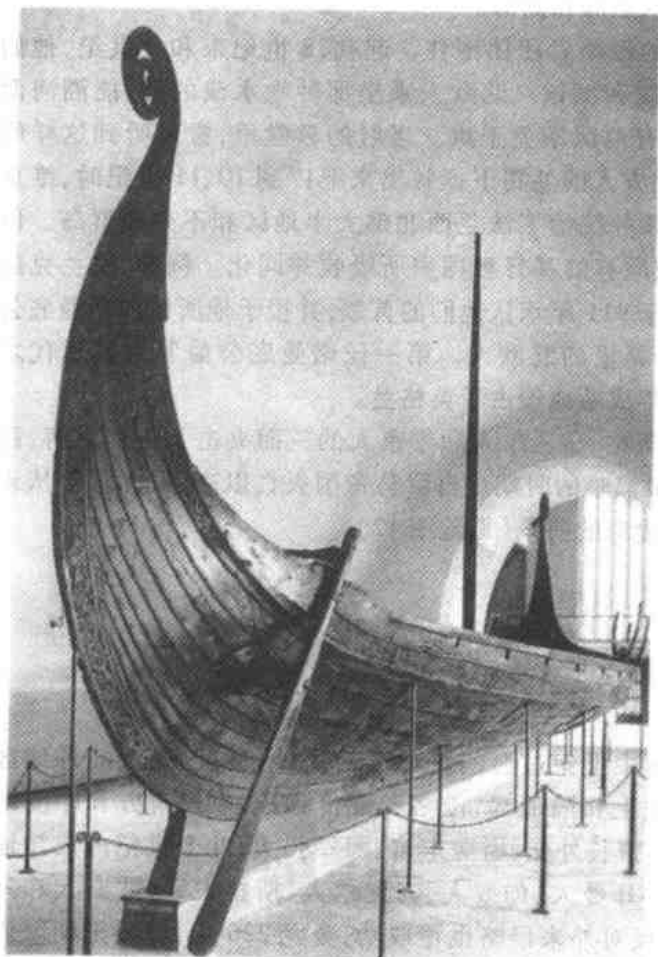


图 53 北欧海盗船

出土于1904年的北欧海盗船“奥斯特伯格号”,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维京人的船只。现陈列在挪威奥斯陆的维京人船舶博物馆中。

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秘书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札尔人，于 895 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

北欧人即维京人的侵略范围最广。相对于陆上的游牧民来说，他们就是海上的游牧民。维京人制造了一种船来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京人正是乘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陵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两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京人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顺流而下，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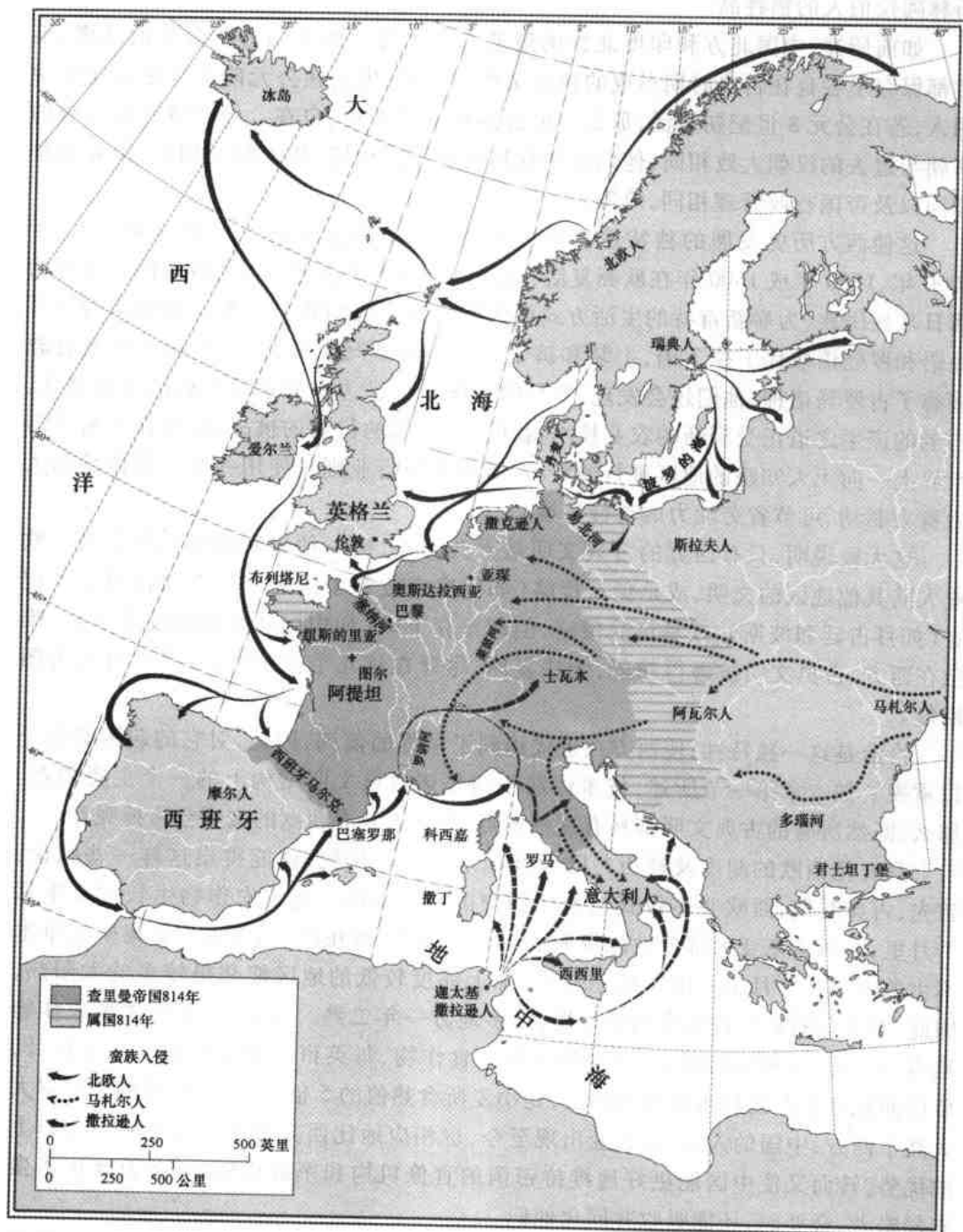
这样，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起初，8 世纪末和 9 世纪，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北欧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幸免于难。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 10、11 世纪时，维京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是，无论他们定居何处，最终都被原有的基督教国家所吸收并同化。例如，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京人的劫掠，于 911 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 1066 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155 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京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 世纪为最黑暗的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如此凄凉的前景（见地图 12）。

## 五、西方的巨大例外

纵观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侵略活动，很明显，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迥然不同。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扰。拜占廷帝国因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公元 226 年，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人王朝。萨萨尼亚人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





地图12 蛮族对西方的不断入侵(9—10世纪)

织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因而，波斯能击退奥克斯河沿岸游牧民的进攻浪潮；但同拜占廷的战争，弄得双方两败俱伤，皆轻易成为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牺牲品。

如前所述，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并不太好。两者均遭到蛮族的蹂躏，不过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时期形成的独特文明。因此，生活在公元前 1 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 8 世纪初复活，那么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们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们会注意到两朝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这使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人，于 1000 年、1500 年或 1800 年在欧洲复活，他们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为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们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他们还会发现，罗马的帝国结构已为一群新的民族国家所替代，古老的谋生之道正受到新的农业技术、新的贸易、新的行业的挑战；这种新贸易是与世界上一向无人知晓的地区进行的贸易，而种种新行业则是使用一些无需传统的人力畜力驱动、可节省劳动力的奇特机器。

这无疑说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接替。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

恰恰是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对它的起因必须予以重视。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诸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只有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

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像其他地区如中国那么富饶。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 5 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中国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吸收并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

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实际上在所有游牧民族的进攻中都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的近邻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因此,西欧出现了独特的结局——罗马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规模的毁灭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sup>7</sup>

但是,这里所说的“文化”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设法从这些侵略中幸存下来,重新变得生气勃勃。但是,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



图 54 罗马晚期的艺术

这块罗马帝国晚期的象牙雕版描绘了耶稣受难的场景。帝国晚期的艺术正处于从此前的古典艺术到此后的中世纪艺术的过渡阶段。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中,许多主要发明都由此传播出去。但是,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

157 造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原因就在于中东的古代文明经历公元前2千纪的侵略后幸存下来,而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所有地区的古典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一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从而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 推荐读物

以下作品中论及帝国的兴衰问题:S. W. Eisentadt 主编的 *The Decline of Empires*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67 年版);和 C. M. Cipolla 主编的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Methuen 出版社,1979 年版)。P. Brown 所著的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Harcourt 出版社,1971 年版), S. Magzarino 所著的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1966 年版)和 F. W. Walbank 所著的 *The Awfu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出版社,1969 年版)阐述了对于罗马衰落的不同观点。

以下书中讨论了罗马帝国的入侵者:R. MacMullen 所著的 *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7 年版); E. A. Thompson 所著的 *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 (Clarendon 出版社,1948 年版); O. J. Maenchen-Helfen 所著的 *The World of the Hu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73 年版); T. S. Burns 所著的 *A History of the Ostrogoths* (Indiana University 出版社,1984 年版); G. Jones 所著的 *A History of the Vikings*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8 年版)。以下书中分析了入侵之后的发展:J. D. Randers-Pherson 所著的 *Barbarians and Romans: The Birth and Struggle of Europe, A. D. 400—700* (University of Oklahoma 出版社,1983 年版); W. C. Bark 所著的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58 年版)强调了西方中世纪初期的创造性;R. S. Hoyt 主编的 *Life and Thought in Early Middle Ag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出版社,1967 年版)将这一时期诠释为过渡和转变的时期。近期, M. Grant 在 *Dawn of the Middle Ages* (McGraw-Hill 出版社,1981 年版)一书中又提出了此论点。

### 注释

1. J. M.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Harcourt, 1932), pp. 360—361.
2. A. H. M. Jon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History*, XL (October 1955), p. 220.
3. Cited by F. Klemm, *A History of Western Technology* (Allen & Unwin, 1959), p. 23.

4. W. W.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2nd ed. (Norton, 1962), pp. 311--312.
5. Cited by 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 (Glenhurst, 1983), p. 11.
6. Cited by M. Hadas, *A History of Rome* (Doubleday, 1956), pp. 204--205.
7. R.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M. Evans, 1967), p. 58.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 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

每个文明中都不乏厚古薄今的诗人和思想家。他们认为史前时期的人是未沾染上文明的不良影响的“高尚的野蛮人”。很久很久以前,“在天地之初”,在令人惊叹的人类生存的初期,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就有一些段落赞美了不存在种姓制度、人类可以自在和安心地生活的田园诗般的过去。同样,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叙述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描绘了人类不断衰落的命运,从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一直追踪到作者所处的悲惨的现时代。

人类最初生活在乐园中这一观念是有某种史实根据的。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言,文明到来以前的诸部落民族在获得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方面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等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特征。但是,当诸部落民族成为农民之后,他们就不再享有自由获得土地的权利,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他们的特定义务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但无论在哪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按国家、教会、地主和高利贷者的要求支付完租税之后,农民剩下的劳动成果只有一半或更少,仅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历史学家们估计,在全球诸文明中,上层统治阶级仅占总人口的1%—2%。不过,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侵占了整个国民收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何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每年都会爆发农民起义,为何沙皇俄国会在1801至1861年间遭到1467次起义的破坏、使农奴最终获得解放。

159

文明的到来不仅使经济关系,也使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早先新石器时代的村民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仅受到少量制约。但是,文明到来之后,部落首领和长者被国王或皇帝和包括宫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员、法官、书记员和会计在内的一个始终存在的官僚机构所取代。同这一帝国行政机构关系密切的是同样作为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教会统治集团。祭司即“专职专家”代替了早先是“业余专家”的萨满教僧,从而使官方神学和祭司统治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这种神学和祭司集团都起了支持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作用,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政治领袖以神的约束力和神的属性。例如,埃及的法老就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且是“活着的神”。这种神权

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为现状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因为很少有人既敢冒今生当即受罚的危险，又敢冒来世永久受罚的危险。

这种由文明引起的文化变化是根本的、持久的。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是自主的、单一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共同的知识、习俗和见解，而且其生活方式的维持也不取决于外界。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一个更为复杂的新社会出现了。除了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通晓神秘书写艺术的书吏的文化，知晓上天秘密的祭司的文化，擅长绘画和雕刻的艺术家的文化和懂得如何与沙漠和大海以外地区交换商品的商人的文化。因此，不再存在单一的文化，而是发展起所谓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高雅文化可以在城市的学校、寺庙和宫殿中找到；低俗文化则可以在乡村中找到。高雅文化通过哲学家、神学家和文人学士以书面形式流传；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口口相传。

各种文明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基本方面却都相似。它们都以诸如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和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之类的“圣书”为基础。由于这些经文是知识的基础，它们对教育起了决定性影响。任何想要获得成功的人都必须记住大部分经文。这些圣书还被用来加强人们的忠诚与服从意识。若拒绝接受官方学说或者向社会秩序挑战，就会被认为是不赦之罪，今生来世均将受到惩罚。在所有高雅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的“地狱”，对那些敢于反对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来说，是永久的集中营。

160 所有文明的低俗文化也都基本相同。各地农民都拥有相当多的关于饲养牲畜和栽培植物的实践知识。他们都把勤劳看做美德，瞧不起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所有的农民都想拥有一块土地、几头牲畜和基本的种田及做工的工具。这些东西意味着独立和安全，因此，为了得到它们，所有的农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顽强地抵制外来干涉，不论这种干涉是来自地主，还是来自今日由政府管理的集体。不过，乡村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却抵消了农民的这种“讨厌的个人主义”。好的邻居除了乐于帮助邻居盖房，参加乔迁宴、收获节和其他社区活动外，还总是乐于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帮助和同情。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很紧张。一方面，农民们有优越感，认为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与城市生活和各种职业截然不同，在道德上是“善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隶属于城市。地主、税吏、教会行政管理人员和士兵通通都来自城市。他们的傲慢和专横十分清楚地表明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虽然显贵们实际上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富裕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自身精神品质和道德品质较好的缘故。几千年中，农民们不可避免地把显贵们对他们的这些看法深藏在心底，变得卑躬屈膝和顺从起来。

显然，文明的到来对人类的平等来说是一种倒退。不过，文明也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成就。按历史观点看，尽管出现了所有这些不公平和剥削，但历史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方面，情况颇类似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最初导致了令人痛苦



的社会分裂和人类苦难,但最终却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福利。文明的到来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中普通部落成员所过的生活,很可能比文明社会中普通农民或城市工人所过的生活更完美、更自在。但是,恰恰因为部落文化是轻松闲适、毫无紧迫感的,所以比较而言,也是无成效的。虽然税吏、祭司和地主的要求很苛刻,但他们也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各大河流域农村人口的剧增便是生产率得到提高的确凿证据。生活标准也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提高。君主和高级官员,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无疑都享有部落首领们永远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食物和饮料,以及华丽的服装和豪华的宅第。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员和教士——也能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差不多的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普通民众的境况——如果不从心理社会学的角度而单从物质方面来看——也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

由于有了书写这门新艺术,文明使知识的不断累积和代代相传成为可能。各门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在内,都能扎下根并繁荣起来。富裕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也为建筑师、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提供了机会。诸如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印度的泰姬陵和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之类的杰作,便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创造力带来的结果。

这些宝贵的进展使少数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多数人。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是多数人。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重要的是人类的确取得了进步。而且,正是数千年间积累起来的这些进步,最终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战胜自然,获得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和少数人一起受益。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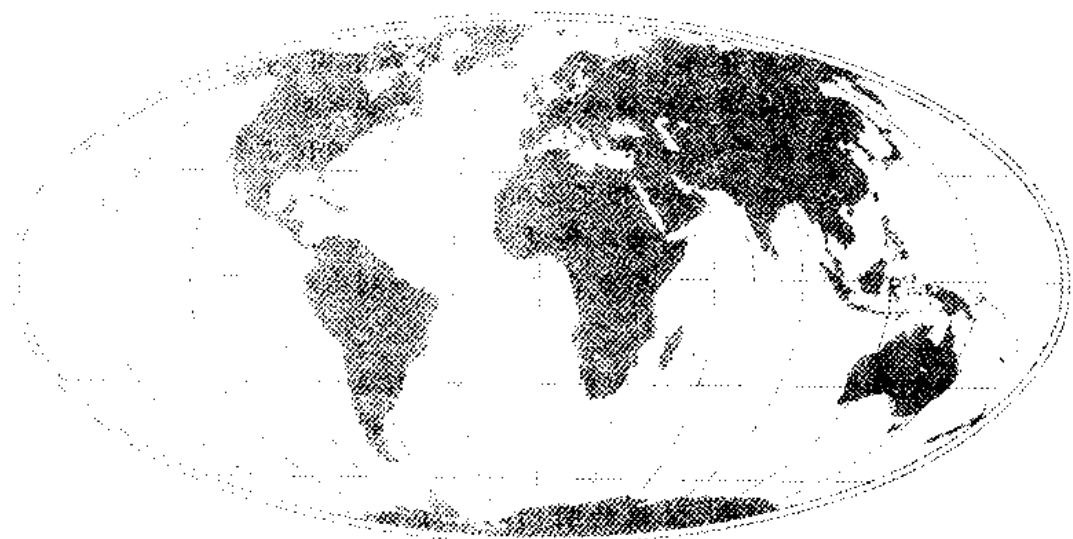
的确,现在仍有千百万人未受教育、患有疾病和受饥饿煎熬。但是,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14世纪中叶;那时,占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被黑死病夺去生命。这种情况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在1846年,有100万爱尔兰人因马铃薯患枯萎病而饿死,在1876年,有500万印度人因粮食歉收而饿死。这些瘟疫和饥荒的牺牲者不可能获救,因为那些时代中的人们缺乏必需的知识。

今天,我们已拥有必需的知识,因此,我们有摆脱数千年来灾祸的潜力。可悲的是,这种潜力还没发挥出来,但事实依然是,它的确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过去人类的不同文明使种种进步成为可能。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呢?——在过去,文明既是诅咒又是福音。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人类是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用于破坏还是用于建设。

## 推荐阅读物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写了关于文明的相对价值的一些发人深省的书:Chang Kwang-Chih 所著的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2年版);V. Gordon Childe 所著的 *Man Makes Himself* (Mentor 出版社,1951年版);R. Redfield 所著的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to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 1956 年版); L. A. White 所著的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 (McGraw-Hill 出版社, 1959 年版) 以及 W. Goldschmidt 所著的 *Man's Way* (Holt 出版社, 1959 年版)。另外, 著名哲学家 K. Jaspers 在其著作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3 年版) 和 *Man in the Modern Age* (Doubleday Anchor 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表述的观点也值得关注。还有一些观点见于 W. W. Wagar 所著的 *Building the City of Man* (Grossman 出版社, 1971 年版), 以及 H. Baudet 所著的 *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5 年版)。



##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  
公元 500—1500 年

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也是以各种侵略拉开序幕的:古典时期开始时有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中世纪肇始时有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不过,与古典时期不同,中古时期的各个世纪都是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宣告结束;这些侵略实际上影响了欧亚所有地区。从7世纪开始,伊斯兰教武士靠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他们占领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半陆地。

这些大规模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却不像较早时候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在不规则地伸展的穆斯林世界里,土生土长的希腊—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灭绝,反而融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164 如前章所述,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只有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截然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能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产生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是,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动,标志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项目的双向交流;其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加整体化的王国之中。

——小林恩·怀特

## 第9章 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

正如一个正在形成的欧亚大陆整体化把古典时期与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一个成熟的欧亚大陆统一体又把中世纪与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欧亚大陆早期阶段的统一(见第4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使欧亚大陆完全的统一成为可能。但是,这些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仅像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像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好几个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腹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其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诸帝国疆土如此空前辽阔,消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孤立。这时,欧亚各地区之

间已有可能发生直接的联系并相互影响。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结、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 一、商业联结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存在，促进了贸易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 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度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耗时一年半。

671 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像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 758 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 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继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 878 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北宋（960—1127 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 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 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 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 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明朝(1368—1644年)期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例如,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劫,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的航程更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还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见地图13。)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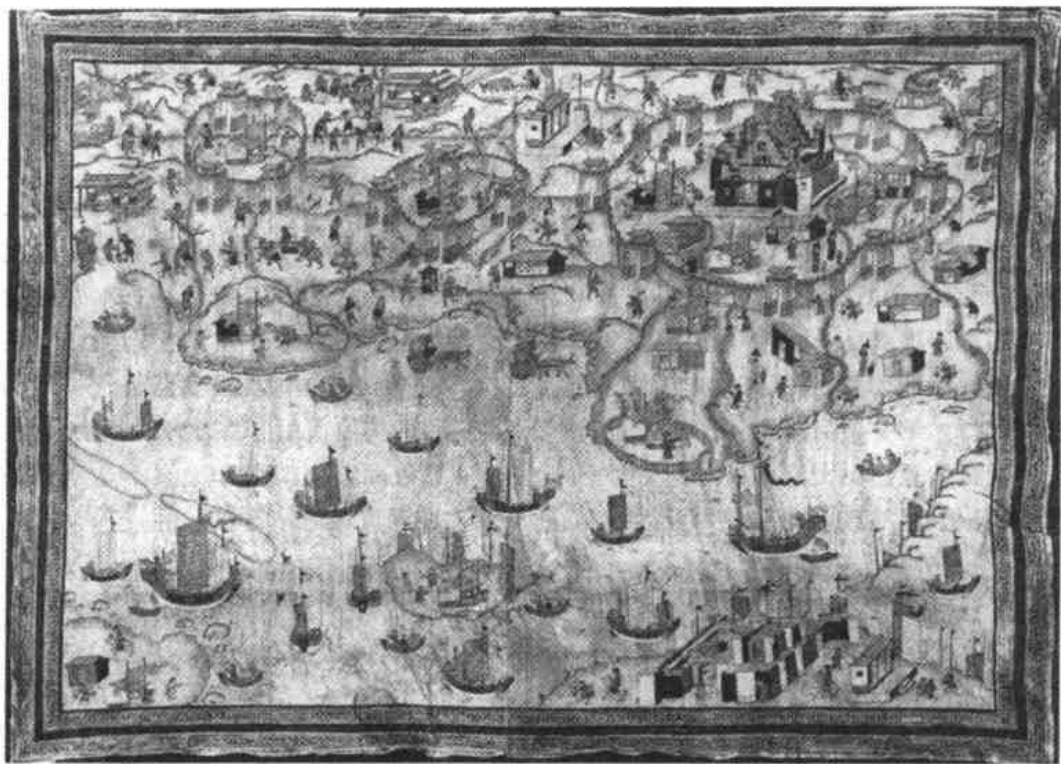


图55 宋朝的沿海港口

17世纪制作的皮制壁画,描绘了宋朝时期沿海港口的兴盛景象。

1433年,皇帝突然下诏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辈。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

169

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像中国人一样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因此，1498 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就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14 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治下和平时期商业的重大意义：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从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路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有 60 个人同行，那也会感到如同待在家里一样安全。<sup>1</sup>

1264 年，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自动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沿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来到忽必烈新朝廷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通过两条路线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运到这些港口。第一条商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商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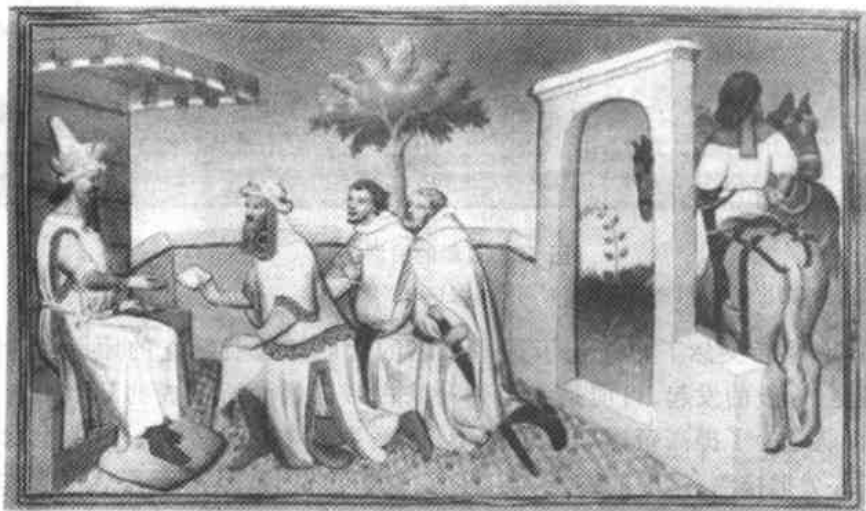


图 56 马可·波罗觐见忽必烈

马可·波罗在宫廷中觐见忽必烈汗。





不过,热那亚人不愿意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溯顿河而上,随后可能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能到达波斯湾,直接去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非常便宜,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经纪人在东南亚生产者 and 欧洲消费者之间牵线搭桥,从中牟取了巨额利润。

170

在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陆上贸易的恢复证明是短暂的。一个原因是,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全面崩溃,从而使中亚再度分裂,导致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中断。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改宗伊斯兰教,自然切断了欧洲人去香料群岛的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的航线,用船运输,这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是,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已知道香料的产地及价格;因此,他们开始寻找避开穆斯林这一障碍的新道路,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 二、技术联结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加速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一直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这种帆船在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阿拉伯帆船操纵起来更加灵活,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由于这个原因,它不久便在地中海东部诸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11世纪时,它已成为整个地中海通常的运输工具。尽管这种三角形帆船是由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在今天它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sup>2</sup>

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 868 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1041 至 1049 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经中东传入欧洲。1423 年，欧洲人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 年，欧洲人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618—906 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 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器，即“突火枪”，它由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 1280 年，不过现在没人知道它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 240 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力，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巫术方面。不过，到 1125 年，指南针开始被用于航海，显然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171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105 年，中国人发明了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 年，被带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1150 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造纸术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 300 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戴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 1180 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戴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肩上，使马能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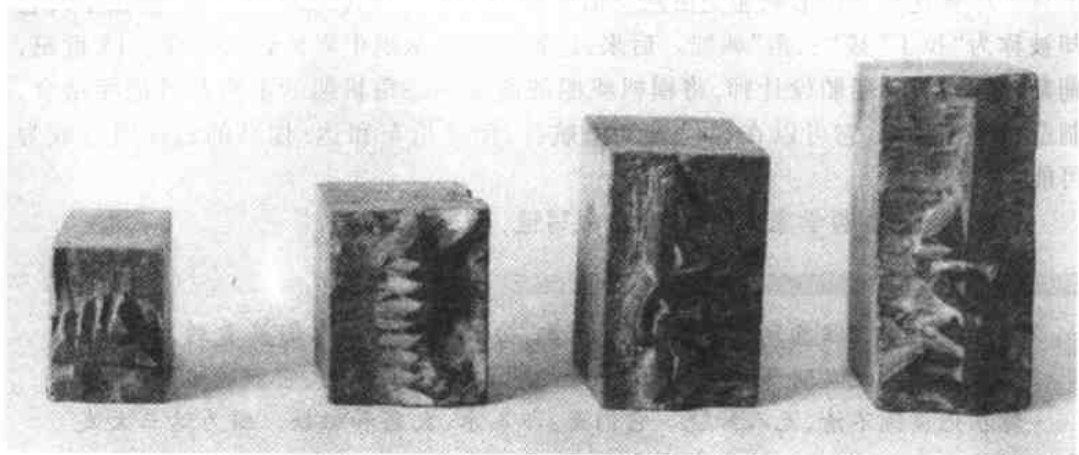


图 57 中国的活字

木制的中国活字：四个活字印模上刻有表示言语和音节的汉字。

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还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柑橘等;柑橘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 三、宗教联结

中世纪不仅以横贯欧亚大陆的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还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们于古典时期末开始传播,中世纪时期继续流传(见第四章第三节)。但是,中世纪诸世纪中,最重要的宗教变革是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这将于下章叙述)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以后叙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32年到750年,伊斯兰教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巨大扩张,自然使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一点,也是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们的反应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骑兵所予以的屠杀使他们丧魂落魄。但是,正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况并非一片漆黑,因为蒙古人也征服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因此,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们希望自己能使异教的蒙古人也像以前异教的马札尔人和维京人那样皈依基督教。

172

教皇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传教士们试图说服可汗信仰基督教,参加教皇对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但是,由于传统的巫师或萨满教僧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传教团没能使可汗皈依基督教。不过,他们成功地收集到了关于蒙古习俗和军事策略的第一手可靠情报。他们还了解到,从哈拉和林往东走20天,就会到达中国的神秘领土。欧洲人知道中国不仅很富裕,而且不信奉伊斯兰教,因而有可能成为反对穆斯林的同盟国。



图 58 阿拉伯人的手稿

15 世纪阿拉伯人的手稿, 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 画的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女儿法蒂玛。

由于中国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1264 年忽必烈从哈拉和林迁都大都, 即今天的北京。最早来到首都的欧洲人是前面提到的两位威尼斯商人: 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 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 忽必烈请求, 为他的朝廷派 100 名传教士, 向他的人民传教, 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如果说忽必烈提出这一要求是由于他对基督教的热情, 那是颇可怀疑的。更有可能的是, 他要为自己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才, 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 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实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 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

#### 四、扩展中的视野

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 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蒙古帝国的存在, 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 正如后来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使人们

的视野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表明,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比得上欧洲,而且还超过欧洲。这也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因为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即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173

## 马可·波罗的新世界

中世纪欧亚大陆的统一,主要是靠商人,他们在从地中海到中国 and 东南亚的这一路线上来回旅行。以下摘自马可·波罗游记的若干片段,明确描述了中世纪人们视野的开阔程度。\*

至于这一城市(大都,即现代北京)的规模,人们一定知道,它方圆 24 英里,每一面长 6 英里。……共有 12 扇城门,每扇城门上都有一个漂亮的大城楼。……街道笔直宽阔,你们可以沿着街道从一端看到另一端,也可以从一扇城门看到另一扇城门。整个城市,到处都有美丽的宫殿,还有许多极好的大旅店和大量精美的房屋。……

先让我们谈谈载着商人们往返于印度诸小岛之间的[中国]船只。你们一定知道,这些船用杉木制成,只有一个甲板,但却有 50 或 60 个船舱,商人们每人一间,悠闲舒适地呆在里面。每艘船只有一个舵,但有四根桅杆,有时船上还有两根额外的桅杆,人们可以很随意地将它们竖起或放倒。……每艘大船至少需要 200 个海员[有的船需要 300 个]。这些船的确规模巨大,因为每艘能装载 5 000 到 6 000 筐胡椒。

日本是东部公海上一个很大的岛屿,距大陆 1 500 英里。岛上的居民皮肤白皙,文明开化,外貌好看。他们崇拜偶像,不依赖于任何人。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拥有无数的金子。

如果从印度尼西亚出发,沿南部到东南部之间的航线航行 1 500 英里,你们就会到达一个叫爪哇的大岛。岛上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海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方圆 3 000 多英里。它隶属于一个伟大的国王,不向世界上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纳贡。岛上居民都崇拜偶像。这个岛极其富庶,盛产黑胡椒、肉豆蔻、松香、姜、荳蔻、丁香和其他各种香料。……

当你们离开锡兰岛,向西航行大约 60 英里时,你们就会到达玛巴省,它被称为印度之都,位于大陆,是印度最富庶的地区。……居民都崇拜偶像,很多人崇拜牛[神牛],因为牛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生物。他们从不吃牛肉做成的任何东西,也决不会屠宰牛。

\* H. Yule 编译,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Scribner's, 1903), vol. 1, pp. 423—426; vol. 2, pp. 249—250, 253—254.

176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殖民;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应聘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1278年,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班·巴尔·索马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对其反对伊斯兰教的援助。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中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旅行家是伊斯兰教徒伊本·拔图塔(1304—1378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朝圣,然后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又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被派往中国。回到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北上到达西班牙,随后又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到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已至少旅行了75 000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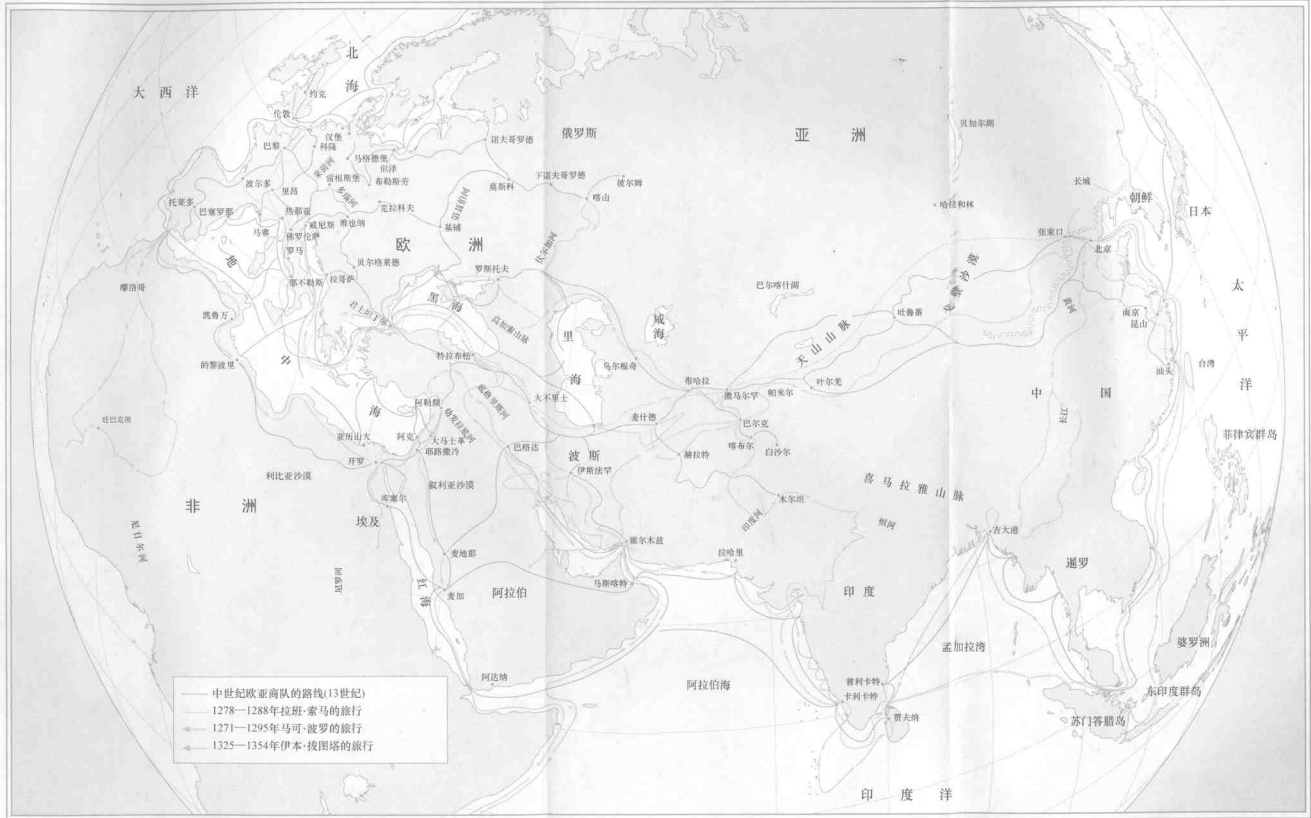
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旅行家是著名的马可·波罗。当他父亲和叔叔第二次旅行去中国时,他也一同前往,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忽必烈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经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他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像别的石头一样,从山里挖掘出来,但却可以像木头一样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他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穿戴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一些大道,它们修得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在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神话式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就和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帝国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 推荐读物

论及欧亚大陆内各种相互影响的最重要的著作有 J. Needham 所著的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54 年版) 的第一卷; J. H. Bentley



— 中世纪欧洲商队的路线(13世纪)  
 - - - 1278—1288年拉班·索马的旅行  
 ···· 1271—1295年马可·波罗的旅行  
 ← 1325—1354年伊本·拔图塔旅行

地图 14 中期欧亚大陆整体化(约13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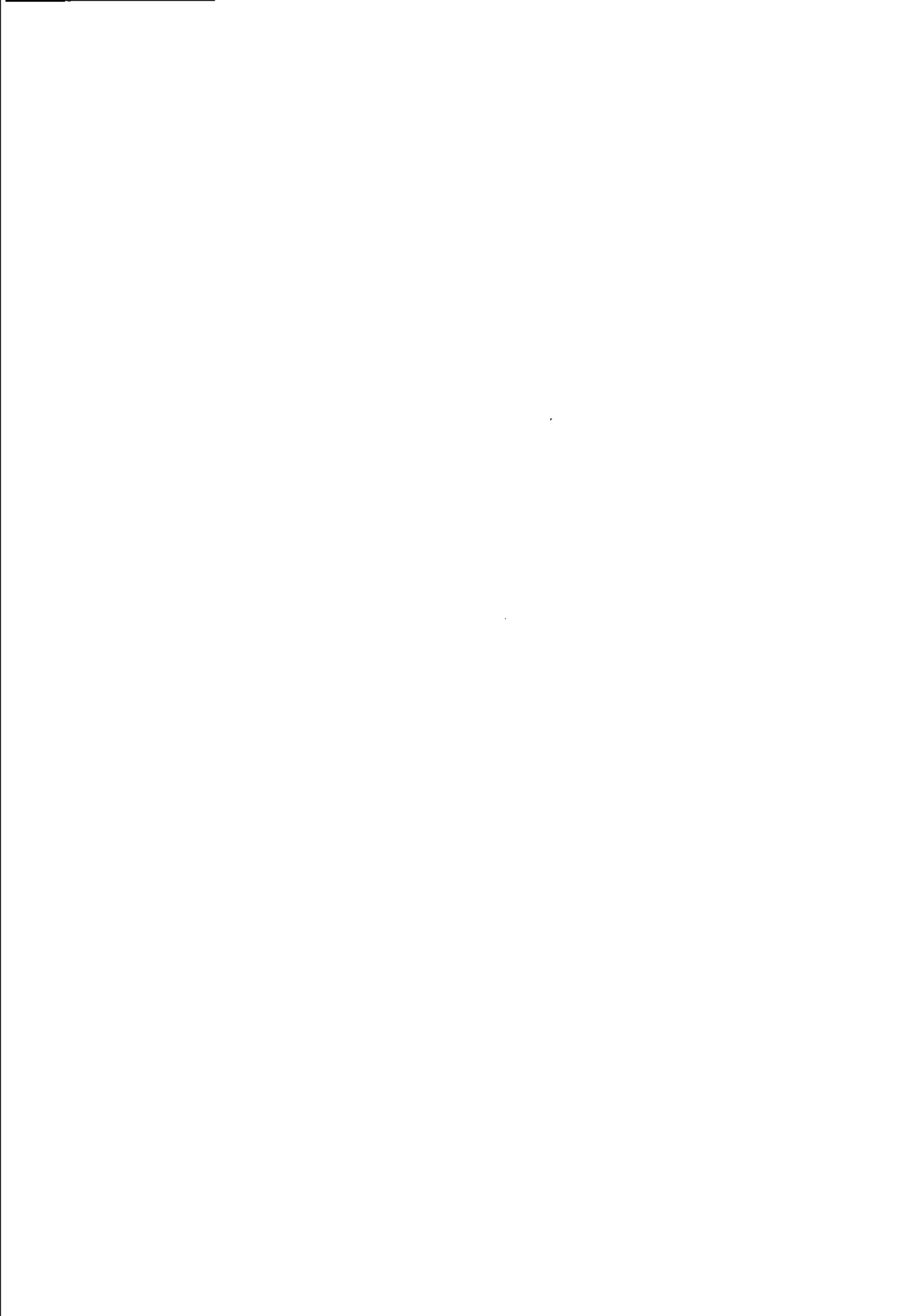


所著的 *Old World Encounters*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93 年版); J. L. Abu-Lughod 所著的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9 年版)。以下著作描述了海上贸易: G. F. Hourani 所著的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1 年版); P. D. Curtin 所著的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4 年版); K. N. Chaudhuri 所著的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5 年版)。Needham 著作的第四卷第三编阐述了中国人的航海事业, 包括明代的航海活动。以下著作对陆上贸易进行了分析: G. F. Hudson 所著的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Beacon 出版社, 1961 年版); P. Yung 所著的 *The Silk Road: Islam's Overland Route to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6 年版)。C. G. F. Simkin 所著的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9 年版) 对欧亚贸易进行了概括的分析。关于技术交流的基本著作是刚刚列举的 Needham 的多卷本研究成果。

以下著作论及马可·波罗和其他旅行家的经历: R. E. Latham 翻译的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Penguin 出版社, 1958 年版); L. Olschki 所著的 *Marco Polo's Precursors* (Johns Hopkins 出版社, 1943 年版); I. de Rachewiltz 所著的 *Papal Envoys to the Great Khans*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1 年版); R. Dunn 所著的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l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 1986 年版) 一书提供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迷人的全景。

## 注释

1. H.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I (London, 1914), pp. 152, 154.
2.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Book 1, aphorism, p. 129.



论海旁旷野的默示：有仇敌从旷野，从  
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

——《圣经·以赛亚书》

我这样启示你一本阿拉伯文的《古兰  
经》，以便你警告首邑麦加及其四周的居  
民，以便你预告毫无疑义的集合日[最后审  
判日]。一部分人将在乐园中，一部分人将  
在烈火中。

——《古兰经》第四十二章

---

## 第 10 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600 年至 1000 年间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欧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穆斯林武士的惊人征服，和大约 1000 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一样，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7、8 世纪，伊斯兰教的征服使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印度，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都统一到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

比这些军事扩张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伊斯兰教文化上的成就。尽管被征服地区曾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但到 11 世纪时，阿拉伯人已对这些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阿拉伯语成为从波斯到大西洋范围内的日常用语。因此，新出现的伊斯兰教文明是前犹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的综合体。这一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伊拉克人和摩洛哥人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在语言和文化上至今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 一、穆罕默德

178

穆罕默德，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于 569 年。6 岁时母亲去世，先由祖

母,后由伯父抚养长大。有关他青少年时期的情况知道的很少。传说他 12 岁时曾随伯父跟商队去过叙利亚,在这次旅行中,可能获得一些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识。穆罕默德 25 岁时同一位富孀结婚,她为他生了几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儿子都早年夭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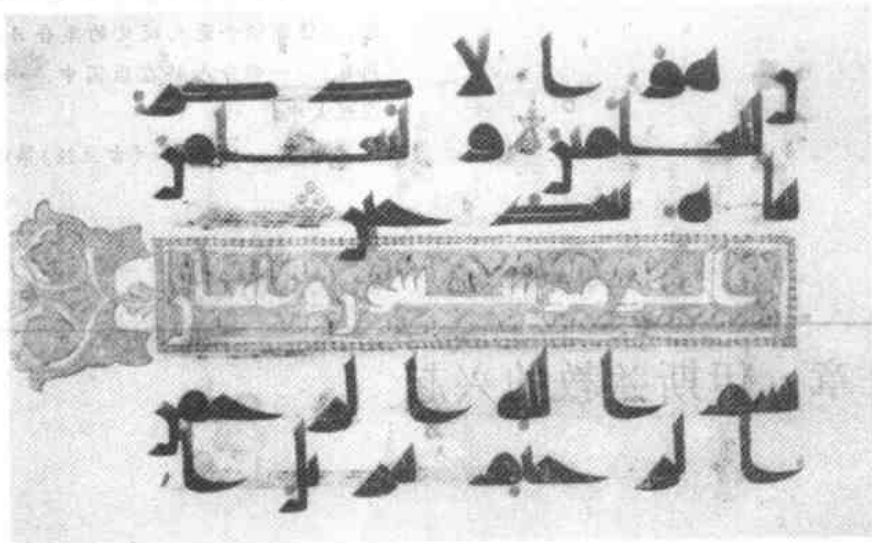


图 59 阿拉伯文字

公元 8 或 9 世纪用库法字体书写的《古兰经》的一页(23.8 厘米×35.5 厘米)。由于穆斯林讨厌图像,书法很早就成为伊斯兰教艺术的一种主要形式。阿拉伯字母表主要是为了使《古兰经》文本尽可能精确才发展起来的,于是,书法艺术也随之发展起来。这种横向拉长的库法字体作为《古兰经》最早的、居支配地位的书法,持续了 3 个世纪。

穆罕默德 40 来岁时,经历了一段精神极度紧张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相信上帝选他为先知,选他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穆罕默德这时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安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最后审判日终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对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对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穆罕默德的教诲,在他死后不久被记录成书,成为伊斯兰教这一新教的圣典。“伊斯兰”意为“顺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没有建立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灵魂的具体圣事。但是,他的确要求信徒们履行某些仪式,即伊斯兰教的“五功”。它们是:

- (1) 念功:信徒一生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 (2) 拜功:信徒应每日礼拜5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5个时间内举行:脱掉鞋子,戴上头巾,在一张地毯上面朝麦加方向祈祷。
- (3) 课功: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虔诚的行为。
- (4) 斋功:穆斯林必须在斋月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食。
- (5) 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条件允许应朝觐麦加一次。

这些仪式为信徒们提供了一种特别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他们一起祈祷、斋戒,一起为不太幸运的兄弟们承担责任;他们——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和黑人——一起到麦加去朝觐。而且,《古兰经》还对虔诚徒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风俗和卫生、结婚和离婚、商业和政治、犯罪及惩罚、和平与战争予以指导。因此,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制度。它不仅为信徒们提供宗教戒律,而且为个人和公众生活提供明确的指导。与基督教世界不同,伊斯兰教国家中并不存在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现世与教会之间的严格区分。伊斯兰教认为,凡属于凯撒的就是属于神的,而凡属于神的也就是属于凯撒的。“沙里亚”,即圣典,直到近代仍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国法,而且仍是穆斯林国家的基本法。

179

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人们皈依这些教义。首先是他的直系亲属和私人朋友,这些人后来作为“先知的同伴”,享有崇高的威望。随着这一小股皈依者的发展,麦加的富商开始感到惊恐,害怕穆罕默德的教义将削弱过去的宗教信仰和阻止朝拜者去麦加放有“黑石”的天房中做礼拜。由于反对势力的增长,穆罕默德应邀前往麦地那,即麦加以北约300英里处的商路上的一座绿洲城市。这里杂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犹太部落的居民,因此,穆罕默德被当做仲裁者受到欢迎。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阿拉伯人称这一事件为“希吉拉”,伊斯兰教历则以这一年为纪元元年。

由于穆罕默德的教义主要基于犹太教的教义、传说和经典,他希望能作为麦地那犹太人的先知的继承者受到他们的欢迎,但麦地那犹太人嘲弄了他的要求。于是,穆罕默德转而反对他们,最终将他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他的信徒。穆罕默德逐渐说服了麦地那的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并以他的教义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神权政治国家。

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组织了对麦加商队的一次次袭击。这种袭击是阿拉伯游牧民普遍接受的一种经济活动。如今,他们聚集在“先知”的旗帜下,希望获得战利品,并顺便得到灵魂的拯救。到630年时,穆斯林已十分强大,完全有能力占领麦加,因而,穆罕默德将收藏在麦加天房中的黑石定为伊斯兰教的主要圣物。就这

样，他实现了和麦加商人的和解，从而维护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使其扎根于传统的阿拉伯习俗之中。到 632 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虽不是全部——已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

穆罕默德已发现自己的祖国因存在许多地方性的偶像崇拜习俗而分裂。他给祖国留下了一个宗教和一部天启的经典，留下了一个具有良好的组织和武装、统治了整个半岛的社会和国家。一个世纪内，他的信徒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并传播了他的教义。如今，这一宗教以在全世界拥有 5 亿信徒而自豪。

## 二、征服时期

正因为穆斯林社会是穆罕默德天才的结果，所以他死后，这一社会似乎很可能彻底分裂。部落酋长们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于是，他们停止纳贡，重新开始自由行动。这种撤离，伊斯兰教历史上称为“变节”，即叛教，引发了一系列经过适当谋划的战役。这些战役制服了“叛教的”部落，迫使他们回归伊斯兰教社会。但是，被制服的部落成员愤怒愤恨，显然一有机会还会叛离。穆斯林首领们明白，缓和这种不满的理想办法是，发动对外袭击，使每个贝都因人都有希望获得自己所喜爱的战利品。结果，这些袭击不是作为传播信仰的宗教战争开始的。穆罕默德并不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也不认为上帝选派他来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其他人传教。因此，阿拉伯人发动袭击，其原因正是为了让骚动的贝都因人一心忠于麦地那这一需求。

领导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被选来代表起世俗作用的先知。当然，作为先知的穆罕默德不可能有继承人，但是，社会的世俗首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只意味着他是信仰的守卫者，而非宗教领袖。正是在艾卜伯克尔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被迫恢复信仰，阿拉伯人开始了最早的对外侵略。

634 年，欧麦尔继艾卜伯克尔之后当选为哈里发，在他的领导下，早期的对外侵略发展成正式的征服战争。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貌似强大的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不久便暴露出其外强中干的实质。这两个帝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削弱了它们各自的实力，而它们的国民对繁重的捐税和宗教迫害也极为不满。此外，当整个整个的部落被有关财富的迷人传说所吸引，从阿拉伯半岛各地向北迁移时，穆斯林军队也就由小股袭击队变成大规模的武装部队，任何想让他们返回贫瘠家园的企图，都将引起新的、很可能是致命的“变节”。结果，穆斯林首领率领贝都因军队进入叙利

亚。因此,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征服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的扩张,而是意味着阿拉伯部落的扩张;这些阿拉伯部落在较早几个世纪中,已多次向北推进,进入“肥沃新月”地带。当时,扩张的规模空前,一方面是因为那两个帝国异常虚弱,一方面是因为新的伊斯兰教信仰所促成的团结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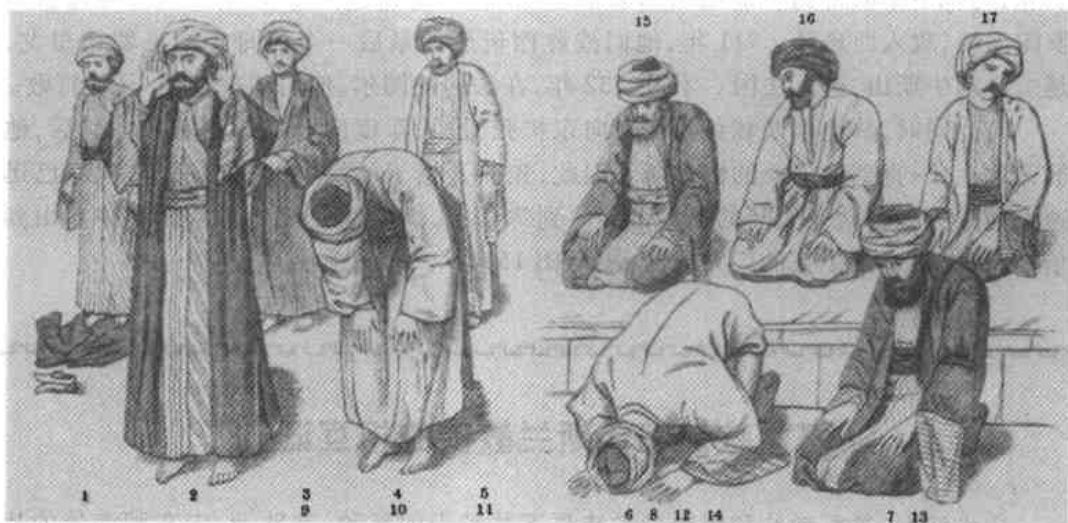


图 60 祈祷仪式

崇拜仪式,即祈祷。这些插图表现了穆斯林每天进行五次的祈祷仪式所规定的动作次序。每个位置和动作都配有引自《古兰经》的不同的称赞语、祈祷语和吟诵语。这一仪式象征穆斯林对安拉的绝对服从,象征穆斯林承认安拉是宇宙唯一的、永恒的、全能的主。

阿拉伯人一旦开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们沙漠作战的经验。他们不像拜占廷人和波斯人那样骑马作战,而是骑骆驼作战。这样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正如后来的维京人,因控制着海洋而能劫掠欧洲沿海一样,这时的阿拉伯人利用他们的“沙漠之舟”,进攻富庶的帝国。阿拉伯人在他们所征服的省份里,选择沙漠边缘的城市作为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并不是偶然的。如果他们所处的位置合适,他们会利用现成的城市,如大马士革;如果必要,他们也会建立新的城市。这些有守备部队驻防的城市满足了正在形成的阿拉伯帝国的需要,就像后来的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新加坡满足了不列颠海上帝国的需要那样。

636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的河谷中,赢得了对拜占廷人的决定性胜利。他们乘眯眼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由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徒组成的混合部队。皇帝希拉克略逃进君士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哈里发欧麦尔这时转而进攻富裕的邻邦伊拉克。那里的闪米特人已部分地皈依基督教,疏远了波斯和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这种分裂有助于637年夏天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取得的伟大胜利。波斯皇帝仓皇撤离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

在耶尔穆克和卡迪西亚所取得的惊人胜利，给穆斯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大批来自西南部沙漠的贝都因部落。阿拉伯军队如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他们向西进入埃及，向东进入波斯。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贪婪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迅速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西班牙。711 年，他们战胜西班牙的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不过，732 年，在法国的图尔，他们却被查理·马特打败。

与此同时，其他穆斯林势力正在向东扩张，进入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然后，他们又北上，一直到达中亚的怛逻斯。因此，先前开始于沙漠中的一个简单宗教，已迅速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到 750 年，伊斯兰教统治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广大地区（见地图 15）。

---

## 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相互诋毁

中世纪时，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欧洲、中东和海外的战场上互相厮杀。他们也互相贬低，正如以下两种说法所表明的。第一种说法出自西班牙托莱多市的一位穆斯林法官之口，他将北欧人视为末等民族。<sup>\*</sup>第二种说法出自一位基督教主教之口，他表达了西方世界对穆斯林道德堕落的共同看法。<sup>\*\*</sup>

赛义德·安德鲁斯(Sa'id-Andalusi)法官说：……就民族之林中  
没有发展科学的其他民族而论，它们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像动物。那些深居北方的人，其所在地与太阳相距极远，故当地气候寒冷，空气闷塞，人也因此受到影响，变得生性冷漠、脾气粗暴。因而，他们都长得很高大，肤色苍白，头发很长。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智力迟钝、不聪颖，无知和愚昧成了他们的特点。他们大多做事荒唐，处于心理盲状态，就像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邻近民族一样。

萨坦尼亚(Sultaniyah)的主教威廉·亚当说：在穆斯林教派中，不仅未禁止任何性行为，而且还允许和赞扬各种性行为。因此，在他们当中，除了有无数的妓女外，还有许多剃光胡须、涂脂抹粉、手腕和脚踝上戴着镯子的脂粉气十足的男人。……因此，穆斯林忘却了人类的尊严，不知羞耻地为那些脂粉气十足的男人所吸引，并公然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像我们社会中夫妻公开地生活在一起那样。

<sup>\*</sup> 见 *Islam and the West* by P. K. Hitti © 1962 by Litt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sup>\*\*</sup> 见 N. Daniel, *Islam and the Wes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0), 第 144 页。

---



### 三、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182

第一阶段的扩张完成之后,阿拉伯人便安顿下来,享受胜利果实。他们实际上是其属国的占领军,大多数居住在军事重镇里,由此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哈里发欧麦尔一开始就规定他的追随者不应在被占领的行省里享有封地,所以,他们这时享受政府津贴。支付这些津贴的资金来自伊斯兰教国家没收的土地和征收的捐税,向非穆斯林征收的捐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确实,皈依伊斯兰教极不受统治者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实际上是阿拉伯武士贵族的特权,他们统治了人数远为众多的诸被征服民族。

183

不久,日益增长的“马瓦里”,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这些新教徒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充当雇员、工匠、店主和商人,为阿拉伯贵族的需要服务。作为穆斯林,他们要求与阿拉伯人平等,但未得到承认。虽然“马瓦里”也在伊斯兰教军队中服役,但通常只能作为步兵参战;步兵得到的薪俸和战利品少于阿拉伯骑兵。

随着帝国的扩张,随着财富从属国行省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马瓦里”的人数和财富也不断增长,但他们仍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于是,他们成为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决心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社会地位。人们开始有充分理由认为,阿拉伯伍麦叶哈里发王朝是征服战争完成后百无一用的一个寄生集团;伍麦叶王朝曾于661年,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因此,对阿拉伯贵族的抵抗运动,既是一场民族反抗运动,又是一场社会反抗运动。

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以750年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结束;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马瓦里”,尤其是波斯人,这时代替了旧贵族。阿拉伯军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权阶层,而是被皇家常备军所取代;皇家常备军开始时主要由波斯人组成。从前的军事重镇,如今在“马瓦里”的控制下,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加入市民和农民的行列,另一部分则重新退回到游牧生活。

帝国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762年随着首都从大马士革东迁到巴格达,情况更是如此。这实际上意味着,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开始放弃地中海,接受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哈里发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首长,而是一位由神决定的专制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他的权力并不依赖于部落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常备军的基础上。因此,哈里发统治已成为同前泰西封、波斯波利斯和巴比伦的许多君主政体相类似的东方君主政体。在这一君主政体所强加的秩序与防护下,一种融合了犹太传统、希腊—罗马传统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

传统的混合文明,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伊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上层骑士贵族的宗教信条,而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文明。

## 四、伊斯兰教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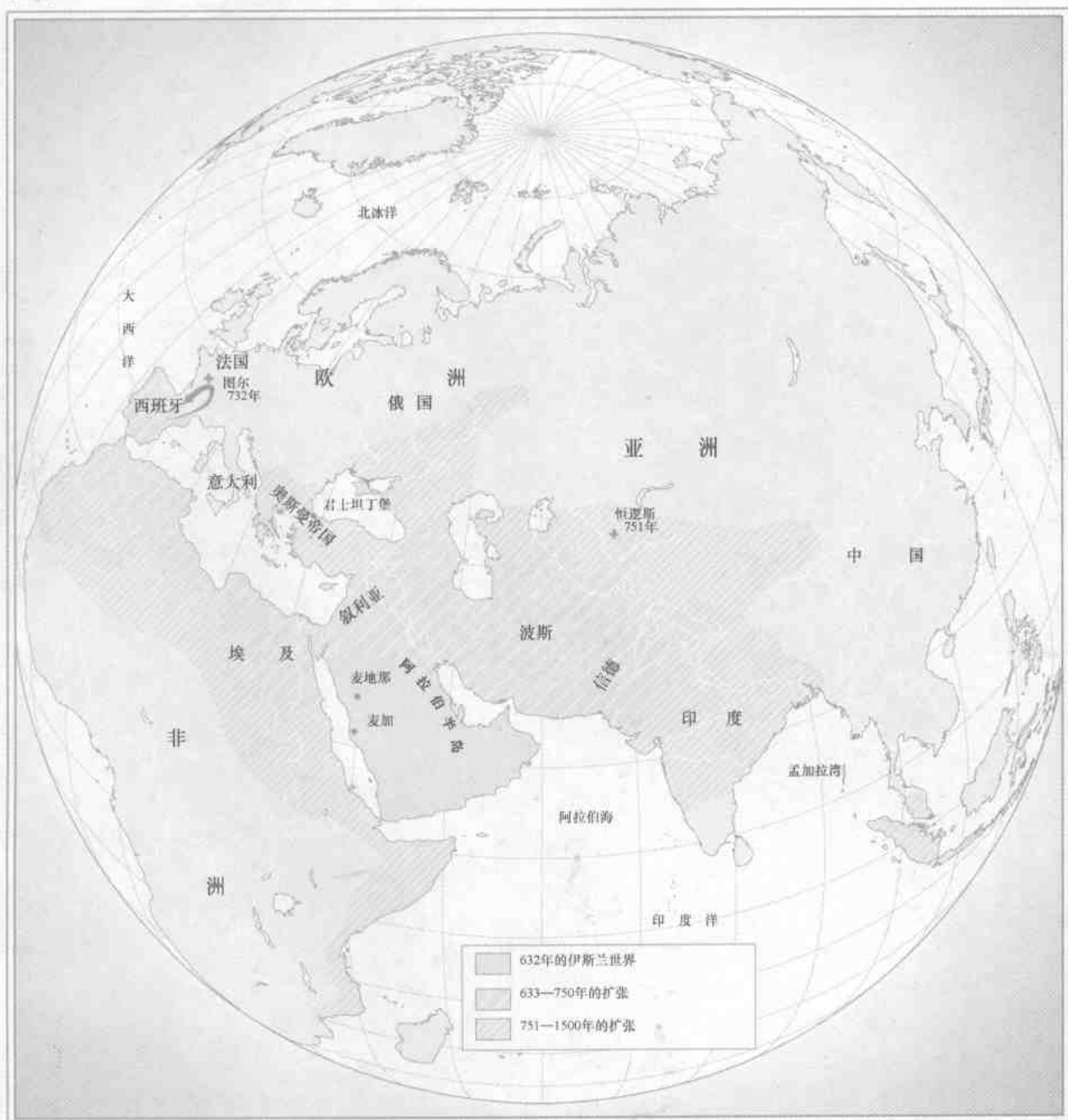
哈里发曼苏尔选择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在地,他预见到了这一选择的辉煌前景:

这个东濒底格里斯河、西临幼发拉底河的岛屿,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溯底格里斯河而上的所有船只……都将在这里停泊;顺底格里斯河而下、沿幼发拉底河运来的货物,也将在这里停卸。这里将是山区、伊斯法军和霍拉桑诸地区居民的交通要道。感谢安拉,为我保留了这块地方,并使我之前来过这里的人们忽略了它。真主啊,我要在这里建筑城市,并终生居住在这里,我的子孙也将居住此地。无疑,它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sup>1</sup>

曼苏尔的期望很快得到全面实现。一个世纪内,巴格达的人口约达 100 万。城市的中心是一座直径约两英里的城堡,里边有哈里发的宫廷、官员们的官邸和禁卫军的营房。城堡外围建立了巨大的商业中心,由富饶的两河流域地区提供充裕的产品。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各行省还提供了丰富的金属资源,如来自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来自努比亚和苏丹的黄金,来自伊斯法罕的铜以及来自波斯、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都蕴藏着宝石,波斯湾水域还盛产珍珠。工业也很繁荣,就从事生产的人数和产值而言,纺织业最为重要。从中国战俘身上学到的造纸术,迅速传遍伊斯兰教世界,并于 900 年传入西班牙。

如此繁荣的经济,遍布辽阔的阿拔斯帝国,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贸易。如前章所述,穆斯林商人或走陆路经过中亚,或从水路同印度、锡兰、东南亚和中国通商。他们还同非洲进行广泛的贸易,由此获得黄金、象牙、乌木和奴隶。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发现的大批铸于 7 至 11 世纪的穆斯林硬币,证实了穆斯林商人同北方国家的贸易。如此广泛的贸易交流,促进了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结果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在巴格达开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

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便在其奢侈豪华的宫殿里纵情享受。《一千零一夜》描写了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786—809 年在位)。他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统治者,身边簇拥着一批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学者和才子。室内常见的游戏是象棋、骰子和十五子棋;室外的运动有打猎、鹰猎、放鹰、马球、射箭、



地图 15 1500年以前伊斯兰教的扩张

击剑、掷标枪和骑马比赛等。哈伦与查理曼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各自的首都,巴格达和艾克斯拉沙佩勒简直无法相比,如同今天的巴格达和巴黎无法相比一样,不过是在相反的意义。



图 61 耶路撒冷的石制穹顶

位于耶路撒冷的石制穹顶。它是早期伊斯兰教建筑(但不是清真寺)的范例,始建于公元7世纪第一轮阿拉伯扩张浪潮掀起时。它建在一块岩石之上,穆斯林认为那块岩石是穆罕默德的升天之处,而犹太人认为它是亚伯拉罕准备祭献以撒之处。

阿拔斯王朝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而且以一段时期内在宗教事务上比较宽容而闻名于世,很明显,这种宽容在当时的西方是绝对没有的。伊斯兰教教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神圣法律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同穆斯林一样,都属于“有经人”。两者都有一部圣典,即成文的启示书。他们的信仰被认为是真实的,不过还不完整,因为穆罕默德已取代了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宽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它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只是予以某些限制和处罚。

阿拔斯王朝还以科学领域的成就享有盛名,不过,这方面的趋势是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比鲁尼(973—1048)曾说过:“我们应限于从事古人所从事的事业,完善可以完善的东西。”<sup>2</sup>然而,帝国的庞大规

究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外，还翻译和研究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

在天文学方面，穆斯林一般接受了前希腊人的基本原则，理论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他们不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 900 年的记录，为他们的重大发现提供了依据。



图 62 14 世纪的手稿

14 世纪的手稿，表现的是阿维森纳和学者们。这一页取自阿维森纳著的《医典》，现存于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

与在天文学方面一样，穆斯林在地理学方面也没取得什么理论上的成就，但是，庞大的帝国疆土、广泛的贸易范围，使他们积累了有关欧亚大陆的系统、可靠的资料。例如，比鲁尼关于印度的名著，不仅描写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而且描写了印度人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科学成就。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直到 18 世纪才有人能与他相媲美。穆斯林还绘制了航海图和地图。在这些图中，如当时的基督教制图者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一样，穆斯林自然以麦加为中心。

除自身原先的成就外，穆斯林还在翻译和传播古代著作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们不信任任何非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文明也不感兴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则不同。他们曾得到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有力支持，因而度量也更为宽宏。“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翻译家，其中著名的翻译家侯赛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就是一位基督教徒。他曾出访希腊语国家，收集手稿，同助手一起翻译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

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另一个伟大的翻译中心位于穆斯林西班牙的托莱多市。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来自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这一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西欧人对希腊学问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的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著作的作用。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两条基本纽带,即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阿拉伯语的传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效果更为显著。到11世纪时,阿拉伯语已代替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米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流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一公用语言说明,虽然在这一地区,除了占优势的闪米特人外,还有苏丹黑人,除了占优势的穆斯林外,还有黎巴嫩基督徒和埃及科普特教徒,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彼此认同的情感。甚至在这片已永久阿拉伯化的辽阔地区之外,阿拉伯语对其他穆斯林民族的语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词汇在这些语言中,如希腊和拉丁词汇在英语中一样被普遍使用;其中有些语言(乌尔都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土耳其语)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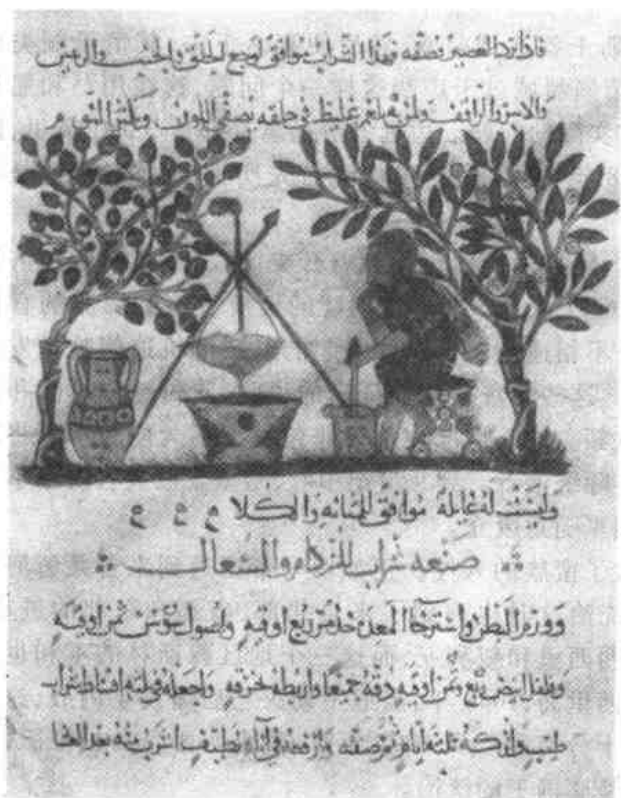


图 63 迪奥斯科里斯的手稿

迪奥斯科里斯手稿中的一页:咳嗽药的配方和一位正在配制此药的医生。阿拉伯人对医学界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大批药品由意大利船只运往欧洲。

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一条比基督教更有力得多的纽带,因为它不

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社会和政治体系与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如同语言为阿拉伯世界打下基础一样，宗教信仰也为伊斯兰教文明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文明在征服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带有希腊—罗马、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文化和科学诸成分的综合体。因此，它不是早先各种文化的简单拼凑，而是代表全新文明的一种融合。它虽然来源不一，有多种组成部分，但却明显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独特印记。

到目前为止，伊斯兰教依然是一股较重要的势力，是世界的第二大宗教。它拥有近 10 亿信徒，约占世界人口的 18%。而基督教大约有 17 亿信徒，约占世界人口的 33%。穆斯林（照字义即安拉意志的“顺从者”）分布在从非洲的大西洋海岸越过北非、穿过中东和南亚、直达印度尼西亚的辽阔地域。因此，许多种族群体占据了虔诚徒众的阵营；阿拉伯人，即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现在成了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

## 五、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哈伦·赖世德统治时期，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然后便衰落下去，其情景颇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崩溃。首先存在着帝国疆域过于广阔这样一个问题，这在用马和船只作交通工具的时代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边远省份远离首都达 3 000 英里，因此，西班牙于 756 年、摩洛哥于 788 年、突尼斯于 800 年，首先摆脱帝国的统治，是不足为奇的。

其次，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阿拉伯帝国也存在着开支问题；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而言，帝国的开支显然过大，难以承受。巴格达朝廷的极度奢侈和膨胀的官僚机构的浩大开支，与技术的进步是不相适应的。由此引起的财政危机迫使哈里发委派各省总督为当地的税款包收人。这些总督用他们征来的税收，支付地方军队和官员的薪俸，并向国库交纳指定的款额。这一情况使总督兼包税人不久便和军事将领达成协议，两者一起成为各省的实际统治者。到 9 世纪中叶，哈里发已失去对军事和行政的控制，并逐渐被土耳其雇佣军随意废立。

像往常一样，帝国的衰弱招致了蛮族的人侵。正如罗马帝国遭到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侵略一样，哈里发统治这时也遭到了来自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进攻。十字军由北入侵，占领了西班牙、西西里和叙利亚，而这三个地区穆斯林的不和也为十字军的人侵提供了便利。在西西里岛，1040 年，当地王朝灭亡后爆发了内战，这对诺曼底人从意大利南部入侵该岛十分有利。到 1091 年时，整个西西里岛被征服，混杂的基督教—穆斯林居民沦于诺曼底国王的统治。

同样，在西班牙，伍麦叶王朝于 1031 年被推翻，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由各“党派”即代表各民族的宗派进行统治。这些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当地前

穆斯林伊比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即欧洲奴隶。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使北部基督教国家能向南扩张。到1085年,他们占领了重要城市托莱多。到13世纪末,穆斯林只剩下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

事实证明,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失陷于基督教世界是长期的,但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这里,几个穆斯林国家自相残杀战争,使十字军从1096年起迅速向前推进,抵达叙利亚海岸,进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四个国家:埃泽萨伯国(1098年)、安条克公国(1098年)、耶路撒冷王国(1099年)和特里波利伯国(1109年)。这些国家都以西方封建方式建成,然而,它们缺乏根基,从未同化穆斯林阿拉伯臣民,它们的存在依靠欧洲零星到达的援兵的支持。而且,它们都位于沿海地区,很易受内地组织的抵抗运动的伤害。这些国家只有当周围的穆斯林世界处于分裂状态时,才能生存下来。萨拉赫丁,即西方人所称的萨拉丁,结束了这种分裂状态。他统一了穆斯林叙利亚和埃及,包围了十字军公国,于1187年开始反攻。他在1193年逝世以前,已收复了耶路撒冷,把西方人从所有地区驱逐出去,只剩下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区。随后一个世纪中,这一地区也被占领,穆斯林的再征服宣告完成。

除北面遭到十字军的猛攻外,哈里发统治还遭到了来自摩洛哥南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以及上埃及地区的希拉勒和苏莱姆这两个阿拉伯贝都部落的进攻。这些部落席卷利比亚和突尼斯,到处劫掠破坏。正是这一入侵,而不是更早的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摧毁了北非文明。

最后,第三股侵略军是来自东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入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所侵略的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欧亚大陆,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范围及其影响,完全可以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征服相匹敌。实际上,这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突厥人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又将他们的信仰扩展到遥远的新地区。下章将叙述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过程及意义。

## 推荐读物

以下研究成果记述了穆罕默德和他的训导:T. Andrae 所著的 *Mohammed* (Scribner's 出版社,1936年版); E. Dermenghem 所著的 *The Life of Mahomet* (Dial 出版社,1930年版); H. A. R. Gibb 所著的 *Mohammedanism: An Historical Survey*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53年版); 以及 M. M. Pickthall 所著的 *Koran* (New American Library 出版社,1953年版)翻译本的简易版。

有关阿拉伯人及其通史的权威性描述,见于 A. Hourani 所著的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91年版); P. Hitti 所著的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第五版, (St. Martin's 出版社,1951年版); B. Lewis 所著的 *The Arabs in History*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出版社,1966年版)。关于



阿拉伯人的征服和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参见 M. A. Shaban 所著的 *Islamic History A. D. 60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2 年版)；F. M. Donner 所著的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1 年版)。在最初的征服后，伊斯兰教通过不露声色的传教继续扩张，以下著作描述了这一过程：T. W. Arnold 所著的 *The Preaching of Islam: A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Muslim Faith* (Constable 出版社, 1913 年版)。

以下著作对伊斯兰文明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讨论：T. Arnold 和 A. Guillaume 主编的 *The Legacy of Islam* (Clarendon 出版社, 1931 年版)；W. Montgomery Watt 和 P. Cachia 所著的 *A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 (Doubleday 出版社, 1967 年版)；A. G. Chejne 所著的 *The Arabic Language: Its Role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69)；R. A. Nicholson,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9 年版)；A. Lewis 主编的 *The Islamic World and the West, 622—1492 A. D.* (Wiley 出版社, 1970 年版)。

## 注释

1. 引自 B. Lewis, *The Arabs in History*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50), p. 82.
2. 引自 A. Mieli, *La Science Arabe* (Brill, 1939), p. 376.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前,人类不可能看到可与这一灾祸相比的灾难。……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丝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剖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

(穆斯林历史学家,1160—1233年)

---

## 第11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公元1000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为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辽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历史成就是,他们共同改变了游牧民与文明之间的传统关系。几千年来,游牧民们一直居住在文明地区的外围地带,贪婪地艳羡着文明民族的繁华。但是,随着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这种传统的平衡状态发生了急剧变化,游牧民成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者和主人,而不仅仅是草原上的动物饲养者。

在这几个世纪中,突厥人和蒙古人耀武扬威,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这些令人震惊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充当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即13世纪,蒙古人开始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00—1500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意义。

## 190 一、突厥人的入侵

突厥人是一个语言群体，而不是一个种族群体。他们都因说突厥语系的某种语言而共同联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像高加索种人，而不像蒙古种人。到 6 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草原到奥克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 8 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 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斯河对岸杰出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与此同时，如同以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作为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他们很快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变成了主人而不是仆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 970 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越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那里的政权。1055 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有权力的人”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是，1071 年，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先前受腐败的拜占廷官吏剥削的小亚细亚农民，这时欢迎突厥人的到来，感到松了口气。因此，11 至 13 世纪，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这时就像一个架在枯瘦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 年君士坦丁堡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 1071 年。

在塞尔柱人向西推进到小亚细亚时，其他突厥人也向南打开一条出路，朝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 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是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

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受极端的伊斯兰教一神论的激励,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又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跟在马哈茂德后面的还有来自阿富汗的其他突厥入侵者。他们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攻占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首都。在这些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之所以能不太费力地征服一个人口远远超过他们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印度人还在使用过时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1500年前反对亚历山大时的战术一样,是不顶用的。印度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像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191

## 二、成吉思汗的征服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 Chingis, Jeng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12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除了自身的勇猛外,还兼具忠诚、狡猾和无情的背叛这些不同的品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战胜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转而反对自己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能将操蒙古语的不同部落统一在一起。1206年,在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够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图 64 成吉思汗狩猎图

15 世纪中国的绘画，表现了成吉思汗狩猎的场景。

192 者呢？这个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牧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 100 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 125 000 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首先靠的是所有游牧武士都具备的一个内在优势——即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就是一系列战斗行动的不断演习。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进餐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 193 13 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 270 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供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供养，不过必要时，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诱使敌人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上，扬起灰尘，或者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 600 英尺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 30 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钩的长矛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也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料。这使它们虽然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



地图16 忽必烈汗去世时的蒙古帝国(1294年)

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成吉思汗还进一步用多半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新技术和新装备来加强自己的军队。因此,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士气。他们强迫战俘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且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即使拥有军事天才和最佳的战争机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统一强大的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但是,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汗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拔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庸国。1211年他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体战略,成吉思汗此时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国灭亡。征服上述地区之后,他已接近了花刺子模边境,并于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战功,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他生前选择的家乡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见地图16)。

### 三、蒙古帝国

194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南宋亡国。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奉命率兵15万进攻欧洲西部。1237

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 1238 年 3 月,拔都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图 65 成吉思汗的朝廷

13 世纪波斯人所著的蒙古历史书中的插图:成吉思汗的朝廷。成吉思汗坐在王位上,他的三个儿子站在左边。其中一个儿子窝阔台于 1229 年继承了其父的王位。

两年以后,1240 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 12 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 3 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里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 年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窝阔台的继承者们决定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取代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在中国,蒙古人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最后,1277 年,蒙古人占领了南方大港广州。新大汗忽必烈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然后,他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



和日本。

与此同时,其他蒙古军队在中东横冲直撞,于1258年占领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被送往忽必烈的朝廷外,该城的80万居民大多被屠杀。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不过,1260年,埃及马木留克军队却在巴勒斯坦出人意料地大败蒙古人。这次失败标志着蒙古帝国在中东开始由军事胜利走向衰败,就像其在日本和爪哇的类似失利标志着它在远东的衰败一样。由于不能进一步扩张,蒙古帝国便迅速瓦解,其瓦解几乎同其建立一样迅速。

195

#### 四、蒙古帝国的衰落

蒙古人衰败的基本原因在于,相对于被征服民族,他们人数太少,过于原始。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下马,定居下来享用掠夺物,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仰为其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明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他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控制着上土耳其斯坦的堂弟海都也与他争位,从而引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在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尊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是,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土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他们接受佛教的影响,渐渐湮没无闻。

甚至马可·波罗在伟大的忽必烈手下供职时,便已预见到了蒙古的衰落;这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马可·波罗在描述自己的游历时,对蒙古人被其所征服的民族所同化的情形作了如下重要分析:

关于真正的鞑靼人[蒙古人]的风俗习惯,我所告诉你们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我必须补充说,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大大地衰退了;因为那些定居中国的人以近乎崇拜的方式接纳了这个国家的习俗,而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习俗;而那些定居黎凡特的人则接受了萨拉森人的习俗。<sup>1</sup>

## 五、突厥人的复兴

196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他们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后,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迅速地崭露头角,就如同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中那样。一批批军事冒险家,这时在为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势或垮台。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泰摩兰。他于 1369 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 1405 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势力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展。13 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所构成的压力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只加强自己在印度北部的地位。14 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接着,在帖木儿的侵袭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印度北部和中部出现了几个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印度教教徒建立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 16 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其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廷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 50 英里。1299 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

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间的对立,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经分裂,它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教徒和东正教教徒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他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事实上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菲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后,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是,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0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成为多瑙河以南、除威尼斯控制的几座沿海堡垒以外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人(详见第12章第4节)。

## 六、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这一力量对比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末叶,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在欧亚大陆外,伊斯兰教正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非洲大陆的内地。它从北非沿海地区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海一带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一个人若想成为穆斯林,只需反复念诵这样一句话:“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通常,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仅仅加了伊斯兰教仪式,便被接受,并变得神圣。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们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当地的习俗,同当地妇女通婚,改变自己新的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当地居民。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已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若把东南亚看做一个整体,那么,主要的穆斯林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5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

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 世纪，在初期扩张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世界的内海；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内海。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 1295 年波斯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或水路运输的。因此，1240 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 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 1500 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事务的进程。现在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分，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世界人口 18% 的人们的信仰，原因皆在于此。



图 66 艾勒汉卜拉宫

1248 年至 1354 年期间建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国王的宫殿艾勒汉卜拉宫。遍及欧亚大陆的著名伊斯兰教建筑表明公元 1000 年至 1500 年期间伊斯兰教得到广泛传播。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还因为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内那种相互得益的交流。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一连串中国发明的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 9 章第 2 节）。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炮兵在蒙古军队中服役时，曾去过波斯。我们还知道，有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曾在波斯传播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

的意大利商人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因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起了使欧亚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的作用。当时的中国观察家汪力(1314—1389)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展现在自己眼前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融合作了如下非凡的叙述：

……四海之内已成一家，文明到处传播，不再有任何障碍。……许多人[新到中国的人]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快乐地生活在我们的江河湖泊之间。他们在中国定居很长时间后，有些人上了年纪，子女也增多了；由于远离故土，他们不再要求以后葬回故乡。无疑，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sup>2</sup>

最后，由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提供的机会，仅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所有其他文明都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但却非常善于借鉴已被确认的伟大文明，创造出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在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也存在极深的隔阂。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大力支持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与他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将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断都当做异端邪说和无神论来加以排斥。

从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经院哲学的胜利。这种经院哲学在蛮族入侵后的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对智力活动已起决定性影响，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入侵，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助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仰。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受到挑战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认为，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本源，人们应该运用智力来领悟到：必须用对上帝的信赖来摧毁和取代自信。正统派反应的程度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最先将历史看做是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记录。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把哲学和科学当做无用和危险

的东西来加以排斥。他说：

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自然哲学的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我们不必加以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诸宗教学科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项工作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其有害面的侵蚀。<sup>3</sup>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公元 800 至 1200 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 16 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199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距。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 1368 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 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而且，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明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 8 章第 5 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得以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 推荐阅读物

关于突厥人在不同地区的入侵，见 T. T. Rice 所著的 *The Seljuks* (Thames & Hudson 出版社，1961 年版)；C. Cahen 所著的 *Pre-Ottoman Turkey* (Sidgwick & Jackson 出版社，1968 年版)；S. Vryonis, Jr. 所著的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71 年版)；H. Inalcik 所著的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Weidenfeld & Nicolson 出版社，1972 年版)；J. A. Boyle 主

编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5, The Seljuk and Mongol Periods*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31 年版)。M. Nazim 所著的 *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31 年版) 讨论了印度的突厥人。H. Lamb 所著的 *Tamberlane the Earth Shaker* (McBride 出版社, 1928 年版), J. J. Saunders 主编的 *The Musli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 (Prentice Hall 出版社, 1966 年版) 中也全面地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关于蒙古扩张主义的动力, 见 O. Lattimore 所著的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Mouton 出版社, 1962 年版) 中的不同文章, 以及他写的文章“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fic American*, 1963 年 8 月, pp. 55—68。R. Grousset 所著的 *Conqueror of the World: The Life of Chingis-Khan* (Viking 出版社, 1972 年版) 中收集了成吉思汗的几篇传记, 包括一篇通俗报道; B. Y. Vladimirtsov 所著的 *The Life of Chingis-Khan*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 1930 年版) 中进行了学术研究; H. D. Martin 所著的 *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Johns Hopkins 出版社, 1950 年版) 一书擅长于蒙古军事组织方面的论述。J. J. Saunders 所著的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Harper & Row 出版社, 1972 年版), J. A. Boyle 所著的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1 年版) 和 B. Spuler 的权威性评价即其所著的 *The Mongol Period* (Princeton University 出版社, 1995 年版), 对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

## 注释

1. R. Latham, trans., *Travels of Marco Polo* (Penguin, 1958), p. 71.
2. Cited by J.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 (Oxford University, 1993), p. 145.
3. Ibn Khaldun, *Muqaddimah*, trans. F. Rosenthal (Pantheon, 1958), pp. 250—258.





拜占廷的 1000 年产生了灭绝；中世纪 200  
1000 年的努力[在西方]产生了文艺复兴、  
现代社会，最终产生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罗尔·巴克

---

## 第 12 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拜占廷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下来、从古典时代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但是，这段完整的、持续了 1000 年的历史，最终意味着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的意义上说。因为拜占廷在地理位置上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例如，中国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侵略，它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19 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拜占廷则相反，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而西方的进攻则是取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的形态进行的。与此同时，拜占廷还遭到了来自复兴的东方的袭击，首先是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来自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持续到 1911 年，而拜占廷先于 1204 年崩溃，后又于 1261 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 1453 年最终灭亡（见地图 17）。

### 一、拜占廷的出现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将此城重建为新罗马时，201  
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7 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廷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廷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 1000 年中，它只是一座第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

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廷变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堡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已非常稳固，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在导致第一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的面前，它岿然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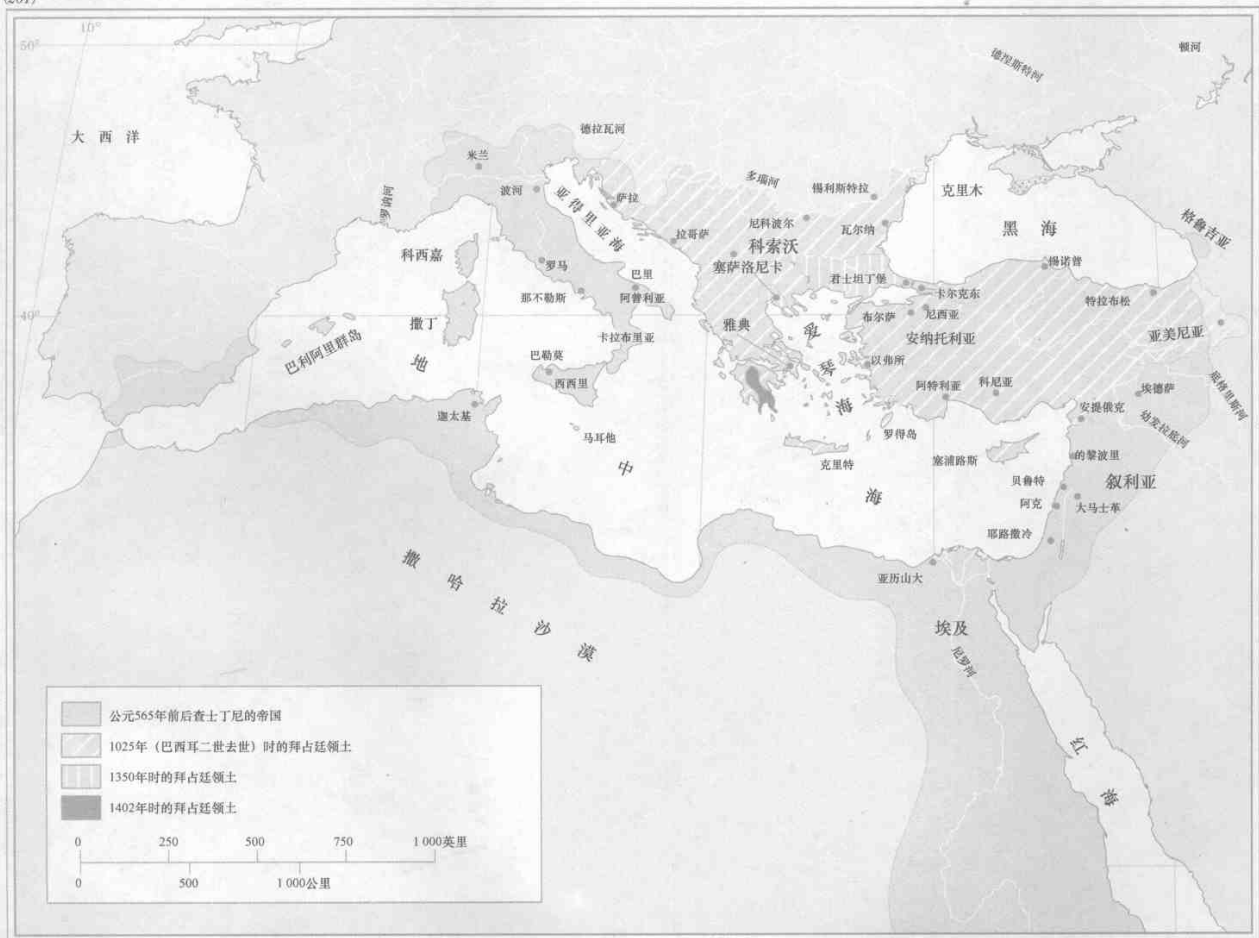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堡扮演拜占廷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历时 1000 年，直到 1453 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其疆域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征服而扩展，即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君士坦丁堡统辖着这一广大地区直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便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安全地带即安卡拉城。

202 君士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它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由于它的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这座城市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拜占廷皇帝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 4 英里；第二堵墙长 40 英里，宽 20 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 30 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进口。因此，在拜占廷长达 10 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遭受围攻的要塞，但却得以保存下来。

公元 476 年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皇帝在罗马被废黜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仍认为自己是恺撒的继承人。查士丁尼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从蛮族那里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见第 8 章第 4 节）。但是，这个刚刚恢复的帝国的寿命却十分短暂。查士丁尼死后不久，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向南涌入巴尔干地区；而在东部，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在伟大的赫拉克利乌斯皇帝（610—641 年在位）的领导下，拜占廷对周围的敌人进行了反击。627 年希拉克略大败波斯人，迫使他们将所占领的拜占廷领土全部退回。希拉克略又转向多瑙河边境，发现斯拉夫人在此期间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为入侵的斯拉夫人指定了一些定居地。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散居在巴尔干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形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黑海沿岸其他地区，不久便自称保加利亚征服者的斯拉夫人。

7 世纪后期，拜占廷帝国再次受到威胁，这次是由阿拉伯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构成的双重威胁。阿拉伯人发展了海上力量，并凭借这支力量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然后，从 669 年起数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拜占廷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些保加利亚人已占领了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



地图 17 拜占廷帝国的衰落

之间的地区。

拜占廷这次再度被受神启示的帝国首领——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所拯救。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政权。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与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失给伦巴第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阿拉伯人。

不过,这一缩小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撤回到托罗斯山脉,是加强而不是削弱拜占廷,因为托罗斯山脉将希腊人的小亚细亚与此时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分隔了开来。这一分隔因最终导致阿拔斯哈里发即位(750年)的穆斯林世界内部的动乱而得到加强。由于伊斯兰教帝国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巴格达,伊斯兰教的扩张方向此时是向东,而不是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廷帝国和穆斯林帝国能和平共处。

8世纪时兴起的拜占廷帝国,比查士丁尼的短暂的帝国小得多,但是,正如我们已提到的,它也显得更加和谐一致。它已去除了东、西方诸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腊的东西,只是,并非绝对如此。它以这一方式完成了从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廷帝国的转变。8世纪时的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文化上既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又与西方的新欧洲截然不同的帝国。

203



图 67 查士丁尼和随从们

查士丁尼和随从们,出自拉文纳圣·维塔修道院的镶嵌画。

## 二、拜占廷的黄金时代

9 世纪初至 11 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均由一位将军统治。将军既主管行政,又主管军务。希拉克略皇帝已将行政管理军事化,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的一项应急措施。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了大部分捐税负担,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拜占廷的经济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农民村社的基础上,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发挥着作用。自希腊—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描写了拜占廷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与之媲美。自欧亚大陆各地区运经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它们是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熟铁产品、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204

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廷的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像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更为实际可行。他们重新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1014 年,巴西耳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这一时期在文化上是一个稳定的、和谐一致的时期。拜占廷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被再次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和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宗教的和谐一致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865 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接受了东正教,来换取帝国对他的征服地的承认。以后几年里,拜占廷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制定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就像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



图 68 查理曼加冕

14世纪的法国金泥写本：公元800年教皇为查理曼大帝加冕。这一事件促使君士坦丁堡于812年授查理曼以“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从而承认了西方的政治独立。

拜占廷皇帝和东正教，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教会从属于国家的原则是传统的、公认的原则。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沙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倾向于闭关自守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下章将要提到的明朝统治下的中国。

###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似乎是稳固的、未受到挑战的。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这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波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不过，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就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 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1261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是拜占廷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拜占廷史学家尼塞塔斯·科尼亚提斯所作的如下描述，揭示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同样也揭示了希腊人对拉丁人的憎恨。\*

……我该如何讲述这些邪恶的人所干下的勾当！唉，我们原本应该崇拜的偶像，却被他们用脚踏踏！唉，值得尊敬的烈士们的遗骸被扔到了不干净的地方！然后，有人看到了大家都怕得不敢听的事情，那就是圣餐面包和葡萄酒喷溅满地或四处抛散。他们夺走宝贵的圣盒，将圣盒中的装饰品塞进胸前衣襟，将那些残存的破损的器物用作盘子和酒杯。……

他们亵渎大教堂[圣索菲亚教堂]的言论不堪入耳。用各种贵重材料制成并为整个世界所崇敬的圣坛，被打成了碎片，分发给了士兵们，就像光彩夺目的其他所有宗教财富的遭遇一样。

用稀有材料制成的神瓶和圣器，极其优美、极具艺术性；环绕法庭屏风和讲道台屏风、镶有金子的精制银饰品，做工令人钦佩；它们和门及其他许多装饰品一起，成为战利品，被劫掠一空。骡子和备有鞍具的马给牵到了寺庙的圣殿上。其中有一些骡子和马不能在富丽、光滑的路面上站稳脚，而它们摔倒时，便会遭到刺戳，因此，神圣的路面被鲜血和污物玷污。……

最困难、最费力的事莫过于靠祈祷来使这些愤怒的野蛮人变得温顺善良，他们一听到令人不快的话就会大发雷霆，因此，什么事都有可能使他们勃然大怒。任何想要尝试这一点的人，都会被取笑为疯子或长舌妇。他们时常拔出短剑来对付那些胆敢反对他们或拒绝他们要求的人。

这种悲哀，人人有份。在巷子里、街道上、寺庙中，到处可闻抱怨声、哭泣声、哀悼声、悲叹声，男人们呻吟着，女人们尖叫着，伤害、强暴、囚禁、骨肉分离，充斥着每个角落。贵族们不光彩地四处游荡；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眼含热泪；富人们变得贫穷起来。因此，在街道上、角落里、寺院内、书房中，已找不到一处不受攻击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为这些哀求者提供庇护。到处都布满了各种罪行。啊！不朽的上帝！人们的苦难多么深重，痛苦又多么巨大！

\* D. C. Munro, trans.,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European History*, rev. ed., series 1, vol. 1, number II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12), pp. 15, 16.

形势陡然逆转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

国的军事体制。虽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悍,能够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削弱了帝国。私人 and 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继承者们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重,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无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廷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206



图 69 十字军屠城

1204年春,十字军在佛兰德的鲍德温的指挥下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烧杀抢掠三日整。这是19世纪尤金·德拉克洛瓦所作的一幅绘画中对这一场景的描绘。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廷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来自西方的诺曼人冒险者,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属于拜占廷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后,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得以复兴,重新统一了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逼近将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这是 1071 年拜占廷遭受的两大灾难的背景，这两大灾难标志着帝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廷唯一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灾难，也是更具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次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廷皇帝，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这一战役结束之后，两位彼此竞争的拜占廷皇帝为了争夺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地将小亚细亚从希腊拜占廷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207 精明顽强的康尼努斯皇帝[亚历克赛一世](1081—1118 年在位)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拜占廷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来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西方基督教世界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他得到的不是自己所想要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一批批难控制的十字军。有些十字军是由亚历克塞有充分理由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的。东方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怀疑和公开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彼此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这就是被恰当地戏称为“商人东侵”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背景。威尼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战利品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廷覬覦王位者的甜言蜜语，拉丁人心中对所谓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成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特征；由于贪婪和报复欲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偏离了解放耶路撒冷这一原定目标，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1204 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即使是萨拉森人，”一位拜占廷编年史家说，“也比他们仁慈。”似乎有悖常理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终结果是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尽管 1261 年拜占廷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一直处于无依无靠的虚弱状态，直到 1453 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 四、拜占廷的灭亡

得胜的拉丁人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热衷于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不过，这些新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至死都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地盘，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不仅面临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相

继建立的三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亚，能凭借它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的统治。

凭借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结果，1261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庄严地迈入首都，在公众的欢呼声中，住进帝国皇宫。

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1261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1453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两个世纪中，恢复后的帝国仅由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拉布宗。

这个可怜的残存帝国的前景，几乎不比前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面对的是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依然存在于希腊的诸拉丁小国和北面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包围着。除这些外部威胁外，还有内部危机。这时，帝国在经济上已破产。意大利人对贸易的束缚一直未中断，因此，1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人区的收入是帝国政府关税收入的7倍。皇帝们被迫将自己的货币贬值，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政治上有权势的富人通常能避开增长了税。为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208

1342年至1349年期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城。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并分配寺院的土地；他们推行参与式民主，允许群众集会，让民众选举官员。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已受到意大利共和城邦的政治纲领的影响。但是，奄奄一息的拜占廷帝国不可能维持在蓬勃发展的西部地区自然兴起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结束了他们的共和政体。不过，这一事件却说明了深刻且普遍的不一致，就像同时代人的以下这段描述所表明的那样：

起义像可怕、残酷的时疫席卷全国，冲击着许多过去曾是温和、稳健的人。……于是，所有城市都起来反对贵族。……整个帝国处于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斗争所带来的痛苦之中。……人民动不动就发动武装起义，行为凶暴，因为他们憎恨富人。……<sup>1</sup>

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被削弱。由于希望获得西方的援助以抵御日益逼近的土

耳其人，皇帝们已在三个不同的场合（1274 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 年在罗马；1439 年在佛罗伦萨）同意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这些协议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廷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憎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和意大利商人的盘剥做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过去常常声称，他们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占领也不愿接受十字军的入侵，但是到 15 世纪中叶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土耳其人已大兵压境，随时都可能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不速之客。如第 11 章第 5 节所述，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 1453 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减少到 50 000 人至 70 000 人。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 9 000 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轰开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 80 000 人。4 月 2 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士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次击退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在 5 月 29 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连续屠掠三日。当时的拜占廷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绘了拜占廷帝国 1 000 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穆罕默德二世]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以上列举的东西和物品。<sup>2</sup>

## 五、拜占廷的遗产

回顾历史，拜占廷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贡献是，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保护盾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有利条件的全部意义，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攻陷该城后，不到半个世纪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同样重要的是，拜占廷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发动机，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

自足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文化领域,拜占廷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她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廷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



图 70 圣巴西勒教堂

位于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巴西勒大教堂。

最后,拜占廷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就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是宗教和文明的源泉。沿河道连成一串的诸早期俄罗斯公国,与拜占廷进行繁荣的商业交往。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经过基辅运出去,换取拜占廷商人运来的各种奢侈品,如细布、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随希腊有形的商品而来的是希腊的文化制度。对东斯拉夫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于 988 年前后采纳的东正教。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一个以拜占廷模式为基础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组成。为首的是基辅大主教,由君士坦丁堡最高级主教任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随着这一教会统治集团的建立,东正教还带来了新的宗教文献和法律文献,其中包括《圣经》的译本、拜占廷收集的神父们的著作、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拜占廷艺术这时也以石头建造的教堂、镶嵌画、湿壁画、绘画、尤其是肖像画的形式被引入俄罗斯;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极为出色,发展起自己独特的俄罗斯—拜占廷风格。东正教会还带来了拜占廷的教会法律,建立了

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方面的一切讼案。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起了加强大公权力的作用。正如早先在西欧，罗马教皇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廷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

拜占廷不复存在后，这一传统仍在继续。在沙皇帝国追随拜占廷、直到灭亡之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对俄罗斯皇帝表示忠诚和顺从。

总之，拜占廷文明因其历史作用和成就而格外令人瞩目。不过，拜占廷的确缺乏古典雅典的生气和荣耀，即便比较起来，雅典在面积和存续时间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其原因在于，拜占廷所起的作用按恰当的词意来说，是保守的。这并不是说拜占廷停滞不前。从始至终，它都在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然而，事实依然是，它的命运注定是守旧而不是创新。它一出生就已是罗马帝国范围内的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生活在过去的权势和荣耀的阴影中，一直试图维持或恢复这种权势和荣耀。它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一连串杰出的领导者——行政官员、将军、学者和神学家——但是，由于其工作环境，他们中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却为数极少。

西罗马帝国（第一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帝国）又生存了整整 1000 年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在 5 至 11 世纪之间，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是原始的、无足轻重的。但是，在这几个世纪中，正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正在为一个新文明奠定基础，而拜占廷却在靠其辉煌的、然又令人无法忍受的遗产生存。这就是为何从 11 世纪起，西方能随着其经济的繁荣、民族君主政体的兴起、思想见识的更新和扩张主义的强有力而稳步前进的原因；西方的扩张主义先是体现在地方性的十字军东征中，后又表现在最终于数世纪内导致全球霸权的海外拓张中。因此，对比之下，让人觉得可怜的是，在后来的这些世纪中，拜占廷一直未能摆脱过去的束缚，故而成为一个过时的落伍国家；这一落伍国家进行着一场英勇的但却注定是牵制性的战斗，直到其 1453 年声誉扫地、不可避免地灭亡为止。

## 推荐读物

最好的全面研究拜占廷的史书是 G. Ostrogorsky 所著的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Rutgers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7 年版)；最好的简述性史书是 S. Vryonis, Jr. 所著的 *Byzantium and Europe* (Harcourt 出版社, 1967 年版)。后一本书的作者还著有有关拜占廷历史上的决定性转折点的权威性著作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71 年版)。关于拜占廷人、南部斯拉夫人以及与基辅和伊斯兰教关系的各个方面,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4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66 年版)。另一本讨论了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标准性著作是 A. A. Vasiliev 所著的 *History of the Byzantium Empire*, 2 vol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出版社,1958 年版)。集中对国家、基督教和拜占廷思想进行考察的简短概论是 D. A. Miller 所著的 *The Byzantine Tradition* (Harper & Row 出版社,1966 年版)。关于拜占廷文化的其他阶段,见 D. T. Rice 所著的 *Byzantine Art* (Penguin 出版社,1961 年版)和 A. Grabar 所著的 *Byzantine Painting* (World 出版社,1953 年版)。最后,主要材料的来源是 D. J. Geanakoplos 所著的 *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85 年版)。

### 注释

1. Cited by G. L. Seidler,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World* (Pergamon Press, 1968), pp. 116—117.
2. S. Vryonis, Jr., *Byzantium and Europ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7), pp. 190—192.



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邵雍(理学家,1011—1077年)

---

## 第 13 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隋、唐继承了汉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因此,中国文明的过程与罗马崩溃后西方正在形成的独特变化形成了鲜明对照(见第 8 章第 3 至 5 节)。随后 1000 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到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从 6 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 16 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这 1000 年是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比较起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中国社会在这 1000 年中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利益和心理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中国是如此成功和舒适,以致它虽未完全停滞不前,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不过,在这同时,如下章所述,西方由于自己的技术成就、经济活力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多元化,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一切,形成一种最终导致西方主宰全球的推动力。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sup>212</sup> 尽管结局如此,但我们不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整整 1000 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 一、隋朝和唐朝

隋朝(589—618 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 8 个世纪的秦朝一样。



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创立者一死王朝便崩溃了。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河，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竭尽全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来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是，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致应对这一事业负责的隋炀帝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损害了自己的王朝。

拓疆扩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朝鲜最北部领土的企图却惨遭失败；当时的朝鲜分成三个王国。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618年被暗杀。几个觊觎王位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

唐朝最明显的成就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的帝国能与唐朝匹敌。

由于在国内重新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便有可能进行对外征服。早先，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弱；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大地产，在这上面建造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面积不断增长的土地，也向帝国政府提出了挑战。隋朝和唐朝政府提出了解决这种政治分裂的办法。即实行“均田制”：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19英亩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且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不过，“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势力、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213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前隋朝已恢复汉朝在竞争性统考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据儒家“征召有才能的人才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种种问题”的基本信条，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而拒绝采纳西方通过改变法律和制度来处理国家事务的典型方式。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的一系列考试组成。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

年举行一次。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在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考生能通过这一“篱笆”,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



图71 隋朝立佛像

一尊塑于隋朝(589—618年)初期的立于莲花基座上的立佛像。这帧作品由砂石雕成,且有着色痕迹。(现存中国山西省天龙山,规格为68.5×17.8×15.24厘米)

214



图 72 中国粗陶塑像

6 世纪的中国粗陶塑像，现藏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事务。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到文章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上。最终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它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一方面,这一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1905年它最终被彻底废除。 215

唐朝首都长安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这段短暂时期外,唐朝统治下的中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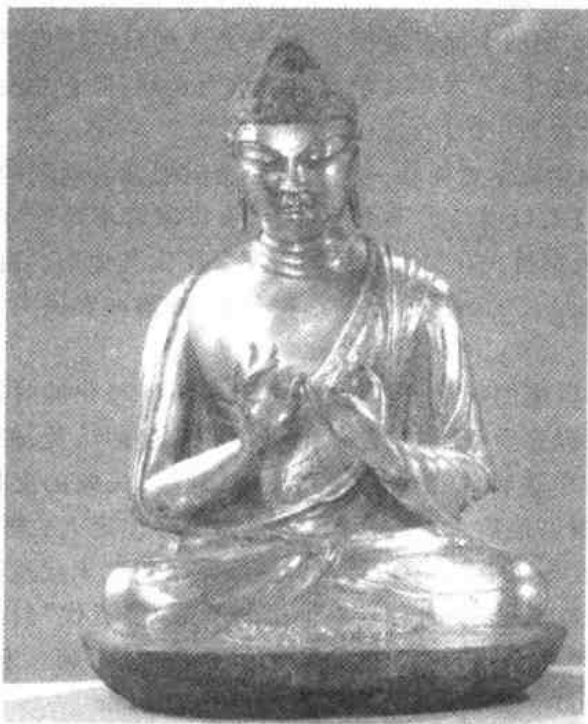


图73 唐朝坐佛像

唐朝(618—907年)坐佛像。

思想自由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和海上商路的重新开放,致使许多外国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

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在汉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和忠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佛教的影响迅速增长，并于唐朝初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财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它还从根本上促成了理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念和依靠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和拉拢寺院和庙宇。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控制的企图失败了，最后，政府采取了彻底迫害的政策。佛教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完全与世隔绝，也与中国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迫害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就如同西方类似形势下发生的情况一样。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介入的最终结果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没像基督教改造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中国社会。

216 在最后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中，唐朝统治者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开支超过税收。同样，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在损害农民的情况下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

唐朝皇帝又设法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中官员的无能和富有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朝廷谋取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种“野蛮”民族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他们无视朝廷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王朝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斗争。结果，907年，一位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谓的“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样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



图 74 唐朝战马的浮雕

唐朝皇帝唐太宗(597—649年)墓中的浮雕:一匹栗色的战马。

## 二、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得十分被动。他们从未发动过大的战役,去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族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但是,他惨遭失败,所以他的继承者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满洲的东北领土,也没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可提供前往西方的陆上通路。

这是宋朝的一个致命弱点,使宋朝易受游牧民的入侵。虽然“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但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降临了。他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游牧民对中国北部的大规模入侵。宋朝的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1127—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960—1127年)被称为“北宋”。

217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陲各省,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们的严厉谴责。虽然这种批评是不可否认的,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于唐、宋几个世纪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在这几个世纪中,除了出



图 75 木版印刷术

用木版印刷的《汉书》(汉朝的历史)的书页。印制于 1208 年至 1224 年期间。这本书是宋版印刷的最好范例之一。

现许多学者撰写的无所不包的各朝历史外,还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制和发行大批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见第 9 章第 2 节)。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 至 12 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贸易量也随着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上升。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大城市。

比起国内贸易的突飞猛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更为明显。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但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当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

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速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在亚洲诸海中活动的伟大创业者。

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不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见本章第4节）。

### 三、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尽管南宋的统治仅维持了半个世纪，但这半个世纪却格外地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部则由满族的一支女真人统治，称为金。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抵御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没有意识到蒙古人的极有害的力量，反而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去援助蒙古人。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归他所统治。蒙古人立即以入侵中国南部相报复。由于蒙古人忙于侵占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是，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这些游牧民并未因早期同中国的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这些蛮族征服者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更有利的选择。一个中国顾问陈述了这种选择：

既然你们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万盎司的白银、8万匹丝绸和40万担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sup>1</sup>

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与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



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背景在语言、习俗和法律方面将他们与其臣民隔开。他们还有意雇佣许多外国人任职，以与他们所不信任的多数中国人相抗衡。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都是中亚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的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法，来抚慰他们，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外籍官员的数量之多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已使政府的文职机关变成一个国际官僚机构；他们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包括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在内的各种外国宗教表示不满（见第 12 章第 4 节）。

219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东北平原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行政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

不管商人带多少银子到中国去，中国的君主将统统拿去，存入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受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sup>2</sup>

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 1294 年，终年 80 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具有才干的铁木耳。但是，铁木耳死得很早，他之后的大汗们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生活。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像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 年建立了中国人的明朝，且一直统治到 164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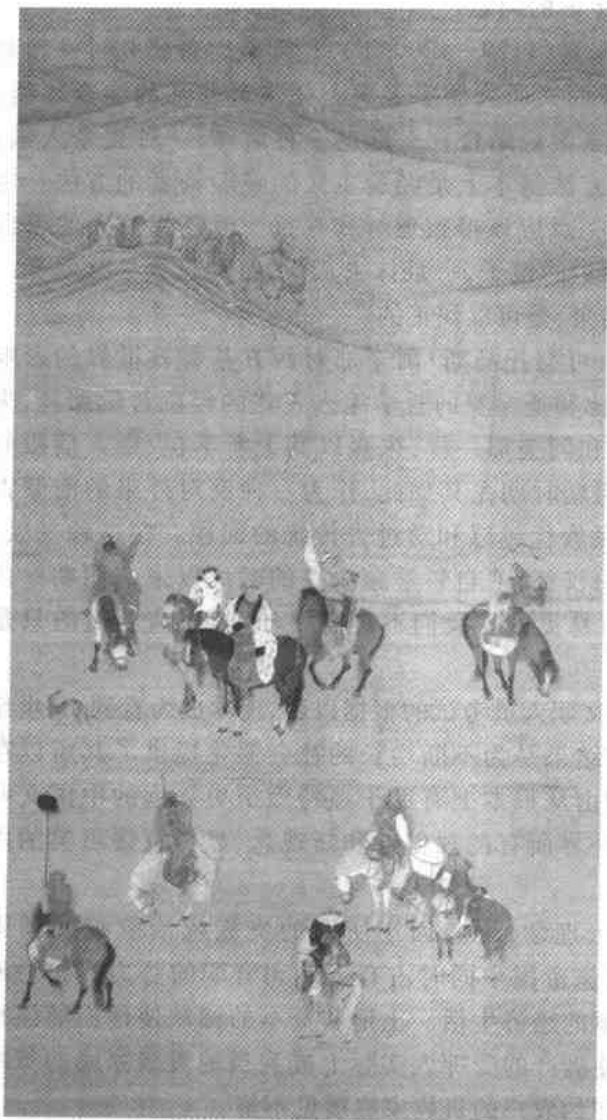


图 76 忽必烈汗狩猎图

身着白色毛皮外衣的忽必烈汗和他的蒙古武士一起在狩猎。注意画面上山后的骆驼商队。

#### 四、明朝的民族优越感与回缩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治理有序、社会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少有的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理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那时,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

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由于对这两者都不满意，他转而又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非凡的综合才能，他做出了把佛教和道教的成分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解释，一种更令人满意、更切合他那个时代的解释。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疏忽和教育有缺陷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很快将亚里士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入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融入理学。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无所不包、令人信服的思想，进一步阻止了哲学的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外来的前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对世人来说已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sup>3</sup>

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 19 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理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同时占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稀缺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新到一个省份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明清两代的中国是由官僚和贵族共同统治的，如果能对这两者作富有意义的区分的话。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为此而合作。较早时候的一些王朝偶尔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小心地避免向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提出任何挑战。

对比起来，发人深省、颇有意义的是，明朝政府率先控制和约束商人阶层。这是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一个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正如下章将提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强这种自

221

## 中国稳定的根源

中国文明的古老和稳定总是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世纪中期在中国任职的英国领事官员 T. T. 梅多斯,根据第一手观察资料做出如下解释。\*

中华民族作为同一个民族,其历史空前悠久,人口不断增长……其真正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信条和一种制度。……这三个信条是:

1. 必须靠道义的作用而不是靠物质力量来治国。
2. 让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妥善治理国家所必需的。

3. 如果君主道德败坏、肆意放纵自己,从而导致高压的暴政,那么人民有权废黜这样的君主。

一种制度是:

公职竞争考试的制度[科举制]。……

(严格地说来,长期以来一直是竞争性的)公职考试制度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原因:正是这种考试制度维护了其他一些事业,并使这些事业能有效地进行下去。全国凡是当父母的,都能理解这种考试制度的用意,所以,这种考试制度诱使父母们向自己的儿子们传授文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包括以上所引用的三个信条,以及有利于培养较高精神境界的其他许多知识。通过这种考试制度,所有贤能的人都给招募到小心地保持考试制度纯洁性的政府中来。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那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们并没有设置任何不公正的障碍来阻挠他的提升。……

通常的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础上:它不是一个专制政府。它所维持的军队和警察,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事实上,仅够镇压派别叛乱,而完全不足以镇压一个表示厌恶的、愤怒的民族。但是,尽管这一政府并不实施暴政,但它在形式上和机制上却是一个纯粹的独裁政府。在一个地区内,地方行政官是专制独裁的;在一个省里,总督是专制独裁的;在帝国中,皇帝是专制独裁的。民众没有立法权,没有自行收税的权利,没有投票使统治者落选的权利,也没有限制或者停止政府开支的权利。因此,他们有造反的权利。造反在中国是阻止专断的、邪恶的立法和行政的一种古老的、时常运用的符合宪法的正当手段。

\* T. 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Smith, Elder, 1856), pp. 23, 24, 401—403.

治权。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像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性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如第八章第五节所述,在于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 1912 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在理学的一些观念的支持下,能消减或减弱新技术和经济发展<sup>222</sup>的作用。但是,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多元化的文明;在这一文明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是被埋没,而是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约束力太强。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以行会头领为首的地方行会。但是,这些行会头领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首领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首领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 and 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 and 分配,如盐和铁等。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创建自由企业的机会,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中国统治集团限制性的内向政策的另一实例是竭力反对海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已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 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 32 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 20 000 人,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 1 000 人。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上。正是这一年,1603 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抛弃祖先坟墓的人,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同样,1712 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 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一中国政策<sup>223</sup>同西方政策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图 77 中国将军石像

中国将军石像。它是北京城外通往明朝陵墓的墓道两旁的一些护卫石像中的一尊。

15 世纪早期明朝航海业的异乎寻常的历史,提供了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抱消极态度的最富戏剧性的实例。这些航海其范围惊人,显示了确实证明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居领先地位的技术优势。随之而来的是,皇帝下达的禁止进一步海外探险的命令和官方对这一命令的立即执行(见第 9 章第 1 节)。

虽然皇帝下禁海诏书的确切动机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皇帝之所以能颁布禁海令,仅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体制结构和向外拓展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此时却崭露头角。

## 五、中国文明在日本

由于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不间断地延续到近代，它们以诸西方国家皆不能用以控制西方的一种方式控制了东亚。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已成为西方特点的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不可能存在，因此，游牧民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一直是最不依赖中国这一大国而自立的国家，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图 78 泥塑武士

从古墓出土的泥塑的穿盔甲的武士像。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不过,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大陆 115 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只有 21 英里宽。日本人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 13 世纪受到蒙古人的外来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擅长于借鉴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当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 1 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6 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除了带来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 645 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会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实施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与更早时候的氏族结构相比,这些变革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还远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无可争辩的首脑。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 19 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领域,日本以同样的方式修改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



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几乎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在新的封建时期,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有效地起作用。不过,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已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京都的各种娱乐活动,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个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居住那里的虾夷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因此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是,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结果,反对虾夷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进行。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12世纪,日本已由互相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这些封建领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大地主即“大名”最终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图 79 日本园林

京都众多美丽的园林之一。京都是足利将军的都城所在。

## 七、日本的回缩与孤立

226

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农作物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发展。早在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4世纪末叶,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同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削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会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

得立足点。然而这时,除了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国内的惊人作用外,还有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退缩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的条件下,在长崎港的出岛上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家;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为了寻求稳定,德川幕府从中国引进了儒家思想和制度。他们采纳了儒家的由四个阶层——武士管理者、农民、工匠和商人——组成的等级制。他们还借用了儒家哲学,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合适关系。他们还在江户建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儒家学派,因此,日本人民渐渐地为中国哲学的伦理道德标准所影响。虽然佛教仍是大众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儒教已慢慢地成为日本最强大的思想力量。

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像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更准确地说,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做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 推荐读物

第8章的参考书目中已列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著作。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由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参考书目的说明性文章:J. K. Fairbanks 所著的 *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Washington 出版社, 1968 年版)。这个参考书目列举了诸如官僚国家的崛起、商人的作用以及阶级结构和流动性之类主题的近期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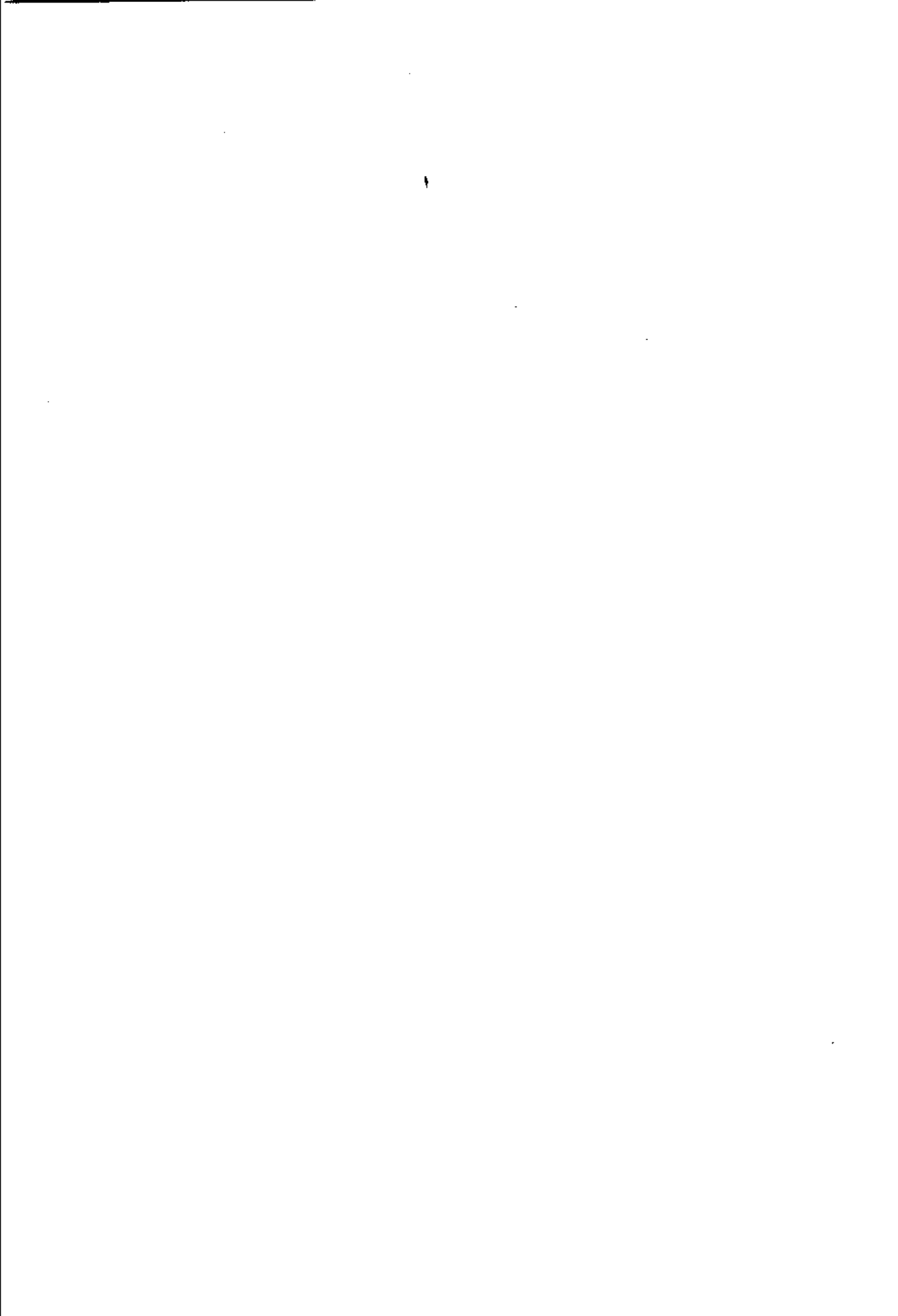
关于 220 年至 1644 年期间中国历史的一些更重要的研究成果是:W. Bingham 所著的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Waverly 出版社, 1941 年版); E. A. Kracke 所著的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3 年版); J. T. C. Liu 所著的 *Reform in Su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9 年版); C. O. Hucker 所著的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1368—1644* (University of Arizona 出版社, 1961 年版); E. Balazs 所著的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4 年版)。以下两卷分类的专题论文集分析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趋势:A. F. Wright 主编的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 1953 年版); J. K. Fairbank 主编的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 1957 年版)。另一本有用的书

是:J. M. Menzel 主编的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 (Heath 出版社,1963 年版)。最后,M. Elvin 所著的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3 年版)一书分析了为何中世纪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成就没有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J. Needham 所著的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1969 年版)一书对此也有所论及。对于那些认为 Needham 的不朽著作过于浩瀚的人来说,更易理解但却很可靠的记述是:R. Temple 所著的 *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1987 年版)。主题与此相关的另一本读物是:P. Snow 所著的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Weidenfeld & Nicolson 出版社,1988 年版)。最后,W. H. McNeill 所著的 *The Pursuit of Pow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82 年版)一书从全球的角度分析了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的成就。

关于日本,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了一个方便而通用的参考书目,即 J. W. Hall 所著的 *Japanese History: New Dimensions of Approach and Understanding*, 2nd ed. (Washington 出版社,1961 年版)。详细阐述的标准书目是 B. Silberstein 所著的 *Japan and Kore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University of Arizona 出版社,1962 年版)。关于日本政治、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在 R. Tsunoda et al. 所著的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1958 年版)一书中得到提供。英国学者 G. B. Sansom 所著的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修订版(Appleton 出版社,1944 年版),及其权威性的三卷本的 *A History of Japan*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58—1964 年版),撰写了规范的通史。最好的介绍性的报告是 E. O. Reischauer 所著的 *Japan Past and Present* 的修订版(Knopf 出版社,1953 年版)。

## 注释

1. 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pp. 1, 140.
2. H.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 (London, 1914), p. 154.
3. Cited by L.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per & Row, 1943), p. 200.



中世纪后期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一个复杂文明的首次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

——小林恩·怀特

---

## 第 14 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古人并不知晓；我们应注意到，没有哪个方面的发明就其力量、功效和结果而言，比三大发明更惹人注目。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sup>1</sup>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提出的这一论断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他如此明智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新文明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全球处于革命的新社会的影响下时，也为全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

### 一、西方的多元化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保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

骑士。”<sup>2</sup> 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所作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准确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基本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很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来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所需的资金。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是，接受者们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做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是，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为私有财产。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领主除提供封地以外，还应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 40 天。



图 80 采邑

封建制度的后继者即采邑制度，依靠的是农奴们的自给自足。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

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应该是来自王权,所以,封建主们小心地选择一位合适的国王,即便他们无意尊重这位国王的统治权。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下来时,国王们渐渐能够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利,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一样,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作为对这种经济崩溃的反应,采邑成为靠农奴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农庄,靠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各不相同,其居民少则二十人,多则数百人。农奴与奴隶不同,他们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们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们必需耕种耕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

由于远距离贸易、集中式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满足自身的几乎全部需要。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是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采邑的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自给自足的村庄,恰恰因为它们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打铁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3节所述)取得了更大进展,超过了希腊—罗马的水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天主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似乎有悖常理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得更为强大。教皇无需像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坚称:“是主教,而不是俗权,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此外,拜占廷的皇帝们被穆斯林和其他敌人的攻击搞得不知所措。这就使教皇们可以放手加强自己在西方的地位;他们这样做时采取了两种方式。首先,他们与崛起的法兰克人结成联盟,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其次,教皇派出传教团,去改变北欧地区异教徒的宗教信仰。他们成功地组织了承认教皇权威的新教会——如597年成立的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的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的德意志教会。

当时西方新的多元化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以下这些:一个不受皇帝支配的独立的教会;代替皇权的封建君主和封建领主;代替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分别开垦荒地的自治的采邑;以城市为根据地、在反对贵族、高级教士、最终是君主的过程中有效地行事的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一社会,这一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社会,在1000年后



的 500 年中如何发展和适应,以及最终怎样发展起海外扩张的力量与动力,是以下几节所要讨论的主题。

##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促使欧洲在中世纪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免遭了公元 1000 年后的多次大规模侵略。只要看一看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13 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 和 16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欧地处偏远位置的重要性。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西盛行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以北的欧洲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河流终年无冰,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锯齿形的海岸线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

当然,这些自然资源一直是人们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对适当技术的这一需要在各地和各时代都存在。例如,上个世纪,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情况同样如此。中世纪的西欧也是这样,在那里,先进技术首次使当地资源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结果,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

## 三、技术的进步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抑制新的技术。另一原因是,很多地区都存在的边疆环境需要节省劳力的装置。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社会尺度表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对

生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之地,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被载入史册。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这样做时,他们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建造修道院,他们将新拓居地的边界推进到了北欧和东欧的森林中,而且,他们还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方法。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其一是“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制从8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时,任何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耕,而过去使用“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置。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明;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这样安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重型轮式犁与原始的爬犁完全不同,爬犁通常用于翻耕地中海盆地贫瘠的砂土;而重型轮式犁则使耕种欧洲中、北部地区肥沃却又难以翻耕的洼地成为可能。

更有效地利用马力也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很少用于农业,因为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因此,马过于用力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不过,到10世纪时,人们发明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马拖重物时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动力来源。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增加了马犁地的效用,而且还增加了马驮运货物的效用。

232

最后,应该简单地看一看极其重要的水车和风车。水车和风车在希腊—罗马时期便已为人们所知道,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区不存在这两大障碍,所以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原动力。于是,水力开始用于锻锤和锻炉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捣矿机。的确,英格兰1086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登录了5000家磨坊。这就是说,每50户人家就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 四、发展中的经济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年至1300年期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首先是一连串的粮食歉收和饥荒,尤其是在1315年至1316年期间;然后是黑死病,黑死病首次流行于

1349 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周期性地爆发；最后是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不过，1400 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盐、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大不列颠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丰富的木材和松脂的开采范围，这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北部地区渔业的产量，尤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农民首次开始耕种村庄周围的荒地。令人吃惊却又千真万确的是：12 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得到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

农民不仅耕种附近闲置的土地，而且还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迁徙的西进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挺进的东进运动。例如，到 1350 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 1500 个，由 15 万到 20 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在损害东欧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的情况下渡过易北河，而且其他移民也正在强行进入穆斯林西班牙，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进入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地区。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10 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侈品。不过，到 14 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边缘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虽然当时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末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沿途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沿内地商路发展起来的大集市，对商品流通也很重要。这些集市中，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是刚出现，且处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框架中，所以市民们从开头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当市民们获得权力和财政资源时，他们通常能说服国王向他们颁发皇家特许

状,准许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市镇内联合起来。这种市镇有权充当社团,有权用自己的社团印章签订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行会是自愿社团,用以防护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们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例如,当时的惯例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语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使人感到自由。”



图 81 市场透视图

一幅绘于15世纪的透视图,画的是11世纪或12世纪的一个市场。中世纪妇女正在积极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尤其是从事食物和衣物的交易。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不仅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实体,而且还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实体。例如,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们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波罗的海沿岸的各种城市——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和总数达90个的其他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竭力主张在外国的商业特权,几乎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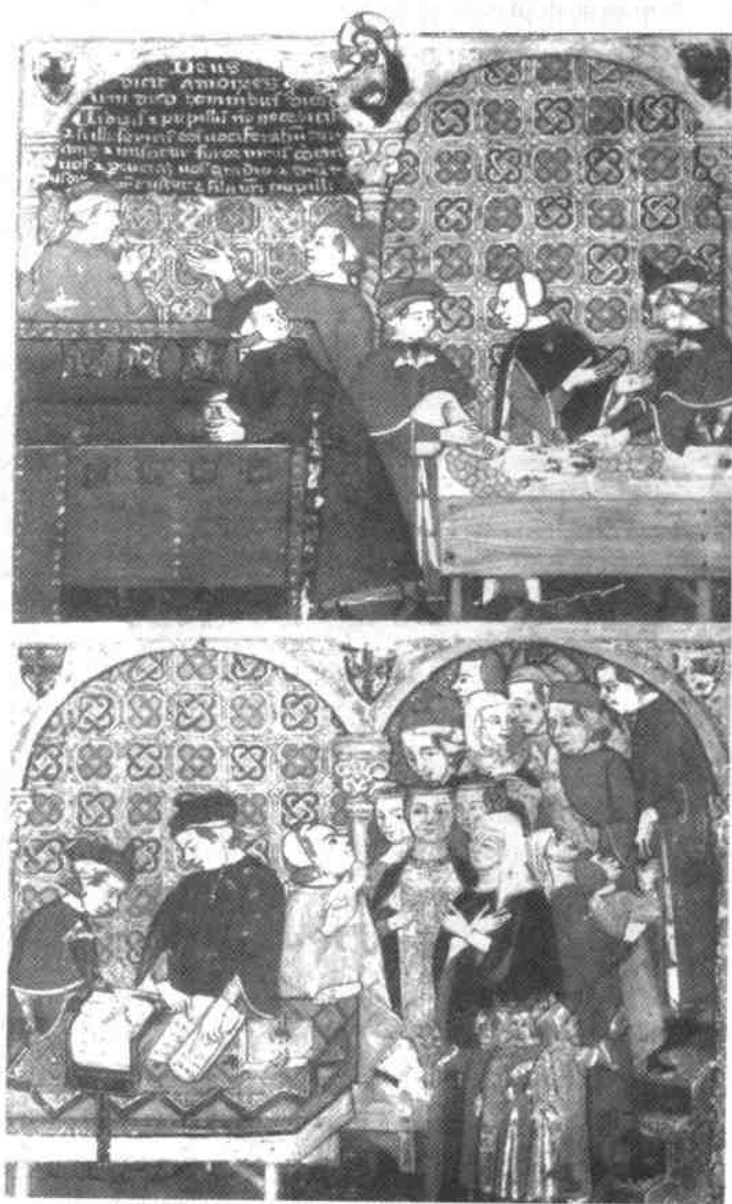


图 82 意大利银行

图中所绘为 14 世纪末的意大利银行。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文臣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地区和印度拉其普特人的一些国家是地方贵族料理政务，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不仅在稳步地获得经济力量，而且在稳步地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

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海外冒险事业。

## 五、新的君主国的崛起

295

到10世纪时,西欧已遍布封建小国;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蚕食已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西欧社会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诸城邦有时结成诸如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之类的强大组织。因此,为了反对这些集团的专一主义利益,此时兴起了一股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后继者“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不断变化,无限多样。

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而不支持反对教皇权力的拜占廷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即位,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开始了。到13世纪时,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颁布《教皇训令》(1302年)时,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在《教皇训令》中,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坚定地阐明了关于教皇权力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此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顾问这时把王国福利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八世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的教皇们成了法王的工具,失去了其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支配地位。

欧洲君主们的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与新兴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市民们向君主们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他们还充当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等,来提供管理才能。作为回报,新君主向市民们提供保护,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不合情理的要求。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自治的地方当局的一些杂乱模式;这些自治的地方当局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随着这些障碍物的消除,随着皇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出现了新的君主国。到15世纪时,这些君主国大致包括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领土。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实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

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早期探险者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探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家乡的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绝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 六、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

236 中世纪西方的文化和智能的发展，同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大约 1000 年期间的几个世纪，在几乎不具备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士们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对教会的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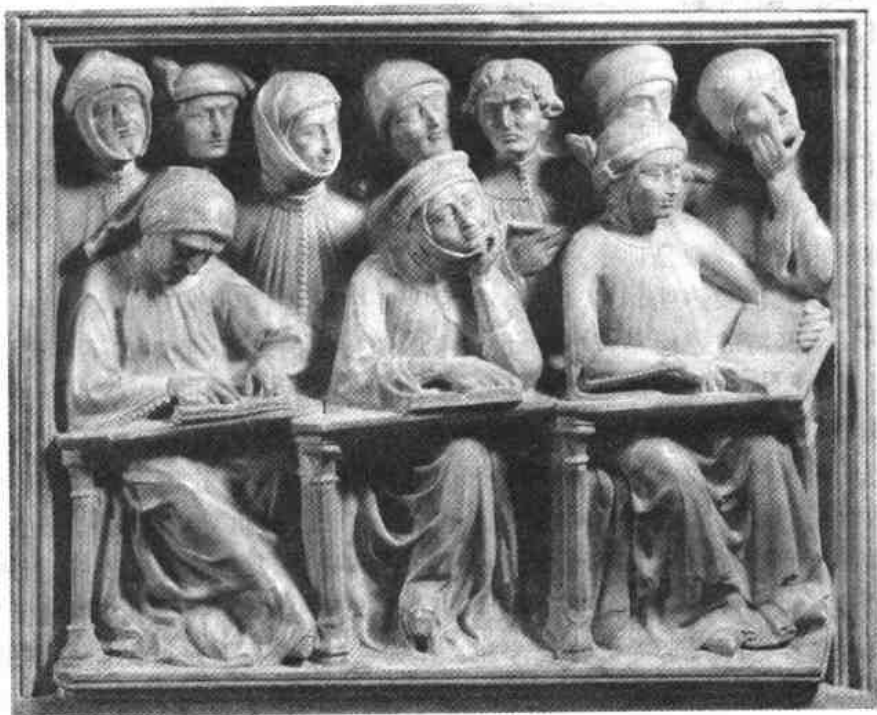


图 83 博洛尼亚大学的讲座

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大学作为复兴罗马法的中心而出名。这幅刻在博洛尼亚大学一位法学教授的坟墓上的雕刻品，表现的是学生们正在听他的一堂讲座。

11 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所辖教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

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们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此外,它们不像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而是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法、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中,有人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又有人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建立了一些大学。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重视培养教士是很自然的,也是适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

随着从大约1350年至1600年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教育和学术环境起了变化。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意大利开始,并因此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状况和价值观。意大利是以蒸蒸日上的工业以及西欧、富裕的拜占廷和伊斯兰教帝国之间有利可图的贸易为基础的一个活跃的都市社会。庞大的商人家族不仅控制了贸易和各种制造业,而且还控制了政治事务;他们对诸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和比萨之类的繁华城市起了决定性影响。正是这些商人家族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作家的资助者。尽管这些资助者中不仅有教皇如尼古拉斯五世、庇护二世、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而且还有公爵家族如米兰的斯福尔扎,但是,商业家族的需要、私利和爱好却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复兴;因此,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现世主义和人道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关心的是今世而非来世,注重的是异教经典而非基督教神学。

237

## 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

极有天才的里昂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他代表了所处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如此众多的领域中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还因为他乐于突出显示自己的天才。三十岁时,他给米兰公爵写了以下这封信;这封信给米兰公爵极深的印象,使后者雇用了他。\*

1. 我为建桥制定了计划。桥要建得轻巧、稳固,以便于运输,这样就可以追逐敌人,时常打败他们;而有些桥则要设计得非常坚固,无法被烈火和进攻所破坏,同时还要便于我们撤退和部署兵力。我也制定了焚毁和破坏敌人桥梁的计划。

2. 当一个地方被围困时,我知道如何切断引自沟渠的水源;我还懂得如何建造大量的桥,如何制造盾牌、云梯和其他与军事相关的器械。……

4. 我还打算制造大炮。这些大炮应该便于运输,能够发射冰雹般的小石子,它们落地产生的烟尘能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恐惧、损失和混乱。

5. 为到达某一个固定地点,尽管也许有必要在沟渠底下或河底下行进,但我还



有办法通过洞穴和蜿蜒的秘道悄无声息地到达那里。

6. 我还能制造安全的、攻不破的装甲车。这些装甲车可以驶入备有大炮的敌人的密集行列中,而且,敌军的阵营再庞大,也抵挡不了这些装甲车。步兵可以安然无恙、不受抵抗地跟在装甲车后面前进。……

9. 如果战斗发生在海上,我打算建造许多既适合进攻又适合防守的发动机,还打算建造一些能抵挡最猛烈炮火和烟雾的船只。

10. 在和平时期,我相信在建筑方面,在建造公私用房方面,在将水从一地输送到另一地方面,我可以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令您完全满意。……

如果有谁认为上述事物中有哪一样是不可能实现或不能实行的,我很乐意在您的公园里或阁下喜欢的任何地方进行试验。再次对阁下表示最真诚的敬意。

\* J. P. 和 I. A. Richter eds., *The Literary Works of Leonardo da Vinc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 92, 93.

文艺复兴运动的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反映在学术成就和教育中。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之父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克,即彼特拉克(1304—1374年),强调古典文学作为自我修养的手段和社会行动的指导所具有的价值。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成立的新寄宿学校,并不培训牧师,而是培养商人的子弟。学校课程注重的是古典作品研究和体育运动,其宗旨是要教育学生们快乐、健康地生活,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文艺复兴精神极为明显地体现在艺术方面。由于教会不再是各种艺术的唯一资助者,艺术家们便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鼓励,转向除传统的《圣经》中的题目以外的其他一些主题。虽然宗教题目通常依然出现,但是在诸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提香之类大师的作品中,创作重点越来越转向旨在揭示灵魂内在奥秘的肖像画,转向旨在以醒目的色彩和形式来使人感到赏心悦目的绘画。

文艺复兴运动并不只局限于意大利,16世纪时,它还将种种新事物传播到了北欧。促成这一传播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因素是受雇于北方诸君主的意大利外交官和将领,另一因素是加快了图书的发行和思想的交流的印刷机。由于识字现象在北欧比在欧洲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更普遍,所以印刷业在北欧尤其有影响。大批的印刷品激起了公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极大热情,从而大大地促成了宗教改革和随后的宗教和王朝战争。

最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文艺复兴的意义何在?显然,对人类、对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的新的强调,比起先前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事实依然是,在西欧出现了思想的蓬勃发展,这种发展在欧亚其余地区是不存在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根本差别。

在中国,儒学继续对社会起决定性影响。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改革创新,因而成为在各方面保持现状的最佳工具。这种因循守旧、坚持正

统观念的气氛阻碍了思想的继续发展,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尽管中国在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最初的辉煌成就。在这些早期发明之后,中国并没有制订出一套科学原理。



图 84 大卫像

年仅 26 岁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于 1501 年雕成的大卫像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象征,并被陈列在韦基奥宫(Vecchio)前面。这里展现的细部,突出了雕像赖以成名的压抑的情感和尊严。

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情况基本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注重神学、法学和修辞学,但轻视天文学、数学和医学。从这些学院毕业的学生对西方正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弄清楚。穆斯林土耳其人都不相信基督教教徒能传授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时地,会冒出一位出类拔萃的、有远见卓识的人警告说,这道思想铁幕具有将奥斯曼帝国与附近基督教世界分隔开来的危险性。生活于 17 世纪上半叶的著名的土耳其目录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兼历史学家卡提比·舍勒比,就是发出这种警告的人之一。由于出身贫寒,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这其实是塞翁失马。他用不着以浅薄的、吹毛求疵的态度专心于代表当时的奥斯曼教育的穆斯林神圣学业。他自学成才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对西方学问不存先入之见的态度。

在舍勒比的著作中,有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这本手册是他在 1656 年土耳其舰队于海上遭惨败后编写的。他在手册前言中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

的必要性：

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部队作战时，他们就可以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使攻击敌区、保护和守卫边境地区成为一件更为容易的事。同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商量是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即便他们是当地的老兵，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老兵大多完全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能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的必要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异教徒通过应用和尊重学问中的那些分科，发现了新大陆并侵占了印度的一些市场。<sup>3</sup>

舍勒比看到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在舍勒比 1657 年去世前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警告自己的同胞说，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很快就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言证明是有预言性的。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中，所以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基督教异教徒则凭借他们的新知识，最终不仅成为新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4 世纪至 10 世纪期间，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札尔人、维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是，从 10 世纪到 14 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见地图 18）。各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国。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在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当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时，他们反对异教的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征。骑士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 15 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侵实际上导致了中世纪后期每一种建设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



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力充沛，十字军东侵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14世纪大萧条后开始加速，结果，使十字军战士的扩张主义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也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此，希望他们能与基督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面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南北美洲偶然发现了一些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归依的臣民。

241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第安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所在的地区，是为了寻找基督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想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并发财致富”<sup>4</sup>。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海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1200年至1500年期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600吨到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到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13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舵，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14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把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原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革新的成果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100到200个划桨手及其食物和装备，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图 85 法国教士为一个印度人施洗礼

这位身穿独特的天主教教袍的耶稣会传教士正在为新法兰西的一个印度人施洗礼。法国耶稣会士允许印度的一些基督教皈依者至少能保留自己的某些习俗，在这方面，他们比欧洲的大部分传教士更宽容。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携手并进。尤其重要的是对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意义重大的领先地位。过去，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战。16 世纪的前 20 年，佛兰德和德意志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 300 码内的船只。海战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使欧洲人能占领并控制世界各大洋达 4 个世纪之久。欧洲人的优势随着 1905 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对俄罗斯人的划时代的海战胜利而结束。

伴随着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重要的新技术。意大利复式簿记的发明使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成为可能。另外，货币的日益广泛的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和信用状的发展以及中世纪基督教对禁止贷款和利息费用这一做法的逐渐放弃，也有利于商业经营。最后，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后，股份公司的发展大大地巩固了商业经营。这些股份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伙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最终能成功地与东印度和黎凡特的几家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现存的哈得逊湾公司相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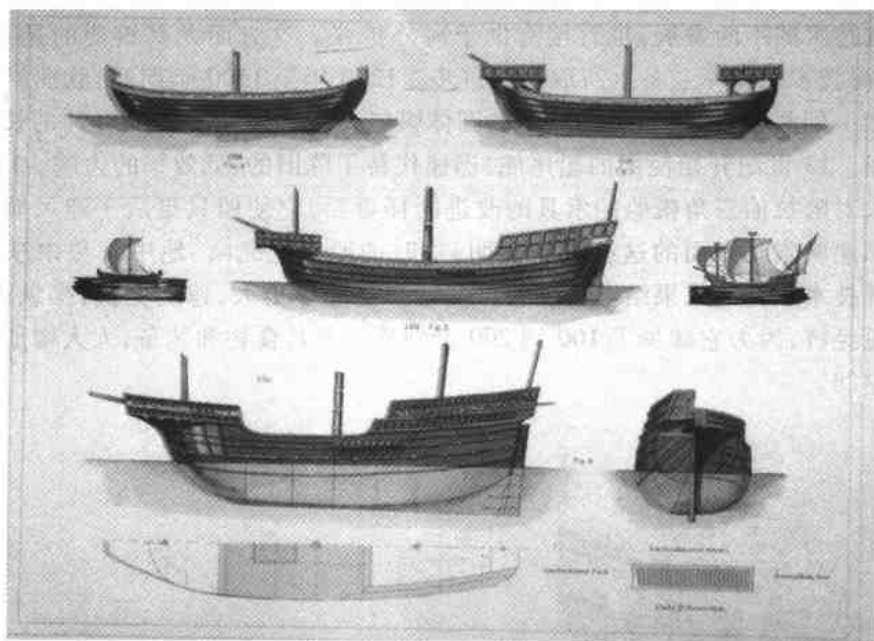


图 86 帆船的演变

在欧洲人能安全地在大西洋上航行之前，他们需要更大的、操纵起来更灵活的船只。这幅图表明了帆船从中世纪末期到 15 世纪的演变。技术上的改进包括建造更大的舵、设立更多的桅杆，以及对帆作新的安排。

最后，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使欧洲具有强大的、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当我们察看 15 世纪欧亚大陆对穆斯林世界的扩张的各种反应时便可明白。

如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述,当时的伊斯兰教以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然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向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9世纪英国人接管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和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尽管郑和的远征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人的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慎重地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使他们的地理视界开阔、商业野心变大,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使他们灰心丧气,留下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各国,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被困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继续同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交往,将货物转船运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仍很繁荣。但是,虽然这一安排使作为经纪人获得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感到满意,可其他欧洲人却很不乐意。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

由于他们有专门技术,有经济实力,有丰富的思想,还有相对抗的君主国之间的竞争,他们的追求必定成功。欧洲没有一个君主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另外,欧洲对国外产品有真正的需要,有强烈的要求,而且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准备起飞;当它起飞时,发现海路是畅通的,遂不可阻挡地扩张到全球各地。

## 八、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由于现下对妇女在全世界不同社会中的地位有争议,察看一下妇女在中世纪欧洲如何受刚出现的新文明的影响,是可以有启发教益的。我们已看到,在旧石器时

代漫长的数百万年中，两性之间的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平等。随着农业和文明的先后出现，妇女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平等地位，成为顺从、依赖男性的人。不平等的程度因地区而异（如在希腊不同的城邦之间），也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如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之间）。但是，在所有早期文明中，妇女肯定是“第二性别”。她们被束缚于“室内”工作，而男人则自由地从事“室外”工作；“室内”工作被认为是不太重要的，而“室外”工作则被认为是重要的、有创造性的。



图 87 妇女们的活计

佛罗伦萨的妇女们正在纺纱，织布，做针线活。这些活计占去了妇女们的大量时间，有助于服装的漂亮雅致；佛罗伦萨的男男女女以其服装的漂亮雅致而闻名。

中世纪的千年中，当一种革命的新文明逐渐在西方出现时，这一模式仍在继续。但是，有某些改变值得注意，而且对今天的女性具有某种意义。

女性在西方新文明中的地位主要由两种制度——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决定。在理论上，教会支持两性之间的平等，就像它也支持种族平等和阶级平等一样。“因为你们信仰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孩子。”圣保罗写道，“世界上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没有约束，也没有自由；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因为在基督耶稣看来，你们全都一样。”<sup>5</sup> 不过实际上，教会在性别问题上其态度是极为含糊不定的。它将女人视为夏娃，即亚当的妻子，因此是诱惑男人的人，是拯救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是，教会也将女人视为受尊敬的玛丽亚、圣母、贞洁的女王以及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解者。因此，中世纪的妇女发现她们自身的地位上下起落不定。在教会内部，妇女不能被授以牧师职，也没有布道的权利。

不过，教会的确提供了一个专门为中世纪妇女设计的重要机构，即女修道院。女修道院被称为一个“阶级机构”，<sup>6</sup> 因为虽然不是出于严格的教会法规，但实际上这一机构却要求想当修女的人随身带一份嫁妆来。尽管这份嫁妆不如一个丈夫所期望的多，但女修道院仍然主要是向来自贵族家庭、来自中世纪后期商人家庭的有钱妇女开放的。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妇女都结婚，而且在年纪很轻时就结婚。不过也有少数妇女找不到丈夫，或者是因为私生女身份或生理有畸形或没有足够的嫁妆，或者是因为甘愿一辈子做基督的新娘而不做某个男人的新娘。



对于这些特殊情况,女修道院提供了除婚姻生活外的一种选择。此外,修道院的隐居生活的确在某些方面比外面的生活优越。修女们比起自己世俗的兄弟姐妹们,通常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如果一个修女特别有抱负、有才能,那么她可以升至女修道院院长的职位,管理大地产,并对人数多达80名的修女承担责任。这些修女中,有一些在侍奉圣父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寺院生涯所带来的极大满足感,有少数人还成为伟大的苦行的圣徒,受到人们的纪念。其余的人除了在修道院的隐居生活中找到只有女修道院才提供得了的不受男权支配的自由外,还找到了自尊和社会的尊重。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一些人满腹牢骚地将自己视作社会弃儿:“我条件不够好,配不上男人,所以只好将自身托付给上帝。”<sup>7</sup>

对中世纪妇女影响最大的第二种制度是封建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封建领主将土地授予封臣,作为封臣服兵役的报酬,因此,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由男性居支配地位的世界。封建地产连同军事义务被传给单身的男继承人。只有在没有男继承人的情况下,女人才能继承。中世纪妇女的一生都在男人的监护下——首先是在她父亲的监护下,然后是在她丈夫的监护下。如果丈夫死了,她就成为由封建领主监护的人;封建领主将自己所监护的人的地产收益占为己有,直到她再嫁为止。封建领主可以决定她应该嫁给谁,所以对封建领主来说,将自己所监护的人的婚姻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反过来,向不想嫁人或想要自己选择配偶的寡妇索取报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女贵族还得忍受闲散无聊、漫无目的的生活所带来的烦恼。管理家务和照看孩子之类的事都交托给管家和保姆去做。因此,如果她们的丈夫去打仗或出席朝廷的会议,她们就会没什么事可做。大体上,这些女贵族的不幸命运就是充当缔结政治和经济联盟的工具,然后为她们所嫁的人家生育继承人。

村镇中的劳动妇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开这种依赖他人的边缘生活;因此,说起来好像矛盾的是,中世纪妇女地位的高低“大致与其财富和社会身份成反比”。<sup>8</sup>绝大多数农村女孩都会嫁人,并与自己的丈夫并肩从事每一种农活。少数几个不嫁人的女孩通常都是出身于最贫穷的家庭,所以她们会离开自己的村庄,靠到城里去做女仆或到邻近村子中去当农家女佣来养活自己。以下这条中世纪时期的谚语反映了农村妇女在日常生活是如何辛劳:

天气不好会使丈夫们有片刻的喘息时间,  
而家庭妇女的活儿却永远也做不完。<sup>9</sup>

同样,在城镇中,妇女们几乎活跃在各个行业中。从13世纪艾蒂安·布瓦洛所编的《行业手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该手册登录了巴黎所有行会的规章。在所列举的100个行会中,有86个行会均有妇女在工作。中世纪时,常在一些英语单词后加上后缀“ess”或“ster”来描述妇女所从事的工作,这也表明了妇女所起的作用

245 是何等重要。例如：

|             |      |
|-------------|------|
| Webster:    | 女织布工 |
| Brewster:   | 女酿酒工 |
| Baxter:     | 女面包师 |
| Laundress:  | 女洗衣工 |
| Seamstress: | 女裁缝  |
| Spinster:   | 女纺织工 |
| Governess:  | 女教师  |

中世纪妇女肩负与男性同样的重担和责任，但却享受不到平等权利。在乡村中，家庭主妇有干不完的活儿，可是她们被排斥在所有决策机构之外。她们不能担任乡村公证员、堂区牧师、采邑法庭文书之类的职务。村里地主们的会议，除了未婚或孀居的女地主外，只准男人参加。拥有土地的已婚妇女须由丈夫作代表，参加所有的乡村会议。同样，在城镇中，妇女们享有诸如拥有财产、加入行会和从商之类的经济权利，但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她们不能参与城镇政府机构的选举，也不能被推举到城镇政府机构中去。

两性关系中这种根本的不平等，从中世纪欧洲通常的各种习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一是颇为流行的殴打妻子的习俗。佛罗伦萨流传的一句谚语是：“好女人和坏女人同样需要棍棒的管教。”13世纪时，法国的法律条文规定：“在很多情况下，若男人伤害妻子，可以免受惩罚。……当妻子伤害丈夫时，丈夫殴打妻子是合法的，只要别把她打死或殴残就行。”<sup>10</sup>对通奸坚持传统的双重标准这一点，也表明了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国王、贵族和商人可以公开养情妇和私生子。但是，偷情的妻子却会受到羞辱，受到严厉的惩罚，她们的情夫会被阉割或杀死。此外，上流社会的男人接近下层社会的妇女，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2世纪一本题为《典雅爱情的艺术》的小册子，鼓励对一个农家女孩想入非非的骑士“毫不犹豫地去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强行拥抱她。”

人们通常认为，妇女应满足于做一些“适合女人做的琐事”，而男人则应干一些“大事”；这种看法同样表明了普遍的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利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5世纪30年代写道，男人应把对“小事的关心”留给自己的妻子，使丈夫们能自由地从事“一切适合于男人的、光荣的事业”。<sup>11</sup>

所有这一切使人回想起农业革命之后两性关系的重大转变；当时，妇女失去了平等地位，开始出现女性的不重要的“室内”工作和男性的重要的“室外”工作之间的区分。一旦这种区分被接受，它便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变得根深蒂固。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区分不仅存留于相继出现的古代文明，而且存留于西欧出现的新文明。中世纪末期，尽管有了技术进步、经济活力和政治改革，但过去的习俗依然是欧洲妇女的沉重负担。固有的性别歧视甚至在长达数世纪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变革时期也依

然存在。过去对现在的这一胜利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今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之相同的模式还可觉察到;这一点,从1915年卡贝尔郡(位于西弗吉尼亚)教育委员会在学校公报上颁布的以下“女教师行为准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 在合同期内不得结婚。
2. 不得陪伴男人。
3. 晚8点至早6点之间必须在家,除非参加学校活动。
4. 不得在闹市区的冰淇淋店闲逛。
5. 不得出城旅行,除非得到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允许。
6. 不得与任何男性一起乘马车或汽车,除非他是你的父亲或兄弟。
7. 不得抽烟。
8. 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衣服。
9. 决不可染发。
10. 至少穿两件衬裙。
11. 裙子不能短于脚踝以上两英寸处。
12. 为保持教室整洁干净,每天必须至少清扫地板一次;每周必须用热肥皂水擦洗地板一次;每天擦黑板至少一次;早7点生火,使教室到早8点时很温暖。<sup>12</sup>

246

### 推荐读物

关于蛮族入侵之后中世纪早期的著作,见第12章的参考书目。联系全球的对中世纪欧洲做出重要的、振奋人心的研究的是:R. L. Reynolds 所著的 *Europe Emerges: Transition Toward an Industrial World-Wide Society 600—175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出版社,1961年版)。关于中世纪西方的优秀的通史著作是 R. S. Lopez 所著的 *The Birth of Europe* (Lippincott 出版社,1966年版)。

对封建制度的最好介绍是:J. R. Strayer 所著的 *Feudalism* (Van Nostrand 出版社,1965年版);和 M. Bloch 所著的 *Feudal Society*, 2 vo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61年版)。关于社会 and 经济发展,参见 J. LeGoff 所著的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 (MIT 出版社,1988年版); R. H. Bautier 所著的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Europe* (Harcourt 出版社,1971年版); R. S. Lopez 所著的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71年版); B. H. Slicher van Bath 所著的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 (Arnold 出版社,1963年版); L. White Jr. 所著的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s* (Clarendon 出版社,1962年版)。关于君主国的兴起,见 B.

Guenée 所著的 *States and Rulers in Later Medieval Europe* (Blackwell 出版社, 1984 年版)。对文艺复兴的优秀的概括性介绍是: W. K. Ferguson 所著的 *The Renaissance* (Torchbook 出版社, 1940 年版) 和 P. Kristeller 所著的 *Renaissance Thought, 2 vols.* (Torchbook 出版社, 1961—1965 年版), 以及 W. Pater 所著的 *The Renaissance* (Meridian 出版社, 1961 年版)。最后, 对于为何是西方而非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在海外扩张中居领先地位这一关键问题, 在以下读物中进行了分析: J. R. Levenson 主编的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 1300—1600* (Prentice Hall 出版社, 1967 年版); D. L. Jensen 主编的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Heath 出版社, 1967 年版); E. L. Jones 所著的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1 年版)。关于为何欧洲遥遥领先于其他大陆这一问题的最新著作是 A. W. Crosby 所著的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1600*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96 年版), 该著作强调了新技术和以数量术语估量世界的新智能。

关于中世纪妇女的开创性研究见 E. Power 所作的至今仍有价值的概论“*The Position of Women*,” 该文收入 C. G. Crump 和 E. F. Jacob 主编的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 (Clarendon 出版社, 1926 年版), pp. 401—434。近期的重要著作有: S. Shahar 所著的 *The Fourth Estate: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Methuen 出版社, 1983 年版); F. and J. Gies 所著的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Crowell 出版社, 1978 年版); S. M. Stuard 所著的 *Women in Mediev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出版社, 1976 年版); S. H. Gross 和 M. W. Bingham 所著的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 (Glenhurst 出版社, 1983 年版)。

## 注释

1.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aphorism, p. 129.
2. Cited by R. S.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Lippincott, 1967), p. 146.
3. Cited in manuscript by L. V. Thomas, *Ottoman Awareness of Europe, 1629—1800*.
4. Cited by J. 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3), p. 19.
5. Galatians 3:28.
6. Eileen Power,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C. G. Crump and E. F. Jacob, eds.,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 (Clarendon, 1926), p. 413.
7. Eileen Power, *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 c. 1275—1535* (Cambridge University, 1922), p. 31.
8. F. and J. Gies,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Crowell, 1978), p. 232.
9. 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 (Glenhurst, 1983), p. 84.
10. *Ibid.*, p. 46.
11. *Ibid.*, p. 228.
12. Republished in “*Dear Abby*” column by Abigail Van Buren,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7, 1979.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 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

在欧亚大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上,最惊人、最重要的发展是西欧从贫穷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崛起。在从约 500 年至 1500 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其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教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当第一批西方人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认为,从这些奇怪的“长鼻子野蛮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正因为自身比较落后,所以乐于并急于学习和适应外界。他们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

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在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1000 年),中东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都市生活方面进行了基本改革,起了发达的文明中心的作用。但是,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在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转变中落后了。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比较落后的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有创造力的革新中起了先锋作用;革新中涌现的新事物除了包括儒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这些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包括对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的有效利用。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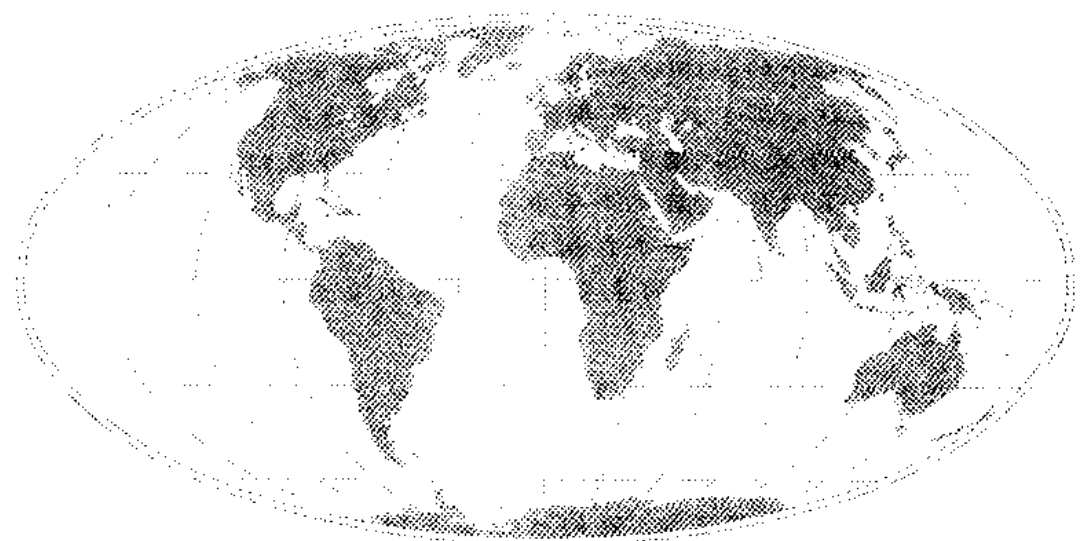
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

今天,当西方——中世纪西欧的后继者——不再代表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

而是代表全球的最高度发达的地区时，这一法则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变得十分明显。此外，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历史的发展速度与中世纪相比已大大加快。从二战后几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况看，这种加快就十分明显：日本和德国自在战争期间遭受破坏以来，其经济已有了迅速的恢复；苏联突然间发生政治解体，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世界地图上的一个空白处。在这样一个不断加速变革的时期，适应能力对个人和民族的成功来说——或许应该说，对个人和民族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林登·B. 约翰逊总统对这一情况作了最好的概括，他告诫美国同胞说：“我们必须以变应变。”

### 推荐读物

“受到阻滞的领先”这一概念的全部含义在 M. D. Sahlins 和 E. R. Service 主编的 *Evolution and Clut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出版社, 1960 年版) 和 E. R. Service 所著的 *Cultural Evolutionism: Theory in Practice*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出版社, 1971 年版) 中得到了阐述。



## 第四编

# 1500 年以前的 非欧亚大陆世界

至此,我们已专门论述了欧亚大陆的历史。现在,我们转向世界的非欧亚大陆部分的历史。这样分别论述的原因在于,所论述的诸民族的历史基本上是互不相干的。1500年以前,世界的欧亚大陆与非欧亚大陆部分之间没什么交往。那数几百万年间的人类历史就范围而言,实质上是地区性的历史,而不是全球范围的历史。一旦人类分散到各个大陆,他们彼此之间就失去了联系,随后几千年中,他们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各自的大陆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人类技术的进步既是人类早先分散各地和与世隔绝的主要原因,又是人类后来互相交往和重新统一的主要原因。

我们早些时候(在第1章第3节中)已提到,当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学会使用工具、缝制衣物和控制火时,他们便有力量离开通常所认为的他们原先的故乡非洲,向四处迁移,占据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但是,一旦在新的家乡安居下来,他们就无法与留在老家的亲戚们保持联系,因为他们的技术太原始了,无法来回航行,越过将各大陆分隔开来的海洋。在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连接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的陆桥和东南亚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中转岛屿被淹没之后,情况尤其如此。由于这一原因,人类各居留地必然在地区性的孤立状态中存在数百万年。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种种进步时;这些进步使中国人能绕东南亚航行,穿越印度洋,同样,也使西欧人能绕非洲南端和南美洲航行,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这样,世界诸民族重新建立了彼此间的直接联系,从而开始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全球性阶段。

由于欧洲人在海外探险中占主要地位,历史教科书着重强调了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强调了他们的发现以及随之产生的影响。这种态度对全球历史来说是不适当的。全球性的观点不仅要考虑扩张中的西方,而且要考虑西方扩张所至的诸地区。毕竟,这些地区的民族构成了人类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因此,他们的发展不能被忽视。另外,非欧亚大陆的国家、民族和制度在决定西方扩张主义的结果方面,同西方人一样,也是十分重要的。鉴于这些原因,本书接下来的两章将叙述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历史。



在树木茂盛的尼日尔河谷， 251  
在蜿蜒曲折的沃尔塔平原，  
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山肩上，  
覆盖着像冰一般光泽的白雪。  
这里是广袤而难以捉摸的非洲，  
那个很久以前的非洲。  
——米歇尔·德-阿隆(加纳诗人)

---

## 第15章 非洲

随便看一眼世界地图即可明白，非洲位置居中。它北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狭窄且容易渡过的水域，在历史上起了交通干线的作用。东面的西奈半岛是通向亚洲的桥梁，而红海比地中海更狭窄、更易通过。虽然印度洋的浩瀚无垠，但季风可以使东非和南亚之间的来回交往非常便利。

然而，历史上，人们却错误地认为非洲与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余地区相隔绝。这种感觉中的与世隔绝，使这块大陆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在历史学家们强调这块大陆的与世隔绝的同时，他们还强调非洲在这一时期中从外部世界借鉴了许多东西；不过，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当有意义的接触和交往发生时，交流才得以存在。本章将考察非洲的内部发展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 一、地理环境

综观非洲大陆，其南北两端是小而肥沃的狭长地带。这些狭长地带很快让位于广阔无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绵延起伏的草地或大草原，北部以苏丹草原最为著名：“苏丹”这一阿拉伯词意谓“黑人之国”。然后是热带雨林；对外面的人来说，穿越热带雨林最稠密的地区，比穿越沙漠还难。 252

非洲大陆极为巨大，且富于变化。其地理上的多样性对非洲人来说始终是一个

挑战,但它从未被看做是一个障碍。从历史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便在非洲地理条件最差的区域,诸土著民族也创造了重要的文明和文化。

非洲时常被人为地划分为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但是,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决不是一道分界线,也不是一个障碍物。在非洲所能察觉到的种种障碍物,对外面的人来说,是一道屏障,使非洲在大陆历史的早期阶段难以穿越和征服。不过,非洲并没与世界的其余地区相隔绝;纵横交错于全非洲的许多商路将非洲诸社区连结起来,而且,这些商路还经由红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将非洲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非洲在早期阶段就建立了一个高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这一组织有效地控制了贸易、商路和市场,并使潜在的侵略者通常无法迫近。

在考察非洲大陆的政治组织时,非洲的历史学家们时常非常强调中央集权的王国、国家和帝国。除了有组织国家之外,非洲还存在许多团体,它们一直是分散的,但逐步发展起能很好地起作用、妥善地为当地人服务的适当的治理结构。例如,现代尼日利亚数以百万计的伊博人就从未建立过中央集权的国家。

## 二、农业和铁器



图 88 锻造锄头

在欧洲人来非洲之前很久,非洲人已使用铁制工具。这幅插图取自戴维·利文斯通所著的《最后的日志》,表现的是非洲人正在锻造锄头。

人们时常认为非洲的技术和农业是从欧亚大陆引进的。最近的考古研究正在改变我们对非洲的这些发展的看法,因为考古研究表明,非洲许多地区早在公元前就开始开采铁矿,就掌握了冶铁知识。不同地区开始开采铁矿的时间如下:在现代坦桑尼亚的湖泊地区,是公元前 7 世纪;在梅罗伊(Meroe),是公元前 5 世纪;在西非

的诺克(Nok),是公元前 4 世纪;在东非的北部大湖地区,是公元前 3 世纪。这些情况表明,可能很多地区都是独立地发展对铁の利用,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引进铁。铁的这些早期使用者很可能将对铁の利用保守秘密。不过,公元 2 世纪至 5 世纪期间,冶铁技术通过已学会使用铁的班图农民传播到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班图诸民族从西非到中非、东非和南非的运动时常被说成是一种迁移,但是,这是小部分班图民族的逐步的迁移,他们时常与自己所渗入的地区的人们通婚。到公元前 5 世纪时,班图人已到达现代的扎伊尔地区,但是公元 2 世纪至 5 世纪期间铁的广泛使用,使班图人能更迅速地迁移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其余地区。

铁的出现对非洲的影响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一样广泛。包有铁头的锄和装有铁头的斧使农业有可能扩展到非洲的森林地带,正如更早时候铁的使用使农业进入中欧、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森林地区一样。结果是提高了农业产量,有了可用于贸易目的的剩余产品。正如在欧亚大陆一样,这转而导致社会分化——导致诸民族分裂为取代简单亲属关系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因此,大约公元 9 世纪前后,出现了明确的国家机构,这些国家机构进行军事管理和行政管理,拥有维持这类管理所必需的税收来源。



图 89 非洲传统农业技术图

一位现代非洲画家绘制的非洲传统农业技术图。图的前景左侧是两位妇女正在一个大石臼里碾米,而远处的男人们正在锄地和收割。

非洲的技术进步使这块大陆的种族成分受到影响。采用农业和冶铁技术并从中得益的，是易接近的黑种人，而不是不易接近的桑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种人；他们凭借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在损害桑人和布须曼人的情况下向南推进。这种扩张主义在班图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班图人是一个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他们从中心发源地喀麦隆高原出发，于公元初渗入刚果盆地；在那里，他们发展了与人口稀少的桑人狩猎者的一种共生关系。公元 600 年至 900 年期间，他们从刚果盆地向东南推进，到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他们在损害桑人的情况下继续向南穿过热带大草原。这些迁移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种族集团，而早 1000 年时，他们却同高加索人、桑人和俾格米人一起非常公平地分享这块大陆。

## 非洲农业

在 7000 年前撒哈拉干涸成沙漠以前，这片地区曾支持了一个畜牧社会，这里放牧着成群的绵羊、山羊和牛。这里的人们用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来打鱼和放牧；这些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如今已在古代遗迹中被发现。

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何时开始种植作物，但我们的确知道，农业系统在这一地区不断发展，供养了拥有广阔市场和贸易中心的众多村庄居民。市场和贸易中心有助于产生非洲文化，如诺克、贝宁、加纳、马里以及苏丹和东非的其他王国的文化。

254 植物和非洲诸民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其他地方人们中的情况一样；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虽然农业大约在公元前 6500 年前后出现在埃及，但是，用于大面积采集的整套工具和粮食作物的出现却可以追溯到 18000 年前。有证据表明，这些整套工具是非洲的，而不是近东的。埃及的考古证据表明，6500 年前该地区最早的农夫也放牧绵羊、山羊和牛，并在凉爽的季节种植诸如大麦、双粒小麦、亚麻、小扁豆和鹰嘴豆之类的作物。

在西非森林地区，也有证据表明那里很早就驯化诸如油棕、豇豆和薯蓣之类的作物。这种驯化并不表明这些作物是外来的。例如，在热带大草原地区培育的水稻就被认为是当地原产的。此外，在埃塞俄比亚培育的大多数作物都是非洲本地的，没有从外地引进的证据。

## 三、伊斯兰教

非洲曾受到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影响，后者在公元 7 世纪侵占整个北非，然后以商

人和殖民者的身份沿非洲东海岸扩张。从这些沿海的基地开始,伊斯兰教对非洲诸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影响最明显的是体现于生活的外表——姓名、服饰、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等。此外,它也表现在农业进步和技术进步上,农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因与外界更为广泛的交往引起的;例如,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水稻和甘蔗。



图 90 迪京格热伯清真寺

坐落于廷巴克图的迪京格热伯(Djinguereber)清真寺。这座由泥土和木头建成的建筑是一座具有典型的苏丹西部风格的清真寺。清真寺独特的塔楼是伊斯兰教存在的象征。它证明伊斯兰教曾经由陆上商路传到中非和西非的廷巴克图等地方。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地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的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鸟羽、制作香料的灵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苏丹和北非之间的贸易对

双方都很有利，因此，到 1400 年时，整个西非商业道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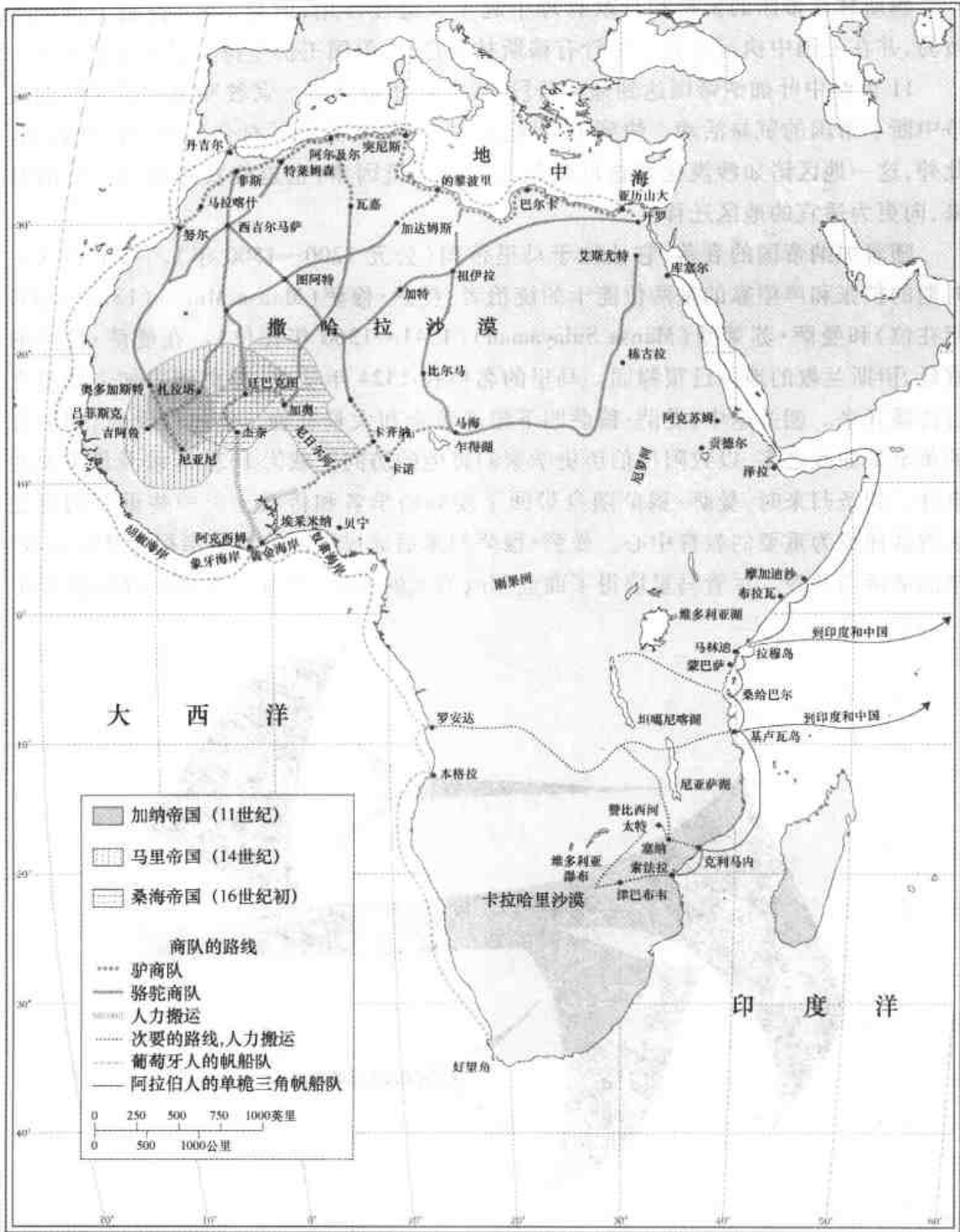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一种相类似的贸易模式正在东非形成。沿海地区的穆斯林经纪人派代理商前往内地，从今天津巴布韦所在的地域收购象牙、奴隶和黄金，从加丹加收购铜。这些商品是通过当时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的。以后几个世纪中，他们还从内地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础。因此，我们看到，地中海使北非与中东和欧洲诸民族之间长达好几个世纪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同样，印度洋使东非与中东、印度、南亚甚至远东诸民族之间类似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

现在，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些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

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辽阔，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合。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做忠实的封臣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领导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皇权拴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皇权服务的人。

#### 四、贸易与苏丹诸帝国

伊斯兰教的征服给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以新的推动力，并使这一贸易与穆斯林世界连在一起；穆斯林世界的货币制度依赖黄金。最早与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加纳帝国（约公元 400—1200 年）（参见地图 19）。这一帝国由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草原上的、操索宁克语的非洲人建立。虽然我们不知道加纳帝国建立的确切日期，但早在公元 5 世纪时它便已存在。加纳帝国的名声远远超



地图 19 非洲大陆的帝国和商路

出撒哈拉地区,并远播到巴格达。曾在位于该城的阿巴斯哈里发宫廷中居住的阿拉伯作家阿尔-法扎里,将加纳描述成“黄金之国”。

穆斯林在帝国的贸易和行政管理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国王控制了帝国的贸易,并在王国中执行审判。尽管有穆斯林的存在,但国王仍坚持自己祖先的宗教。

11 世纪中叶加纳帝国达到鼎盛阶段,接着便开始衰落。宗教冲突和毁灭性的战争中断了帝国的贸易活动。快到 12 世纪末时,加纳又失去了对金矿开采区的控制。此外,这一地区诸如沙漠化和过度放牧之类的环境因素,也迫使农民和商人分散开来,向更为适宜的地区迁移。

随着加纳帝国的衰落,它让位于马里帝国(公元 1200—1500 年)。马里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和声望靠的是两位能干的统治者:曼萨·穆萨(Mansa Musa)(1312—1337 年在位)和曼萨·苏莱曼(Mansa Sulayaman)(1341—1360 年在位)。在曼萨·穆萨的宫廷,伊斯兰教的地位已很稳固。马里的名声在 1324 年曼萨·穆萨到麦加去朝圣之后传播开来。朝圣途中,曼萨·穆萨四下赠送黄金和大量礼物。路过埃及时,他散发的黄金是如此之多,以致阿拉伯历史学家们将他的访问记载为 1324 年埃及最重要的事件。朝圣归来时,曼萨·穆萨随身带回了虔诚的学者和传教士。一些重要的商业区就这样成为重要的教育中心。曼萨·穆萨归来后通过更诚笃地信奉穆斯林的宗教,来纯洁伊斯兰教。尽管马里取得了商业和政治上的成就,但由于内部政治问题和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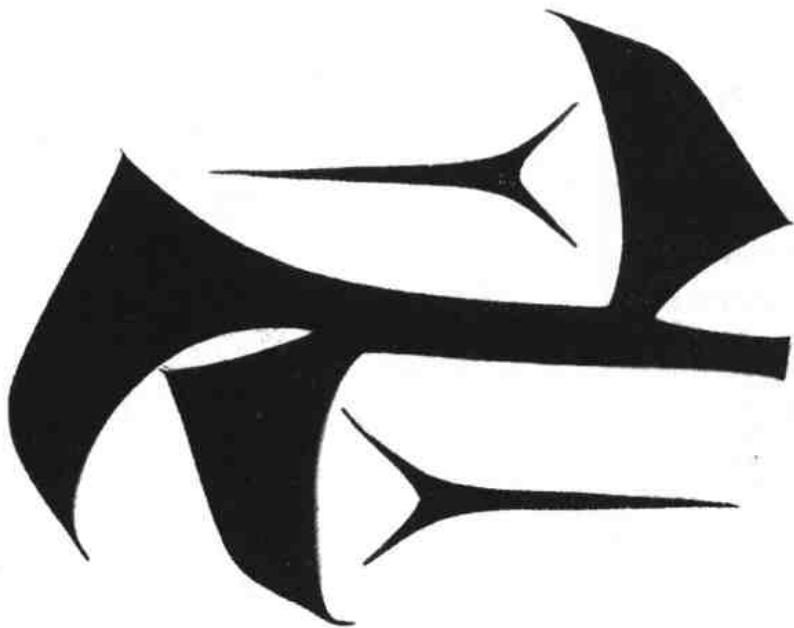


图 91 非洲古代的铁制钱币

在赤道非洲发现的铁制钱币的实物。



来攻击,它还是开始衰落。苏丹西部诸大帝国中的最后一个是桑海帝国(公元1350—1600年)。该帝国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除了它地处肥沃的苏丹草原这一地理位置外,还有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都促成了这一王国的兴起。此外,王国坐落在尼罗河两岸,也为捕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当桑海发展成为帝国时,它的人民给划分成三个专门职业阶级:索库人(通常是渔民)、杜尔人(通常是农民)和戈人或加比比人(通常是猎人)。

桑海在14世纪末叶摆脱马里的统治取得独立并开始扩张以前,一直是一个小王国。当它成为帝国时,仅享有一个世纪的辉煌,即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早期数十年的辉煌。

桑海的扩张和这一帝国的巩固可归因于两位皇帝:桑尼·阿里(1464—1492年在位)和阿斯奇亚·穆罕默德(1492—1528年在位)。后者利用廷巴克图的战略位置,复兴了对帝国至关重要的贸易。阿斯奇亚明白伊斯兰教的重要性,所以努力争取穆斯林社会的支持。他与一些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交往,鼓励教育。在廷巴克图,他设在桑克尔清真寺的大学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其中一位学者给我们留下了对廷巴克图的智力活动的描述:

在那些日子里,从马里省到马格里布最偏远的地区,若论社会公共机构的稳固、政治权利、道德纯洁、人身安全、对外邦人的体贴和同情、对学生和学者的谦恭有礼,没有哪里能与廷巴克图相比。

258

周游过这一地区的摩尔历史学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也写道:

这里储备了大量的医生、法官、教士和其他有学问的人,这种储备是靠国王慷慨地支付种种费用来维持。在这里,潜水员捞上来的巴巴里[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手稿和书籍,能卖出比其他任何商品都高的价钱。

尽管不乏财富和知识,但这一帝国仍因内乱和摩洛哥的侵袭而衰落。到16世纪末,桑海只是早先其自身的一个影子而已。

这些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点。它们都主要以贸易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扩展自己的权力,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对这些商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买卖的征税。征税所得的收入使帝国的行政管理逐步变得更为先进。因此,桑海帝国比起原先的两个帝国要更为复杂。它划分为界限明确的几个省,每个省都设有一名长期任职的总督。桑海帝国还

可以炫耀的是,它开始拥有职业军队,甚至还拥有几个部——除了分管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外,还分管财政、司法、民政、农业和林业。



图 92 西非的陶制雕像

西非诺克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雕像(高 36 厘米);从约公元前 900 年至公元 200 年前后,诺克文化繁荣于西苏丹。像上图这样的陶制铸件的式样表明,这些雕像也许有木制原型。

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之所以能发展贸易,提供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和促进智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还将苏丹由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改变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14 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将马里也包括在他的旅行范围之内;这一旅行向东最远到中国。1353 年 6 月,拔图塔到达马里的首都,帝国的行政管理和人民的习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

黑人们具备一些极好的品质。他们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的苏丹不宽恕任何犯有最轻罪行的人。他们的国家绝对安全。在那里,不论旅行者还是居民都无须害怕强盗或暴力者。在他们国家去世的白人,即使留下数不清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相反,他们将其财产交给白人中最可信赖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继承人前来继承为止。他们小心地遵守做祷告的时间,专心致志地聚众祈祷,并以此

教育他们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十分拥挤,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进行祈祷。<sup>1</sup>

在苏丹诸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起了主要作用,但应该指出,它主要还是一种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变成了穆斯林,而乡下人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伊斯兰教的依靠,既是促使帝国强大的原因,又是导致其衰微的根源。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教曾有过很多贡献,但它的基础比当时去过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过的观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狭窄。因此,危机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会突然分裂,迅速崩溃。 259

苏丹诸帝国的另一个弱点是,易受北方柏柏尔人的攻击;这些柏柏尔人或是寻找非洲黄金的发源地,或是企图将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强加于别人。1076年,狂热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同样,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毁了桑海帝国。桑海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苏丹帝国时代的结束。用17世纪廷巴克图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代替了富裕,不幸、灾难和暴力代替了和平。……”<sup>2</sup>

## 五、王国与诸侯国

上面提到的三个帝国,是非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产物。不过,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在东南非,存在着某些同苏丹相类似的情况。正如苏丹以出口黄金闻名于世一样,东南非也以同样原因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一种贸易模式养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15世纪时,另一种贸易模式也供养了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城邦。

“莫诺莫塔帕”一词,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许多地区,因而,同苏丹诸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正是莫诺莫塔帕的君主们建造了津巴布韦大神庙;这座神庙四周的围墙高达32英尺,为皇家举行正式的礼仪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在沿海地区,基卢瓦港的商人统治者控制着从莫诺莫塔帕到穆斯林商船的货物流动;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基卢瓦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拔图塔——这位对马里帝国也留下深刻印象的旅行者——这样写道。<sup>3</sup>

正如苏丹诸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和基卢瓦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的掠夺。在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绕好望角航行后的十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像它是一个葡萄牙湖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避



图 93 贝宁国王和随从

贝宁国王和随从像,尼日利亚出土,成像于约公元前 1680 年至公元前 155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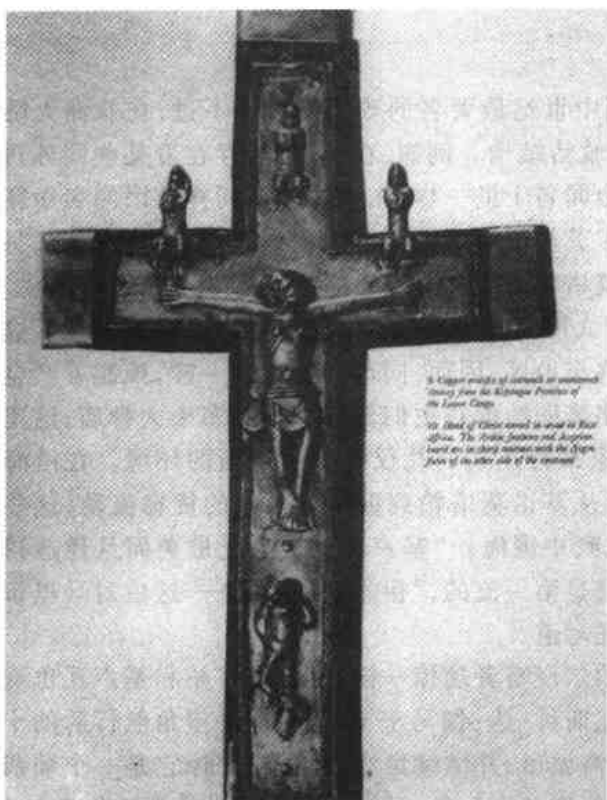


图 94 绘有耶稣受难图的铜十字架

一个 16 或 17 世纪制作的、绘有耶稣受难图的铜十字架。在下刚果的基潘格省出土。

过难。五年后,另一支舰队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当地人的好客。一位远征队员描述说,他们没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便占领了这座“有许多坚固的、高达数层的房屋”的城市。然后,“教区主教代理人和方济各会的一些长老带着两个十字架,唱着感恩赞美诗,列队登上岸去。他们走进宫殿,放下十字架,舰队队长做了祷告。然后,大家开始抢劫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粮食。”<sup>4</sup>

后来,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他们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影响,直到1628年发起不可避免的最后进攻为止。葡萄牙人凭借自己的火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莫诺莫塔帕的两支军队,但是,有几个坚固的小王国仍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幸存下来。

## 结 论

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在欧洲扩张之前的这一时期中,非洲绝不是与世隔绝的。由于伊斯兰教带来的推动力,从7世纪起,外部联系和内部关系开始增多。地区间的贸易因更有效的交通工具而增长。虽然骆驼在北非已被使用,但从7世纪起,这种使用变得普遍起来。中亚的双峰驼与阿拉伯驼或单峰驼的杂交,繁育出了两种骆驼:一种是步伐缓慢、能负重远行的骆驼,另一种是步速更快、可用做信使的骆驼。

贸易的增长也促进了航海术的发展,并使阿拉伯人能在进行东非与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沿岸诸国之间的贸易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舰队。整个非洲大陆的商业城镇也有了惊人的发展:西基马萨(Sidjimasa)成为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的中转站;开罗成为东方穆斯林和西方穆斯林以及草原地区的贸易的中心;奥代古斯特(Awdaghust)成为连接北非和草原地区的中心市场。在东非沿海地区,穆斯林商人在摩加迪沙、马林迪、蒙巴萨、基卢瓦和索法拉的商业城镇中定居下来。

用于贸易的产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诸如铁、亚麻、棉花、树胶和靛青之类的原材料;诸如高粱、稻米、黄油、粟、橄榄油、盐和鱼之类的给养品;诸如黄金和象牙之类的奢侈品。

在公元15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非洲大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公元1500年以后,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发展方面超越了非洲。正如我们在下一卷中将提到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1500年之后非洲的内部发展和破坏性的外部联系。

英国的非洲学学者托马斯·霍奇金写到:

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思想氛围和基督教思想氛围之间的差别,14世纪廷巴克图的一位市民可能会发现,自己呆在14世纪的牛津城里时也感到比较安逸。16世纪,他或许仍能找出这两座大学城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但

261

是,到19世纪时,两城之间的鸿沟则变得很深了。<sup>5</sup>

霍奇金提出的这一论点,描述了一个肯定不是非洲所独有的进程。从前几章看,地区之间的差异显然是世界范围的常见现象,其原因很简单:西方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因而跑到其他所有社会的前面去了。不过,事实仍然是,西方与非洲之间的差距比西方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对伦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确是衰落了,但是,它们并没像廷巴克图那样,衰落到实际上已经消亡的地步。

### 推荐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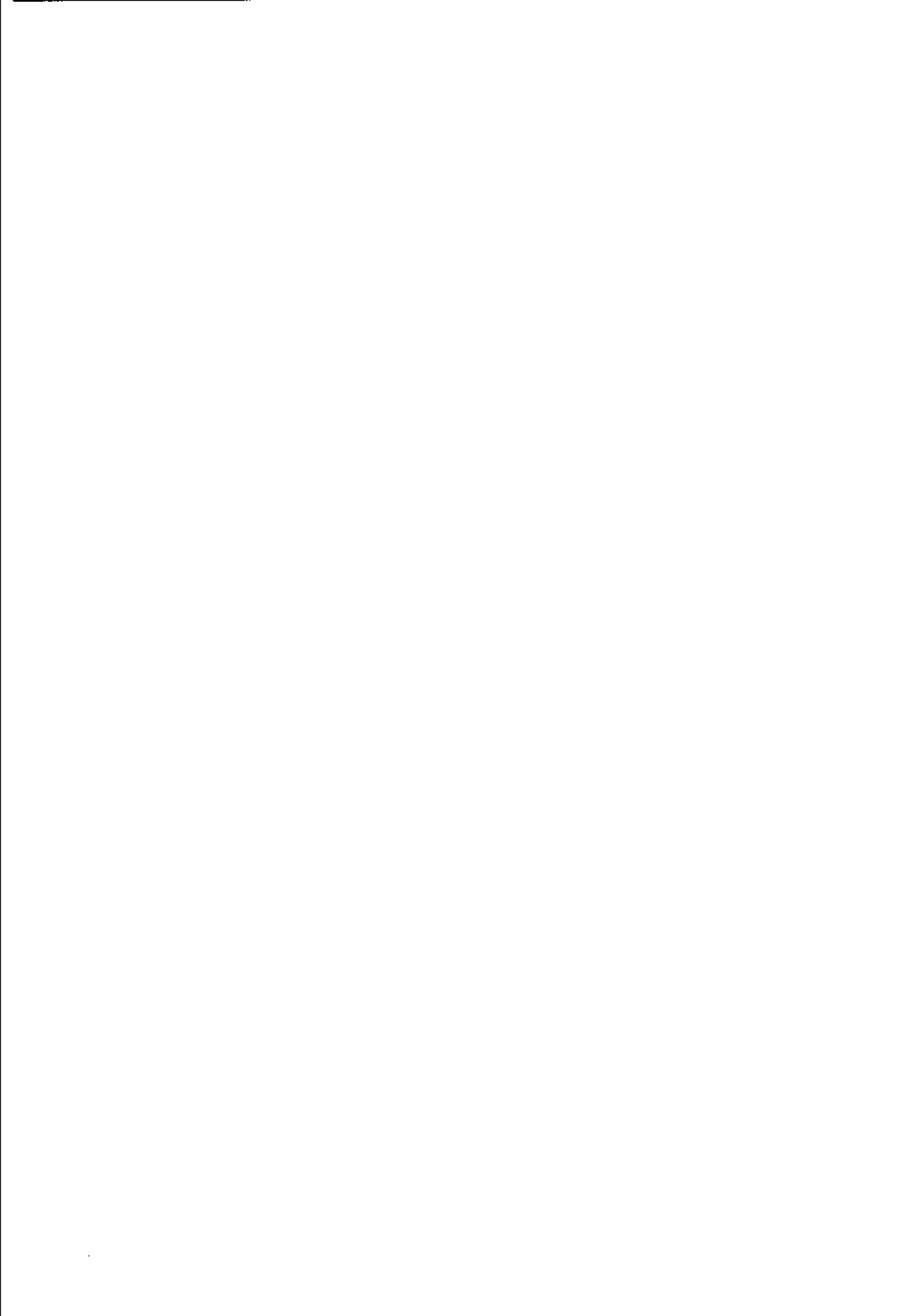
了解非洲历史的有用读物是 J. F. A. Ajayi 和 M. Crowder 主编的 *Historical Atlas of Africa* (Longman 出版社,1985 年版)。在非洲地理方面,可以参考 W. A. Hance 所著的 *The Geography of Modern Af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1975 年第二版),以及 G. W. Hartwig 和 K. D. Patterson 共同主编的 *Disease in African History* (Duke University 出版社,1978 年版)。

可以提供原始资料汇编的是 B. Davidson 主编的 *The African Past: Chronicles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 (Little, Brown 出版社,1964 年版),还有 P. J. M. McEwan 主编的 *Afric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8 年版)。目前最具权威性的讲述西方人侵前的非洲史的书籍有:P. D. Curtin 以及其他人所著的 *African History* (Little, Brown 出版社,1978 年版);J. D. Fage 所著的 *A History of Africa* (Knopf 出版社,1978 年版)。更为详细的著作还有:R. Oliver 和 J. D. Fage 共同主编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75 年起,八卷本);UNESCO 主编的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81 年起);以及 P. J. C. Dark 所著的 *An Introduction to Benin Art and Technology* (Oxford: Clarendon 出版社,1973 年版)。

有关非洲艺术的著作有:M. Posnansky 主编的 *Prelude to East Africa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6 年版);J. F. A. Ajayi 和 M. Crowder 共同主编的 *History of West Africa* 第一卷 (Longman 出版社,1985 年第三版);B. Davidson 所著的 *The Prehistory of Africa* (Thames and Hudson 出版社,1970 年版);B. Davidson 所著的 *The Africa Genius* (Little, Brown 出版社,1969 年版);以及 B. H. Dietz 和 M. B. Olanunji 合著的 *Musical Instruments of Africa* (John Day 出版社,1965 年版)。关于伊斯兰教在非洲历史上的作用,参见以上所列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及 N. Levtzion 所著的 *Ancient Ghana and Mali* (Methuen 出版社,1973 年版);后者是对已知材料的一种透彻研究。

注释

1. Cited by C. M. Cipolla, *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Pelican, 1970), p. 105.
2.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trans. H. A. R. Gibb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9), pp. 329—330.
3. Cited by T. Hodgkin, "Kingdom of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Dawn of Africa History*, ed. R. Oliver (Oxford University, 1961), p. 43.
4. Cited by B. Davidson, *Africa in History* (Macmillan, 1968), p. 63.
5. *Ibid.*, p. 168.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诸民族来说,所有由这些事件[欧洲的扩张]产生的商业利益都已沉没和丧失在由这些事件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斯密

---

## 第 16 章 美洲和澳洲

11 世纪,维京人偶然发现了北美洲,在长达约 100 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试图在那里保持居留地,但没有成功。15 世纪,哥伦布同样发现了美洲大陆,但这次结果完全不同。随发现而来的不是失败和撤退,而是对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大规模的、势不可挡的入侵。这一对比反映了这 500 年间欧洲势力和活力的增长程度。

欧洲人对南北美洲的迅速入侵和开发,与迟至几个世纪后才得以侵入和开发非洲,构成了同样引人注目的对比。一个原因是地理环境;美洲大陆在地理上更易接近,更吸引人。另一原因是,印第安文化的总的发展状况使当地人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如果说这一点符合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仍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来说,就更是如此。本章将叙述哥伦布登上西印度群岛和詹姆斯·库克船长登上新南威尔士之后诸重大发展的自然环景和文化背景。

### 一、陆地和人民

同非洲相反,南北美洲向欧洲移民彻底开放。这里没有阻碍接近海岸的沙洲。南北美洲锯齿形海岸线上可利用的港口,比非洲平直海岸线上的港口要多得多。此外,南北美洲拥有发达的、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障碍的内河航道,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的通路。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密西西比河和圣劳伦斯河气势雄伟、水流平缓,这样的河流是非洲所没有的。探险者们不久就学会了使用当地桦木独木舟。他们发现只需携带少量物品,便能划船从大西洋顺圣劳伦斯河进入五大湖;由此南下,沿

密西西比河到墨西哥湾，如果北上，沿马更些河到北冰洋，或者西进，沿哥伦比亚河或弗雷泽河到太平洋。

一般说来，南北美洲的气候也比非洲的气候更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河流域气候炎热、空气潮湿；南北美洲两极地区气候非常寒冷。但是，英、法移民在其殖民地格兰德河北部地区却很兴盛。同样，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也感到安适；墨西哥和秘鲁成为他们的两大中心。那里的气候同西班牙的气候相差无几，无疑与非洲的气候闷热、疫病流行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了可喜的对照。

欧洲人在南北美洲见到的印第安人，是从西伯利亚渡过白令海到达阿拉斯加的移民的后裔。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印第安人首次渡海来到南北美洲是在约 10 000 年以前。考古新发现和碳 14 年代测定法的使用，彻底修正了这一估计。现在普遍同意，人类在大约 30 000 年以前就已生活在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发生在 3 000 年以前。接着来的是爱斯基摩人，他们不停地往返于海峡两端，直到现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这一边或另一边为止。总之，在美洲的离亚洲最近的地区，这时的人口已十分稠密，从而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对这些早期的移民来说，渡海到美洲大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冰河时代末期，封冻了大量的海水，海面下降了 460 英尺，于是露出了一座宽 1 300 英里、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桥。如此大的“桥”实际上是一块大而新的次大陆，为当时动植物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范围。而且，这一地区由于降雨量不足，不是被冰覆盖着，而是被湖泊、沼泽、草地和冻土带的各类灌木所覆盖。这些植物为当时的大型哺乳动物如乳齿象、猛犸、麝牛、犏牛、驼鹿、麋、山区野羊和石山羊、骆驼、狐狸、熊、狼和马提供了牧场。由于这些动物越过陆桥来到美洲大陆，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捕捉它们为生的猎人。

即使在气温的回升使海面增高、淹没了这块连接地之后，最终形成的海峡也很狭窄，可以在看到对岸的情况下乘粗制小船毫不费力地渡过。后来的更先进的移民可能是乘船从亚洲来到美洲，然后沿西北海岸继续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英属哥伦比亚登陆和定居。

渡海来到阿拉斯加的大多数亚洲移民，越过育空高原中部冰封的山峡，继续进入北美内地。他们被促使他们移居阿拉斯加的同样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的动力和后方部落不断向前挺进的压力——推动着向前迁移。这样，分散的狩猎部落不久便布满了南、北美洲两块大陆。

就种族特征而论，所有印第安人都可以归类为蒙古种人。他们以颧骨高凸、头发硬直粗黑、脸上和身上汗毛稀疏为特征。不过，也并非所有印第安人看上去都相似。那些生活在北美洲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比起美洲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脸和鼻子更为扁平，眼睛也更加狭长（蒙古人式的褶皱）。对这种差异有双重解释：首先，最早的移民就外貌而言远不像蒙古种人，因为在亚洲蒙古种人——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完全进化之前，他们便已离开东方。其次，移民到达美洲后立刻四散开来，并

以近亲繁殖的小集团在各种气候区定居下来。因此尽管他们都出自同一个蒙古种人大家庭,但却进化形成各种生理类型。

## 二、文化

264

迁居美洲大陆的移民几乎没带来什么文化,因为他们来自欧亚大陆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西伯利亚东北部。当然,他们都是组成小集团的猎人,仅拥有粗糙的石器,没有陶器;可能除狗外,也没有其他已驯化的动物。由于他们进入的是一块无人居住的大陆,因此他们能够毫无约束地形成自己的风俗,而没有雅利安人迁移印度河流域或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移居希腊时所受到的当地居民的影响。

在以后几千年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确发展了丰富多彩的种种文化;他们不仅使这些文化适应他们所遇到的范围广阔的自然环境,而且还使这些文化互相适应。有些印第安人仍停留在狩猎团体的阶段,而另一些印第安人则发展起王国和帝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所有已知的种类,其中还有一神教。他们使用约 2 000 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有些语言相互间的差异就像汉语和英语间的差别一样。这表明在这里如同在整个东半球一样,语言的变化极为丰富;据悉,公元 1500 年,存在于东半球的语言约 3 000 种。这些语言不论在词汇,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并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大约 24 000 个词,钦译《圣经》使用了约 7 000 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则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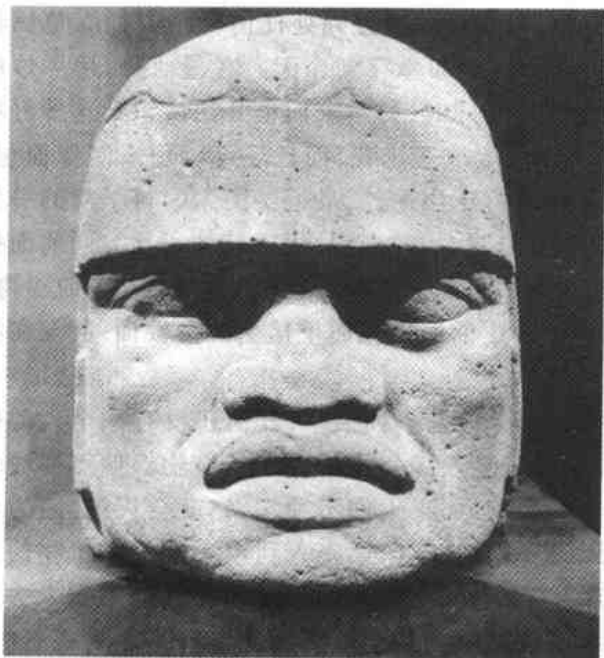


图 95 奥尔梅克头像

奥尔梅克头像。这个巨大的头像出土于圣洛伦索,现存于墨西哥城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该头像由玄武岩雕成,可能是奥尔梅克统治者的肖像。奥尔梅克文化兴盛于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800 年期间。

了 27 000 个词,被认为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后的民族之一的火地岛上的雅甘人至少也拥有 30 000 个词。

考虑到各类制度和习俗,人类学者将美洲大陆分成大平原地区、东部森林地区、西北沿海地区等 22 个文化区。一种更简单的分类法是以获得食物的方式为基础,将美洲文化分成三类:渔猎采集文化、中级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不仅更加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也更富有意义,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印第安人对欧洲入侵者的不同反应。

高级农业文化存在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级农业文化一般位于高级农业文化的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位于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和北美洲西部和北部。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美洲,农业首先在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中东极为相似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这些地区即高原地区,在那里,无需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砍伐森林,那里有足够的降雨量使各种作物得以生长,而且还拥有大量可培植的、具有潜在高产特性的土生植物。

265 印第安人培植了 100 多种植物,即与整个欧亚大陆所培植的植物一样多,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 50% 以上的农产品都来自印第安人驯化的各种作物。而且,我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印第安人所种植的某些植物具有较好的食品价值,但却为欧洲移民所忽视。一个例子是籽粒苋属植物;这种植物对阿兹特克人来说,就如同玉米和大豆一样重要。他们将这种苋属植物与人血混在一起,按做蛋糕的方式做成诸神的神像,并把这些神像给那些虔诚的人吃。西班牙人认为这种仪式太野蛮,是对基督教圣餐的一种嘲弄。因此,西班牙人通过判处任何种植或拥有苋属植物的人死刑来禁止这种仪式。然而,这种植物却幸存到今天。在墨西哥,用爆炒的苋属植物和蜂蜜制成的甜食仍然颇受欢迎。同时,科学家们也开始认识到这种籽粒的价值:它可以磨成面,也可以像玉米一样爆成玉米花,而且还可以用来制作面包、饼干、点心、汤、粥、团子和饮料。除了这一广泛用途外,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苋属植物作为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来源,优于其他谷物。同前面提到的培高田地农业技术(见第 2 章第 3 节)一样,现在承认苋属植物为“未来的谷物”的做法,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从史前的祖先那里接受种种教训,甚至在我们这一“高科技”时代中,也是如此。

玉米几乎是所有地区的主要产品,最初只是一种杂草,其穗还没有一个人的拇指甲大。印第安人将它培育成一种长棒子上长满一排排种子的作物。他们彻底培植了玉米,使它变得只有依靠人类才能生存;如果人们不种它,它就会灭绝,因为培植后的玉米已不能散播自己的种子——玉米粒。印第安人利用大量有毒植物的技术,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之一是木薯属植物,即美国的木薯淀粉,印第安人去掉其中致命的毒素,保留下淀粉。印第安人种植的其他重要植物有:南瓜、马铃薯、西红柿、花生、可可豆、烟草,以及含有大量蛋白质的豆类植物。印第安人留传下来的

药用植物有：药鼠李、可卡因、山金车花、因皮卡克和奎宁等。在发现新大陆以前，美洲种植的植物没有一种是在东半球培植的，这一事实最终证明两半球的农业各有其独立的起源。

印第安人的农业发源地，也是他们最早进一步发展农业、并逐渐形成“高级农业文化”的地区。这反过来又深深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总的看来，其结果和在欧亚大陆一样，大大增加了定居的人口，促进了那些与最低限度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文化活动。换句话说，正是在这些高级农业文化中，有可能发展起在某些方面可与西非相比较的庞大帝国和复杂文明。不幸的是，美洲本土的这些文明突然被西班牙人所制服，结果，除印第安人培植的宝贵植物外，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

### 三、文明

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从厄瓜多尔中部到智利中部、延伸 3 000 英里的印加文明（见地图 20）。玛雅人创造了南北美洲最古老的文明，并以其艺术和科学的惊人发展而闻名于世。他们独自发展了表意文字，用字母或记号作为表达思想的传统符号。为了计算时间、预言未来和为献祭和主要的丧葬事宜推算吉日，他们还研究了天体的运动。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祭司搜集的天文学知识非常广泛，据认为，至少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不相上下。玛雅人的复杂的圣历以共同周期为基础；这种周期在其倍数与时间相一致时便并入更大的周期。他们的有些历法计算跨越几百万年——这是一种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时间范围方面的观念，如果我们回想起最近在欧洲，世界的创造是如何被确定在公元前 4004 年的话。

玛雅人的城市，如果它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举行仪式的中心，而不是要塞、居住地或行政首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玛雅人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这种农业在两、三年内便耗尽了土壤的肥力，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迁移村庄驻地。为了补偿这种短暂的生活方式，玛雅的耕种者们在主要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以此来表示他们的社会统一。这些建筑物是巨大的金字塔庙宇和公共住宅，祭司和新信徒可能就住在这里。这种建筑物完全靠石制工具建成，用雕塑加以装饰；这些雕塑在美洲是无与伦比的，现被列为世界伟大的艺术之一。



图 96 玛雅人塑像

一尊玛雅人塑像，它表现的是一位显贵或一位祭司。

4 世纪至 10 世纪期间，玛雅文明非常繁荣，但随后便衰落下去，其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土壤的肥力耗尽，或疫病流行，也可能是由于反对供养宗教中心及其祭司集团这一负担的农民革命。总之，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被废弃，被周围的森林所吞没，近几十年才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

同爱好艺术、富有知识的玛雅人相比，阿兹特克人显得粗野好战；这一对比使人联想起东半球的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悬殊差别。实际上，阿兹特克人是后来才进入墨西哥的。几个世纪内，这里相继形成了一系列非常发达的社会。这些社会很容易遭到来自干旱的北方的蛮族的攻击；自然，这些蛮族是被肥沃的土地所吸引而迁移南下的。最后一批入侵者就是阿兹特克人。他们在特斯科科湖的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然后，占据了阿纳瓦克谷地的大部分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岛屿变得非常拥挤，阿兹特克人通过建造“浮动园地”来扩大耕地面积。“浮动园地”是一些在湖底丛生的杂草上面铺垫上湖土、由生长的杂草固定在湖底的浮岛，直到今天，某些地区仍使用这种耕作方法。每次播种之前，农民们都要挖些新的湖土，铺在“浮动园地”上，因此，其表面随着一次次耕种而不断增高。然后，农民们再挖去表层的泥土，用



地图 20 西班牙征服前夕的美洲印第安人帝国

于建造新的“浮动园地”，于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

“浮动园地”使阿兹特克人的人口和财富剧增。15 世纪早期，阿兹特克人与特斯科科湖沿岸诸城镇结成联盟，并从他们的立足点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经常对外远征袭击，迫使其他民族以实物向他们进贡和为他们服劳役。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阿兹特克人的统治西至太平洋，东达墨西哥湾，南几乎到达尤卡坦半岛，北抵格兰德河。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这时已成为拥有 20 万到 30 万人口的大城市，通过几条道路与海岸相连。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将这个首都同威尼斯相比，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268 阿兹特克人的力量建立在持久备战的基础上。所有男人都要携带武器；国家军火库始终备有武器，供需要时使用。凭借有效的军事机器，阿兹特克人从其臣民那里榨取到数量惊人的贡物。据他们自己的记载，除其他各种物品如军服、盾牌和宝石之外，他们一年还征集到玉米 1400 万磅、豆类和苋菜各 800 万磅、棉外套 200 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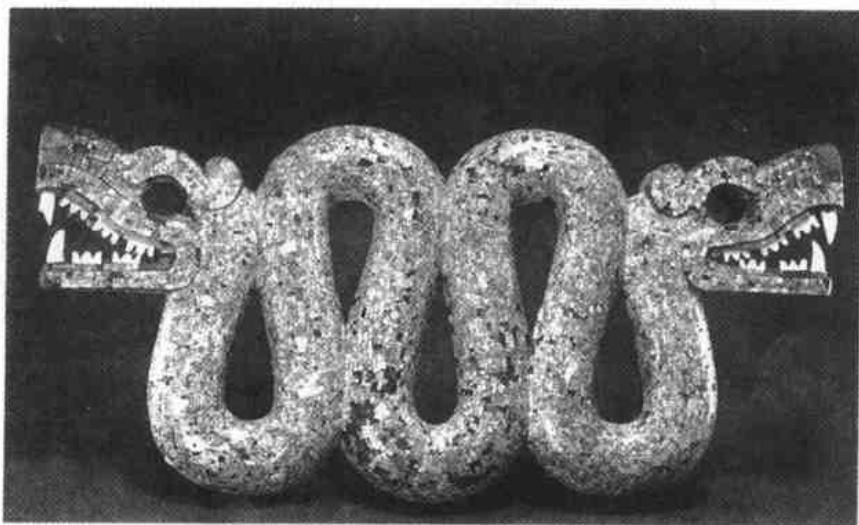


图 97 双头大蟒蛇

属于阿兹特克文化的镶嵌绿松石的双头大蟒蛇。

首都的壮丽和源源涌入首都的大量贡物，自然使西班牙人断定，阿兹特克人的首领蒙提祖马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其实并非如此。诸附庸国仍相当独立，实行完全的自治。它们同特诺奇蒂特兰的唯一联系就是纳贡；它们之所以纳贡，是因为害怕阿兹特克人的远征。除秘鲁印加人的国家外，没有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国家组织得比城邦更大。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不同，并不试图使其臣民适应阿兹特克人的生活方式，以免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权。

西班牙人不仅为阿兹特克国家的富有和豪华而眼花缭乱，而且也为其宗教仪式上大肆屠杀一排排献祭用的人而毛骨悚然。这些献祭用的人是在到处可见的、用于



宗教仪式的金字塔的顶端遭到屠杀,因此,西班牙人很快就认识到,金字塔是人们献祭用的祭坛。献祭仪式在中美洲很普通,但没有一个地方像阿兹特克人那样,实行了魔似的大屠杀。实际上,阿兹特克人远征的目的,不仅是要为自己的首都收集贡品,而且还要捕捉俘虏,用以献祭。

阿兹特克人认为,捕捉俘虏甚至比获取贡品更重要,因为祭司告诫他们,世界经常处在被洪水淹没、尤其是太阳熄灭的危险之中——因此,需要用人来献祭,以抚慰天上诸神。但是,这一做法使阿兹特克人陷入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之中:为防止普遍的灾难,需用人来献祭,而献祭用的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只有用人献祭才能进行成功的战争,但反过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用的人。贝尔纳·迪亚斯是这一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的见证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镇区[索科特兰]中位于庙宇附近的那块地方。那里十分整齐地堆放着许多人的头颅——可以肯定有10万多个,我再重复一遍,10万多个。同样,在这个广场的另一角落,你还能看到整齐地堆放着许多人的残骸,数目多得不可胜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头悬吊在道路两旁的柱子上。……在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镇区,我们都能看到同样可怕的情景。<sup>1</sup>

最后谈谈秘鲁的印加人。应该指出,“印加”是其君主的称号,因此,虽然习惯上称印加人为印加印第安人,但严格地说,这样称呼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是属于克丘亚种族的许多部落中的一个,操克丘亚语,擅长于饲养美洲驼和种植马铃薯。12世纪,他们在库斯科谷地定居下来,不久便统治了这个地区。在早期阶段,他们的战争首领逐渐建立起一个王朝,而他们的部落成员则成为其他部族中的贵族。世袭王朝和贵族阶层相结合,在美洲大陆是独一无二的,构成了建立帝国的有效工具。由于一代一代的印加即国家首领的杰出才能,他们的帝国特别强大。印加唯一合法的妻子是他自己的亲姐妹,因此,每个印加都是兄弟姐妹通婚所生育的后代。这种近亲繁殖大约持续了八代;而最早的祖先一定非常强健,因为正如西班牙人所看到的那样,王子们都是些英俊、精力旺盛的人。

269

印加人从坐落在秘鲁高原上的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向外派出军队和使节,向西到沿海地区,向南和向北沿大山谷前进。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他们已将其版图从厄瓜多尔扩大到智利中部,南北长约2500英里。这样,他们统治的领土比阿兹特克人的领土大得多,而且,他们将这片领土当做一个真正的帝国来统治。

这一帝国在地理上由完整的道路系统紧紧地连接成一体;这一道路系统包括用芦荟藤编织成的索桥和用有浮力的芦苇制成的浮桥,其中有几百英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大面积的灌溉系统同样很重要,它使印加帝国成为繁荣昌盛的农业国;其中



图 98 印加城市

位于马丘比丘的印加城市，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东坡两座山峰之间的一个山口上。

270 部分灌溉系统至今仍在使用。当时的通讯靠由驿站和信差组成的综合系统维持；信差迅速地将信件送往全国各地。

复杂的朝廷仪式和基于太阳崇拜的国教，进一步促进了帝国的统一。这一宗教认为“印加”是太阳的后裔，在太阳礼拜中，他起着重要的作用。帝国的其他统治方法还包括：土地、矿藏和牲畜归国家所有；为了税收和军事上的目的，编制详细的人口普查表；废黜世袭的地方首领；为同化被征服的民族，强迫他们迁至新地区定居；在国家的主持下，举行集体婚礼。毫不奇怪，印加帝国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一。

#### 四、历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

虽然美洲印第安人的这些成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事实仍然是，仅一小撮西班牙冒险者便能轻易推翻和彻底根除美洲大陆的这三大文明——情况就是这样，尽管这些文明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稠密人口。西班牙单方面取胜的原因，最终应归于南北美洲的与世隔绝。不仅美洲诸印第安文明与其他大陆诸文明相隔绝，不能促进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诸印第安文明彼此之间基本上也相隔绝。

[一位考古学家说]关于秘鲁和中美洲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可以说,人们已承认,在从形成期[约公元前1000年]到西班牙人入侵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所有证明这些地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或接触的实物或记录,都是不可靠的。<sup>2</sup>

换句话说,在2500年中,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可证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这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都处在持续不断的交往中(后者是在较小的范围内)。最终结果是,美洲印第安人——甚至是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远远落后于欧亚人,尤其是落后于技术发展格外早的欧洲人。到公元1500年时,美洲大陆刚进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约公元前2500年便已达到的文明阶段。

当西班牙人入侵美洲、双方发生对抗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印第安人发现自己在经济和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侵略者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不应用来掩饰他们在更多的物质领域里都极为落后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悬殊差别在中美洲最为明显,但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也普遍存在。农业上,印第安人虽在培植植物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很少生效。他们的耕作技术从未超过养活全体居民所须达到的最低限度,而他们的人口也很少达到东半球的人口密度。他们的工具仅用石头、木头或骨头制成。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使用金属,但几乎只用于装饰目的。他们所制造的船只有独木舟和远洋木筏。至于陆上运输工具,印第安人还没有利用轮子;他们虽已知道轮子,但只是用作玩具。除美洲驼和羊驼外,人的背是唯一的运输工具;美洲驼和羊驼虽已用于安第斯山脉地区,但不能运载重物。

这一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不应夸大。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是,在经历了最初的打击之后,印第安人渐渐习惯了火器和骑兵。而且,西班牙人很快就发现,印第安人的武器非常锋利耐用。他们开始更加喜欢印第安人的棉制盔甲,而不喜欢自己的盔甲。一位征服者叙述道:阿兹特克人有

……两座军火库,里面装满了各种武器,其中许多武器都饰以黄金和宝石。这些武器包括不同规格的盾牌、军刀和一种大砍刀。这种大刀需用双手挥动,刀刃用燧石磨制而成,因此,极其锋利,比我们西班牙人的剑更适合砍杀。此外,长矛也比我们的长,全长6英尺,一端装有尖头,也是用几种锋利的燧石制成的。这种长矛非常锋利坚硬,能刺穿最坚固的盾牌,刺

杀起来像剃刀一样便利;墨西哥人甚至用这些石头刮脸。另外,还有极好的弓箭、单头和双头长枪、专用于弹射的皮条,以及为他们特制的圆石投石器和一种大盾牌。这种盾牌结构非常精巧,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只是在战场上才展开,能从头到脚将整个身体遮盖住。<sup>3</sup>

这番言论表明,技术上的悬殊差别不是促使西班牙人获胜的唯一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印第安各民族之间缺乏团结。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能利用对库斯科和特诺奇蒂特兰的暴虐统治不满的被征服的部落。过于严格的控制和过分的依赖也削弱了印第安人。他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绝对执行命令的思想,并对此习以为常,因此,当其首领被推翻时,他们不能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抵抗。一旦国王蒙提祖马和阿塔瓦尔帕落入西班牙人手中,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就群龙无首,丧失抵抗力。



图 99 月亮金字塔

月亮金字塔位于特奥蒂瓦坎的中央大道即死亡大道的南端。

这种被动性因宗教的抑制而进一步加剧。当地人认为,墨西哥的科尔特斯和秘鲁的皮萨罗都是回来应验古老预言的神。库斯科的阿塔瓦尔帕和特诺奇蒂特兰的

蒙提祖马之所以会发生动摇以至自取灭亡,原因就在于此。对阿塔瓦尔帕来说,西班牙人就是造物神维拉科查及其追随者。为此,这位统治者温顺地等待着皮萨罗的到来;皮萨罗和其手下的180人迅速控制了 this 庞大的帝国。同样,对蒙提祖马来说,科尔特斯就是魁扎尔科亚特尔神,他正回来要求他的合法王位。因此,这位统治者也就无精打采地恭候着西班牙人在其首都安营扎寨。

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同样使他们遭受灾难;他们认为,战争是短期的,是为宗教仪式尽力。他们在战争中主要关心的是捕捉俘虏,用俘虏的心脏祭神。因此,他们发动的战役常常就是礼仪上的争夺;争夺期间,他们尽可能以最小的混乱和破坏来捕捉俘虏。这种军事传统显然是一大障碍。西班牙人杀人是为了获胜,而阿兹特克人只想捕捉俘虏。



图100 西班牙征服墨西哥

一幅16世纪阿兹特克人的图画,描绘的是西班牙征服墨西哥过程中的一场战斗。

如果说美洲印第安人缺乏击退欧洲人的技术和内聚力,那么更严重的是,他们缺乏抵御欧洲人所带来的种种疾病的免疫力。由于印第安人在数万年前渡过白令海峡之后没再与其他大陆诸民族有任何联系,所以他们在生物上变得很易受欧洲人及其非洲奴隶所带来的天花、麻疹、斑疹伤寒、黄热病和其他疾病的伤害。

近几年,对 1492 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口的估计数已加以修订,使其急剧上升。现在认为,居住在南北美洲的人口总数达 4 300 万至 7 200 万。如所预料,绝大部分人都居住在中美洲的三大文明区内。不论居住在哪里,所有印第安人在首次与欧洲人接触时,都以骇人的速度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新到达的移民常常发现被遗弃的田地和无人居住的村庄的原因;他们只需将这些田地和村庄接管过来就行。据估计,1492 年墨西哥的人口有 2 500 万,到 1608 年时,已缩减到 100 万左右。其他地区的人口数也同样猛跌。1508 年,伊斯帕尼奥拉岛(即今日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有 6 万美洲印第安人,1554 年时为 3 万,至 1570 年仅剩 500 人。1586 年来自秘鲁的以下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场浩劫的规模和所带来的恐怖:

流感不像钢刀那样寒光闪闪,但印第安人都躲不开它。破伤风和斑疹伤寒比一千只目露凶光、口吐白沫的灵猴更能夺人性命……天花比所有的枪炮消灭更多的印第安人。四下流行的鼠疫正在使这些地区荒芜。受鼠疫感染的人都倒地身亡;鼠疫吞食人的身躯,啮噬人的眼睛,封住人的喉管。一切都散发出腐臭的气味。<sup>4</sup>

后来,当大批移民开始从欧洲移居美洲时,印第安人陷于绝境,被征服了。最早到来的是商人,他们几乎未遇到任何竞争和抵抗便渗入南北美洲各地,因为南北美洲不像非洲,没有与之抗衡的土著商人阶层。其次是移民,他们被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淹没了不幸的印第安人。当印第安人在绝望中偶然拿起武器时,由于他们缺乏团结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注定要失败。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那里的印第安人一开始时就十分稀少,因而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他们被赶进印第安人居留地。在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和玛雅人所在的地区,人口较为稠密,很多人在经历欧洲移民潮后幸存下来。由于他们对欧洲人和非洲人带来的种种疾病产生了免疫力,这些幸存者渐渐地又东山再起。今天,在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等国,印第安人占人口的大多数。1990 年,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美国印第安人总数是 190 万,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切罗基人(308 132 人),其次是纳瓦霍人(219 138 人)、奇佩瓦人(103 826 人)和苏人(103 255 人)。

很明显,美洲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于非洲的力量对比。地理环境,较少的人口,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所有这些都对印第安人不利,使欧洲人能占领南北美洲;而这时在非洲,欧洲人仅在沿海地区占有几个不稳定的小立足点。虽然美洲印第安人不能有效地抵抗欧洲入侵者,但事实依然是,他们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贡献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培育了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日常饮食支

柱的多种植物。最著名的是玉米、马铃薯、大豆(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南瓜、西红柿和巧克力。总之,南北美洲培育出来的植物与整个东半球一样多——这是一个真正非凡的成就。今天,美国50%以上的农产品都源于原先由印第安人培育的植物。由于美国是向世界市场提供食品的主要出口商,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美洲印第安先驱者,今日世界的总人口数实际上会低一些。

最后,应该指出,正在进行的考古调查研究使我们必须不断修正对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认识。例如,最近的发掘表明,除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和印加文化外,在南美洲亚马孙丛林区,可能还存在着第四种文化。这一发现颇让人感兴趣,因为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早期的食物采集者缺乏在热带雨林中生存的技术和技能。不过现在,考古学家们正在发现和分析在亚马孙河口附近,在大约11000年前便已被人占用过的洞穴中找到的数千件人工制品和烧焦的剩余食物。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因为它同美洲印第安人的其他文化不一样,主要依靠的不是猎取大猎物,而是在河流和森林中搜寻食物——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主要靠鱼、软体动物、蟹和鸟类过活。

##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大陆。这种与世隔绝使古代的生物类型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诸如桉树属之类的植物和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之类的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古代人文类型也幸存下来;18世纪末叶,当首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时,当地的人文类型仍处于旧石器阶段。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土著居民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尚未确定。最新考古发现表明,土著居民到达这里的日期大约在50000年以前。这意味着,土著居民的祖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手,因为当时要从东南亚到达澳洲的陆地,必须横渡约40英里的广阔水域。

274

有三个不同的种族群体渡海来到澳大利亚,这三个种族群体在今天的土著居民中仍可辨别出来。大多数土著居民是身材细长、四肢较长的人,他们皮肤棕色,身上没什么毛发,头发、胡须卷曲如波。他们之所以大批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对近代白人移民没什么用处的沙漠地区。在这块大陆的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生存着一个人数不多、完全不同的土著民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浅棕色,身上多毛,胡须浓密。而沿东北海岸,在澳大利亚唯一稠密的热带雨林地区,居住着第三个种族群体。他们是黑人民族的一支,身材瘦小,鬃发蓬松,皮肤黝黑。

这些土著民族的文化并不相同。最先进的是居住在东南角的民族的文化;这

里雨水充足,适合长期居住。但是,整个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他们的停滞不前,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除为了装饰外,他们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由简单的露天防风林组成,而在潮湿地区,则是低矮圆顶的小棚,这种小棚由任何可得到的材料拼凑而成。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梭镖、梭镖发射器和飞镖,所有这些都是用木头制成的。他们不知道制造陶器,所使用的器皿只有少数编织的包和篮子,以及偶然用树皮或木头制成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技艺高超,非常机灵。他们除了以动物为食外,还以范围广泛的植物为食,他们熟悉这些食物的种类、习惯和特性,并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的繁殖率。但是,土著居民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的方法是举行宗教仪式,而不是耕种。一个典型的仪式是:在希望增加猎物和植物的地方,将血和土混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政治组织几乎与技术一样落后。像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迁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此,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后归来的妇女,要按严格规定,将其所获分给本家族所有成员。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当一个人打喷嚏时,所有听到的人都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打的具体位置随他们同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社会这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如此复杂,以致对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来说,成为一件乐事。但是,这些事物的过早发展,在 18 世纪末叶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对土著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说具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的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无法抵抗白人的话,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就更是如此。他们的人数极少,在欧洲人来到时总共约 30 万。这意味着在有利的沿海或大河流域地区,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两个人,而在干旱的内陆,每 30 到 40 平方英里才一个人。除人数少这一弱点外,土著居民还缺乏进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他们不大想获得和使用白人的“火棍”。因此,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惨遭英国移民的屠杀;在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从拥挤的监狱用船运往此地的目无法纪的囚犯。疾病、酒精中毒、肆意屠杀和大批没收土地,使土著的人口下降,减少到今天的 45 000 人,外加同异族通婚所生育的 80 000 混血儿。1853 年,一位维多利亚移民在下面这句典型的描述中暗示了澳大利亚土著人所受的待遇:“仿佛是天意注定,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同莫希干人和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将在文明拓展的面前从其本土消失。”<sup>5</sup>



## 推荐读物

关于南北美洲人口居住情况的最新信息,见 R. Shutler Jr. 主编的 *Early Man in the New World* (Sage 出版社,1973 年版),此书中也相应地包含了一篇关于澳大利亚人口居住情况的文章。关于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影响,做出令人兴奋的分析的是:F. Jennings 所著的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出版社,1975 年版)。关于美洲印第安人数的最新估计,见 M. Denevan 主编的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出版社,1976 年版)。对欧洲人扩张在生物方面上所造成的致命影响进行分析的是:A. W. Crosby 所著的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6 年版)。

对美洲印第安人从早期移居美洲到现在的生活进行了内容丰富的描述的是:*America's Fascinating Indian Heritage* (Reader's Digest 出版社,1978 年版)。做出令人兴奋的解释的是:P. Farb 所著的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as Shown by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Dutton 出版社,1968 年版),书中还包括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经历对现代人的意义所作的分析。其他值得注意的研究是:A. M. Josephy Jr. 所著的 *The Indian Heritage of America* (Knopf 出版社,1968 年版); C. Beals 所著的 *Nomads and Empire Builders: Native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South America* (Chilton 出版社,1961 年版);极好地收集了一批读物的文集是:H. E. Driver 主编的 *The Americas on the Eve of Discovery*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64 年版)。V. W. Von Hagen 对美洲三个最重要的文明进行了有趣的描述:*The Aztec: Man and Tribe* (New American Library 出版社,1958 年版), *The Incas: People of the Sun* (World 出版社,1961 年版)和 *World of the Maya* (New American Library 出版社,1960 年版)。对爱斯基摩人作了最好的全面研究的是:K. Birket-Smith 所著的 *The Eskimos* (Crown 出版社,1971 年版)。关于早期印第安人在智利以及他们如何到达智利的情况,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见 *Science*, 1998 年 9 月 18 日, pp. 1775—1776, 1830—1835。

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标准读物是:A. P. Elkins 主编的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 第 3 版, (Angus 出版社, 1954 年版); W. E. Harney 所著的 *Life Among the Aborigines* (Hale 出版社,1957 年版); R. M. 和 C. H. Berndt 所著的 *The World of the First Australia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Life of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64 年版); A. A. Abbie 所著的 *The Original Australians* (Muller 出版社,1969 年版); G. Blainey 所著的 *Triumph of the Nomads: A History of Aboriginal Australia* (Overlook 出版社,1976 年版)。

### 注释

1. J. J. Lockhart, trans. , *The Memoirs of the Conquistador Bernal del Castillo* ( London, 1844), I, 238.
2. R. M. Adams, "Early Civilizations, Subsistence and Environment," in *City Inevitable*, eds. , R. M. Adams and C. H. Kraeling (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0), p. 270.
3. Lockhart, *op. cit.* , I, 231—232.
4. Cited by E. Galeano, *Memory of Fire; Genesis* ( Pantheon, 1985), p. 158.
5. Cited by A. G. Price, *White Settlers and Native Peoples* ( Melbourne University, 1949), p. 121.

胜了当时所有其他文明,并强行将它们联合成一个差不多是世界范围的社会。西方划时代的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利用海洋,统一了整个有人居住的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南北美洲。

——A. J. 汤因比

---

## 第 17 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公元 500 年到 1500 年的中世纪 1000 年中,世界均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时,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一个骚乱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一再发生的侵略而遭到毁坏。迟至 12 世纪时,英国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表达了这样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其中一部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的面积等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所有的使徒除两人外也都在这里死去。但现在,这些地区若还有基督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土地勉强维生,并向其敌人纳贡;他们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带给他们已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用武力占领了它 200 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威胁更大,因为基督教世界从前曾供养过这些最傲慢的、精灵般的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像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谁愿将基督徒的名声给予那些居住在遥远的海岛上、像鲸鱼似的在冰海

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 300 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sup>1</sup>

277 但是，到 12 世纪时，历史潮流已开始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侵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未获成效之后，伤心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徒的。”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这一事实：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海軍也未曾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这一事实对世界事务的意义在 1625 年一位奥斯曼帝国观察家的下述评论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西方基督教国家]，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奥斯曼帝国必须控制也门沿岸地区和从那里经过的贸易；否则，不久以后，欧洲人将统治诸伊斯兰教国家。<sup>2</sup>



图 101 欧洲黑奴像

这幅由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绘制的卡塔琳娜的肖像画提供了 16 世纪期间欧洲存在非洲奴隶的证据。卡塔琳娜是居住在当时欧洲的金融中心安特卫普的葡萄牙经济部长若昂·布拉达奥的仆人。丢勒在 1520 年至 1521 年逗留低地国家期间成为布拉达奥的朋友。

如果将这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早 500 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作的分析作一比较,全球均势的根本变化会变得十分明显。确实,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它标志着西方占优势的近代时期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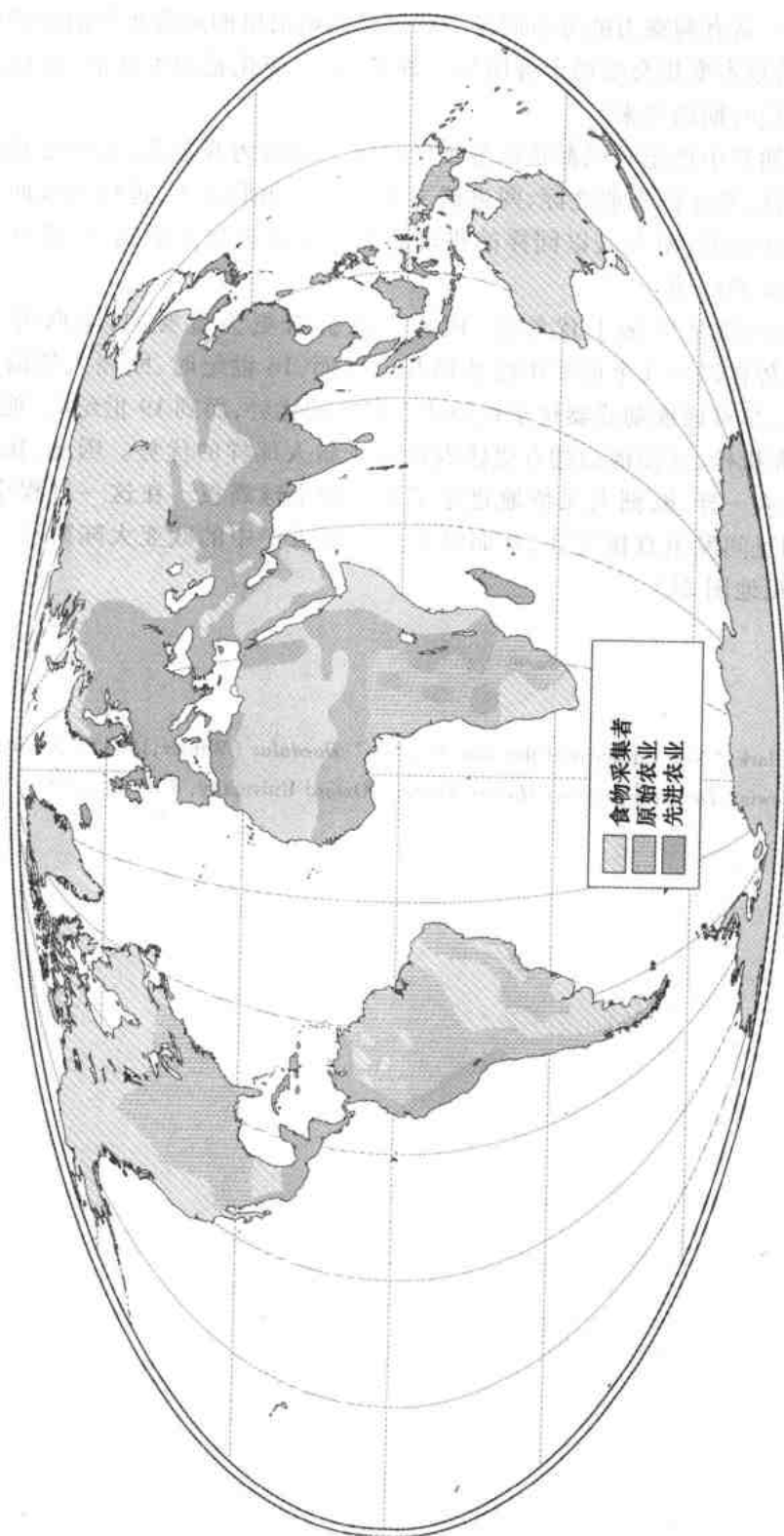
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诸文明中心。相形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各大洋上活动,因而可以自由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

除了未受到挑战的海上优势外,西方人还拥有更为重要的、全面的技术优势——这一优势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稳步增长。因而,16 世纪时,欧洲人凭借航海帆船和海军大炮,享有像铁制武器优于铜制武器那样的优势,而到 19 世纪时,他们的轮船、制造工业和机枪,又使他们拥有更像农民优于猎人那样的优势。因此,犹如班图人取代布须曼人一样,欧洲人无情地建立了他们的全球霸权。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直接交往,从而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欧亚大陆阶段,开始了全球性阶段(见地图 21)。

### 注释

1. Cited by W. Clark, "New Europe and the New Nations," *Daedalus* (Winter, 1964), p. 136.
2. Cited by B.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1961), p. 28.

278



地图 21 1500 年前后世界上的文化区域

#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 历史上的种族

当西欧人开始探险航行时,他们发现散居世界各地的诸民族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例如,中国人所拥有的文明是如此富裕、先进、治理有方,以致许多早期的欧洲来访者都认为中国人的文明优于他们自己的文明。其他的海外人都是些赤身露体、到处流浪的食物采集者,欧洲人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几乎不能算人。因此,欧洲人将他们赶进沙漠或丛林,或奴役他们,或追捕他们,消灭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时,欧洲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们提出这样的理由:我们是一个优等民族,正在将自己优异的文明之光带给世界上诸劣等的(因而也是落后的)民族。

这一理由引起一个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各种族到底是天生就平等的,还是有些种族生来是优等民族,有些种族生来是劣等民族呢?绝大多数科学家——虽然不是全部——都一致认为,各种族通常是平等的。1952年9月,体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在他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所发表的声明,是颇具代表性的:

虽然有些人认为,人类诸群体在发展智力和情感的天赋能力方面有差异,但现有的科学知识并未为这种看法提供任何依据。……遗传差异在决定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不起什么重要作用。<sup>1</sup>

如果遗传基因解释不了欧洲探险者在海外发现的巨大差异,那么什么东西能解释呢?这在今日世界是一个热烈争论的问题。它还引出了种族主义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种族主义认定,一个种族在生物上对另一种族有受定优势。教皇约翰二世对这一问题感到极为不安,恳求主教委员会即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去帮助和唤醒良知……让诸族群和诸种族群体彼此间相互尊重”。1988年,主教委员会报告说,种族主义是一种在古代并不存在的近代现象;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确信,他们对野蛮人有文化优势,但并不认为,所谓的野蛮人因与生俱来的生物原因而低人一等。在近代以前的时代中,以基因为依据的种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其原因很简

单,各种族生活在地区性的与世隔绝中,因此,无须面对这一问题。但是,随着欧洲的海外扩张以及随后的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征服和奴役,种族主义成为能为这些行为辩护的一种方便的理论说明。1537年,教皇保罗二世谴责那些种族主义者说,他们认为:“应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那样对待西印度群岛和南部大陆的居民,专门利用他们来为我们牟利,为我们服务……因此,我们决定并声明,除了基督教将来会知道的其他任何民族外,还有上述的印第安人,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的自由和财产也决不可剥夺……恰恰相反,他们有权享有自己的自由和财产。……她(教会)告诉每个人并试图实践的道理是:‘人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sup>2</sup>

回到上述问题:为什么欧洲探险者在海外诸民族的发展中发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提出了一种似乎与实际的历史经验相吻合的理论: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中获得好处。<sup>3</sup>

换句话说,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281 如果将这一假设应用于全球范围,我们就会发现,遥远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应该是所有群体中在文化上最受阻碍的群体;其次是新大陆的美洲印第安人;然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后——最不受阻碍即最先进的——是欧洲大陆各民族,它们相互之间处于不断的、普遍增加的接触之中。当然,这恰好就是公元1500年以后欧洲探险者所发现的文化水平的递变。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处在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处在从加利福尼亚的旧石器时代部落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的不同发展水平上;非洲黑人表现出类似的多样性,虽然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较高;最后,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存在着在欧亚大陆发现的非常先进、高度发展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南亚的印度教徒和东亚的儒教信徒。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全球的统治,并不意味着西方人



的基因优势。它仅仅意味着,在那段历史时期内,西欧人占尽了天时地利。在其他历史时期中,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在古典文明时期,是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处于文明世界的中心,因而成为最易接近、最发达的民族。相形之下,北欧人那时处于边缘地区,因而与世隔绝,很落后。于是,我们发现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在给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不要从大不列颠岛购买奴隶,因为他们非常愚蠢,完全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无法成为雅典人家庭的一部分。”<sup>4</sup>

同样,在中世纪文明时期,地中海依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北欧依然是诸落后民族居住的与世隔绝的地区。因此,11世纪时,西班牙托莱多的一位穆斯林这样写道:“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种族,生性冷漠,从来没有成熟过;他们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但是,他们缺乏灵敏的头脑和敏锐的智力。”

西塞罗和托莱多的那位穆斯林在他们那个时代都轻视北欧人,认为他们“愚蠢”,缺乏“头脑”和“智力”;事实似乎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北欧人的“落后”同地理大发现时代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落后”一样——或者同当今世界诸不发达民族的“落后”一样——都与基因无关。

但是不管处在什么时期,“落后”都意味着易遭攻击,因为“落后”民族在人数和技术上都落在其他民族后面。对于有60亿人口和遥遥领先的技术的当今世界,情况尤其如此。所以,据估计,自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文化已消失——或者被毁坏,或者被同化。因此,美国人类学家协会建立了“人权委员会”;同样,1972年,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的机构。这一机构试图保护各种现存的文化,例如,它代表因亚马孙河流域的淘金热而陷于危险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尼日利亚境内因石油公司的开采而遭到破坏的奥戈尼人部落和受到危地马拉军队劫掠的玛雅印第安人,充分发表意见。诸“本土”民族是濒于灭绝的群体,其成员的情况通常已为人们所了解;尽管这些“本土”民族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中,但仍占世界人口的5%。<sup>5</sup>

## 推荐读物

232

关于种族的性质、意义和结果,最有用的读物是:P. Mason 所著的 *Race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0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了国际上一些科学家写的论文;*The Race Question in Modern Science* (Morrow 出版社,1956年版)。所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同意,一个种族的成就是由历史和社会背景、而非基因决定的。阐明相反观点的著作是:A. R. Jensen 所著的 *Genetics and Education* (Harper & Row 出版社,1972年版)和 *Bias in Mental Testing* (Free 出版社,1980年版)。L. J. Kamin 已在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 (John Wiley 出版社,1974年版)一书中对 Jensen 的研究结果作了反驳;S. J. Gould 也在 *Ever Since Darwin* (Norton 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

中作了极有趣的、极具权威性的反驳。J. Dower 则在 *War Without Mercy* (Pantheon 出版社, 1986 年版) 一书中对二战中太平洋地区种族的作用作了重要分析。

### 注释

1. Cited by UNESCO, *What Is Race?* (Paris, 1952), pp. 85, 86.
2. F. Boas, "Racial Purity," *Asia*, XL (May, 1940), p. 231.
3. Cited by R.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rev. ed. (Viking Press, 1943), p. 7.
4. *Ibid.*, p. 8.
5.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96.